吴学谦纪念文集

《吴学谦纪念文集》编辑组◎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内附DVD光盘《我的父亲吴学谦》

吴学谦纪念文集

《吴学谦纪念文集》编辑组◎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	石　音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小　寒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吴学谦纪念文集 Wu Xueqian Jinian Wenji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26 印张　336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4 月第一版　200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58年，毛泽东主席、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前排左三）会见非洲客人，后排右一为吴学谦。

1987年8月，邓小平和吴学谦交谈。

1997年1月，江泽民、李瑞环、吴学谦等出席全国政协举办的新年茶话会。

1951年，原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合影。前排左起：陆志仁、张本、张承宗、马纯古，后排左起：张祺、吴学谦、梅洛、马飞海。

20世纪90年代，吴学谦重游原新四军交通站所在地安徽六合市竹镇。

1997年5月，北京举行纪念“五二〇运动”50周年座谈会，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书记吴学谦与当年因声援“五二〇运动”遭被捕的部分青年学生合影。

1950年，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联朋友在一起。右一为团长区棠亮，右二为吴学谦。

1964年4月，邓小平会见伊朗人民党左派、前执行局委员科沙瓦尔兹，右二为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左一为吴学谦。

1980年，吴学谦会见索马里干部代表团。

1983年10月，美国总统里根会见吴学谦外长。

1984年9月，吴学谦外长在第3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1984年11月，吴学谦外长陪同李先念主席访问马耳他期间与明托夫总理举行会谈。

1987年12月，吴学谦会见日本众议院议员辻一彦。

1989年10月，印度总理拉·甘地会见到访的吴学谦副总理。

1991年11月，吴学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台湾“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等一行。

1991年12月24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国务院台办主任王兆国，副总理吴学谦，名誉会长荣毅仁，会长汪道涵（从左至右）步入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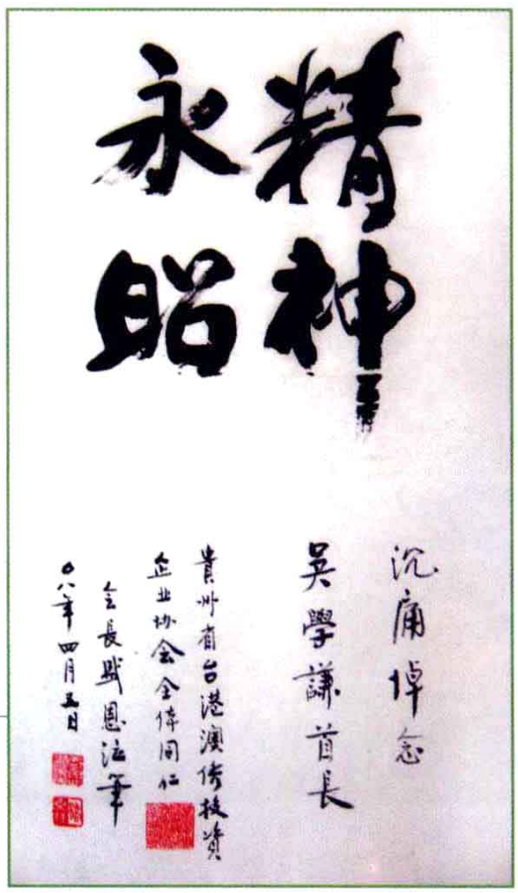
1992年9月，吴学谦副总理在访问日本时会见宫泽喜一首相，双方共述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进程。

1993年8月，吴学谦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煤矿矿区考察。

吴学谦夫妇与儿子吴晓镛、儿媳熊仲颖、孙子吴梦熊及外甥杨纯宝、甥媳郑碧莹及他们的儿子合影。

吴学谦、毕玲夫妇与好友钱李仁、郑韵夫妇（右二、一），朱良、谭雅修夫妇（左二、一）合影。

家人沉痛悼念吴学谦。



各界悼念吴学谦。

吴学谦同志生平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吴学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4月4日9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吴学谦同志，1921年12月19日出生于上海市。他青年时代思想追求进步，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学阶段，他开始接触左翼作家的作品，阅读了许多新文艺小说和诗歌，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和同学们创办了校内文艺刊物，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10月任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格致公学小组负责人。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地下党上海格致公学党支部书记。1940年9月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地下党上海中学区委委员、区委书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暨南大学南迁福建，根据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地下党的工作。1942年9月调赴新四军解放区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交通站负责人、城工部干事。1944年5月回上海后历任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副书记、书记。其间，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他参与组织、发动了上海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示威活动和反美反蒋斗争。他还领导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工厂，到各个阶层中去，扩大革命影响。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了游行学生遭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的

“五二〇血案”，百余名学生被殴伤和逮捕，他同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同志组织上海学生界发动全市罢课3天，并组织学生北上声援“五二〇”学生运动。1948年4月任地下党上海市委委员。1949年6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委秘书长，7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9月率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赴保加利亚索非亚参加第四届国际学生联合会理事会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吴学谦同志历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部长，共青团中央委员、常委，全国青联国际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期间，他主要负责调研国际青年和学生运动形势，开展青年和学生外事工作。他率团同各国青年进行了广泛接触，先后以全国青联驻世界青联代表身份参加柏林世界青联执委会会议，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农村青年大会，出席在保加利亚索非亚举行的世界青联理事会会议，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今埃及、叙利亚），为中国青年同世界各国青年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支持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8年10月至1978年1月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处处长、西亚非洲组组长、三局局长。1978年2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他长期负责非洲及西亚地区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政党和其他进步组织希望了解中国，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交往关系。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主持筹建了亚非研究所，参与组织编写了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非洲手册》，周恩来同志对该书给予了好评。他曾出访非洲、西亚多个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以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代表的身份多次参

加日本反对原子弹爆炸大会。他通过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渠道的友好交往，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与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为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对外交往开拓出可喜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学谦同志遭受“四人帮”迫害。面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他刚正不阿，进行了顽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和革命气节。

1979年3月，吴学谦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赴意大利罗马，就恢复中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进行内部会晤。次年，中断十多年的两党关系正式恢复。中共和意共两党恢复关系，对推动中国共产党同在国际共运大论战及在“文化大革命”中断绝关系的一些国家共产党恢复交往意义重大。1979年12月至1980年2月，他率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非洲10国，加深了我党同非洲国家各政党的交流合作。

1982年4月，吴学谦同志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11月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1983年6月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在他先后担任外交部部长和国务委员期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外关系的新发展，进行了外交战略大调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他在外交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尊严，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维护和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他先后出访50多个国家。1985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和联合国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1986年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联大会议上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身份出席第三十八届至四十二届联合国大

会，在第三十九届联大发言时，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深入阐述我国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1987年出席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会议，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就中美关系发展发表了讲话。在党中央领导下，他坚持祖国至上，不断创新，以“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加强外交队伍建设，开创了外交工作新局面。

1987年11月，吴学谦同志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88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8月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先后对印度、日本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活动。他参加了纳米比亚独立庆典，参与中纳两国建交谈判并签署中纳建交联合公报。在外交工作中，他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始终把祖国的利益和尊严放在第一位，忠实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外交工作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他广交、深交朋友，增进我国同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他思想解放，开拓进取，好学深思，求真务实。他是我国外交战线“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楷模。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坚持中央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对台工作“八项主张”，正确判断台湾问题总体形势，指导对台工作，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他在分管旅游工作期间，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根据我国国情，积极稳妥地指导我国旅游事业发展。

1993年3月，吴学谦同志当选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月担任中共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他同各民主党派和党外各界人士肝胆相照、合

作共事，为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参与领导了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各项工作，为促进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出了积极努力。他充分发挥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的优势，大力拓展人民政协对外交往活动，先后访问韩国、德国、美国和泰国，出席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第二次对话，赴加拿大温哥华和荷兰诺德维克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第十四、十五次全会并发表讲演，应邀参加为庆祝泰国国王登基50周年在曼谷举行的“亚洲的兴起”国际研讨会，发表题为《面向21世纪的亚洲和世界》的演讲。他多次会见来访的外国政要、知名人士和港澳台同胞，并为全国政协成功举办“展望21世纪论坛”等重要国际交流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3月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协会首任会长，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中外人员往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吴学谦同志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学谦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吴学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他党性强，顾全大局，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勤于学习，

注重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工作深入细致，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他作风民主，宽厚待人，团结同志，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和爱护干部。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吴学谦同志永垂不朽！

目　录

江泽民为《吴学谦》画册作序 /1
李瑞环为《吴学谦》画册题词 /3
田纪云题词 /4
马飞海题字 /5
怀念学谦同志　钱其琛 /6
音容宛在 思念未已
——追忆老领导吴学谦同志　叶承垣 /9
我们永记吴叔叔的革命精神
——致毕玲同志的信　张亚圣 /12
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金砚卜 /13
我和吴学谦同志在根据地及地下学委的日子里　陈一鸣 /15
老吴，我们永远怀念您　钟沛璋 /26
青年时代的实践：走向政治上的成熟　钱李仁 /34
回忆同老吴在一起的时刻　朱 良 /40
吴学谦——良师益友同志加兄弟　浦 作 /45
怀念吴学谦同志　吴增亮 /67
忆吴学谦同志的二三事　刘秀政 /76
在上海市纪念“五·二〇”运动
5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上海党史研究室 /81
赴沪参加“五·二〇”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抒怀　傅春令 /83
吴学谦和我　刘起林 /85
深切缅怀吴学谦同志　诸咏芬 /98
珍惜平等亲密的同志式关系
——怀念吴学谦同志　夏禹龙 /104

深深怀念吴学谦同志　李翼振 /106
悼念吴学谦学长　廖贤金 /109
一个特殊的任务　王悦玲 /111
吴学谦与明夷印刷局　支梅芳　孔大成 /113
有关学谦同志的二三事　穆广仁 /117
回忆我和吴学谦同志的历次见面　刘鉴农 /120
深沉悲悼老领导吴学谦同志　姚明达 /125
回忆吴学谦同志二三事　费志融 /126
忆吴学谦同志的共产党人本色　金德琴 /128
“老吴这人很勤恳,没有一点架子”
——追忆老吴住我家的前前后后　费福泉 /130
怀念老吴　张征秉 /134
回忆吴学谦同志　曹奇峰 /135
和吴学谦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殷振民 /137
一次难忘的见面　郭丰敬 /148
迟到了53年的毕业证书
——暨南大学颁发吴学谦毕业证书 /152
关于上海立达图书服务社的情况　曹咏沧 /154
忘不了　严家裕 /156
斯提芬和他的“政治交通”　章大鸿 /158
深切悼念吴学谦同志　王传斌 /168
深深怀念我敬仰的老领导吴学谦同志
——回忆学谦同志关于争取中间分子的片断事迹　梁　畊 /178
缅怀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吴学谦同志　徐　葵 /181
永远怀念吴学谦同志　何振梁　梁丽娟 /186
不尽思念 认真学习
——怀念吴学谦同志　程极明　孙稚如 /190
怀念　周久华 /193
深切怀念敬爱的吴学谦同志　王露仙 /194
春风一样的温暖　钟小满 /197

想见音容云万里 思听教诲月三更
——怀念吴学谦恩师 李燕杰 /199
深切怀念尊敬的学谦同志 李淑铮 /202
吴学谦同志给我留下的一些记忆 蒋光化 /207
光明磊落 两袖清风
——怀念吴学谦同志 杨茂林 /210
永远怀念老吴 郑忠祥 /213
吴学谦同志是我们敬佩的领导和师长 周士琴 /216
谦谦君子 虚怀若谷
——怀念吴学谦同志 彭望东 /220
回忆吴学谦在中联部领导抗震的几件事 林华轩 /224
忆吴学谦同志 丁杏芬 /226
吴学谦同志逝世期祭 宋庆才 /232
学谦同志是我的好领导 吴兆契 /233
严谨宽厚 一心为民
——怀念老首长吴学谦在非洲路上的教诲 李肇星 /235
忆吴学谦同志二三事 李道豫 /238
我敬仰的老首长学谦同志 黄桂芳 /243
缅怀吴学谦在对外工作中的亲切教诲 唐龙彬 /253
陪吴外长秘鲁“历险” 朱祥忠 /259
追忆中国前外长吴学谦 陈有为 /266
怀念敬重的领导学谦同志 詹世亮 /268
吴学谦:清明时节的告别 秦 雯 /274
怀念老首长学谦同志 侯清儒 /277
和学谦同志“一起工作”的日子 袁祖德 /281
一位铭师,一位尊长
——深切缅怀老首长吴学谦 孙起顺 /286
深深怀念吴学谦同志的崇高品德 张龙海 /289
怀念吴学谦 张庭延 /292

为国家四海交友 振华夏心系五洲
——追忆吴学谦同志难忘的两件事 刘俊华 赵建平 /294
怀念吴学谦同志 王 殊 /296
吴学谦：我的朋友，我的知己 [日]辻一彦 /299
吴学谦重视对日工作
——回忆同吴学谦相处的几件往事 杨振亚 /304
我失去了尊敬的战友
——致朱良夫妇信 [日]细川清志 /310
我和他的友情将永恒不变
——致毕玲女士的信 [日]细川清志 /311
回忆吴学谦副总理在对台工作上的重要贡献 唐树备 /312
悼念吴伯伯
——致毕玲阿姨的信 陈 杰 /324
母校发给吴学谦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唁电 /326
清明一生 清明一别 徐春柳 /327
“有大美而不言” 李景贤 /333
哭好官吴学谦 李兴华 /338
我的哥哥吴学谦 程惠甄 /339
舅舅教我如何面对困难 杨纯宝 /342
追思表哥吴学谦 贾春龙 /344
生死不离 毕 玲 /347
征途足迹 笔底波涛
——吴学谦纵论学生运动数十年追忆 鲍世宰 /348
附录：
上海不了情 吴学谦 /384
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 吴学谦 /387
十年地下斗争(之一) 吴学谦 /394
十年地下斗争(之二) 吴学谦 /401

学谦首长，一路走好！ 朱晞颜 /405

后记 /408

江泽民为《吴学谦》画册作序

我和吴学谦同志相识很久。特别是一九八九年我到中央工作后，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学谦同志从一九三八年起就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后来，学谦同志长期负责中共上海学生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爱国学生发起反对国民党政府内战政策的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大到南京、北京、杭州及其他许多城市，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斗争，给了国民党统治以沉重打击，毛泽东同志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第二条战线”。当年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在这种艰苦危险之中，共产党人显示出英雄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学谦同志先后从事青年团、政党、政府外交工作将近五十年，成为一名立场坚定、谦虚谨慎、力求创新的外交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还不多，青年团等群众团体的对外交往对于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学谦同志当时在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担任领导工作。他积极组织青年团的对外交往，主动开展同未建交国家青年组织的来往，广交朋友，成功组织我国青年代表团参加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有一百多个国家几万青年参与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和国际青

年友谊运动会，为促进我国文学艺术和体育运动走向世界、促进我国文化和体育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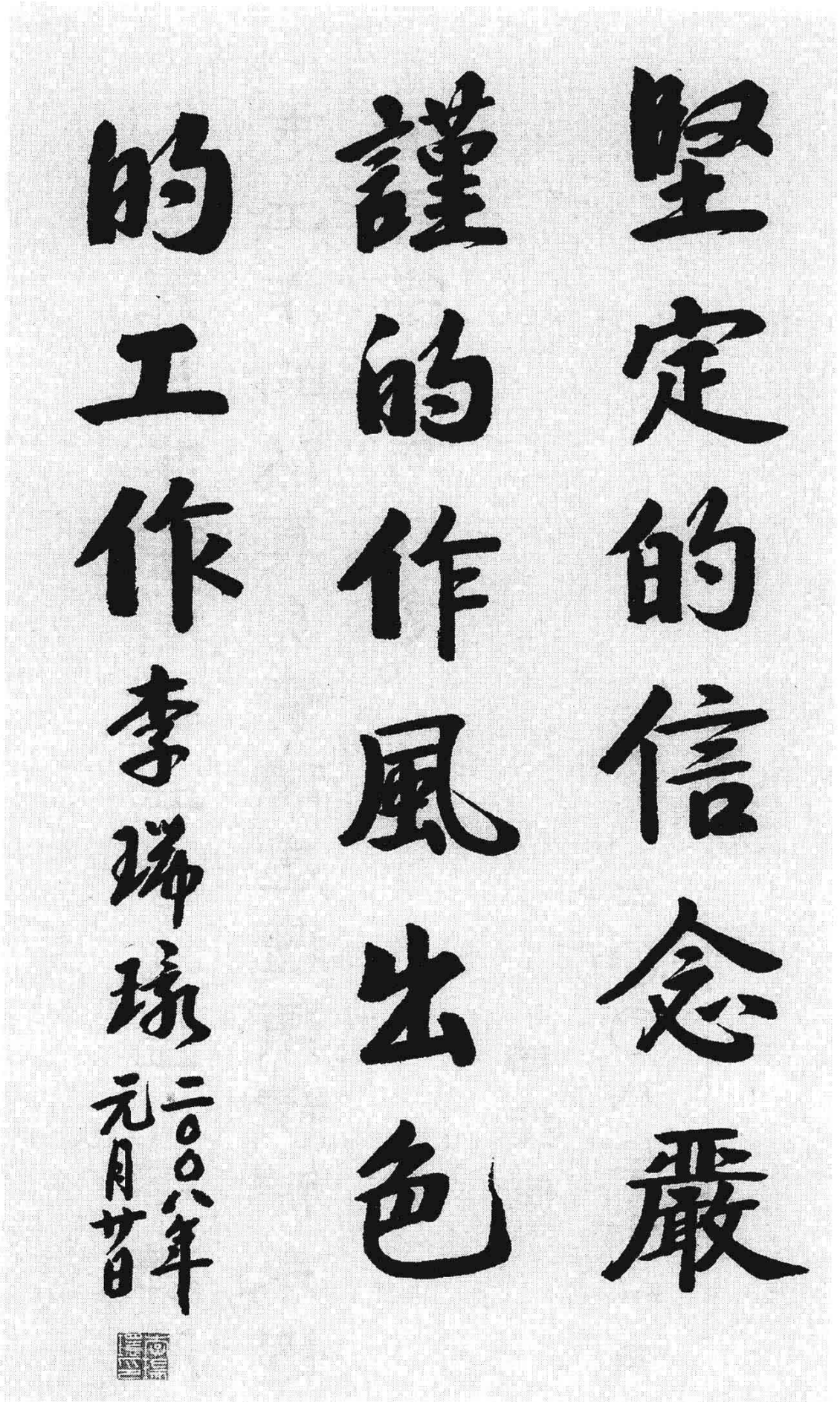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中，学谦同志遭受迫害，身陷牢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谦同志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积极支持拨乱反正，为开展政党外交和打开国家外交新局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一九七九年，学谦同志前往意大利，代表中国共产党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了三天坦诚会谈，积极推动恢复已中断十多年的两党关系，使两党关系于一九八〇年得到恢复，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国家共产党恢复关系的进程。那时，中联部还开始了同各国社会党的往来。一九八二年，学谦同志出任外交部长。他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反对霸权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为做好外交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口对我国实行所谓“制裁”，我国外交工作面临极大困难。学谦同志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工负责外交工作，他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工作、不懈努力，积极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学谦同志还参与领导了对台工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促进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做出了贡献。

在同学谦同志的交往中，我感到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志真诚热情，对干部任人唯贤。学谦同志的优秀品质，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好好学习。

在这本画册出版之际，写了以上这些话，是为序。

江泽民

2007 年 12 月



李瑞环为《吴学谦》画册题词。

我与学谦同志共事多年，学谦同志工作的认真负责谦虚谨慎精神永远值得学习与怀念。

田纪云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吴学谦同志对党、国家和
人民作了巨大的贡献。他
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
辉的一生，永远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

马飞海 一九九五

怀念学谦同志

· 钱其琛 ·

一

第一次见到学谦同志，还是当年从事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期。那时，我是一名高中学生，在大同大学附中上学。加入上海地下党后不久，一天，组织上通知，说上面的同志要来见面谈谈。那位来见面谈谈的同志就是学谦同志。记得我们是在马路上见面，边走边谈，谈了大约半个小时。那时，我不知道学谦同志的真名，只知道他叫“老吴同志”。地下党有很严的纪律，不能打听，且多是单线联系。那次见面之后，直到上海解放，我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那时的学谦同志，虽被叫“老吴”，其实也只比我大七八岁，不过二十岁出头，但已是一位资深而成熟的革命者。作为当时上海地下党学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是上海抗日救亡爱国民主运动以及后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学生罢课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学谦同志1938年6月就参加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那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组织。1939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就一直在上海从事着地下工作。那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毛泽东同志对上海地下工作的形象性的评价），环境极其危险，地下党同志都是抱着随时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投身革命运动的。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中国人民爱国革命热情也空前高涨。在上海，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投身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

去。许多热血青年，正是在学谦同志这样的地下党员的组织和感召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直到迎来1949年的上海解放。

二

再见到学谦同志，已是全国解放以后了，他先是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负责国际青年的交流工作，后调到中联部，从事政党外交工作。

与学谦同志真正一起工作并接触多起来，是1982年以后。那年4月，他从中联部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并在同年11月正式就任外交部长。

当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许多外交政策需要进行重新调整，许多领域需要开创新局面，中国外交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而那时外交部内部，还有不少矛盾，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

学谦同志到任后，很快就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把握全局的能力和团结各方力量的胸怀。

在外交方面，他从调研入手，通过召开小型研讨会，就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等重点，提出了新思路，打开了新局面。在贯彻完成中央外交战略转变的同时，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奠定了新的外交格局。

在内部，他强调“五湖四海”，团结各方面的干部，理顺了干部关系，使外交部的工作很快走上了规范化的正轨。而他本人，坚持原则，又能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却宽于待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和崇高品质，赢得了外交部广大干部的信任和支持。

三

作为当年的引路人和后来的老领导，学谦同志的言传身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他的谦虚，以及对革命理想的忠贞。

学谦同志早年就投身革命，为党的事业做出过贡献，但他自己几乎很少主动提及这些“英雄事迹”。后来，即使作为党和国家

领导人，他在工作和生活中，也仍保持着一贯的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唱高调，不讲排场，不自我吹嘘。

“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迫害，在“秦城”监狱被关了多年。出狱后，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坚定信念。

从少年时投身革命，到晚年的兢兢业业，学谦同志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追求理想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生，也是令后人缅怀和敬仰的一生。

（2008 年 8 月 27 日）

音容宛在　思念未已

——追忆老领导吴学谦同志

· 叶承垣 ·

吴学谦同志走了。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祖国和人民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受我们尊敬的老领导。

我和他第一次直接接触是1995年1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吴学谦同志来宁波视察。我刚由宁波市委转到市政协任主席，陪同他先后考察了宁波港、工业企业、全球环保500强之一的奉化滕头村、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等地，前后约十天。特别是看了港口以后，他说：北仑港自然条件很好，完全有可能建设成为世界级大港。希望宁波充分发挥港口优势，积极促进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步伐。三年后，他又来宁波，我陪同他在东钱湖休息过几天。因为他老伴毕玲同志是宁波人，待人诚恳热情，所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以后每年我去参加政协大会和列席全国政协常委会议时，先后几次去北京万寿路家中和北京医院探望他。

吴学谦同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领导架子。我长期在宁波工作，改革开放前，根本见不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4年宁波被列为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紧接着1987年宁波又被列为计划单列市以后，经常有中央领导同志来宁波检查指导工作。当我第一次去住处看望他并汇报工作时，他很客气地拉我坐到他身边，轻声细语地说：我到政协不久，如何做好政协工作，我们可以敞开聊聊，互相交

流。经他这么一说，我就立即消除了紧张心理，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放开思想交谈了。他说：我看了一些材料，你们宁波市政协搞“委员约谈会”的做法很有新意，这种形式好，可以利用政协渠道，集中各方意见，向党委反映，也可向全国政协通信息，这是一条重要的反映民意渠道。听说你们宁波市政协还组团出访香港，把政协牌子打出去，把民主党派的作用发挥起来，把对外工作搞活，这很好嘛！现在我们大家要动脑筋，拓宽政协工作的思路，要把政协工作搞活，搞得生机勃勃。整个交谈过程中，他既是一位上级，又俨然是一位探讨问题、十分随和的长者。

吴学谦同志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思路开拓，敢想敢说。在多次接触中，吴学谦同志常常畅谈他对新时期如何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创新思想，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指示和启迪。他说政协工作有三项职能这是原则，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搞得有生气，不能干巴巴的。参政议政一定要参在国家大事上，这就是帮忙。譬如经济问题，不要只讲速度、讲造了多少高房子，一定要讲经济质量，有质量的经济才是真实力。他介绍说，最近一位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发表了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所以，大事多听听政协意见很有作用，旁观者清嘛！民主监督是政协工作一个薄弱环节，有的地方只唱赞歌，很少讲问题；有的地方讲了意见，被监督者却听不进去。民主监督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封建社会时间长，在民主这方面很不够。政协没有大权，但有提意见的权利。他的许多重要意见，我们传达学习以后，对大家解放思想，拓宽政协工作思路，积极主动地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在参政议政方面，宁波市政协紧紧抓住事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的问题，深入调研、建言立论，并力求取得实效。我们围绕宁波深水良港作用发挥问题，多次组织视察、研讨会，把过去单纯以散装货物（矿石、煤炭、原油等）为主的功能定位，转变为集装箱和散装货物并重的发展战略。现在宁波港已成为世界级重要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已超千万标箱。此外，还紧紧抓住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议题不

放，经过三年努力，最终列入了省委、省政府和国务院决策议程。今年5月1日，杭州湾跨海大桥胜利建成并正式通车，不仅使宁波由交通末端，变成沟通国家沈海高速的南北通道，还为实施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主监督方面，宁波市政协创新了能够实现广大委员和政府部门领导人面对面交流互动的“政情交流会”，创新了实行坦陈批评意见、定期跟踪整改情况的“民主评议政府部门工作”的新形式，等等。当我们回首往事、总结思考时，更加体会到吴学谦同志如何开展政协工作思路和指示的宝贵，更加体会到他的创新思路对发挥政协组织作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吴学谦同志的俭朴生活，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的作风，真让我肃然起敬。他到政协工作后曾两次来宁波，前后十余天，明确嘱咐我们日常生活一定要按接待标准规定严格执行，不饮酒，也不允许上名贵菜肴。后来，当我第一次去他家看望时，进门后毕玲同志随即领我上楼，她笑嘻嘻地说：“看看我们的家当。”他家的扶梯、楼板的油漆都有斑驳的剥落点，房内家具都是陈旧的“过时货”。走到楼下客厅，水泥地上铺设的腈纶红地毯，完全呈现了暗色，一套旧沙发和几个旧书架，可以看出是已用了多年的老货。这就是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唯一吸引我目光的是客厅中堂一幅骏马水墨画。毕玲同志说：“这是韩美林同志刚送给老吴的。”我开玩笑说：“你们家里的陈设，还不如宁波有些农民家的装修和家具。”学谦同志微笑着说：“吃穿用住都有保证，生活已经很不错了。我国西部许多地方，还穷得很啊！”这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格，真让人深受教育。

斯人已去，功绩和榜样长存！

（2008年8月）

我们永记吴叔叔的革命精神

——致毕玲同志的信

毕玲同志：

晨起看报，忽见吴学谦同志逝世讣告，心中十分难过，可惜党和国家又失去了一位领导人、杰出的外交家。

其实我称呼吴叔叔和您毕阿姨更为确切，因为您们是我父亲张承宗和叔叔张困斋的亲密战友，而吴叔叔又是看着我成长的。那是60年前的事，他常到中共上海市委机关秘密联络点之一“丰记米号”，和父、叔、刘长胜密谈工作。有两次吴叔叔骑自行车带着我（坐在后面的铁架上）到福州路热闹的米市里的一间屋子（秘密联络点）去。夏天夜晚还骑车带我沿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到外滩，对我亲切关心。1946年6月23日大游行，我参加学生队伍，吴叔叔是现场指挥和联络员之一，指挥着游行队伍。

建国后我在吉林热电厂工作，由上海回东北时曾奉父命路过北京到府上拜见您俩，您们拿出家里最好的食品招待我，不由想起解放前白色恐怖下艰苦的情景。后来一次的见面，则是1982年9月，那时我是宝钢发电厂的副厂长，吴叔叔是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陪同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参观电厂，和我热情握手，我感觉十分荣幸。此后他还为我的叔叔张困斋烈士纪念馆题词，为我的父亲张承宗文集作序，老一辈的革命战斗情谊，教育了我们下一代。我们永记吴叔叔的革命精神，永远怀念他。

请您保重身体。

张亚圣 谨上

2008年4月5日

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金瓯卜·

我和吴学谦同志早在1939年春就相识。那时他才18岁，我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学生部门派去和他接上党的关系。此前，他已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在格致中学从事抗日救亡的活动。

1939年春，当时日军已占领了租界以外上海的全部地区。处在敌人的包围下，租界当局禁止民众从事抗日活动。格致中学是英租界工部局直接开办的一个中学，对学生活动的控制尤为严格，甚至开除一个带头在校内悬挂国旗以表示反汪的爱国学生。吴学谦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参加党。他的学习成绩向来很好，在入党后，全不顾他贫困家庭对他的厚望，无私无畏地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团结和帮助校内的同学们提高觉悟，开展反日伪的活动。他还致力于把经过考验的优秀的积极分子发展为党员，建立了在格致中学的第一个支部。在和他相处的这一时期，我对吴学谦同志的忠于党的职守，对工作的执著和甘愿为革命奉献一切的印象极为深刻。一直认为他具备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优秀品质。

我和吴学谦同志，在此后因岗位不同，就一直没有再会过面。十分意外，过了半个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春节的早晨，他突然来到我家，对我和我老伴说，他爱人毕玲去了上海，趁此机会，正好来和我们一起过节。整整一天，从早到晚，我们乐哈哈地在一起度过了大年初一。战友久别重逢，更给节日增加了欢乐。吴学谦的此举，既说明在地下时同志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

一起，生死与共，休戚相关，亲密无间，友情胜过亲情，相隔年代再久远，也一见如故，畅叙为欢。同时也发现尽管学谦同志平时不大动声色，似是一个偏重于理智型的长者，实际上却对和他在一起过的同志们都怀有深情，即使过了半个世纪，也长久不变。此后，我们就一直亲切地称呼学谦同志为“老吴”。

接触多了，我们发现老吴始终没有改变他早期给我的印象：为人谦和，态度亲切，稳重沉着，脸上不时带着微笑，给人一种易于接近的感觉。他与人交谈，十分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自己谈时，语言简练，从不夸张，而切中要害，从而更增加了他讲话的分量。即便在他职高位重时，也依然如此，平易近人，不沾一点官气。这显然是与他高度的修养有关。

老吴严于律己，他爱好读书，长期坚持记工作日记，生活朴素。他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也以此要求家人。在“文革”坐牢的三年里，他不屈不挠，坚持在牢内每天来回走数千步，以保持作为革命本钱的身体的健康。出狱后，在60岁的高龄，为增强体质，保证能有旺盛的精力工作，他每天在上班前，于清晨五点外出，长距离地步行。他的一生，可以说真正达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完美地步，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品质。

老吴走了，他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我和吴学谦同志在根据地及地下学委的日子里

· 陈一鸣 ·

吴学谦，战友间直呼“老吴”。我们在革命岁月里凝成深深的战友情。老吴，您和蔼可亲的笑貌，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对敌我是非的爱憎、对工作的严谨细致、对生活的严格自律，至今仍留在我和同志们心间。

我们这一代献身大时代壮丽事业的青年学子，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培育和领导下成长，在勤于学习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自我教育中成长，在集体的思想交流和合作中成长，在团结群众共同进行复杂、严峻的斗争中成长。

回顾抗战风云中的1942年秋，上海百余位地下党的领导和各委的干部，聚集到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淮南根据地的“顾家圩子”。学员们在中共江苏省委主持的集训班学习，其中30多名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同志十分活跃，走进向往的自由天地了，大家时常放声歌唱。老吴，您也和我——“小陈”一同高歌《延安颂》、“你是灯塔……”，您那熟悉的声调，至今似乎仍在耳畔回响。

集训班上，结合学习党中央的整风文件精神，刘晓同志为大家作了抗战以来上海工作的总结，报告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成功的实践检验了党中央白区工作新方针的正确导向，也证明了创造性实践的可贵。大家都联系了各自担负的工作，总结经验、探索规律。

集训班上，沙文汉对学委系统同志作了工作报告，传达了省委批准的关于学生运动应发展为社会青年运动的方针，为我们指明

了长期斗争的新方向。他谈了对工作的理论体会，并用学习松柏和柳树来启发我们，鼓励加强党的原则性和工作的灵活性的修养。

“顾家圩子”的学习内容是那么丰富，我们还聆听刘长胜同志亲历海参崴工运的故事、刘宁一同志在监狱中坚贞不屈的斗争体验，这些无疑都成为对我们意志和理想的激励。

1943 年春，党中央决定解散省委，由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继续领导原江苏省委所属的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作。多数同志仍回到上海坚持地下工作，有些则被派往延安学习。除原负责交通的同志留城工部外，马飞海、老吴和我，以及陈慎言、张征秉等原学委系统的几个同志被调入设在“大王庄”的城工部。

在刘长胜同志的主持下，任秘书的张承宗同志与老马、老吴和我分别负责对敌占区经济、文化、教育、青少年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

去延安前的刘晓同志仍十分关心我们政治上的成长，还参加了我们的时事讨论，听取发言。

1943 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动的整顿三风运动也在华中局领导下开展了。在长胜和承宗同志主持下，老马、老吴留城工部参加整风，我、田辛及其他四位同志去了华中党校。1944 年春，当我们结束整风回到部里，长胜同志就召开学委系统几个同志的整风汇报会。老吴作了整风的自我思想检查，我剖析了政治思想中的问题，记得当时我还流下了眼泪。老吴和其他同志对我作了分析帮助，长胜和承宗同志都对我作了严格关切的教育。

1944 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决定》，这是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城市的重要部署。

张本同志和负责中学分委的李琦涛同志专程从上海来，与老吴和我等一起作了研讨，我们学习中央精神，结合上海的工作实际，共同研讨了贯彻意见。在部的指导下，我将意见主要精神写入《抗战以来的学生运动》一文的末章，“准备反攻中学生运动的方向”。此文刊在华中局党刊《真理》第 10 期上。这些精神是：

发扬学生青年在大革命前夜宣扬真理、宣传形势，鼓舞信心

的先锋作用，向广大人民发出号召，同舟共济，对抗日寇。把学生青年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力量结合起来，学生运动要发扬桥梁作用，扩大为社会青年运动。

广泛发展青年的力量，开展学业和生活上的互助合作，为新中国准备人才，为争取学生继续求学，保存群众基础而斗争。要团结大批优秀的、有觉悟的、有能力的先进分子，更有效地联系、教育广大群众。

争取一切在敌伪各种组织里的青年，用各种形式与敌伪作斗争，保障青年的权利，揭露敌寇的真面目及它的末日的到来。

一切在敌战区的学生工作者、共产党员，只有依靠群众，学习群众，率领群众与敌人作灵活复杂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进行自我思想改造，坚定阶级立场，提高政治水平，才能组织起强大的力量来迎接胜利。

7月，城工部决定建立新一届的以张本为书记的上海学委，由吴学谦任学委副书记，我任学委委员。老吴先回上海工作，10月初，我负责第一期的上海党员整风轮训班工作结束也返回上海。不久，老吴和我又住到一起。老吴化名吴志毅，商人身份。我化名陈善庆，教师职业。在南市小西门吾园街的一条里弄中，有一座石库门的老宅，这是朱承坚（王光华）同志的老家。他的姐姐朱梅已去根据地，父亲朱穰丞，一位早期的优秀戏剧家，已去欧洲探寻革命真理，我们在老宅中发现他寄回来的一大批法共《人道报》。朱承坚那善良、热忱的母亲王季风接待了我们，我们被设法报入了保甲户籍。

平日里，我们都骑着自行车去联系同志，学委会就定期在这儿召开，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老吴才住到浦作同志家，我则住到从内地归来继续办学的父亲的家。

遵照城工部的指示，学委贯彻了在上海就地整风学习的精神，成立了由老吴分管的整风文件刻印小组。按照征秉同志背诵、承坚同志手抄整理的整风文件，被印发到各区委以组织学习，学习中还须联系本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自我剖析。这一整风

学习使同志们的阶级觉悟、政治水平得以提高，实践党的三大作风成为同志们的自觉行动。

为适应工作的转变和发展的需要，学委对组织作了调整，在中学方面，除施惠珍同志任书记的女中区继续由张本联系外，中学分委撤销，改为两个平行的中学区。一个区由钱李仁同志任书记，一度也由李琦涛兼任、老吴负责联系；另一个区先后由俞正平和吴康同志任书记，由我联系。（到1946年初，又设立了以龚兆源同志为书记的另一男中区，也由老吴负责联系。）

1945年初，学委决定正式成立两个社会青年区，一个由原来朱承坚、浦作负责的交通、电讯区委，扩建为第二社青区，由老吴联系；另一个是由金瓯卜、曹宝贞负责的社青区，由我负责联系。这两个区委覆盖了全市许多重要的企业、交通的要害部门，包括青年科技人员、大学毕业生团体和学校、医院等阵地的党的力量。

此外，老吴还领导了派往昆山地区、以龚兆源为书记的工委，我则联系邵洛羊同志，并由陈昌谦同志协助，联系洛羊主持的、打入汪伪青少年团中的党员。

张本和学委委员莫振球同志继续联系着两个大学区委，一个由莫兼书记，一个由吴增亮同志任书记，由莫负责联系。

学委贯彻了党对群众工作再转变的要求，各大中学校的支部都利用和创造合法条件，使团结群众的工作从原来的分散状态转为集中，发展了班级活动和跨班级活动，发展院系活动和全校性活动，活跃学生自治会、团契和青年会、联谊和福利性的组织和活动。还组织起读书会、研讨会等，了解形势，学习进步书刊。

1944年冬，学委领导各区委、支部发动了两项大活动。一项是扩大了“天亮运动”的宣传，趁圣诞节和新年来临之际，以新四军的名义，发出了贺年卡，报导抗战胜利在望。

老吴领导了一个秘密刻印、投送工作的小组，使一千张贺卡寄到了各大中学的师生中间。广大群众奔走相告，收到策反信的伪方人员胆战心惊。日寇出动了宪兵，四处追查，上海工专有两个党员先后被捕受刑，一个变节招供，另一个是支书贺崇文，他宁

死不屈，又机智地逃脱了魔掌。学委及时作出决定，在党内发出通报：表彰坚定的革命者和将叛徒开除出党，以此教育同志们。

学委发动的另一项是大规模的救济失学义卖活动。面临日寇统治下的学生失学危机，少数学校和申、新两报已在开展助学活动。当时，我分工负责基督教青年会的统战工作，我向从事学生工作的爱国人士建议：发扬青年会原有的依靠群众举办慈善义卖市场的传统，主办一次全市性的救济失学义卖市场。他们采纳后积极行动起来，并发出了公告。

在学委的部署发动下，40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广泛地向工厂、商店劝募商品，向家长推荐义卖市场的代价券，并手工制造了各种义卖商品和工艺品。

1945 年 2 月 15、16 日两天中，一千多名学生在青年会会所设立了各校的摊位，还有各种节目演出和现场服务，十万人次的顾客涌向会所。两天的义卖所得超出预计目标，大批清寒学生避免了辍学。声势浩大的救济失学义卖活动体现了学生青年和社会各界“同舟共济”的团结力量，有力地冲破了敌寇长期统治下的窒息和压抑，鼓舞了广大青年的斗志，实现了学生工作的一项大转折。

还值得回味的是：在日寇灭亡前夕的 1945 年 5 月间，一部歌颂秋瑾英勇就义的大型话剧《党人魂》上演后反响热烈，在上海两大歌剧院演出了十个场次，激发了一万三千多观众的爱国情怀。这是我们打入汪伪青少年团的同志们，团结店职员、学徒的“一青剧团”，巧妙利用敌伪组织的形式，成功实现了特殊使命，从而锻炼壮大了一支社会青年力量！

老吴和我在南市共同工作的日子，正值我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记忆犹新的是，在学委会上，我们常一起审阅来自各区委、支部的一份份申请入党的报告。

这些要求入党的同志，经历了抗战以来党领导下多年工作的锻炼，他们是在大转折中涌现、奋起，逐渐成长为迎接新战斗的党的儿女！

整个抗战时期，上海学委系统共发展了 1300 名党员。1937

年底，上海学生界的党员和学生工作者为200人，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除大批党员同志已支援根据地和其他城市斗争，上海学委仍有757名党员坚守在各个岗位。抗战胜利后，继续入党的同志们仍然很多。学委遂决定将审批的责任交给了各区区委。

1945年春，党中央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由田辛同志从城工部带到了上海。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号召，激励了所有的同志。

老吴为筹组地下军，直接联系了一位从大学支部调出的单意基同志，布置他打入伪警察中。经过单意基的艰苦工作，从中发展了我们的积极分子。在老吴的指示下，到胜利前夕，负责掌管军械的单意基，直接掌握了一批可供起义的枪支。

在日本乞降前夕，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华中地区大中城市，命城工部领导回上海发动群众，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并成立以刘长胜同志任书记的上海市委。11日，任委员的张承宗同志先回上海，他向学委张本、老吴和我作了传达和布置。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学委在此时期，迅速进行了各校和各单位的组织准备，以及恢复全市性学生组织、多方面地发动群众的组织准备，并印发了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命令。

8月21日起，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决定改变方针，指示上海市委停止武装起义。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转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群众团体，开展保障群众生活权益和清算汉奸的斗争，继续坚持长期、隐蔽斗争的方针。当前，要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口号，广泛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和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阴谋作斗争。对学生青年运动，要求大力团结和教育群众，并发挥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中的先锋与号角作用。

在刘长胜同志和张承宗同志的领导下，学委发扬了全体同志的革命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的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主要的是：

—1945年8月，在救济失学义卖市场的群众工作基础上，首

先恢复了由男女青年会支持的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上海联”），组织起各校的团体力量，开展多样生动的活动，70余所学校积极参与，建立了“新音乐社上海分社”。

—1945年8月，圣约翰、沪江大学、上海音专、正行女中四校发动了反汉奸斗争。

—1945年9月，交通大学等六校发动了“学生无伪”的“反甄审”斗争。

—1945年12月，4000名学生青年上街进行“欢迎马歇尔”的反内战斗争。

—1946年1月，以学生骨干为主体的全市各界一万名群众聚集玉佛寺，公祭烈士于再，而后游行示威，向蒋介石和政协发出政治要求。

—1946年1月，针对年前青年会、“上海联”主持义卖助学活动受阻，学委采取合法斗争，成立上海学生助学联合会（“助学联”），发动98校二万学生上街劝募。

—1946年2月，在“上海联”、“助学联”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学团联”），有98所学校参加。兴办了许多青年爱好的全市性活动。

—1946年3月，全市二万名各界妇女，在中山公园纪念三八节并举行了游行，提出保障妇女权益和政治要求。学生界发挥了骨干作用。

—1946年4月—6月，从敬师运动到尊师运动。

当物价飞涨，教师生活陷于困境，全市市校教师向教育局请愿，遭到冷遇后，发动了怠教。部分私校大学教授也开始罢教。有一些大中学校学生发起了敬师活动。学委就决定发动广大学生的“敬师运动”，支持教师。

然而，由“学团联”公开领导各校学生推售“敬师章”的活动和宣传，在校内外却遭到各种破坏和压制。

接着，在4月17日的报上，刊出了当局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的告各界书，宣称要捐募巨款，救济教师。委员会由教育局副

局长、三青团上海团部总干事李熙谋任总干事，并由陈鹤琴任副总干事。

面临这样的情况，学委会进行了研究，张本和老吴提出了意见和对策：当局标榜“尊师”，是为了平息教师的不满和风潮，推出知名教育家陈鹤琴，显然是为了利用他的社会声誉。我们可以团结陈鹤琴，争取“学团联”参加联合尊师，利用合法去发动群众，就能绕过“敬师”的障碍，实现我们对广大师生的团结。我分析提出：我的父亲陈鹤琴同意出任尊师工作，是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而长期以来，他是重视依靠集体力量举办群众性的教育事业的，因此他必定赞同学生合作和发动群众的，这将有利于我壮大群众基础。

1946 年 4 月，刘晓同志从延安回到了上海，主持上海党的全面领导工作。此时，老吴也被组织任命为学委副书记。

刘晓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对上海工作的 4 月指示，精神是：

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在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一个长时期里，国民党在上海将占优势，因此，上海的地下工作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注意积蓄力量，扩大群众组织，争取中间分子，造成深厚的强固的社会基础，以待时机。在工作作风上，切忌犯急性病，只顾眼前利益。同时，对国民党的各派系要调查研究，利用矛盾，利用合法，采取智斗，善于斗争；必须注意隐蔽党的组织，明确坚守秘密工作原则。要唤醒人民注意全国局势，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压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学委关于参加联合尊师的对策，实践证明是符合这一精神的。

经布置，“学团联”的主席陈震中和顾光顺二同志，由我的二妹陈秀瑛（约大的党员）以同学的身份引见陈鹤琴。陈鹤琴欣然同意学生联合尊师的意见。我也在旁鼓动他说服李熙谋，促成此事。

此后，经陈的疏通，教育局接受了意见。5 月份，在陈鹤琴的主持下，经过教育局、官办的“学生总会”和“学团联”三方的谈判，达成了以“上海市学生尊师运动”命名的各自发动群众的协议。

经充分发动，“学团联”联系的学校增加到 159 所，影响到 200 所。5 月 27 日—29 日三天内，二万五千名学生上街义卖“尊

师谢帖”，许多学校在校内举行了各种尊师活动。陈鹤琴亲自和其他爱国人士邀请了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举行了义演。出于对教师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广大的各社会阶层民众，包括工商界都积极支持，尊师款超过10亿，由立信会计学校的学生审核，并公布账目，再经我党领导的市中等教育研究会的监督，分发到各校教师。

整个运动充分体现了我们主动运用统一战线，利用合法，发扬广大群众的自救精神，打破了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压制和控制，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团结，也提高了政治觉悟。

1946年6月16日，天蟾舞台热闹非凡，100多所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尊师庆功大会在此召开。这是由“学团联”的同志们精心组织的。大会将尊师庆功转为反内战、争和平民主的内容，这是中央委派来沪调查学生运动的青委负责人冯文彬同志出的主意。在会前，我曾陪同他见“学团联”的党团书记黄振声同志，听取了工作汇报。冯文彬提出意见并批评称，学生运动不应还在搞生活性的。他还表示，他将请郭沫若来演讲。会后，我向学委会作了汇报。

尊师庆功大会由陈鹤琴任执行主席，他热情赞赏了全市学生团结的力量。当郭沫若上台演讲，抨击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发动内战，大量耗费军费，是造成教育危机的根源时，林汉达、孙起孟两位也相继演讲时，反内战、要和平的横幅出现，全场群众情绪高涨，歌声四起。大会最后由陈鹤琴宣读了上海学生的五项要求：立即停止内战，降低学费，提高教育经费，保障教师生活和职业，维护国家一切主权。

冯文彬同志也由张本和老吴陪同，秘密到会。

尊师庆功大会强烈震动了国民党高层。

大会次日，陈鹤琴一回家，就告诉我说，他被李熙谋指责：“你被人利用了！”陈鹤琴为之抱怨说：“郭沫若来演讲，我事先并不知情。”我安慰他说：“郭沫若的讲话是从事实出发，是有道理的”。

再次日，陈鹤琴对我说，教育局有人告诉他：“你的儿子是共

党学运的高级领导人”。就要我早日去美国留学，并称他已去信向美国大学申请奖学金。

我立即去福煦路我党办的丰记米号，找有经理身份的老吴：我向他报告了上述情况，并表示，我是有岗位的，怎能去美国留学。

很快张本就来找我说，组织上已查到国民党内确有此情报，并称组织要我同意父亲让我留学的要求。

相隔半个多世纪的20世纪80年代，我在负责从事上海学生运动史的征集工作中，竟从市档案馆查到一份以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宣铁吾署名发出的情报，它称：陈鹤琴的儿子名陈高，绰号“小陈”，为共党学运高级领导人，是共党学生团体的负责人，要严加注意等。

这份情报虽有来头，但并不确切，如把“学团联”公开负责同志和我混淆了。

1946年6月19日，刘晓同志和承宗同志约张本、老吴和我开会，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部署发动上海各界人民支持和平请愿代表团赴京请愿，于6月23日在北站集会、大游行，并要求学生界队伍在“6·23”运动中起组织和宣传的带头作用。

在这次会议中，刘晓同志曾指出，尊师庆功大会转得太急，是不利于长期隐蔽斗争的。刘晓同志并称对此他已批评了冯文彬同志。

“6·23”运动后，刘长胜同志召集学委同志汇报学生界参加的人数。张本、老吴和我，还有李琦涛同志，分别汇报了各区委统计各支部组织参加的群众人数，合计为二万人，并针对国民党制造的“下关惨案”和我们的宣传教育，汇报了群众在政治思想上的收获。长胜同志表示，根据各委（学委、教委、工委、职委）的汇报，参加“6·23”运动的总人数为五万人，是我们工作成果的一次力量大检阅。

7月初的一天，刘晓、刘长胜、张承宗同志约见学委我们三人。刘晓同志在安排我赴美留学任务时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重要指示：国民党反动派现已发动全面内战，但经过几年的艰巨斗争，我

们一定胜利。为了建设新中国，需要开展争取留学生的工作，做好建设人才的储备。学委可将已有条件出国留学的同志派去工作并学好专业。

长胜同志也嘱咐说：要以各种适合环境和留学生要求的方式把留学生团结起来，配合国内革命形势进行教育，使留学生关心祖国的命运，到新中国成立时，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事业。

10月间，我和也是党员的大妹陈秀霞与一批出国的留学生同船离沪赴美。

老吴，回顾1944年夏到1946年夏，从迎接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革命形势激变，两年来我们在新一届的学委里共同工作。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抗战以来共同奠定的党的群众工作基础上，我们学委遵循正确的方针政策，依靠各区委、支部所有同志的自我教育、共同奋斗，发扬了革命的创造精神。大家深入群众，从广大群众的切身要求和青年特点出发，去组织和教育群众，引导他们冲破敌人的压制，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开辟了学校与社会的新阵地，使青年和广大民众相结合，特别是锻炼了所有干部，积累了经验，为迎接革命运动新高潮准备了条件。

在这段时期中，值得一提的是学委系统的学生报刊工作，它全方位地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抗战胜利前夕，有《莘莘月刊》（丁景唐、沈惠龙等负责），它曾报导了救济失学的义卖市场盛况；抗战胜利后有《联声》（陆兆琪等负责，“上海联”恢复后的机关报）和《新音乐》（“新音乐社上海分社”）、有《时代学生》（陈昌谦等负责、学委张本联系的学委机关报）等刊物反映和指导了学生运动的发展；《学生新闻》（杜淑贞负责，“学团联”的机关报）报导了学生运动直到“6·23”运动；《新少年报》（社青区办胡德华等负责）。另有金砚卜、曹宝贞指导下“一九社”办的“上海书屋”，对发行学生刊物起着支持作用。

老吴，我们不会忘记：您曾以“辅民”的笔名，在《时代学生》上发表指导性的文章，为学生运动点亮着方向。

（2009年1月31日）

老吴，我们永远怀念您

· 钟沛璋 ·

老吴，这是上海从事学生运动的同志们对吴学谦同志亲切、敬重的称呼。而对我来说，老吴这个称呼，更包含着引路、启蒙和导师等多重含义和感情。

我小学刚毕业那年，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我从已被战火波及的上海虹口，逃难到被称为“孤岛”的租界。被耽误半年学习后，考进了由租界办的格致公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原多为富家子弟。所用的教材，都是英商伊文思书店从英国进口的原版书，甚至所用的练习本，也是从英国运来的，价格自然比较贵。这对像我这样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来说，有点负担不起。一位高年级同学看到我正在作难，对我说：“我们把印得很讲究的练习本的封面留下，装上我们自己到印刷厂印刷的练习纸，不是可以便宜得多了吗？教材也可以由高年级同学用过的教材出让给大家。”一商量，这是大家互助学习的好方法，于是在这位高年级同学的领导下，我和一些同学就动手做起来，做得很成功，大家很满意。

这位高年级的同学，是比我高三个年级的吴庆德，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为老吴的吴学谦同志。

老吴看到我这个才初一的小同学，也很热心为大家办事，就带我与一些高年级的大同学一起参加活动。参加歌咏，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阅读进步报刊，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斯诺的《西行漫记》、《抗战》三日刊等。当时谢晋元团长领导的坚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已撤退到租界内胶州公园。我们就发动同学前去慰问，后来谢晋元团长被暗

杀，我们又发动同学前去追悼。老吴告诉我，这些活动，都是由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领导的。

我得知我们学生也有自己的抗日救亡组织，就更积极了。我当时才14岁，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深受国难当头的痛苦。回想我刚进小学，老师就告诉我们，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军队未放一枪，就丢失了东三省大片大好河山。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像“红头阿三”（英租界内用红布缠头的警佣）那样当人家亡国奴了。日本侵略者果然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我跟着母亲往乡下逃难。因此我一直盼望着大家一定要团结抗战。1936年发生蒋介石被扣的西安事变。十天后，蒋介石被平安释放，团结抗战有了希望，上海人民放鞭炮庆祝，我也把用零花钱买的又舍不得放的鞭炮，也拿出来放了。1939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我小学刚毕业，看到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广告，只恨自己还太小，不能前去，现在上海学生也有了自己的抗日组织，我怎能不积极参加呢？

格致公学处在日军包围下“孤岛”里的英国校长，怕得罪日本侵略者，对我们学生管得紧。学校里也没有时间和地方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干脆我就说服爱国的老师，利用上课的时间来作宣传。一次我正在讲台上讲，英国校长来查课堂了。老师悄悄地对我说：“别慌，你只管讲，他听不懂你的中国话。”由于老师的支持，我还在教室墙上挂起抗日宣传墙报。一次，为了挂国旗事，同学与学校当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老吴知道后，一方面肯定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同时又指出，目前英国校方也同样处在日军的压迫之下，对他们的处境应该理解，对他们的要求，也要考虑到他们能接受的程度。从这些事中，我开始懂得了学生运动中一些重要原则，要善于争取同情、支持，有斗争，又要有理有节。

老吴看到我虽然年纪小，但政治上已比较成熟，有一次他就试探地问我：“有没有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这正是我热切希望的。当时我已读过华岗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凯

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和列昂徒也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书籍，我已认识到抗日和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写了很长的入党申请报告，由老吴交上后，很快老吴通知我说："党组织要找你谈话。"因为当时我全家都挤住在一间房里，无法在家里谈话。就约定在街头一个地方，用暗号与党组织派的人接上头。这个人就是李琦涛同志。那天，天正下着小雨，李琦涛撑着一把大伞，两个人在伞下，一边走一边谈。李琦涛说："你为什么要入党，在申请报告中已写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入党有极大的生命危险？如果你被敌人抓住了怎么办？"在这场雨中进行的严肃谈话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革命气节，应该怎样保守党的秘密——即使咬掉自己舌头，都不吐一句秘密！

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入党介绍人就是老吴，他是在1939年稍早些时候加入的。与他同时入党的还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黄毓椿。要进行入党宣誓却没有地方，李琦涛告诉我们一个秘密的地方，在一个叫《觉园》的私人寺院的假山洞。1939年9月9日上午九点，李琦涛作为上级领导，老吴作为入党介绍人，我就在假山洞里宣誓入党。

格致公学在1939年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老吴是支部书记。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敌，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上海"孤岛"的形势日益险恶，原来公开活动的上海学生抗日救亡会已转入秘密状态。格致公学的党支部，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积极稳妥地开展活动。我们一方面成立半公开的联谊会，帮助同学解决学习和生活的一些问题，出版油印小报；另一方面，党员以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在同学中取得威信，广交朋友，帮助同学学好功课，传阅进步书刊，讨论抗战和时事形势。格致党支部很快得到壮大。我除了在同班级发展了两个新党员，还在比我高的年级中发展了两个新党员。其中一位是钱春海同志，以后成为学生运动的活跃的骨干，解放后曾任团中央联络部长。老吴作为党支

部书记，出色地领导大家做好工作，使秘密与合法相结合。他善于在党内文件和党内语言中，用代号来表达，如T代表党员、M代表群众，J代表积极分子，以后又用YF来代表党的外围进步青年组织。当时环境虽然险恶，党的力量却一直在发展，没有发生泄密或被捕事件。

随着党组织的壮大，老吴被命为中学区委委员，除了继续联系格致党支部外，还要联系其他中学的党组织。我接替老吴担任格致的支部书记，而老吴还是我的直接领导。之后不久，我也被调任中学区委委员，老吴还是我的领导，因为老吴已是中学区委书记。

1942年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把上海地下党的一些骨干转移到新四军二师在淮南的抗日根据地学习。我由秘密交通引路，乔装打扮通过日本哨站，来到集中学习的顾家围子。从险恶阴沉的敌伪统治区，忽然到明朗、自由的新天地，与这么多不同年龄的同志一起学习、生活，真是高兴极了。我在顾家围子经过短期的整风学习后，与老吴一起被派到根据地的边缘游击区设立交通站，接引从上海来的同志进入根据地。从未在农村独立生活过的老吴和我，要独立设立交通站，要与游击区的老乡打交道借住，自己做菜饭，接引从上海来的同志，真有点两眼摸黑。那年我18岁，老吴比我大3岁，也完全是个上海人。第一次接到四五个同志，帮他们艰难地走了许多路，脱离危险的敌控地段，天黑时在一个农民家住下，忽然接到通知说："有情况！"（暗示：敌伪武装出动）。老吴立即带领大家转移。大家摸黑穿过许多农田、乱坟堆，浑身大汗地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野外休息了下来。等到天渐渐发亮，仔细一看周围，竟发现我们转了一个黑夜，又回到了应该脱离的危险区。事后知道幸好那夜敌伪武装没有过来。真是一个危险的大笑话。

我和老吴在交通站工作一些时候，接到通知说，敌伪武装要对根据地发动扫荡，要我们就地跟当地区委的一支武装小分队活动。这样我和老吴第一次都背起了大枪，跟着小分队打游击。我

们白天找一家可靠的老乡家隐蔽，每天天黑就转移。一天得知有一支伪军出动，我们打了一个伏击战，俘虏了两个伪军。我们押着俘虏紧急撤离，一个晚上急行军80里。我从没有连续急行这么多路，后来几乎寸步难行了。老吴却看起来比我强得多。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原来在顾家围子学习的同志，有的被送往延安学习，一些仍回敌伪区工作。我回上海后不久被派往南京开辟工作。我考入了汪伪办的南京中央大学。老吴则被留在根据地的城工部工作。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敌占区的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胜利，国民党的官员忙于接收，抢夺房子、条子、车子、女子，却敌视人民，把敌占区的学生视为“伪学生”，不承认我们学籍，要一律进行甄别考试。我南京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进行争学籍的反甄别斗争，立即得到上海和北平等地学生的响应。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场学生运动。经过斗争，我转到上海临时大学学习，后转入上海交通大学。

我与老吴再次见面，是三年多后在抗战胜利的上海。当时上海已是另一种完全新的局面。一方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国民党却倒行逆施，发动内战。这样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称之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老吴就是这第二条战线在上海的总指挥。我则很快转入办中联广播电台、办《青年知识》半月刊，宣传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反迫害、反内战鼓与呼。我还是在老吴直接或间接领导之下。老吴还在我主编的《青年知识》上发表好几篇指导学生运动的文章。

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恐怖统治越益加紧。抓人的“飞行堡垒”警车满街呼叫。特务搜查《青年知识》人员，直查到了我的家。我被通知转移到地下党杭州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正遇到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逮捕后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杭州、上海等地学生在地下党学委领导下进行了一场强烈抗议的“于子三运动”。

1949年上海临解放前夕，我被调回上海，做迎接解放的宣传工作。我们组织学生成立人民宣传队，印制大量标语、传单、巨幅画像和大红旗。在上海四周枪炮声还不断的时候，标语、传单已遍布全市，在跑马厅钟楼上升起了我母亲和大姐连夜缝制的巨大红旗，在国际饭店和大新公司（解放后改为第一百货公司）窗外挂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大画像。上海人民在黎明时抬头一望，喜悦地看到：解放了！天亮了！

以上海为中心的学生运动紧张、惊险、热烈，一浪高过一浪地迎来了解放。这一幕又一幕，都是在地下党学委、老吴同志领导下进行的。上海解放后不久，老吴被调到北京团中央工作。后来我也被调到《中国青年报》工作。1957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日本。日本青年和人民热情地欢迎来自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团。老吴是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在代表团活动日日夜夜的半个月里，我亲身感受了老吴这位原来在万马奔腾学生运动中的指挥员，又成了一位亲切、热情的人民使者，展现了外事活动的巨大潜力。老吴后来果然成为一位人民敬重的外交部长和副总理。

地下工作十年，解放后一段短暂的身教，老吴从对我少年时的启蒙、引路，到我成长为青年时的领导，给我留下了永生不忘的记忆。老吴刚强、坚毅、热情、憨厚，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老吴，我们永远怀念您！

（2008年10月26日）

附：
抗日战争时期六合县地下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六合县地处日本侵略军总部、汪伪中央所在地的南京和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之间，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江南茅山、皖江根据地、苏浙军区以及在上海的中共江苏地下省委、南京地下市委联系的必经之道。为了确保六合的咽喉要道畅通，安全护送过境的地下党负责人，转送军事物资、秘密信件、文件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华中局城工部、中共江苏地下省委等，先后在六合境内建立了十几条地下交通线。其中主要有：

1. 上海——南京下关——老江口——九里埂——水家湾——练山口——西仇庄；

2. 上海——南京栖霞——大河口——东沟——八百桥——四合墩——东旺庙；

3. 上海——镇江火车站——瓜州——月塘——东旺庙——顾家圩子；

4. 上海或苏南——浦口——花旗营——烟陈——仇庄；

5. 上海——南京——浦口——浦镇——张家渡口——雷官集——竹镇；

6. 上海或苏浙军区或苏南——栖霞——大河口或沙窝子——月塘集——大井赵；

7. 苏南——东沟——月塘集——樊集；

8. 桥头镇——龙潭——大河口——东沟——东旺庙——六合北部解放区；

9. 东沟——大河口——皖江根据地；

10. 下蜀——方块子小学——大连渡口——泗沿沟——月塘集——

樊集；

11. 下关——划子口——红山窑——东沟——六合北部解放区；

12. 南京——卸甲甸——六合城——八百桥——六合北部解放区。

经过六合各条地下交通线的既有党政军负责同志，也有普通地下党员、爱国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和工人数千人。其中有原上海、江苏省地下省委和南京地下市委主要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刘宁一、张承宗、张登（沙文汉）、马飞海、王尧山、陈士琪、钱正心、潘汉年、陈修良（女）、陈慎言、陈伯诚，江南特委书记黄祖炎，皖中行署主任吕惠生，路东地委书记陈光，淮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等。1943 年，粟裕率一个旅到江南莫干山建立抗日根据地时，也有部分同志经过六合地下交通线过江的。1943 年 4 月初抗大九分校团长杜屏、政委刘季平率千余骨干需从江南转移至苏中根据地，派大河口交通站长陈玉堂负责转送工作，在东南支队司令魏然的协助下，动员 50 余条民船，并派一个连警戒，经过一夜抢渡，全部安全过江，在八百桥头牌休整数日后，全部转送至苏中根据地。

地下交通站护送过境的军事物资，包括弹药、武器和军用车床等百余吨。

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的现在已查出姓名的有 130 余名同志，其中负责人有吴学谦、彭原、魏杰、郭铁之、陈聪、赵卓、姚臻、俞敦华、张洽泰、田辛、戚原、周晓华、赵毛兴等同志。

（摘自《六合人民革命斗争史》）

青年时代的实践：走向政治上的成熟

· 钱李仁 ·

学谦同志离去了，而在我的脑海里，60多年前他领导我们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条件下，打开我们所在中学全校工作新局面时充满智慧和勇气的生动形象，仍然历历如在眼前。在此后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我多次亲身经历了学谦同志在极其错综复杂的诸多矛盾面前，沉着冷静，善于从局部联系全局，分析和掌握各有关方面的相互关系及矛盾的发展趋向，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的全过程。我冒昧地认为，这是学谦同志领导作风中的一大特色。可惜现在已经不可能请他自己来回顾和总结，但我愿意从几件实例中加以说明和探讨，也是对我称为“真是我良师”的学谦同志的纪念。

一、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课

1941年春，学谦来领导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下简称上中）的地下党支部。我是一名支部委员，高中理科二年级学生，离17周岁还差几个月。上中校址原来在上海郊区的闵行，1937年被日军占领，被迫迁入被称为“孤岛”的租界，学校行政仍为国民党牢牢控制。在1940年上半年的全校反汪斗争中，进步学生运动的力量引起国民党、三青团的警觉，校方于当年暑假借故开除大批进步学生，未被开除仍留校读书的学生秘密党员只剩下3人，但也受到注意。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党在不少班级中恢复了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小型群众活动，党员也有少量的增加，但是，

从大开除起就笼罩全校的高压态势和沉闷局面还未能打破。

1941年12月8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向美、英宣战。第二天，日军占领在这之前还分别由英法当局管理的上海租界，封闭一切带有爱国和进步色彩的机构、团体、报刊、书店，大肆搜捕“抗日”和“赤色”分子。上中不能再以“省立”名义存在，改名为私立沪新中学；具有国民党身份的原代理校长和训育主任等自行离职，改由曾经留学美国的化学教师、无党派人士吴瑞年任沪新中学校长。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内实行单线联系，并要求党员和积极分子销毁或埋藏所有涉及抗日和进步内容的书刊。学校内外的各种集会和活动实际上也陷入停顿。

不久，学谦同志在党内传达上级指示：敌伪虽已占领租界，但其统治力量暂时还伸不到每个基层中去，空隙很多，并且出现种种新的矛盾，应充分利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开展工作。

有这个重要指示的引导，支部在学谦同志出席和具体引导下，分析出上中各种矛盾关系变化中两个具有特殊性的对我有利的现象：一是学校由省立改为私立，学杂费陡然大增，上中同学本来家境清寒的较多，现在更多同学面临失学的威胁；二是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减弱，三青团活动实际已停顿，敌伪还来不及直接进入学校，新校长需要各方面包括学生方面的支持。根据这一分析，支部认为，在校内开展助学运动，既是对广大清寒同学和家长的直接支持，也有助于学校稳定生源和经济收入，对新校长也是支持。助学运动由一个班级发起，随即推广到各班，举行了大大小小的义卖、义赛、募捐和转让或转送教科书给低一班同学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吴校长亲自出席篮球义赛的首场比赛，应运而生的是全校性的助学委员会。这次助学运动解决了一大批同学的学费困难和书籍困难，加强了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团结，也打开了全校性学生活动的局面，建立了全校性的学生机构，并给我党员、积极分子在同学中开展日常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支部及时提出把在历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以巩固、提高，够

入党条件的吸收入党，到1942年六七月，上中支部党员达到50人左右，升格为总支部。

这样，我们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大环境”中营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小环境，打开了新的局面。参与这样一次富有成果的实践，确实上了一堂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大课，至今觉得受益匪浅。带领我们这些十六七岁毛头小伙子在实践中学习的，就是我们的良师——吴学谦。

二、机动果断的现场指挥

1948年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下简称“反美扶日”）大游行。预定的部署是：各校队伍先在南京路外滩集合，在外滩美军总部前示威后，沿南京路向西行进。但是国民党市警备司令部在5日凌晨就以大批军警、马队、便衣特务包围了交大、复旦、同济、中华工商等主力院校，严密封锁校门与周围街道，禁止学生出入。他们对其他大量的大、中学校学生，虽也竭力阻挠，但不可能都采取同样的严密封锁手段，于是，仍有包括圣约翰、大夏、光华、震旦等大学和一大批专科学校及中学的大约5000名学生冲破封锁阻挠，到达南京路外滩集合。面对包围着的军警，学生们高唱“反美扶日”的歌曲，散发传单。整个下午，学谦同志一直在南京路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斜对面，通过联络员与正在被军警围困的几支学生队伍的领头人联络，进行指挥。相持到下午更晚时，又开来大批军警马队，用插入分割的办法，把学生队伍分割成十几个人一堆的许多小块，着手实施强行解散，并开始个别殴打和抓捕学生。学生们仍然面不改色，昂首挺胸，向军警大声抗议。根据现场形势，学谦同志最后决定不与敌人硬拼，而是让学生分散离开外滩后，再根据情况重新集合。结果，在南京路上重新形成一支约500人的队伍，游行到西藏路大上海大戏院前举行集会。会后，有一批学生继续游行到静安寺后分头安全返校。虽然游行队伍规模已大为缩小，但还是把“反美扶日”的大旗飘扬到南京路上而扩大了影响，同时也使敌人的镇压手段扑空，避免了因硬拼而可能带来对学生的伤害。

事后，学谦同志在谈话中讲到他在现场作出决定时的考虑：从大局看，随着敌人在战场上的败局越来越明显，敌人对学运孤注一掷、狠下毒手的倾向也越来越强烈，对此要有足够估计；从上海学运形势看，敌人在同济大学镇压学生事件过去才四个多月，由此出现的沉闷空气刚有所打破，如果再一次遭受血腥镇压，学生的受害太大，学运将一时陷入低谷而适应不了“第一战线”上胜利发展的形势，要力求避免。后来的事实证明：在6月5日后，各校学生以多种方式对当局的镇压行动展开反击，敌人向各院校施展的种种破坏手段都因广大师生团结战斗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声援而以失败告终，上海学运保持并发扬了斗志昂扬的前进势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都是与学谦同志在斗争现场沉着冷静、着眼于大局、机动果断地摆脱了敌人在外滩的镇压阴谋分不开的。我当时作为市学联的党组书记，始终随同在学谦同志的身边，深感他在指挥中的机动果断，从中学习了不少东西。

三、扬长避短，在扩大国际交往上取得突破

中华全国青联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简称“世青”）的会员组织。世青建立时，包容了第二次大战中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国、各党派和宗教团体所领导的各种青年组织，象征着世界青年的广泛团结。随着“冷战”的展开，倾向西方的各青年组织陆续以不同缘由退出世青，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组织也与世青疏远，世青活动局限于共产党和其他少量“左”派组织所领导的青年组织这样一个圈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青力图打破这种狭隘封闭的局面，想方设法与西方国家各政党的青年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亚洲非洲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但应者寥寥。当时，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但也面临着西方的封锁和围堵，青年的国际活动是我扩大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

1956年10—11月，一个由中方邀请、经世青协调组成的国际青年代表团来华访问。代表团成员33人，来自18个国家，分属25个不同的青年组织，包括4个国际组织。其中，除少数属于世

青会员组织外，大部分是世青以外其他有影响的国际青年组织的会员或不参加任何国际组织的“独立”派。这样一个具有广泛性的代表团，使世青同这些组织有了在共同的活动中进行接触、增进相互了解乃至合作协调的机会，是一项突破；同样也是我青联扩大国际联系的重要一步。

具体分析起来，参加这次访问的非世青会员组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欧美或日本的中间或偏右的组织，如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和“国际学生拥护联合国运动”的代表，比利时和意大利社会党青年组织的负责人，联邦德国和日本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等等；第二类是亚非国家的官方青年组织，如印尼青年阵线的主席，埃及、锡兰（今称斯里兰卡）官方青年组织的代表，等等。有12个组织是第一次派代表来华，不少组织都是世青曾力图与之建立关系而屡遭婉拒的。这次之所以能组团成行，是中方和世青互相配合，在邀请工作方面下了很大工夫的结果。

上述的第一类组织，世青大多与之有事务性的联系渠道，但他们往往把世青看成是“苏联集团向西方渗透的工具”，从而不愿与之进行工作上、活动上的交往；而他们对建国不久的“共产党中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持不同甚至反对态度，但对其各方面的发展有强烈的好奇心，有的还想试探重建关系的可能性（如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但又不愿主动来和中方接触。对这些组织，我们一般采取由中方发邀请、但不直接递交而由世青转达的方式，使三方面都能发挥主动而又留有余地，便于被邀者从容选择应邀与否。上述的第二类组织，一般愿意与中国同行发展友好关系，但强调必须通过官方；他们愿意与世青以及“世界青年大会”（倾向西方）等各种国际青年组织都发展关系，但十分注意不倒向任何一个“集团”。对这一类组织，我们一般采取由中方经双边的官方渠道直接发出邀请（对有些与我国从无来往的中东、非洲国家，也有由世青转达中方邀请的），同时说明被邀参加这个国际青年代表团的组织既有世青的会员，也有世界青年大会、国际社会党青年联盟以及基督教、天主教国际青年组织的会员，也有不参加任

何国际组织的团体，应邀者相互之间也不承担组织挂钩之类的义务，从而解除不必要的顾虑。采取这种多样而微妙的邀请方式，既发挥了中方和世青各自具有的优势，避开了各自的“劣势”；也对被邀请的不同组织各自与我方的共同点和顾忌点有较准确的掌握从而做到发扬前者而避开后者。整个邀请工作历时半年多，经过与世青多次反复磋商，才组团成功并成行。学谦同志自始至终具体主持和指导了邀请、组团和接待的全过程。

在接待工作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根据“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同组织一视同仁”的方针，力求做到亲切热情，尽量满足客人各种不同的要求。从整个日程的安排到具体参观单位的活动都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有准备的自由点菜”的方法，这也是根据学谦同志的倡议而提出的：让客人在我方提供的“菜单”上自己选择参观项目，接触群众，使之感到我诚恳相待，不加限制，因而使一些本以为“中国没有自由”的成见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对于新中国在短短几年中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更加信服。邓小平副总理在1956年11月17日会见了代表团，从上午9时30分谈到下午1时30分，历时四个小时。当时正是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刚发生，外宾提出种种问题，小平同志一一解答，为访问画上圆满句号。

这个代表团的组成本身及其访问的成功，对世青拓展联系和团结面，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从而使世青也感到满意。取得这样一次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学谦同志对国际青年运动大局的准确分析判断以及对各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无疑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几项事例，比起学谦同志后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所处理的大事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但这些都是在他从20岁到35岁的青年时代的实践，生动地说明，在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指引下，学谦同志较早就走向政治上的成熟。

（2008年7月31日）

回忆同老吴在一起的时刻

·朱良·

吴学谦同志2008年4月4日离开我们走了。我有幸在60余年中有几个阶段受他领导或有接触并受到他的教育。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吴”。在他任副总理以后，人们仍这样叫他。以下讲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1947年11月我在上海地下学联党组工作时，有一段时间老吴直接领导党组的工作。在记忆中有两件事好像就在眼前：(一)学联党组开会是在上海贝勒路我家里。我家前门弄堂封闭，只走后门弄堂。老吴每次来，我就搬个板凳坐在后门口，擦自行车。他不需要进弄堂，在马路上就能清楚地看到表示安全的“暗号”，可以放心地进来。(二)1947年年底，老吴直接领导学联党组时，正是国民党政府加紧白色恐怖的时候。老吴向我们传达并组织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信心。他同时强调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仍将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必须继续采取“长期积蓄力量”的方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奠定了新中国青年外事工作的基础

1949年6月，上海刚解放，老吴就被团中央调去参加布达佩斯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任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以后又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部长直至1958年10月。在当时只有20多个国家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民间交往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吴根据青年的特点，很重视每两年一次的有100多个国家两三万青年参加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每次都派出几百人到1200多人，广交朋友，参加文艺演出和竞赛，参加体育运动会比赛。事情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我们现在仍能在电视或广播中听到关于歌唱家郭兰英、舞蹈家陈爱莲等人是“联欢节获奖者”的报道。在当时我国对外交往很少、不能参加奥运会的情况下，青年外事工作不仅配合了总体外交，而且超越了青年工作的范畴，对整个国家的文艺、体育事业及其对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老吴和区棠亮同志为青年外事工作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青年外事工作队伍。

老吴在对外交往中强调广交和深交外国朋友，重视做人的工作。他同外国朋友交往那种政治敏锐、友好坦诚、求同存异、很少套话、很少共产党专用词汇、不卑不亢的风格和气质，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加强中国同非洲国家、政党的友好

1958年10月，老吴离开团中央，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西亚、非洲方面工作，并多次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亚非团结委员会”名义出国访问，做了很多支持亚非人民斗争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迫害，1968年4月到1970年11月被送到秦城监狱。老吴全家也受到了磨难。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解放”后，1972年年初被调到中联部参加恢复团中央对外联络的工作，因此，有机会经常到机关宿舍看望老吴夫妇，我们的主要话题就是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老吴从不谈论他被批斗、被迫害的情况，只是担心“四人帮”一旦完全夺权党和国家的命运。

加强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础，我们一贯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1963年年底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形成了中非友好的一次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国家的民族解放组织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党的来往，甚至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建党，我们都以中共只能同马列主义政党建立党际关系拒绝了。但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愿意同中国友好往来，因此需要同他们接触，积极做

解释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1978年老吴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在一年中，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名义邀请接待了八个非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执政党代表团访华。虽然当时的对外战略仍是“扩大反霸统一战线”，但是老吴突破了“以苏划线”的框框，经中央批准，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从1979年12月4日至1980年2月11日，马不停蹄地访问了10个非洲国家。中央同意代表团的出访方针：(一)关于反霸问题，根据不同对象“相机”、“灵活”地宣传我们的立场，有的“只提反对外来势力对非洲的干涉”。这就有利于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二)不主动要求各国领导人会见代表团。但是访问结果，除了有135个部长、总书记、副总统和总理会见外，十个国家中有八个国家的总统会见了代表团一行。他们都是著名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代领导人，如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布隆迪总统巴加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多哥总统埃亚德马、贝宁总统克雷库、塞拉利昂总统斯蒂文斯、几内亚总统杜尔、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这次访问获得了巨大成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发展了中共同非洲民族主义执政党的党际关系，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中非友好的高潮。

贯彻中央调整对外战略的努力

1982年4月，中央调老吴去外交部任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同年11月任外交部长；1983年6月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他任外长时正当我党开始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报告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强调“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独立自主的实质，就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就是要改变“一条线”的政策。十二大报告还提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是各国人民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提五项原则，就是要改变支持东南亚国家人民武装斗争的政策，以改善、加强友好睦邻关系。

邓小平同志1985年6月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实现了两

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对外战略的调整是一个十分复杂、微妙的难题。1983 年我曾听老吴说，这一段时间是他从事外事工作以来最艰难的时候，他做出了很大努力。为中英解决香港问题，发展中欧、中日、中美关系，以及加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等，他做了许多工作。外交部曾多次建议中国同苏联外交部长互访，但是一直到 1988 年 4 月老吴离开外交部时还没有能实现。1989 年 5 月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时，却逢东欧、苏联已开始剧变、解体了。

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

1982 年老吴是单枪匹马，不带秘书和任何助手离开中联部转到外交部工作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主张干部政策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1959 年批判张闻天副部长的反“右倾”运动及其他政治运动留下了不少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部是重灾区之一：造反派抢夺中央的外交大权，“王（力）八 · 七”事件；“四人帮”批判周总理；乔冠华 1976 年不再任外交部长等。1983 年 2 月，老吴在一次会议上说：外交部内部改革，中心问题是思想上拨乱反正。不拨乱反正，不搞“五湖四海”，派性就消除不了；要实现干部年轻化，一大批被耽误了的老干部要适当安排，还有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问题也要解决。老吴为干部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付出了很多精力。

学习老吴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

1997 年起，老吴的身体开始变坏。我、谭雅修和钱李仁、郑韵经常去他家看望他。王子成、鲍奕珊有时也一起去。那时我们几个地下党老同志还与他讨论如何在 1997 年 5 月到上海去参加“五 · 二〇”学运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到了 1998 年他已住院治疗，十年来病势加重，终于到 2008 年。

老吴离开我们走了。他为党、为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存。同

他接触过的人都赞扬他。老吴为人突出的特点是：待人宽容厚道，严于律己；对同志坦诚交心，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在解放前，他直接间接地培养了一大批投入革命、建设新中国的知识青年。解放后，他培养了一茬又一茬外事工作干部。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2008 年 9 月）

吴学谦
——良师益友同志加兄弟

·浦作·

吴学谦同志谢世已大半年。回忆从抗战期间的1942年春天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5月27日，在我从事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历程中，他是直接联系我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其间约有二年时间，又曾共同生活在一起；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除了“文革”期间由于上海地下党遭受“四人帮”诬陷、迫害，彼此被“隔离”“坐牢”而一度中断交往外，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六十多个春秋，他对我而言，始终是良师益友，同志加兄弟。我深深地敬重、怀念他。往事历历，择要记之，以寄托自己对这位老领导的不尽哀思。

初见吴学谦同志是在1942年清明前后，一天，介绍我入党并领导我工作的朱承坚同志（后改名王光华）通知我，上级领导人要找我谈话，约定到朱寄住的三姨夫庄先生家会面。那时我在省立上海中学理科高三乙班读书，即将毕业，年仅19岁，入党才半年，完全是一个毛头小伙子。革命热情很高，但政治上却十分幼稚，实践经验更是缺乏。听到领导上要找我谈话，兴奋不已，满心期盼。见面时节，寒气未消，可春意已显，我早早赶到蒲石路（现长乐路）290号高福里，承坚同志安排我到亭子间坐定后，转身去接应这位领导。9时整，一位戴着眼镜，身穿深藏青隐条花呢中式长袍，下穿西装裤，足蹬黑皮鞋，20多岁大学生模样的人走进门来，含笑地伸出手来和起身迎上前去的我紧紧握手，自我介绍叫吴仁辅，示意在靠墙的方桌子旁分头坐下。然后说，先把我们的公开合法关系确认下来，我是你的家庭教师，来辅导英文功课，

万一有人查问，统一以此口径回答。接着他就切入正题说：此来是根据党的决定，要对入党不久的同志教育培训，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历史使命问题。他先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起，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祖国山河破碎，百姓水深火热，青年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因此中国青年学生具有很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统治阶级的意识和感情，加上青年固有的朝气蓬勃、富于爱国正义感、追寻真理、感觉敏锐、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和进步影响，有相当多的青年学生在正确思想引导下，会投身于革命洪流。他们走的道路一般都是从反帝爱国——追求民主进步——逐步走向共产主义，我们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进而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组织和领导中国学生运动，每当祖国和民族命运处在存亡续绝的危急关头，中国的青年学生都会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冲在前面，大声疾呼，救我中华，兴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民主、进步运动，而且由于青年学生的社会地位及其与社会各界有广泛联系，必然会影响和引起社会的同情、支持、共鸣、呼应；回顾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到当前全面抗战中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都可以看到，中国学生运动在中国革命中能够起到号角、先锋、桥梁作用。联系目前日本法西斯强盗已进占租界，上海完全沦陷，斗争环境空前严酷，学生抗日运动暂时处于沉寂阶段的现实，他着重指出更要看到暗流涌动，民族矛盾更加深化，我们学生界党组织和党员应该满怀信心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团结教育广大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肩负起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当前，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统治下，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做好准备。由于我入党后，上海中学支部即指定我与同时期入党的王运乾等同志开辟初中部同学的工作。我们通过由上海中学部分高、初中同学组建的基督教“海鸥”少年团契，去接触三四十位低年级同学，从一点一滴这些小事做起，工作似乎很细小，影响面有限，因而初听这一席话，似乎感觉离我的现实工作很远，看不到低潮与高潮之

间的关系，更看不到与上海以至全国青年学生运动的大目标有联系。可听到后来，觉得他讲得很切合实际，特别是他引导我联系自己的成长过程，如何从一个普通中学生，在二位同班同学、共产党员平常一点一滴的教育启发下，激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责任感，投身于本校和全市大、中学校学生正在兴起的抗日、反汪、护校斗争（反对学校当局向汪精卫汉奸政府登记）并加入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学协”小组，提高了革命觉悟，得到工作锤炼，随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班中像我这样的同学共有九人，先后成为班级内党的新生力量，当最先的两位同志被国民党校方开除后，我们九个新党员不仅团结了班级内的多数同学，而且还由党支部抽调了党员去开辟低年级同学的工作。吴学谦同志的一席谈话（后来知道他当时就是上海中学支部的上级领导），使我领略到，运动低潮时的一点一滴细小扎实、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运动高潮以及和整个学生运动大目标之间的紧密相连，真是这种“聚沙成塔”、“滴水成渠”的工作和面对困难的革命精神，不断激励着我。在我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一直谨记这种精神。吴学谦同志的这次谈话也加深了我对党的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总方针的认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他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有理论有实际，语气平实坚定，充满信心，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听到如此令人鼓舞和折服的教益。

1942年7月间，吴学谦同志突然来找我，说要找一份职业做掩护，当时我跟一位刚刚继承了一家西式家具店遗产的积极分子相熟，就托他可否聘任吴为跑街，结果没有办成；8月份有一天吴学谦兴冲冲来和我告别，说他很快要撤退到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叫我不必再为他谋职事奔走了。当时我真为此事心里有点歉疚，他特意来话别，短短两句话，不仅消除了我的不安，还感到他很体谅别人，更触发了我依依惜别之情。

我们离别后，遵照党组织的决定我进入大同大学读书、工作。1944年清明前后，大同大学领导我的雷树萱同志跟我说，考虑到我参加革命后，在工作中和接触的同志中有安全隐患，为此决定

让我撤退转移到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几天后，交通员老戴带领我们进入新四军四师游击区。此后我们整整徒步走了两天，到达新四军四师师部驻地半城，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接见并招待晚饭，向我们介绍抗日战争形势时谈到日本法西斯侵略强盗已成强弩之末，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政治清明，人民团结，有些地方夜不闭户。我们听了都很振奋。第二天，交通员老戴就打道回上海向组织复命，临行前老戴说已口头上向淮北区党委讲明我和另一位同志两人的党员身份，我们的党组织关系会通过党的渠道转到四师。不久，我被分配到“淮北中学”工作。5月4日，学校组织五四青年节纪念活动，四师政委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同志亲临对全校师生作报告，我被指定做记录，整理成文后在《拂晓报》上发表。没想到我为邓子恢同志的报告做记录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与吴学谦同志在新四军根据地再相聚。当时我虽被分配到淮北中学，但党的组织关系迟迟没有转到，因而未确定工作岗位，我把焦急的心情向邓政委汇报，期望领导关心帮助。邓老当场就书写了一封给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的信交给我，要我直接去华中局组织部门办手续。在邓子恢同志的关心下，很快我就随同四师刘参谋搭乘一条小渔船横渡洪泽湖，再长途跋涉二百里左右，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荡，找到华中局组织部曾山部长，他见邓老的亲笔信后，马上指点我到不远处的小王庄找华中局城工部。一路问询，在下午四时光景到达目的地，接待我的居然是吴学谦同志，我就像见到亲人一般，心里别提多高兴。阔别两年，看上去他变得结实了，上身穿一件本色粗布衬衫，下身灰布军裤，脚穿旧布织成的草鞋，面色红润，精神抖擞，大步走来，除了那副眼镜，全然没有了学生味，整个一军干模样。他也认出了我，见我灰头土脸，走得筋疲力尽的样子，马上前来帮助提了随身行李，引我进入他办公和接待的草屋坐定，给我倒了一浅杯开水示意慢慢喝，喘口气，歇一会儿。然后坐下来，仔细听我汇报从上海撤退到四师以及辗转寻到华中局的详细经过和来意，他没有立刻表态，只是叮嘱我好好休息，旋即转身去安排我的食宿问题，我则

喜出望外，见到了他，心就完全定下来了。晚饭后，他端了一木盆热气腾腾的烫水，让我泡脚，看到我双脚由于长途跋涉，脚趾下面涨出好几个血泡，叮嘱我挑破后慢慢浸入热水中，待水凉了，再擦干，好好休息一宿就会好的。关于食宿问题他与时任华中局城工部秘书的张承宗同志商量后把我领到一间较大的草房内一张已经铺好被褥的床前，让我早点睡。第二天一早，老吴（城工部的同志们从上到下都叫吴学谦同志为老吴）先是领我到伙房要了一桶开水，让我把随身带的衣衫投入开水中浸泡除虱蚤。随后连续几天，找我个别谈话。谈两年前别后，我在大同大学的工作情况，并叫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尽可能提出对上海学生工作的看法和建议。以后又详细地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谈话的形式，犹如两个知交促膝谈心。他听的很仔细认真，我则力求详细毫无保留。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有机会如此推心置腹和领导谈话。过了将近一个星期，我看谈得差不多了，就向老吴提出何时可回到淮北中学。他笑笑说已经向领导汇报了我的情况，华中局城工部是上海以及江浙一些城市地下党的领导机关，组织上研究了情况后，决定我不回淮北去了，留下来学习一段时间再说，至于淮北中学那边，组织上会通过党的渠道告知对方。

在华中局城工部的学习分两个时段。第一段是从1944年5月中旬到6月下旬，约一个多月，是在老吴直接领导下，按照他指定的范围和目录学习。主要学习中央整风文件以及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文献和讲话，时事形势有关文件，有关白区工作文件和统一战线的论述，还经常会听到吴学谦、张承宗两位领导探讨交流有关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等党的发展历史等，使我犹如从坐井观天的井底蛙跳出井圈看到了一片广阔天地，引导我从自己仅仅在一个中学、大学工作过，仅参加过一次反汪护校运动的短暂经历中走出来，以纵深广阔的角度领悟党从诞生之日起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浴血奋斗，历尽艰难曲折，屡起屡仆，勇于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路线。确立了以毛

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地位的历史，这是在我参加革命后，最具有基础性的长进，终生受益。第二时段是老吴通知我参加华中局城工部为分批教育培训上海地下党干部而办的整风学习班，从1944年6月下旬起到7月中、下旬，一个月左右。主要是学习整风文件，联系和自觉梳理各自的思想作风，找出差距提高认识，结束时写出个人学习小结。

学习即将结束前，吴学谦同志找我谈话，他了解了我的学习情况，并告诉我，他即将回上海工作。我在整风班学习结束后，也将被分配回上海工作，届时他会来和我接关系。7月底，华中局城工部刘长胜部长通知我，决定我和刚来根据地跑交通的浦侠（我弟弟）以及警委的邵健同志、交通赵茅兴同志回上海。8月1日我和弟弟浦侠回到了家中，结束了我进入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四个月的难忘经历。

1944年8月吴学谦同志来我家接上了关系，此后一直到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总共4年9个月，我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上海的胜利两个历史阶段。这期间上海的青年学生运动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战略部署先后在华中局城工部、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迎着惊涛骇浪奋勇前进，谱写了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吴学谦作为最直接和最具体领导上海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6月，华中局城工部领导要求上海各地下党系统，根据中央指示调整工作部署和转变工作方式，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开展天亮运动，组建地下军，为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光复上海作好积极准备，并决定建立新一届“学委”，派回一些干部以确保组织领导，以政治坚定、锐意进取、沉稳善断、谦和宽厚而深得领导器重的吴学谦，正是在这新形势下，被派回上海充实新一届学委领导成员的。

1944年8月份，吴学谦来接上关系时，传达了华中局城工部

要求学生运动发展在整个社会运动中的桥梁作用，扩大成为社会青年运动的指示。从9月份开始到11月，建立了由他直接领导的两个新的区委会，一是以昆山为基点，开辟沪宁铁路沿线城市交通要道工作为目的，把在那边工作的学生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昆山县工作委员会，由龚兆源、沈正光、杜淑贞负责；二是把离开学校或由学生界吸收发展进入上海铁路局、北火车站、美商电力、电话公司、英商电车、煤气公司等具有要害性质的公用事业和仁济医院、红十字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苏联办的时代出版社等单位的12个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由朱承坚、浦作负责的交通电讯区委，开启了学生运动进一步发挥桥梁作用、有组织、有计划、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开辟社会青年运动的新尝试。吴学谦在交通电讯区委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每一个党员无论进入社会哪个行业，第一要搞好和精通本职业务，第二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广交朋友，第三要适时适度积极在周围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引导他们关心时局发展，树立抗日必胜信心，善于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凝聚起一股进步爱国力量，形成气候，迎接抗战胜利。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推动下，社会青年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从开始时10余个单位12名党员，发展到到抗战胜利前后已遍及小教、补校、夜校、民校、银钱、保险、百货、杂货、纺织、制药、医院等行业和沪东沪西的女工、上层家庭妇女、摊贩、报童、贫民、失学失业青年等各界别，从大、中学校出来进入社会领域的学生党员犹如撒在土地上的种子，粒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党员数量和工作阵地像雨后春笋般向四面八方扩展。

1945年春，交电区委扩大为社会青年区委，雷树萱为书记，我和蒋文焕、周湛为委员。日寇战败后，上海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华中局1945年8月9日下达的“准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进攻，解放上海”的指示精神，发动各级组织全力以赴，广泛发动群众，准备里应外合。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45年8月21日中共中央连续两次急电中共上海市委，认为目前起义对我党和人民不利，应即停止武装起义和占领上海的方针。8月29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方针》，指出："凡我不能切实占领的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工作必须仍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上海地下党工作做出了重大转变。

吴学谦据此对社会青年区委从组织上工作上进行了重大调整。第一项重大调整是1945年底1946年初，他从战略需要出发，高瞻远瞩地为革命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积蓄和储备科学、技术、工程专业人才，决定把社会青年区委内所有在社会上从事科技工作、有专业知识的党员集中起来，筹组一个能广泛团结各类科技人才的全国性技术团体"中国技术协会"，单独成立了技协支部，抽调当时社会青年区委书记雷树萱同志任技协支部书记。1946年3月，"中国技术协会"正式成立的同时，举办了上海工业品展览会，展期7天，参观者10多万人次，获得社会广泛好评。协会邀请了当时在上海社会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工业家和科技专家40余人为正式会员。1947年6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市委领导认为这是迎接全国解放后建设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才战略储备事业，决定专门成立科技部门工作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张承宗直接领导，仍由雷树萱同志任书记。这一当初由吴学谦参与决策和创办的"中国技术协会"为解放后新中国建设事业组织输送了数千科技骨干。当时吴学谦才24岁，离上海解放、新中国建立尚有三年半，革命事业何时取得胜利尚处于不可预料之际，他未雨绸缪参与了作出如此的战略性举措，表明他胸有大志，对革命胜利具有坚定信心，令人折服。第二项重大组织调整是在1946年春，把社会青年区委领导下的铁路、电力、电话、电讯等公用事业和沪东沪西工厂中的党组织和所有党员陆续划归工委领导，其中仅是在劳工夜校吸收入党的女工党员就有100来人，还有不少已成为群众领袖的党员骨干，如王孝和同志等。第三项组织调整是鉴于虽然已把科技和工运系统的党员分离出社会青年区委，但管辖的党员仍然面广量大，为加强对基层的具体领导，于1946年春，在区委之下按行业类别设置了四个分区委。社会青年区委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多种生活性和政治性斗争，在更为广阔的范围

内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还值得一提的是社青区委1946年2月创办了一份面向少年的全市性报纸《新少年报》,当时是由蒋文焕、施德荃、王业康等担任小学教师的同志们倡议的,他们感到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少年儿童生活苦闷彷徨,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他们的倡议立即获得吴学谦的支持,他和区委书记邵洛羊以及全体委员从各方面予以帮助。办报之初,困难很多,吴学谦表示组织上必会尽力提供帮助。我们几个区委成员不仅从物资经费上支持,也参与审阅稿子, 吴学谦同志每期稿子必看,常常在区委会议上对某期版面安排和内容反复斟酌。报纸刚面世,就深受广大学生和教师欢迎。以后还引导《新少年报》的读者参与我党领导的爱国进步活动;上海解放前夕,运用《新少年报》的群众基础,组建了为迎接上海解放的地下少先队。《新少年报》从创刊到停刊,出版了一百期,最多时一期就印发一万份,对当时的上海青少年影响很大。

吴学谦在地下党工作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特别突出关注党员的思想情况和精神状态。当时,我在传达停止起义,转变工作方针,党的组织务必保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作长期打算的指示时,有位同志情绪失控,痛哭失声,表示不知何时才能解放上海。我觉得,原先大家满怀希望投入武装起义的准备,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现在突然停止起义,同志们思想上难免感到失望,可以理解,但这位同志的反应似乎流露出过度悲观的情绪,因此我向老吴如实汇报了这一情况。他听后十分重视,和我一起具体分析了这一现象,他说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话,他说:我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历尽艰难曲折逐步发展起来的,采取任何重大战略方针都必须认真分析,趋利避害。这次中央从决定武装起义配合主力革命部队解放上海等大城市,到决定停止起义的大转变,在中央8月21日给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第一份电文中讲得很清楚是“过细考虑结果,认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不利的”。这是党中央对当时形势急剧变化权衡利弊得失作出的英明决策,我们一定要引导所有党员认清大局,对工作方针的重大转变决不能

从消极的观点去理解。他强调在工作大转变，革命必须迂回前进时，一定要耐心而坚定地使党员队伍始终保持奋发向上、遇难而进的昂扬革命精神。在他引导下，我们振奋精神，趁敌伪投降，国民党统治尚未建立和稳定的混乱期间，把工作转向开展保护人民生活权利，建立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团体等斗争。充分揭露蒋介石统治集团为策划反共内战，包庇重用日寇侵略军头目、双手沾满我抗日军民鲜血的战犯岗村宁次，保护勾结大汉奸周佛海的罪行；揭露国民党派来上海的接受大员肆意劫搜汉奸、卖国贼和奸商掠夺的巨大财富——车子、票子、金子、房子、女子（老百姓称之为五子登科）的罪行；开展清算汉奸的斗争和反对蒋介石集团诬陷上海沦陷期间在公立学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为“伪学生”、在敌伪占用单位工作的职工为“伪职员”、“伪工人”等歧视压迫上海人民的斗争；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军队取代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后残害人民，侮辱妇女的斗争。社会青年运动有了更为扎实的推进，夯实和发展了我们党在社会各行各业的青年中的基础。吴学谦同志自始至终领导开辟和发展了社会青年运动。1946 年 4 月，来沪考察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同志听了学委关于开展社会青年运动的汇报，极为赞赏，并约我向他具体汇报社会青年区委的工作情况和经验。

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方针重大转变的时刻，为应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蓄谋破坏和镇压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和上下级联络的畅通，吴学谦还受上海地下党市委和学委的委托，建立了三个掩护党的领导联络机关。其中一个是市委的领导联络据点，经审定，在原英籍犹太富商哈同所有的一片房产福熙路（今延安中路）近西摩路（今陕西中路），临街开设了一家“丰记米号”，房源来自浦侠领导的一位撤退到解放区的唐同志家准备出租的一间店面，老吴派我出面办理租赁手续，很快开张。米店经理由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承宗以及学委领导吴学谦担任，定日定时去米店；张困斋（承宗之弟）当账房，坐镇店内，他还有一项实际工作是专门领导上海地下党和党中央联络的秘

密电台。上海地下党的各系统领导有急事找市委,就来米店。老吴有时有事又分不开身,也曾几次派我去找过张承宗。这一秘密联络点近邻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上海站。米店安全运行到1949年春,因张困斋同志及其领导的秘密电台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而终止。张困斋同志坚贞不屈,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卫了上海地下党的领导联络机关;米店老师傅刘志荣同志被特务逮住后,机智勇敢地逃脱并迅速通知了张承宗和我,我立即通知老吴,避免了破坏的进一步扩大。另一个秘密联络点是为学委领导机关设置的,择在爱文义路1363号临街门面(今北京西路,近铜仁路),开了一个"立达图书服务社",专营图书文化用品。由老吴领导,我参与筹资,冯援等同志具体负责,经理是冯季衡,主管业务的是王遇安。学生系统的一部分领导同志有急事找学委就去那里。1947年9月后,我们工作上有事就去那里接头。这家书店经营了不少党的刊物和进步报刊以及文艺、理论书籍,吴学谦还安排他们承担社会青年区委创办的《新少年报》发行处工作,这一小小书店办得与众不同。曾在"立达"当练习生的曹同志回忆说:书店同仁之间平等自由,他深受关爱。联系自己当童工时不如牛马的生活,感到有天壤之别。他记得当年每周五总有一位戴眼镜骑自行车的同志,一来就同负责书店业务的王愚安同志闭门长谈的情景,解放后才知他就是领导"立达"的吴学谦。1948年4月,鉴于党的安全形势特别严峻,了解"立达图书服务社"性质的某些党员同志被捕,决定主动歇业。最后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打算放在我的老家上海嘉定的方太镇,那离上海市区稍微远一点,按那时的交通条件,半天之内可以来回,是为了万一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紧急备用的。为了了解那边条件的可行性,吴学谦决定叫我陪他一起骑自行车去那里实地考察。1946年4、5月间的一天,我们一早就骑车出发,经马陆镇抄一条近路去目的地,岂知沿途前方有一条河,必须从一座石桥过河。老吴在前面,一股劲猛骑自行车,冲过石桥到了对岸,我也随后赶上,哪里晓得这座小石桥两侧没有护栏,石

桥两头都有几级石阶，桥面相当狭窄，我骑车冲上桥面后，由于用力不够，车子摇晃，心中一慌，失去平衡，连人带车跌落河里。老吴在河对岸见状，立刻放下自行车赶到河滩边救我。幸亏天气不冷，河水不深，我惊魂甫定，就在河床里站了起来，老吴叫我站稳了慢步向河边靠拢，先把自行车举托起来，交给在近水处的他接过去，然后他又伸手把我拉上河滩，扶我上岸。当时年轻，受了一点轻伤，活动未受大的影响，二人就继续骑车到方泰镇，找到在北街开南货店的老乡邻，吃过饭，烘干衣服，然后陪着老吴勘察了我家老房子的情况及周边环境、对外交通等情况，下午骑车回到上海。以后由于没有必要，原来的设想没有付诸实施。在这一系列工作中，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吴学谦同志调度有方、依靠群众、一丝不苟、干净利落的办事风格，以及同志有难，倾力相助的高尚品格，和他一起工作很开心。

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下，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自认为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决定发动全面内战。我党中央早有预见，对“争取和平、争取民主、争取团结”的斗争作出战略调整。上海地下党决定在斗争进入艰苦阶段，大规模群众运动将转入暂时沉寂之前领导群众进行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充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破坏和平、坚持内战、搞独裁的反动本质，变被动为主动，以保护革命力量、提振干部斗志、鼓舞群众信心，去迎接新的斗争，促进人民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授意、多方支持下，上海地下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工商、金融、实业、教育界上层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推派代表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当局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决定于1946年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欢送大会，并组织各界人民大游行大示威，以此揭开转变工作的序幕。学生界受命在这次游行示威活动中起带头的组织和公开的指挥作用。吴学谦同志指示我和住在北火车站附近的张永年同志筹划在他家建立秘密指挥部的场所，命我和蒋文焕同志为秘密指挥部与游行请愿队伍实际指挥者黄振声等同志之间的联络员。并交代我三件任务，

一是六 · 二三当天一早到北火车站内联络好铁路部门的党员同志接应赶到火车站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复旦大学300名纠察队伍,共同做好保证赴京请愿代表团进入站台时排除干扰,有序上车,直至火车启动的安全任务;二是陪同来沪考察学生运动的中央学委负责人冯文彬同志和秘密指挥部负责人张执一两位领导在北火车站内外以及欢送大会现场实地察看一切工作是否就绪;三是要我和蒋文焕同志在示威游行过程中始终保持与秘密指挥部和实际指挥同志的联络畅通,下情及时上报,上面指挥迅速下达。上海地下党倾全力组织和领导的六 · 二三运动影响很大,五万人(其中学生二万)的和平大游行受到广大市民的热情呼应,许多市民纷纷自动加入游行队伍,滚滚洪流,长达数里,势不可挡,历时五小时。国民党反动派见众怒难犯,不敢公开镇压,只能暗中破坏,沿途干扰都被游行纠察挫败。根据秘密指挥部决定,游行示威队伍到达复兴公园胜利结束,并有组织地安全散去。

可是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团不仅在火车上沿途受到国民党特务打手上车捣乱骚扰,到南京下车时更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埋伏在那里的特务打手殴打围攻,引起全国人民激愤。蒋介石被迫虚伪地面见代表成员,表示“就是这次谈判不成,我也不打”,言犹在耳,当天他就命令其军队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开始全面内战。上海地下党则在政治上揭露敌人,提高广大人民政治觉悟,提振党员干部的信心和斗志,坚定有序地领导了工作重心的转变。

1946年下半年,学委领导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围绕“教育”、“调整”、“转换”三个方面展开。“教育”最主要的是通过学习,教育党员和积极分子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吴学谦指示我们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毛主席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上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美蒋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这是毛主席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对革命全局及发展前途作出的科学

论断。后来吴学谦又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在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时对上海地下党工作的重要指示：国民党地区的严重黑暗时刻又到来了，必须坚持艰苦的斗争，预计五年的时间，胜利必将实现。吴学谦在传达到“预计五年”时，特别强调“最多五年”，当时振奋之情溢于言表，深深鼓舞了听取传达的同志们。当年党的两位最高领导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领导的反革命力量进入决战阶段，针对蒋介石反动派宣称三至六个月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区的狂妄叫嚣，发出“革命必胜”如此明白无误的信号，显然让这位沉着稳重的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者看到了他自己每逢革命形势剧变时刻，总是从政治思想上教育党员同志们认清形势，树立信心，攻克艰险，奋发前进的做法，有了一个肯定和权威的结论，为此，他感到欣喜和激动。大家心里明白，我们工作面临黑暗的严重时刻，要作艰苦的斗争，懈怠不得，但“长夜有期，曙光在前”，革命队伍里根本没有沉闷、无奈、消极之情，而是充满着乐观、胜利之望。

“调整”最紧迫的是尽快撤退转移已经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确保上海党组织和已暴露同志的安全与隐蔽。当时上海全市各系统撤退到解放区有千余人，学委系统占三分之一以上，领导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毫不马虎，吴学谦在处理过程中有一件事对我教育极大。当时有一位同志由于有所暴露，党组织命他必须迅速撤离去解放区，可是他因家庭原因不愿撤退，党组织决定撤销他的党籍。吴学谦派我去执行时，指示我告诉这位同志，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实行白色恐怖，党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领导他的同志已经撤离上海，今后不可能有同志去联系他，要他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由于我曾是他的领导，说出这番如此关心和语重心长的话时，他听了默默点头。对老吴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我感到他既坚持了贯彻党的铁的纪律的原则性和严肃性，又体现出党对一个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关心和爱护，从而有利于稳住这位同志。隔了两年，当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革命即将胜利之前，吴学谦又专门和我谈起了这位同志，说他在这两年

中表现不错，一直参加我们党领导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各项斗争，而且在群众中颇得人心，因此领导那个行业的党组织向上级领导反映打算吸收发展他入党，老吴表示这位同志当时不愿撤退到解放区是错误的，党组织撤销他的党籍是正确的；但考虑到他当时确有具体困难，家中老母须靠他为生，而且在以后的实际表现也说明他还是要革命的，所以可以吸收他重新入党，问我如何看待时，我当然表示拥护。从中又可以看到吴学谦实事求是以及对待同志宽厚负责的风格。

“调整”组织也临到了我。1946 年 9 月，吴学谦通知我，由于工作需要，组织决定我调离社会青年区委，改做国立大学工作，并相继把一批转到国立暨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商学院的党员关系交给我去联系，这是 1946 年学委系统调整工作中的新课题。抗战期间迁移去后方的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国立大专院校先后复员来沪，这些高校学生中的革命力量有上海本地的，也有外省市来的，他们的党组织隶属关系不同，周恩来同志指示，鉴于白区革命工作的原则，党组织隶属不变，暂不合并。这就出现了由内地复员来沪的革命力量受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后改为中共中央南京局）领导联系，上海本地革命力量仍由上海地下党领导联系的局面，此外还有少量党员是外省市新考进这些国立大学的。吴学谦调我去联系暨大、同济、上商的学生工作时说，你们新进入这些大学的同志都是进入了新的工作阵地，人生地不熟，既不了解内地、外省市来沪同学的实际情况，自己也没有群众基础，你们的任务是必须尽快了解和熟悉情况，广交朋友，打开活动空间，分清同学中在政治、思想上的倾向，和其中的革命进步力量建立起团结、互信、合作的关系，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打好基础。他的一番嘱咐指明了我们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转换”工作方式方法的方向。我和这些学校的党员同志们以紧迫的心情，全力以赴地与来自内地、外省市的同学中的革命进步力量建立起互相沟通合作融洽的关系，并紧密结合同学们对时局的关切和对国民党经济政策的不满，以及学习上的需求，主

动深入群众，热心服务，舒困解难，增进友谊，局面很快有了改观。

1946年六·二三运动“退兵一战”以后，1946年下半年的工作大转变在“教育”、“调整”、“转换”方针指引下，上海学生运动虽然没有举行过大规模、全市性的政治斗争，但各个学校内的生活性、政治性活动却蓬勃开展。

上海学生运动经过1946年下半年的工作转变，党的组织更加隐蔽巩固，且因发展吸收了一大批新党员而壮大了。广大学生群众不仅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沉寂下来，反而更加关注时局的发展和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对美蒋变本加厉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头，青年学生的反抗怒火一触即发。1946年12月24日夜晚，正当西方传统宗教节日“圣诞”之夜，美帝侵略军的士兵竟然在北平市强暴了北京大学的一位女学生，顿时触发了中国人民和青年学生郁积已久的反帝爱国怒火。从北平开始，一场轰轰烈烈抗议美军暴行的火焰迅速在上海以及全国青年学生中蔓延开来。这场运动带有突发性，党的领导还来不及部署，就自下而上向四面八方开展扩散。在党中央指示下，上海学生运动转被动为主动，不失时机地组织学生走上街头，高呼“美国兵滚出去”、“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大家起来赶走美国兵”等口号震撼街衢，在短短时间内，全国大中城市50万学生参加了抗暴活动。1947年1月5日、6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指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美帝国主义虽万分恼怒，但对示威群众仍不得不竭力避免冲突，而工商业界及自由主义者、教授们一致同情这一运动，可见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斗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

党中央为密切配合解放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决战的第一战场，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战场，并设立领导人民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前线指挥部。1947年1月中旬，中央作出重要部署：设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5月上旬，中央又将上海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我在吴学谦直接领导下经历了在上海开辟形成第二条战线，直至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全过程，感觉到吴学谦

同志在当时的上海局书记刘晓、委员钱瑛、市委书记张承宗领导下，是领导上海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国第二条战线最重要战场的最直接最具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一，吴学谦作为学委副书记，承担了最重要的领导任务。鉴于上海国立大学已崛起成为上海学生运动最重要的革命生力军，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947年1月，上海学委成立了国立大学区委，统一领导交大、复旦、同济、暨大等高校的学生运动，又把原有的男、女中学两个区委合并为中学工作委员会，这两个区委都由吴学谦同志领导；以后他又先后领导过私立大学区委、教会大学区委，参加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上海局领导的全国学运组；担任上海学委代书记、书记，并成为上海市委最年轻的委员。第二，刘晓、张承宗在重要和紧急关头，常常直接找吴学谦，向他下达任务，让他或由他调度力量贯彻执行，我亲身经历的有四起，他都发动和组织同志们，有理有利有节有策略地完成了任务。第三，吴学谦亲自具体领导了开辟第二战线中的一些重要战斗。1947年5月9日，全市50余所中学3000余毕业班学生举行游行，欢送“反会考”代表团去南京国民党教育部请愿，这是上海的中学生第一次独立开展的大规模斗争，学委与中学工作委员会派钱李仁同志以记者身份随团指导，吴学谦十分重视，亲自到北火车站观察情况，与钱李仁面商到南京后的活动事宜，并要我找到在火车站工作的同志妥善安排钱李仁同志安全乘车，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中共中央上海局直接领导，决定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市组织全市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请愿活动，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形成第二战线的关键之战。5月18日晚，吴学谦召开国立大学区委会，会上研究的第一件事是当天蒋介石发出恫吓和警告，我们怎么办。他先听取我们详细汇报了动员组织学生队伍上街的准备情况和各校学生的思想状况，然后胸有成竹地明确表示必须冲破国民党蒋介石的“禁令”，原计划的游行请愿活动照常举行，并确保活动安全。大家彻夜不眠，详细讨论了各种应对阻拦和镇压的措施，他对王光华和我随同学生代表团去南京交代了四项任务：一是确保安

全，上火车要避开敌人耳目，像普通旅客一样隐蔽在群众之中；二是到了南京，遇重要情况要及时向上海党组织汇报请示；三是到了南京一定要依靠和配合南京学生中的革命力量完成示威游行和请愿；四是上海学生代表要主动与南京以及各地学生代表商议筹组“全国学生联合会”事宜。经过努力，请愿结束后，所有赴南京的学生代表都安全返沪，并完成了商讨筹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1947年5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对学生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力量和积极分子实施了大逮捕大镇压，各大学特别是国立大专院校首当其冲，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5月28日、5月30日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先后到各大专院校大肆搜捕学生，除部分学生被释放外，全市有57名学生于6月6日深夜被集中押送到漕河泾曹氏公墓（今漕溪公园）举办所谓“青年训导班”进行“感化教育”，上海学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了一场联合全国全市各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具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群众性大营救运动。吴学谦直接领导了学生系统的营救活动，他于5月30日就把被捕的复旦学生党员鲍静佩的弟弟鲍奕珊从中学工作委员会岗位上临时调出来，联合复旦大学被捕学生党员葛嫱月的父亲葛子卿先生共同发起组成“上海市被捕学生家长联合会”，发动家长多次到上海市政府进行请愿交涉，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社会各界申诉，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学生，及时揭露反动派妄图秘密处置被捕学生的阴谋。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同意家长探视被捕学生，他还派私立大学区委委员杨佩景同志也去探视，从此监狱内外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斗争，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对被捕学生的种种威胁欺骗分化伎俩。他还通过上海学生界的党组织广泛发动全市和各大中学校学生以各种分散的办法向社会各界宣传呼吁制止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各大学教授也大义凛然，挺身而出，以集体罢教、联名上书上海市长吴国桢等方式，坚决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从1947年7月底到8月初，国民党被迫释放了大部分学生，以后又陆续释放了

其余学生。国民党当局5.30逮捕的学生不仅没有查出其中的共产党员，没有“感化”任何一个学生，相反有九位被捕学生在出狱后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指挥的上海和全国学生运动终于成功开辟和形成为第二条战线，上海是其中的重要战场之一，这期间，吴学谦同志是上海学生运动的最直接的领导者，自始至终参与了领导工作，直至上海解放。毛主席在1947年5月30日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一文，庄严宣告“蒋介石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吴学谦同志于1944年5月到1944年7月在华中局城工部工作期间，曾直接领导我并共同生活了两个月；1944年8月起，又在上海领导我工作直到上海解放。期间，1945年11月他应邀住在我家，直至1947年9月，我们共同生活了一年又十个月，大家朝夕相处，他自然地融入了我家。在小一辈兄弟姐妹中他就像亲密无间的老大哥，而我父母、叔婶、姑妈等老一辈则把他当作自家人，他也同我们一样称呼我家长辈们。老吴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领导工作，但在我家里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他自律甚严，从不逾矩；我们家长辈们思想开明，待人宽厚，不仅对他完全放心，还自愿地为我们的革命活动服务。刘晓、张承宗多次来我家找老吴，或在我家开会，我家长辈不仅为他们安排场所，供应茶水，供应午饭，还要注意周围环境安全，所以老吴觉得住在我家是最舒心省心顺心的日子。1946年春天，吴学谦突然消化道剧痛，我赶紧把他送到附近医院住院治疗，我母亲每天熬好粥做好适宜的菜由我送去，直至他能正常进食，前后10余天。1947年暑假开学后，我妹妹浦伋由于上街贴标语，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当天晚上，吴学谦、吴增亮和我恰好由于形势严峻住在汶林路我表姐家，浦伋被捕后，我姑妈、婶婶深夜赶来通知我们，我们立即转移。解放后，老

吴去北京工作了，但他一直怀念在我家时建立起来的亲情，他第一次出国访问后回沪，专门来我家看望我母亲和姑妈，我母亲去北京时，他热情邀请我母亲去他家做客。老吴最后一次去美国参加国际性会议，他和毕玲同志在旧金山约见了我的婶婶和堂妹，共叙当年在我家共同生活的往事。

吴学谦住在我家的日子里，不仅工作勤奋，且好学深思，时常看书、写文章或收听延安广播到深夜，好在我们住在客厅的后半间，晚上没有干扰。他常常督促我学习从解放区带出来的文件（如党的七大文件）和上海、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他爱看郭沫若、茅盾的著作，喜欢听梅兰芳、金少山的《霸王别姬》京剧唱片，我们也经常去看进步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以及苏联电影，我们的生活非常充实而有乐趣。更让我难忘的是他生活节俭朴素，当年，按上海地下党的规定，他的生活费由组织供给，但他舍不得为自己添置稍微像样点的外衣，他天天在外面联系工作，有时还要装得体面些，春夏秋季尚可马虎打发过去，可是严冬难熬，我们实在看不过去，设法搞到一块灰棕色的呢料，送给他做了一套西装，这套西装每逢天冷时他就穿，直到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吴学谦就奉调去团中央报到，从此一直在北京工作。作为活跃在国际外交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原上海地下党共同战斗的老同志，无论地位高低，关系亲疏，他都一视同仁，谦和宽厚，真诚相待。1951年，他陪同世界青联总书记访问我国，上海是最后一站，他抽空首先要我陪同他去看望张承宗同志，张承宗同志表示面临新环境、新工作，要重新学习，研究新办法，摸索新经验，吴学谦对此深表敬佩，他还和张承宗同志共同提出为解放前上海市委全体成员拍照，叫我负责操办，留下了一张“全家福”。上海学生界地下党的老同志去北京开会、公干时，老吴不管工作多忙，总会相见叙谈，毕玲同志常常在家备饭热情接待。

吴学谦同志还为解放前上海地下党建立的秘密外围组织的认定实事求是作出了关键性的证明。当时，按照中共中央上海局

指示，为迎接解放，扩展革命力量，要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事前就名称问题请示过党中央，中央指示为避免被敌人破坏，上海学委在各校建立的秘密外围组织不要用全市统一的名称和统一领导，由各校党支部自己领导，自行定名。这种特殊情况使不了解当年具体情况的有关领导部门难以理解，直接影响了上海两千名左右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的同志应得的权益无法保障。上海地下党学生系统的同志虽一再据实申诉，一直未获圆满解决。为此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吴学谦作为当年的当事者，实事求是地做了证明，并得到参与决策此事的领导的赞同，从而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

吴学谦对上海和全国青年学生运动的最后最新总结是在1997年5月19日应中共上海市委邀请来参加隆重纪念“五·二〇”学生运动（形成第二条战线）五十周年大型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五 · 二〇运动是第二条战线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的重要讲话，他不仅阐述了五十年前“五 · 二〇”学生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加速蒋介石政权覆亡的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纵览和总结了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中当年学生运动为新社会的建设事业提供了经过“五 · 二〇”运动锤炼出来的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历经风浪考验，辛勤工作，默默奉献。许多人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被选拔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有的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专家、艺术家，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参加座谈会的上海地下党同志听了更是感同身受，记忆犹新。吴学谦还语重心长地对参与纪念活动的当代青年学生干部谆谆嘱托，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学生运动的光荣爱国主义传统，勤奋学习，艰苦奋斗，把个人命运融入祖国的命运之中，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图强自尊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这是吴学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当年上海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的身份来上海参加纪念学生运动，还亲切会见了当年在他领导下参加上海学生运动的老同志。吴学谦同志这次来

上海参加“五 · 二〇”纪念活动时，他的健康已经呈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他以极大的坚毅精神支撑着参与各种活动，直至圆满结束。

吴学谦同志良师益友的风范、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以及德高望重清正廉洁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大家的永远怀念中。

（2009 年 2 月 18 日）

怀念吴学谦同志

· 吴增亮 ·

今年4月5日传来了吴学谦同志逝世的噩耗。回忆往事，感慨甚多，撰写此文作为对他的永久怀念。

（一）我的老领导，也是户口簿上的“亲兄长”

吴学谦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那时他刚从苏北解放区回上海，领导我们交通大学的党支部（我当年是交大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但时间不长。

我们再次见面是在1947年的1月。那时党的上级领导决定成立国立大学区委，他是代表上级党组织来领导区委的，我被任命为该区委的委员，主要负责联系交大党支部的工作。

到1947年的7月，上级党组织决定调整学委的领导成员，吴学谦同志是学委副书记，我被任命为学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吴学谦同志领导国立大学工作。

1948年初，我跟学委书记张本同志一起去香港参加党的干部学习班，其后，吴学谦同志也在1948年下半年去香港参加了学习班。待他回上海正是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决定，为了迎接上海解放，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党组织从原来按专业组织的改为以地区分成“地区组织”。那时，我被任命为徐龙大区区委书记，由马飞海同志代表市委领导。所以，吴学谦同志和我就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了。

上海解放后，我们都被分配在青年团市委工作，又见面了。但不久，他就被调去北京工作。然而，一直到现在，他还是我心目

中尊敬的“老领导”。

吴学谦同志怎么又成了我户口簿上的“亲兄长”的呢?

这要从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五月学生运动以后的情况说起。

那时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同志常来找张本和吴学谦同志,传达党中央文件,并总结五月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她也常要我参加。有一次,钱瑛问了我的生活情况,得知我每天晚上都要回家住宿时,她认为不够安全,要我搬出来,但哪里能有现成的地方可去?钱瑛同志建议我先搬出来和吴学谦同志住在一起。

当时,吴学谦同志住在现延安东路、成都路浦东同乡会附近的石库门房子的客堂间,大门独用,还有一门通厨房和后门,所以比较安全。他通过公安局内线工作的同志在户口簿上用了“吴仁辅”这个名字,我也用了同样的办法,在户口簿上用了“吴义辅”的名字。这样,我们就成了一对“亲兄弟”。

(二)清晨传达刘晓指示,交大护校斗争胜利转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伟大斗争

1947年5月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第二个年头,军事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财政和经济上的危机,这在教育经费开支方面显得更突出。京沪平津等地相继暴发了国立院校公费生要求提高公费待遇的斗争。

斗争反映到上海交大又因其掺杂着教育部内的派系矛盾而更加激烈。到了5月,不但教职员工因欠薪使生活陷入困境,连水电煤气费也已无钱支付,有导致正常教学陷于停顿的可能。

为此,校长吴保丰带着师生代表去南京,找国民党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帮助解决。但部长不仅不予资助,反而声称,部里经费也不够,要交大停办航海和轮机两个系。有个学生代表听了很生气,就说:“我们的校名不是交通大学吗?”“难道航海、轮机不属交通吗?”朱家骅立刻指责,声称:“交通大学的校名难道就不能更改的吗?”在场的师生代表听了都很气愤。回校后,立即召开系科代表大会作汇报。大家都很气愤,于是决议“全校学生

集体择日进京请愿”。

这样，占全校同学 90% 以上的三千人，在一个早晨全到了上海北火车站。这时，为了阻止同学们的请愿行动，市里和铁道部下达了命令，上海站宣布暂停营业，一切列车停开。车站方面把停在站内的列车车头都拉掉了，路轨也拆了。

同学们在车站职工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车头。在场的同学中有不少是机械系的，实习过驾驶机车，还有不少土木系的同学实习过铺设铁路路轨。在争取到铁路员工帮助的情况下，同学们很快地调好了适合大家乘坐的车厢，拆了的路轨也重新铺好，最后一商量，大家就全部上了此车，自己开着列车去南京！

国民党当局却又下令全路局在沿途多处拆掉路轨，迫使同学们只能自己下车去修。如此开开停停，次日清晨才到了真如车站。

三千名同学全在铁罐车里，又挤又闷又颠，使大家疲惫不堪。朱家骅部长说来不来，失信于同学，更激起了群愤。

车站前，当局调来大批军队，机枪架在站前铁轨上。另外，列车进站前有一段特殊弯道的钢轨已被拆除，一时找不到合用的轨道，只好暂时停车了，而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带领一批官员也乘车赶到。

这时，我想找自治会党组同志研究对策。当我刚下车走到真如站旁，忽然发现站外道路上有两人骑着自行车正向车站赶来，好像是吴学谦同志和浦作同志。我马上迎了过去。这时，他们也看到了我。

吴学谦同志把自行车推到我面前，我才知道他们是奉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命令来传达指示的。指示大意是：“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避免大屠杀，争取及时妥善解决，胜利返校，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我听了以后，认为时间紧迫，一方面找了总支一个同志，要他赶快把这精神向总支全体委员传达，并通过全体党员做好同学工作。另一方面我自己就马上去找自治会党组同志，向他们传达，并要求着重做好积极分子的工作。

就在这时，一辆装甲车忽然开来，亮着大灯停在真如站前，从里出来一个人，手里拿着话筒要讲话，大家一看原来是朱家骅。他声音很高，话很简单："交大学生集体中断交通，已经不是学生的行为了，你们要马上回校，不然就全体开除。"如此蛮横无理，同学们哪能接受得了。

接着，又一个高音喇叭响了，是吴国桢的声音："你们不是要朱部长来吗？他话也讲了，你们如有意见可以到这里来谈。"

这时，自治会正副主席商量后决定先去看看情况。

吴国桢说："朱部长来过了，话也讲了，你们的要求他已写了批文，问题都解决了。他还有事，就先走了，批文在田次长那里，你们可以看一看。"

两位主席看了批文，原先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四条，而批文有五条。前四条对应我们的要求，都已完全接受。第五条是"如有不尽事宜，师生及校友可派代表进京面谈"。

于是，两位主席认为确已原则同意了，具体落实还是可以派代表与校方一起去南京面谈。

经过与主席团商量，大家一致同意两主席的意见，同学们立即返校，并由自治会派学生代表和校方代表一起去南京，直到全部按部长批文落实为止。

此后，向全体同学宣读部长的批文和主席团意见时，大家一致鼓掌同意。

这时，市公用局长也是交大校友的赵曾钰早已调来了公交车，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回校吃午饭了。

我们回校是5月13日，南京中央大学已开始罢课，要求按生活指数增加公费，并发表了《反饥饿斗争宣言》，他们在14日与交大自治会电话联系。

同时上海医学院决定发起"抢救教育危机"行动，并派代表到各国立大学联络实行总罢课。

我们交大护校斗争的胜利结束，也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开始。

当年吴学谦同志及时赶到真如，传达研究贯彻刘晓同志的指示，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如果当时不冷静，同学们可能会硬拼，而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实行武装镇压。一旦我们交大先在护校中遭到大屠杀，对整个“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势将造成不良影响。

朱家骅用心很险恶，有书面答复，当面不讲，企望我们硬拼，但我们接受了谈判，没有上当！

刘晓同志的指示多么重要！

每当回忆起当年情景，心里并不平静。

（三）在危险关头，吴学谦同志传达的指示，促使交大休止罢课口号的提出并取得了比较主动的局面

1947 年 5 月 20 日，南京发生“五 · 二〇惨案”后，21 日晚交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群众大会，听了去京代表的血泪控诉，同学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采取支援行动。

经系科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无限期罢课并绝食一天，支援南京同学，抗议政府暴行。

23—24 日，全市笼罩着浓重的白色恐怖，有些学校内外反动势力捕打学生的事态已很严重。

25 日交大有两个宣传小队的同学在外滩向市民宣传南京“五 · 二〇惨案”实情时，先后被捕。自治会派代表持介绍信去警备司令部探望，却被拒绝，群情激愤。

在这样出去一队被抓一队的紧急关头，吴学谦同志到交大来找我，传达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的指示，大意是“要主动复课”，现在国民党内部有矛盾，警备司令宣铁吾等人主张坚决镇压，甚至不惜制造事端，吓退群众，使少数骨干人员暴露出来，把学生运动彻底打垮。但市长吴国桢等人却怕把上海局面搞得太乱，责任难负。我们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复课，救出同学，把那些企图制造事端，趁机血腥镇压学生的阴谋搞垮。

我说：现在交大刚有两个宣传小队被捕，警备司令部连我们

派代表去探望都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同学们同意马上复课是比较困难的，但像交大这样的“无期限罢课”，再拖下去确实不行。我必须马上和交大总支，尤其是要向自治会党组传达，要他们找积极分子，特别是教师和校长做工作，研究解决办法才行。

吴学谦同志也认为难度是有的，但一定要把工作做得仔细一点为好，要我们抓紧做好。

吴学谦同志传达的指示使我们开了窍，我立即先后找了党组同志，党总支做了传达，让大家分头去做工作。

第二天，我了解他们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总的反映，确有难处。一些积极分子想不通，我们同学还在狱中，我们要复课，这就是投降，怎么能容许呢?!

自治会同志访问教授，争取他们和校长一起去要求当局释放同学。校长说了一段话，很值得考虑。“我不是不想去找吴国桢，请求释放交大同学的事，但自己反复想想，很为难，因为现在全市学校都已复课，只有交大还是无期限罢课，如果吴国桢一问，交大已复课了吗？这一句话，我就不好回答。”

听了这段话，我们同志觉得有办法了，自治会党组同志从中想到如果把复课改为休止罢课，以争取教授和校方出面交涉释放被捕同学。万一当局不放人，我们仍可继续罢课，那时我们的同情力量更大了。

我们决定召开系科代表大会，议题是两条：“营救被捕同学”和“休止罢课”，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又在开会前对会址和纠察力量方面做了充分研究，把开会通告发了出去。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在行动，他们策划了一个阴谋：由校内特务接应校外特务入校，先互打，待纠察来劝阻时再打纠察，同时冲击系科代表大会。然后以维持秩序为名，警察局的人配合抓进步学生，从而把交大的学生运动打垮。

他们的行凶活动，很快被纠察队发现，鸣钟报警。全校师生闻警而集，把行凶者包围起来，反动派的阴谋激怒了全校师生员工。

党组织决定把斗争放在校园内，并通过有关方面把市长吴国

桢找来，并请基督教上层人士、人权保障机构人士来校做调解和作证。

吴国桢在事实面前，被迫同意惩凶和释放被捕同学。

吴国桢下令释放交大同学后，被捕同学却因其他学校的被捕同学未得到释放，一致拒绝单独出狱。

于是代表再向吴国桢提出要求，全市被捕同学都应释放，这样交大被捕同学才同意出狱。吴国桢起始不同意，最终无奈还是同意了。

傍晚狱中同学全部返回交大，交大开了一个热烈的欢迎大会。会议在欢乐气氛中一致通过“休止罢课”的决定。

这一次斗争，搞垮了反动派制造事端、趁机血腥镇压的阴谋。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勇敢、智慧、积极性、责任心和无畏精神相结合的典型，是党的群众工作同上层统战工作相结合的结果。

斗争的发展在政治上已提高到如此高度，不可能靠一次罢课所能解决，敌人的镇压必然要来。在国民党尚能统治的大城市，斗争日益尖锐，僵持时间长了有风险；长期罢课有脱离中间群众的可能，而且不易取得教授和校方的支持。

在青年学生运动中，及时得到党的指引是何等重要啊！

刘晓同志的指示是1947年2月18日周恩来同志代中央所拟的电报指示精神结合上海当时学运情况的具体化，争得了学运的主动权。

（四）同济“一·二九”斗争中，吴学谦同志脱险和国民党当局镇压进步的学生自治会阴谋的破产

继救饥救寒运动后，上海学生界又爆发了一场以同济大学学生为主的“一·二九”争民主反迫害斗争。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自治会在历次学生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早已有所领教，为了取缔各校进步的学生自治会，扼杀爱国民主运动，在1947年12月6日颁发了经修正的《学生自治会规则》。规定：自治会不得参加校外活动；由校方派人监督自治会；校方

有权撤销自治会决议，并可随时解散自治会等等。

根据这一规则，在上海，国民党政府首先把打击目标对准了在救饥救寒运动中崛起的同济大学爱国民主力量。

同济大学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学生自治会选举和无故开除学生，系科代表大会决议“反迫害、争民主”，举行罢课示威，并决定于1948年1月29日起赴南京请愿。

当天国民党当局调集军警宪特几千人，包围了同济。

交大等28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1500余人分散进入同济大学校园，与同济学生汇合。

国民党军警奉命镇压学生，马队冲，马刀砍，特务抓人。晚上反动派冲进会场大搜捕，造成“一·二九同济血案”。

这天吴学谦同志和我，以及国立大学区委几位同志都在现场，处境十分危险。

国民党军警将学生分别按校列队登记，我被军警拉到交大的学生队伍中。当时我挂着校徽也有学生证，但是我觉得交上学生证总不大妥当，所以和无学生证的同学混在一起。后来看到前面排队上去的人签的名字明显是假的，却可以混过去了，所以我也就打算签个假名。

正当我在缓步前行，忽然听到有人在旁边大声喊着：“暨南大学的队伍在哪里？”我一看，他拉着的人竟然是吴学谦同志！再看看他旁边的就是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我心想不好了。这时我已快到签名处，签了一个假名就走了。因时值深夜，我只能徒步到市区乘坐公交车回到住处。

当我将大门打开时，看到里面的灯亮着，原来吴学谦同志已经回到住处了，居然比我还早！

我说：我正在替你担心着。他说，暨南大学今天没有学生去同济。他对李寿雍说是来找同学借书的，李寿雍听了很高兴，因为这么多国立大学都有不少学生来了同济，唯独暨大只有一人，而且不是来支援同济的。李说，他晚上有饭局，要吴学谦同志先回去，明天早晨到校长室去。因为郊区公交车都已停了，李就用

他自己的车子，把吴学谦同志带到市区有公交车的地方，所以他比我到的还早。

第二天一早，吴学谦同志就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批评了他，并要他从此不去暨大，也不再与我住在一起。他就搬出去了。

学委和国立大学区委同志亲临斗争现场，虽然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全力掩护下都安全撤离，但万一发生意外，将对今后全局工作造成严重影响（钱瑛同志说，相当于损失一个师的骨干力量！），上海局、上海市委在同济事件后规定了领导干部不要轻易到斗争现场的纪律。

同济“一·二九”斗争深刻教育了广大学生，使他们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人民本质，激励了广大学生为争民主、反迫害而斗争；冲破了教育部修正颁布的《学生自治会规则》；粉碎了他们企图打击各校学生自治会的阴谋，在上海，原打算从关闭同济自治会着手进而打击其他学校的计划就干不下去了。不久，上海的复旦、交大成功地改选了学生自治会，东吴、约大以及外地的武大、北大、清华、浙大都按原来的制度及时顺利进行了改选。教育部却毫无办法。

在学委领导下，建立了“营救被捕同学委员会”等组织，安排同学探监，发动广大学生参加法庭听审，被捕同学也在狱中展开斗争。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地方法院陆续释放了所有被捕同学。包括以殴打市长吴国桢为名而被抓的几位同学也无法定罪，最后只有中华工商的一位同学被送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经营救也在6月13日出狱。

在同济事件中，虽然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同济学生前后被开除的有107人，其他各校被开除的有217人。但不久被开除的同学有的重新转学，有的转移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60年过去了，往事如歌，难忘此情此景。吴学谦同志的形象，他的革命品格、智慧和勇气，永远铭刻在我心上！深深地怀念他，敬崇他！

（2008年12月于上海）

忆吴学谦同志的二三事

· 刘秀政 ·

2008年4月4日，吴学谦同志离开了我们。魂牵梦绕，在我的脑海里突显出了六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回忆往事，既悲壮，又深沉，且欣慰，真是弥足珍贵啊！

（一）

那是在1947年的夏末，我们的领导蔡怡曾老师通知我去参加上级党组织举办的支部书记训练班。她在我耳边悄声地说："这可是学委'老吴'亲自主持的哟！"当时虽然我没见过老吴，可"老吴"这个名字对我并不陌生。

从蔡老师那里听到过：那是传达党中央对时局和敌我斗争形势的精辟分析，是对学生运动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深刻阐述，是对党员素质和基层建设的严格要求……这一切，都像春雨润物细无声，渗入人们的心灵，培育着我们健康成长。

我如约在法租界一幢小楼的一层找到童月秋的家。身穿浅色衬衫、戴着眼镜、和蔼可亲的地下党上海学委老吴已经在屋里，加上上海市一女中支部书记李淑铮、童月秋和我一共四个人。如果有不速之客闯进来，就像老师在给学生补习功课，找不出什么破绽。

1948年冬，我在苏北解放区才知道老吴的名字——吴学谦。

老吴简要地听了各校讲的近况后，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运动已持续了一个多月，遍及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使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运动发展迅猛，声势浩大，实为国民党当局始料不及。他们惊恐不

已，派军队、警察、宪兵、特务血腥镇压。采取开除、逮捕学生领袖等种种卑劣手段，又通令各大、中学校提前放暑假，企图达到分散群众、进一步镇压的目的。

老吴说，面对白色恐怖，最重要的是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在一些学校进行“反迫害”斗争的同时，要开展全市的助学活动，将政治斗争与生活斗争同步发展，交替进行，以深入发动群众，为迎接新的反美、反蒋斗争作准备。要注意形势发展，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智谨慎……

老吴用睿智的目光对时局所作的分析和部署，非常切合实际，使我又增添了新的力量，急忙赶回学校向蔡老师汇报。蔡老师说，这是党的最新指示，赶快和支部的李若兰、邢至康等同志研究贯彻。

后来得知，毛泽东同志在发动“五·二〇”运动后的第十天，即发表了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高度评价了这次学生运动，说它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并说“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潮”。

（二）

在此之前，组织上曾布置可利用暑假下乡，宣传群众（主要播撒反蒋斗争的种子），锻炼自己。我们建立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外围组织——“清道夫”（各班级都有）为骨干的联络网，一旦有事，可以把撒出去的同学立即召回。我校张耀华等同学在上海郊区大场办起了农忙托儿所，与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离得很近，有时可参加他们的活动，受到启发和教育。“清道夫”骨干肖维新、姜善文回到家乡奉贤县南桥镇（县政府所在地）活动。肖家在当地小有名气，姜的哥哥是小学校长。肖、姜利用这些社会关系，动员了哥哥、姐姐及回乡的外校同学，借用小学校舍，办起了暑期义务学校。他们热情地传播革命思想（种子），颇有收获。正如老吴分析的：在白色恐怖加剧的情况下，应对敌人突如其来的抓捕，可

能措手不及。于是我们决定召回骨干、积极分子抓助学。

为了扩大团结面，确定义演《红楼梦》。这次义演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经过著名戏剧家田汉及夫人安娥的介绍，免费借来戏装及行头，少年剧团的董林肯义务担任导演。前台、后台有几十位同学在奔忙着。除了党员，有积极分子、骨干、"清道夫"成员，有爱好戏剧但平时很少参加学运活动的同学，还有学校当局的得意门生，至于参加推销助学义演入场券、维持剧场秩序的同学就更多了。

演出场场客满。义演获得的助学金不仅缓解了大批清寒同学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使广大同学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使他们看到了团结自救的力量，增强了他们参与斗争的信心。

（三）

1948年初春，上海的白色恐怖进一步加剧。为了防范敌人深夜到学校抓人，组织上决定我和李若兰每日天黑后去同学许宝瀞家住。

一天，我们从学校后门出去，路旁停着一辆黑色小汽车。我们快走，车也开快；我们慢走，车也开慢，似乎在跟踪。我和小李都有所觉察，心领神会。我们没有去许家，而直奔离校不远的百乐门饭店。人多的地方安全，正巧前面不远有一群人像是在吵架，还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我俩赶忙挤到人群中，商量先到百乐门饭店，再想办法脱险。过了一些时候，人群逐渐散去。神秘的小汽车也不见了。我们快步走进了百乐门饭店。起初，躲在后楼黑洞洞的杂物间；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工人用的小楼梯，慢慢地摸到了楼顶，看见几个老工人正在加班装修房子。当他们得知我们两个女生因被坏人跟踪不能回校时，十分同情，就让我们在那里休息。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轻手轻脚地下了小楼梯，从后门离去，到李若兰原在新陆师范党支部周梦熊同志家。请她向组织汇报我们的情况，等候组织的意见。

过了两天，组织的意见来了：让我们转移。分别给我们开了介绍信，把我化名为郭霞珍，介绍到上海大场合光小学教书；李若

兰也化名到离我较远的小学教书。过了不久，接到“表姐”寄来的明信片，说“祖母病危”，要我马上回去。从笔迹上看，是蔡老师写的。明白这是组织上在召唤，我立即请长假回校。

蔡老师告诉我，原来的安排是女中区委决定的。后来学委老吴知道了这一情况，认为我们在女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敌人要迫害，群众有力量保护我们。如果悄悄地撤离，敌人如造谣，反而会引起群众的疑虑。所以让我们回来了。

我非常拥护这个决定，说明老吴对基层的情况、对群众的思想情绪了解很深。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四）

1948 年 5 月 9 日傍晚，天还没有黑，一位同学跑来叫我：“你表姐来了，找你呢！”我在上海没有表姐，肯定是组织上有什么急事，不能通过正常的约定通知，我便匆匆忙忙地跑向较门。刚拐过风雨操场，就看见一双熟悉的明亮的大眼睛，那是女中工委毕玲啊！她给我们开过会，印象最深的是热情爽朗，点拨我们，往往是一语中的。她也是我成长中的好老师。我立即跑上去挽着她的手臂，走到校园灌木丛中的椅子上坐下。毕玲告诉我，由于叛徒的出卖，蔡怡曾几小时前被捕，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组织群众性的营救，并布置了具体的营救方法。

接着，我找到邢至康等商议，执行“发动群众，配合营救”的指示，连夜召开积极分子、骨干会议，并着手各项准备工作。第二天一早，由大姐姐服务团（学生自治会）出面，在挂有蔡怡曾肖像的大礼堂，开全校大会，宣布蔡怡曾被捕的震惊全校的消息，并控拆国民党政府迫害无辜的反动面目，同学们悲愤万分。会上决定礼堂改称“怀蔡堂”，每天“上晨会”15 分钟，大家排队进去唱《怀念》歌，控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行。还成立了人权保障委员会，派人高举“反迫害”、“还我老师”等横幅、标语，到交大、师专等学校去控拆，争取外援，并举行记者招待会等，公开揭露反动政府对人民的迫害。这些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对她的营救工作。

蔡怡曾在狱中坚贞不屈，上电刑、坐老虎凳，备受折磨。但这

些酷刑，都没有动摇她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她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高尚气节。同年8月，党组织通过家属关系把她营救出狱。

我后来才知道，毕玲就是吴学谦同志的爱人。那时，尽管蔡怡曾就在我们学校——市立女师对面的马路上被捕，（敌人对女师可能仍在监视中，当时来女师有极大的危险！）但吴学谦还是让毕玲冒着生命危险，以最快的速度赶来通知我们组织营救。在第一时间内，我们争取了主动、抢到了发言权，使敌人难施展诡伎俩。

吴学谦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为了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奋不顾身的好党员；就是这样一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多谋善断，充满智慧的好领导！

在上海市纪念“五·二〇”运动5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上海党史研究室 ·

1997年5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教卫党委和共青团市委，召集部分老同志和青年学生代表，在上海友谊会堂，举行纪念“五 · 二〇”运动50周年座谈会。吴学谦同志到会作了以此为题的重要讲话。到会的还有王尧山、马飞海、钱李仁、鲍奕珊、吴增亮、陈一鸣，市委副书记陈至立等。第二天，《解放日报》头版作了报道并摘要刊登了讲话内容。2002年5月，在“五 · 二〇”运动55周年时出版的《红浪——五 · 二〇运动在上海》一书，以此讲话为代序。

吴学谦同志在讲话中，对这场运动作了高度精练的概括和表述，这就是：“五 · 二〇”运动是第二条战线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

对于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作了两个方面的集中阐述。他说：“‘五 · 二〇’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有力地配合在战场上同蒋军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为埋葬国民党政权，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了加快蒋政权覆亡的重要作用。第二，“五 · 二〇”运动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准备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在参加“五 · 二〇”运动的几十万青年学生中，一大批地下党员、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和积极分子，输送到各新老解放区和农村游击区，或者在蒋管区继续斗争。全国解放后，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有的被选拔为各级党政

的领导成员。尽管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不少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有的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仍然在科学技术、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各个领域辛勤地工作，默默无闻地为建造新中国的大厦添砖加瓦。有一些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艺术家。其中有不少人已不幸去世。中国人民将不会忘记他们的！”

讲话还寄语当代青年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国学生运动的光荣爱国主义传统，勤奋学习，艰苦奋斗，把个人命运融入祖国的命运之中，在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价值。”他说：“当前，国际上总有一些人不愿看到中国的富强，不愿看到中国人走自己的道路，总要分化、西化中国。我们青年学生就要争这口气，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自尊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赴沪参加“五·二〇”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抒怀

·傅春令·

岁月难忘“五·二〇”，
青春年少数英精。
金陵列队江潮涌，
沪上冲锋战马惊。
学运同心无匹敌，
举旗反蒋有同盟。
韶华半百匆匆过，
老大归来听史评。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开展了空前规模、震惊中外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次运动以5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珠江路，对南京、上海、杭州、苏州16所大学学生制造的流血惨案为标志，又称“五·二〇”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一个多月，席卷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是一次中国最大规模反对美蒋的第二条战线的伟大人民革命运动。1947年5月30日毛主席为此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重要文章，高度评价这次运动。1997年是“五·二〇”运动5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座谈会，开展纪念活动，我应上海市委党史室邀请专程赴沪参加，战友重逢，虽都白发盈颠，但忆峥嵘岁月，豪情不减当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当年是暨南大学同窗学长，曾是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委员、学委副书记。此次他受党中央委派来沪参加“五·二〇”50周年纪念活动。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肯定了“五·二〇”运动的重要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说明“五·二〇”运动是反对美蒋的第二条战线的伟大人民革命运动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会后与暨大校友合影留念。参加合影者有台湾郑晶莹、海南冯尔祺、福建刘春生、上海史振彝、四川熊叔萍以及浙江的我六人。时在1997年5月20日，同学们题诗一首：

学运当年共并肩，
峥嵘岁月着先鞭。
重逢沪上同留影，
半纪风云一梦圆。

吴学谦和我

· 刘起林 ·

我和吴学谦在20世纪40年代初相识，建国前只分别了三年，他在华中、上海，我去延安。建国后分别15年，他在北京或国外，我在上海。“文革”前，1965年我调到北京工作，相聚四十多年，其中三年，他在秦城，我在山东“五·七”干校。2008年4月竟成永别。同志情永恒，比兄亲难忘。

一、“神秘”来客，生死相托

1940年春天，我住在上海英租界海防路海防村旁边一家沿马路开设的煤球店楼上，和奶奶、四个妹妹住在后楼。我好奇而又焦急地等待一位客人，一位从未见过面而又要把生命交给他的人。我按入党介绍人周永葆的通知在二楼后阳台靠弄堂一边摆了一个花盆。这是暗号，表明屋里和周围是安全的。我们家平时都是从后门弄堂进去，不影响楼下王老板的生意。刚进弄堂口就能见到我放的暗号。我们还约好几句口号，来人找我要完全对准口号，才能信任他是党派来的可靠关系。我不知道来人长得什么模样，应该怎样对待他，称呼他。

抗战前我念小学，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的名字。我出生在上海闸北，周围是工厂和贫民区。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日本两次进攻上海，轰炸闸北，我们家两次逃难到英租界。我痛恨日本人，拥护抗日的十九路军。

1937年秋，在我家附近麦根路（今淮安路）戈登路（今江宁路）口，戈登别墅内新开办一所文化中学，我读初中一年级。十月份学校接到一份通知，希望派人参加抗日大会。我自告奋勇按通知

的时间、地点，走到重庆路附近的浦东大楼，参加了大会，到会的有一百多人。这就是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学协”）。此后，学协就始终和我保持联系，指导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周永葆，泉漳中学学生，地下党员。他曾任学协区干事，在1940年春介绍我入党。开始他并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他了解我对党有一定认识，有入党要求后，曾表示要找党的关系，自称认识一位新四军的人可以找到党。他要我写一份材料，说明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和思想转变过程。不久他就通知我来人接关系的日期、暗号和口号。我就在家等着。

抗战初期我从几个方面受到党的影响。首先是文化中学进步老师的教育。肖岱（又名戴行恩、戴何勿），回国不久留学日本的文学士，秘密党员。他给我们上国文课，第一回就讲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我第一次听到两位伟大作家的名字，后来看了他们的许多著作。另方面就是学协的活动教育。1938年秋，学协总交通（负责学协书刊发行）出事，市区中、西部十几所学校，二三十位学协成员被市工部局巡捕房拘捕，关押在英租界新闻捕房拘留所。我也被牵连在内。在拘留所过集体生活14天。高年级同学开座谈会，我参加旁听。他们大谈俄国革命怎样胜利的，列宁怎样领导俄国革命，建设苏联共产党。我最深刻牢记的一句列宁名言是：“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出狱后，我就如饥似渴地阅读理论书和进步报刊，如《列宁论政党》，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我还用省下的零用钱订了一份《译报》。我从书本上认识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周永葆说起从新四军那里找到党的关系，我又没有见过共产党员，就胡乱猜想来人一定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或者是粗眉大眼，满脸胡须的英勇战士，也可能是神出鬼没，计谋多端的能人。反正我想不出什么模样，就耐心地等着，内心充满着神秘的好奇感。

忽然一天傍晚，楼下煤球店伙计大声叫喊：“刘 ×× 有人找

你！”我赶紧下楼，看见一位眉清目秀，身材较瘦长的好像高年级的学生，从后门进来，手中挟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见面就问我，“你是刘 × × 吗？”我说：“是的，你有什么事？”他说：“张先生有本英文文法书，要我带给你。”我说：“我已经有了上册，还缺一本下册。”对准了口号，我就带他上了二楼，完全解除了紧张情绪，开始交谈起来。他自我介绍，“我叫林青。”这是吴学谦在党内的化名。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学校情况，我的思想转变过程，为什么要参加党（入党动机），然后他引导我宣誓。我们低声说话，他说一句，我跟着念一句。没有任何环境布置（不许可），我也没有手举拳头，许了最庄严、最隆重的诺言。从此我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和吴学谦就结成了生死之交。

二、促膝长谈，推心置腹

我入党后，吴学谦每周定期一次到我家交谈，过组织生活。和原来想像不一样，他很少和我谈工作，谈任务。我即将毕业，已接近放暑假，大的政治运动——反汪斗争，发动罢课抗议汉奸傀儡，年初也已搞过，日常工作也没有重要任务。老吴经常和我谈的是介绍我看革命基本理论和进步文艺书刊。他喜欢读书，和我谈读书的心得体会。他介绍我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何干之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他看过许多30年代左翼作家的新文艺作品，有独到的评论和见解。说巴金的三部曲，揭露旧社会的封建大家庭内部矛盾很深刻，但青年的出路在哪里？只有笼统地留一个光明尾巴，没解决问题。吴学谦和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但认识到问题而且找到一条革命道路，进行实际斗争。他介绍茅盾的《子夜》说：这是一本反映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斗争形象化的小说，特别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写得很生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受到欺压、打击的。他赞扬《夜未央》（巴金译）中的革命斗争。介绍我看《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帮助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认

识。他也介绍我看反动的书籍，如杜衡等人鼓吹做第三种人。看这些书的目的是提高对反动著作的识别力和思想批判的战斗力。

在秘密环境下是看不到党内文件和书面指示的，高级领导和党中央联系、报告主要是用电台密码，不用书信来往。有重要指示也是逐级口头传达，根据各行各业有选择地传达讨论。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了解和分析，主要通过进步的报刊杂志自己学习，小范围讨论，交换意见。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内部出版过数量很少、完全秘密的刊物《真理》，后来又改为《党的生活》，1940 年 3 月停刊。吴学谦曾给我看过最后一期的党刊，是小本子，油印，要当场看完，交还老吴处理。

在入党初期老吴只交代两项任务要我努力完成，一项是要在文化中学发展成一名合格的党员，保持“火种”不断。另一项是在我初中毕业后，要争取考进省立上海中学。

文化中学是一所新创办的进步学校，校长俞念远是抗战前回国不久的留学日本的文学士，又名俞荻，翻译过苏联小说《面包》。总务主任钱圣秩，翻译过莫洛托夫的《苏联五年计划》。教务主任夏萤在杭州办过一个读书会。文化中学图书馆有许多进步书籍就是他收藏的。有《鲁迅全集》、《从一个人看新世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高尔基著作等。很可惜，他们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语文教师肖岱，地下党员、文委的骨干，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任。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培养了许多进步积极分子，我就介绍和发展了韩克勤（韩滔）入党。我离校后韩又发展了蒋秀珍入党。解放前，文化中学一直是上海市教育系统的重点进步学校。

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在敌伪时期曾改名沪新中学）一直是上海的重点学校，以教学严谨、校风朴实、水平较高而著称。1940 年年初，反汪斗争轰轰烈烈地走在全市学生前列，但党的力量也比较暴露。一批骨干力量被开除，留下的党员很少。地下党要加强上海中学的支部力量，吴学谦通知我去报考上海中学。但有一个条件，考得上就去上海中学，考不上另作安排。地下党没有权

力不经过合法规定可以随意调动一个人进入学校、企业和任何单位。我在初中学习，各项功课成绩较好，秋季考上了上海中学的工科。上海中学的高中分为理、工、商三科。工科、商科党的力量弱，理科留下几个党员，群众基础好，我的党关系转入学校，担任支部书记。委员有钱李仁、苏振家（女）还有工科三年级一位同志，后来脱党了。上级由徐哲生（沈韦良）领导，我和吴学谦就不能来往。

三、惊险事件，竟成祸根

地下党的领导关系，都是个人向组织详细汇报自己的一切，包括个人的生活、思想，甚至隐私也是毫无保留向领导倾诉的。而领导人除了传达指示、研究工作、布置任务、思想教育外，都是不暴露自己身份、家世、经历和个人事情。这是革命的需要，秘密工作的纪律。我们自己参加革命，参加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为了劳动人民，为了抵抗侵略，民族解放，不是为了哪位个人，哪位领导。我们看待领导是他能更好、更有经验、更有远见地帮助我们取得革命胜利。没有领导的指挥、组合，个人力量是渺小的，无能为力的。

我能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位素昧平生从不相识的人，因为他们是代表组织，代表党。我不必了解和打听他的个人情况，不必要。因为我不是为他个人而革命的，是共同的目的、理想、信念把我们组织起来，紧密团结在一起。这就是产生党性和自觉的革命纪律的基础。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们也不是无情的、僵化的。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就结成深厚的革命情谊，这是任何力量摧毁不了，撕裂不了的。

在1940年的一天，老吴对我谈了他个人的一次惊险遭遇。他在公园里和一位同志接头，身上带着一份别人的入党报告申请书，恰巧碰到英租界巡捕房警察在巡逻“抄靶子”。他想避开，反而引起了注意。一位中国警察搜查他，抄出那份材料。警察仔细翻阅后把材料摔在地上，训斥他一顿：“东西也不放好！不许胡说八道！”老吴赶紧捡起那份报告迅速走开。他后来跟我讲起这

件事，还心有余悸，说："碰巧额角头，要是出事就糟糕了。"这件事就平安过去了，谁知"文化大革命"竟成了审查的祸根并遭遇牢狱之灾难。

老吴毫无保留地和我说起这件事，他推心置腹、吐露心声。他已经不是把我当做下级被领导人看待，而是作为一个亲密无间、知心相交的战友。他平等待人，没有领导架子，心胸坦荡，真挚诚恳，终生如此，感人至深。

四、区委相逢，同赴淮南

1942年年初，新建男中区，我任区委书记，委员有钟沛章，区委由吴学谦领导，我们又见面了。区委分工，我仍管上海中学。支部书记改由钱李仁担任。我还管过民立中学、南洋中学。钟沛章管青年会中学，他还搞了一个私营广播电台。我们常在他家里开会。除了我们一个男中区委外，还有几个区委由李琦涛领导，女中区有张本领导。全市主要的男女中学，都有党的力量。不但高中有，初中也有。这是上海地下党创造的伟大成绩，是一项远大的战略。它是党组织的重要基础。它源源不断地把党的力量输入大专院校、工厂、企业、文教卫生系统。打入敌伪、国民党军政宪特机构。许多同志上前线，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支援抗日根据地。学生的家庭社会关系广泛，各阶层、各行各业都有，非常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国内外反动派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在青年中，尤其在中学生中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更不会想到在中学生中有如此严密、坚强的地下党力量。它经历了英、法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十多年的统治，展开了无数次反侵略、反敌伪、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党的组织始终没有被破坏，而且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学生系统的党员从抗战初期的一二十人发展到解放前夕3000人左右。地下学委是上海地下党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是一个重要方面军。广大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起了先锋、号角、带头作用。作为学委领导人之一的吴学谦，功不可没。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起了主要领导作用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完全占领英法租界，日益加强了统治和掠夺。党中央为了保护和巩固上海地下党的组织，1942 年秋，指示刘晓等领导同志撤退去淮南抗日根据地，组织整风学习。各条战线的近百人聚集在天长县泥沛湾顾家圩子参加学习，总结工作经验。吴学谦和我先后在九十月份也撤退到淮南。顾家圩子是一座地主的较大庄院，有面南正中和东西两边的三幢大屋，没有围墙。离圩子东面四五十步远处，有一间草屋叫枣下堂，已打扫清洁干净。我和吴学谦、张祺、陈公琪四人共住一起。每人一副木板床，铺上稻草，床单被褥都是自己从上海带去的。从敌人黑暗统治下，忽然到了自由、光明、解放的根据地，真是无比的兴奋、快乐。圩子旁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每天早晨大家就在河边洗脸、刷牙。吃过早饭就在阳光照耀下靠在草垛上，学习整风文件。也听过几次领导同志的报告。六师师长谭震林、二师参谋长周骏鸣，还有刘瑞龙、潘汉年都到学习班讲过课。让我们增长了见识，扩展了视野，加强了革命意志和信心。文娱活动也是丰富多彩。有排球队，沙文汉（张登）领队，高个子同志如王文石（侯裕民）等都是主力队员。沙文汉还是跳高标兵。我们都可以自由引吭高歌大唱救亡革命歌曲，苏联歌曲。十月革命节那天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文艺演出。有一天，我们几个年轻的男同志走几十里地去看部队文艺工作者晚上在广场为农民演出，戏未演完，忽然下起大雨，我们赶紧回来。走在田埂上不断滑跤，同伴一边笑别人，一边自己也跌跤，弄得全身是泥，互相取乐。在圩子的同志姓王的最多，共有 9 位，按报到时间公平排列，排到第 8 位，大家就叫他王八。姓刘的也不少，头头就有 3 位：刘晓、刘长胜、刘宁一。还有老工人、公共汽车司机老刘、大刘。

在顾家圩子中，大部分是未婚青年。大家都没有家庭生活经济负担，参加学习完全是自学，自觉总结经验，没有学习压力，更无工作压力。生活是供给制，冬天发棉军衣，每天伙食不是大米饭就是白馒头，蔬菜新鲜有营养。一切不用花钱，有钱也没用。我们过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无忧无虑，精神愉悦。同志间团

结友爱，互敬互助，上下平等，思想解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又自觉遵守纪律。顾家圩子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最幸福的日子，最值得我们留恋、怀念的地方。只有延安生活和上海、全国解放的日子可以比拟。吴学谦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美好时光。

淮南是新四军二师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所在地。党政军主要领导机关都在津浦路东，顾家圩子也在路东。路东纵横几十里都是平原，连成一片。不像华北一些根据地与敌占区犬牙交错。白天是敌伪的统治，晚上是我们的天下。但是淮南的安定也是相对的，暂时的。大敌未除，永无太平，抗日战争仍在艰苦的相持阶段。1942 年年底开始准备反对日军的扫荡，顾家圩子的“人间乐园”也准备结束。所有干部都重新分配工作。有条件的仍回上海。吴学谦暂去农村打埋伏，参加反扫荡斗争。不久就调到华中局城工部负责交通站工作。1944 年 5 月重新回到上海，继续搞学生运动，参加学委领导。我在 1944 年去延安学习。

五、抗战胜利，继续斗争

1945 年“八 · 一五”，日本投降，延安沸腾，全国欢庆，蒋介石一面假谈和平，一面依赖美国，积极准备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刘晓奉中央命令，带领在延安的上海地下党干部，9 月 5 日我从延安出发，赶赴华中，于 1946 年春节前回到上海，仍由吴学谦接上我的组织关系，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老吴分配我参加男中区委，龚兆源是书记。才一个月左右，老吴又通知我去考大学，调大学区委工作。报考要有证件，我就到文化中学弄了个假证明，进了私立大同大学工商管理系春季班学习。1946 年 5 月，国民党从重庆迁都南京。抗战时期原来内迁的一些大学又回到上海，随着大学的增多，大学区委分为国立、私立、教会大学三个区委，我任私立大学区委副书记，后任书记。

1946 年“六 · 二三”反内战要和平大游行前一周，吴学谦通知我发动群众罢课，参加游行示威。大同大学当时正在准备期终考试。学校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地下党员侯裕民当时任学生

会主席，通过学生会各院系班级代表讨论，决定罢课停考，参加游行示威。2500名同学齐聚学校广场，国民党宣传部长兼上海市市长吴国祯带领军警、特务打手、飞行堡垒、警车包围学校。吴国祯两次到校威胁、镇压。群众和他展开面对面斗争，他上台演讲，被大家轰下，斗争取得了胜利。吴学谦在北火车站参加了全市游行集会的指挥部，欢送请愿代表团去南京。

许多次重大斗争，如“五·二〇”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抗议美军强奸北平女学生暴行，抗议英国在九龙暴行，组织反美扶日大游行，吴学谦都是作为学委负责人站在第一线直接布置指挥斗争。1947年5月，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工作。在上海局领导下，由钱瑛（上海局委员）负责成立蒋管区学生运动小组，包括上海、西南、云南、平津南系、杭州等。吴学谦代表上海参加了这个小组。

1948年年初，同济大学学生罢课请愿，爆发民主斗争。吴学谦亲临学校指挥。国民党军警全部包围学校，将同济和外校学生强制隔离检查，查出吴学谦非同济学生，但有暨南大学学生证，追问为什么来同济，老吴编了一个借口，军警不信，派暨大反动特务学生查对。由于老吴在校内没有任何活动，还是个好学生，特务放过了他。老吴虎口逃生，逃过一劫。全部国立大学区委委员都套在同济校内，亏得群众掩护，没有出事，真是一招险棋。老吴在去同济前，布置我要动员私立大学学生支援同济。第二天，我准备先去同济了解一下实情，好向区委同志介绍、布置。当我步行到虹口四达路其美路附近，军警封锁所有马路口不准进出，我估计可能同济出事了，但不知详情。回来向区委汇报了情况，没有布置动员。我们不能自投罗网，再把革命力量送到反动军警包围圈里去，避免了一次地下力量的大暴露。

六、救命之恩，情重亲人

我的家境比较困难，别说上大学，高中也念不起。我父亲是民国初年从浙江舟山进入上海的打工者。中国的职工队伍就是

从破产的农民补充进来的。抗战前我父亲是在一家英籍犹太人的小酒吧当服务员。后来,酒吧关门,职工失业,父亲和几个人凑钱合股继续维持酒吧。我家人口多,家庭负担重。母亲留下弟妹五人,我老大。

1937年夏,母亲去世。1938年后母来家,生弟妹五人(解放后又增一弟一妹),抗战胜利后,组织上要我念大学搞工作。学费是靠申请社会奖学金和学校奖学金维持。买不起衣服,吴学谦从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战后剩余物资中给我弄来一件西服上装,冬天又弄来一件美国空军剩下的羊绒里的夹克衫,在学校里好像还挺神气。又从别的同志家里拿来一件半新的黑色灯芯绒大衣,使我在大学里还可以混得下去,不至于穿着太不像样。

1948年底、1949年初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父亲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曾托一位亲友给我介绍职业,待遇不菲,可以每月有二百大洋的工资,相当于一位大学教授的收入。我没有去,也不能去,我手上有许多秘密党员的关系,临近解放又有非常繁重的任务。吴学谦完全了解我,他还介绍我到一家英文补习夜校去教课,可以拿些补贴,解决一点困难。我去了几次就不去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备课,连查字典、找参考书的时间也没有。我不能误人子弟,骗人学费。大同大学的英语老师葛传槼是很有名的自学成才的教授(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我在课堂上从不缺课,但就像听说书那样,一遍过去,哪能学得好英语。

我的家庭内部矛盾爆发了。亲属中因为我不能供养父母,不能减轻家中经济负担,反而在家中混饭吃,亲人由埋怨而气愤、而仇恨,决定到国民党警察局告发我是共产党员。我紧张了,陷入了极端困境。我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离开这个家,不能让革命工作受损失,让组织受牵连。但是我上哪儿去?我没有住处,没有饭吃,没有钱。我又不能露宿街头,也不能当乞丐。我只能在朋友、同志家中东躲西藏,仍然要坚持繁重的工作任务。我终于坚持不住,病倒了。我看不起医生,也没钱买药。是吴学谦救了我。

吴学谦通过党内关系，把我送到靠近南市的一家四明医院。后来又转到一位私人诊所继续治疗。我本来身体基础较好，抗战时期从上海到延安来回行军万里，从未生过病。全国解放后身心愉快，工作从青年干部训练班，华东青委调至上海市委第一工作队，生活作息时间正常，身体完全康复。吴学谦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到后悔的是对不起那位四明医院党员女医生。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没有对她当面道谢，也没有付过钱。是她承担了一切住院、医疗费用。她无私助人的革命精神，永远令我怀念。

七、北京重逢，“文革”遭殃

上海解放后不久，1949 年 6 月，吴学谦就调到北京，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我一直在上海。1965 年中央组织部调我去北京分配工作。相别 15 年后，我们又见面了。1966 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康生、江青等结成帮派，重点就要打击上海地下党。康生要收集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地下党材料，目的想搞周恩来。江青的目的要彻底毁灭抗战前她在上海丑行的人证、物证。刘晓遭殃、吴学谦也不例外。于是他们千方百计捏造材料，颠倒是非，造谣惑众，陷害忠良。采取法西斯审查方式，任意揪斗干部，宣布专政，关押牛棚，拘捕入狱。吴学谦就进了秦城。

抗战初期，日军扩大侵华，损害了英法在华中、华南的利益。上海租界当局既要利用中国抗日，又不敢得罪日本。只要不影响租界安全，甚至对共产党的活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广大中国巡警更是爱国抗日，不少人拥护共产党。所以地下党在巡警内部逐步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成立支部，后来扩大为党委。开展机智顽强的斗争，坚持到解放，取得最后的胜利。吴学谦在公园里遇惊脱险一事完全是可以理解信任的。中国巡警是通情达理的。但是康生之流的智商还不如这位警察。在他们眼里，敌人是坚强的、铁板一块牢不可破的。革命力量是脆弱无能总是经不起打击，被敌人控制的。

“文革”期间，中联部有一位中年干部来找我，要材料证明吴学谦有问题。我说：“他是革命的，没有问题。”他不愿听，他说组

织上已经肯定他是坏人，你大胆揭发。我说："我不知道。"僵持了一段时间，他毫无办法，训斥我一顿，说我态度很坏。我连任何具体的情况都不谈。你谈正面的，他也可以歪曲成反面的。他想用组织的决定压我，欺骗我。我已经不是幼稚的党员，经过"延安整风"，我懂得了党的历史和党内斗争。"组织决定？"王明、向忠发、张国焘都代表过组织。我要看你是什么组织，做出什么决定。"文革"中我接待过无数次调查人员，都说别人有问题。我说没问题。他肯定说有问题，我说："你不用找我，谁说他有问题，你就找谁证明。""文革"中党风破坏到极点，政治也腐败到极点。对刘少奇、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干部，不管他们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久经考验的一生事迹，康生之流都可以置之不理，造谣诬陷、打击陷害。他们比公开的敌人更为阴险，更容易欺骗人，危害更大。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历史是公正的。1980年终于把他们推上了人民的审判台。

八、无私无畏、坚持真理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年，既是不祥之年、灾祸之年，又是新生之年、希望之年。

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7月唐山大地震，世界震惊。8月松藩、平武7、8级大地震，因为被唐山压住了，谁都没有重视，也不在意。

10月28日"四人帮"被粉碎了，大快人心。十年混乱，政治灾难，告一段落，做了总结。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改革开放有了先决条件。但是革命道路总不是平坦的，历史始终是在曲折前进的。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两个凡是派又成了阻力，这只是一个小旋涡，挡不住滚滚洪流。

许多革命领导干部从牢狱中解放出来，胡耀邦大胆平反冤假错案。吴学谦也是靠周总理在1970年的指示，被关了三年后才走出秦城，回到木樨地宿舍。住房由原来三大间变成普通居民楼的两小间。老吴不计较这些，一家三口团聚一起，总是大喜事。没有工作，他就自动翻译研究亚非各国近代史。翻译工作很艰难，

有的词条只有《韦氏大词典》才能查到，他知道我有一部，说他还买不起。

情况不断地变化，条件逐步地改善。1978 年年初，他被提拔为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文革”前他任处长，中联部当时无局级编制，处长就相当局长）。1982 年后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他职位不断提升，对同志仍是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官架子。对老同志诚恳热情，能互相交心，谈笑无忌。

吴学谦经受过重大的政治压力，他坚持原则，没有退缩，没有动摇。他绝不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出尔反尔，也不会含糊其辞、圆滑应付。他身为高官，敢于藐视权威，无私无畏，坚持真理。他比有些名人更高明、更有远见。他有一颗水晶般透明善良的心，没有私心杂念。一个革命者不是看他平时有多少豪言壮语，而是看他在关键时刻是否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吴学谦做到了，他永远站在人民一边。他是属于人民的，他是人民的好儿子。

2008 年 4 月他和我们永别了！他实现了对党的誓言，也就是 1940 年 4 月他引领我入党时的共同誓言：“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他终生奋斗到底了。他是光辉的！他是伟大的！他是我们的榜样。

我永远无比地怀念他！

（2008 年 7 月 1 日）

深切缅怀吴学谦同志

· 诸咏芬 ·

在迎接上海解放60周年的日子里，我十分怀念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吴学谦同志。1945年二三月间，我参加了吴学谦同志举办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第一次见到了老吴。在以后的三四年间，我在老吴的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这期间，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老吴的姓名和党内职务，当时我并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我们的领导。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老吴就是吴学谦同志。

1944年七八月间，党组织把我调到新本女中读书。新本女中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东段，即现在的永嘉路39弄6号，当时学校有300多名学生和80多名教师。9月间，我担任了新本女中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学生陶钟、吴秀英。当时，我们的上级领导施惠珍同志（时任女中区委书记，解放后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对我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党支部几位同志认真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积极地开展学生运动。

1945年二三月间，施惠珍同志通知我参加支部书记培训班。两天后，我按通知的地点，到拉都路拉都里（现襄阳南路襄阳里），对上联络暗号后进入一幢房内。当时开门的是一位年龄二十三四岁，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个子高大的男同志。我进门以后，见到房内有一张旧四方桌，旁边已坐着两位女学生，年龄在十八九岁。其中一位我认识，是从新本女中调到培成女中担任支部书记的张瑞芯同学（解放后在江苏省教育厅工作，副局级），我

们俩都心照不宣，另一位女同学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她是沪新中学的党支部书记魏静嘉（解放后任上海市总工会生活部副部长）。待我坐定后，这位开门的男同志自我介绍说，他姓吴，叫他老吴就可以了。同时还宣布了培训班的纪律，让大家相互不要打听校名和姓名。

接着，老吴开宗明义，讲这次培训班主要是总结学校开展学生运动的经验。老吴首先向我们讲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老吴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内抗日战争已进入决胜阶段，国内外形势对我们开展工作非常有利，要我们根据有利形势开展工作。

老吴讲了形势之后，要我们各自汇报工作情况。我们三个人都作了汇报。我着重汇报了党支部在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勤学、勤业、交朋友”方针的基础上开展义演募捐助学的情况：1945年年初，在学校放寒假的前夕，高三班同学李玉凤忽然在教室里哭泣起来。原来，她的父亲失业了，她担心再也付不起学费，在高中临毕业的最后学期会被迫失学。李玉凤的伤心事引起了党支部的关注，也牵动了不少同学的心。群众面临的困难，正是我们工作中要重视的问题，党支部立即决定从解决同学的学费问题入手，把群众组织和发动起来。

经过党员的分头活动，为经济困难的同学募集学费的事就在学校里纷纷议论开了，我们发动一些积极分子在同学中间诉说家境贫寒同学的苦处，揭露贫富悬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不合理社会现象，激发起一般同学对贫寒同学的同情，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但是需要的钱这样多，到哪里去募集呢？经过议论，同学们提出搞一次义演募捐活动。我们党支部也认为是一个好办法，就跟高二班几位爱好文娱活动的同学商量，她们劲头很足，搞义演募捐的事就这样定了。于是大家分头准备起来，高一班负责做布景、道具，高二班负责排演，高三班负责总的组织发动，初中部的同学四处宣传，做推销票子的工作。同时，又在教师中进行工作，有正义感的教师马上表示支持义演募捐，有的当即表示愿意协助

我们推销票子。同学们看到教师支持，情绪更加高涨。大家又去找校长交涉。校长沈凤鸣感到这种事对学校有好处，也表示同意。我们看到广大师生已经发动起来，条件十分有利，于是就由积极分子出面，成立了全校性的“助学金筹备委员会”，通过这个组织，公开领导这一活动。

这时已经放寒假了，排演的同学夜以继日地干，工作十分紧张，大约花了两个星期，终于把《沉渊》一出话剧排练出来了。

义演还要通过审查关，那时汪伪特高科对文化活动的控制是很严的，就是对义演也不放松。《沉渊》这出话剧，讲的是一对本来很有理想和抱负的男女青年，婚后在失业、疾病和贫苦的折磨下，由苦闷而消沉的故事。这样的内容，当时容易为群众接受，但其中一段对现实不满的台词，措辞比较激烈，我们估计汪伪特务会借故刁难。为了对付敌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节目审查的那天，由积极分子伍蓓秋负责接待。当演到抨击现实那个场面的时候，伍蓓秋“殷勤”地递烟送茶，就在特务乐滋滋地忘乎所以的时候，这个场面就演过去了。终于闯过了审查关。

正式演出是在金都大戏院（现名瑞金剧场）。我们连演三场，场场满座，演出取得的收入，除了帮助李玉凤等50多位同学支付学费外，还有一些剩余就存起来，以备将来再用。

义演募捐的成功，使全体师生看到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力量，也使我们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形式的活动是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的有效方法。

我汇报以上情况时，老吴边听、边提问、边插话。老吴问为什么义演活动能开展得这么顺利，这么成功？他认为我们的经验，发人深思。当我汇报到汪伪特务审查剧本时，高一班学生伍蓓秋递烟送茶闯过审查关时，老吴高兴地说，要看到同学们的才能，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调动她们的积极性。

培训班开始时每周一次，后来改为两周一次，前后进行了四五次。在培训班总结时，老吴讲，开展学生活动，必须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要了解同学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思想、生活情况。

要与同学们同命运，共甘苦。老吴还讲，现在学生运动将要从低潮发展到高潮，应该在工作中提高学生们的觉悟。要从生活（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要勤总结，勤思考，不断提高工作水平。总结工作不能就事论事，要把它上升到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理论高度来总结经验。老吴用国际歌中“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依靠自己”的这句话来启发引导我们。通过这次培训，我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增强了信心，明确了方向，重视了理论学习。

培训班在老吴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总结了经验，提高了认识之后，我们又在这个学期末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义卖市场。这次义卖活动，群众的发动面更广泛，95％以上的师生都参加了。我们把义演时组织起来的“助学金筹备委员会”进一步充实健全，改称“助学金委员会”。将参加义卖募捐的同学，按年级高低，年龄大小，分成一个个小组，由党员和积极分子带领，拿着收据，分头到现在的淮海路、南京路一带商店团体及居民家里去募捐，走得远的甚至到提篮桥、杨树浦地区。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难熬，而且时常有飞机轰炸，同学们不顾炎热，不怕危险，挨家挨户地去募捐。没有出去募捐的同学，有的拿来了自己家用的东西，有的做了绣花枕头、绣花衫裙送到学校里来。不到几个星期，我们就募集到一大批实物，有文具书籍、衣服鞋帽、五金用品、各种玩具等。我们把物品布置在学校二楼的两间教室里，分别标上售价，发动师生员工动员各自的家长、亲属、朋友以及社会人士前来认购。

通过义演和义卖两次活动，使觉悟不同的同学都受到了教育，一些家境贫寒和平时不大关心政治的同学逐步靠拢了党组织。在斗争中发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我们运用秘密读书会和个别谈心等方式向他们介绍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考察，根据党组织积极慎重、秘密发展党员的原则，从1945年3月开始，我们先后把积极分子童月秋、张文琴、伍蓓秋、徐莲珍、徐静芸、诸蘅、徐美玉、王务醴、

程皓明、蒋宗曹等人吸收到党内。到9月初，新本女中地下党员已发展到27人，为1944年的9倍，初三以上的各个班组都建立了党小组。新本女中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壮大，在群众中扎了根。

1945年年底到1947年年底，党组织安排我担任女中分区区委委员，在吴学谦同志的间接领导下工作。1947年冬至1948年10月，我担任女中区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女中分区区委书记，在吴学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47年年初至1947年冬，上海市男中区委与女中区委合并成立中学工作委员会，虽然我没有担任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但中学工作委员会曾多次借用我家的亭子间（南阳路南阳新邨32号）召开中学工作委员会会议。当时，老吴直接领导中学工作委员会，因此，我多次遇到他。在近三年时间里，我还是在老吴的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1946年6月，我组织学生参加了“反内战、要和平”的“6·23”运动，1947年5月，我组织学生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5·20”运动，1948年5月，我组织学生参加了“反美扶日”运动。

从参加老吴举办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到在他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的三四年间，特别是在培训班，老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吴沉稳随和、作风民主、实事求是、虚心客观、联系群众、关心同志。特别是老吴重视理论学习，强调理论指导实践，强调共产党员与群众的关系必须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联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影响着我的一生。

老吴在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中，始终站在群众之中，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党员队伍在残酷艰苦的斗争岁月里不断壮大，党的工作得到群众拥护，广大党员能得到群众掩护，并能坚守岗位，出色完成任务，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过去，我们夺取政权依靠了人民群众。现在我们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同样也要依靠人民群众。不论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还是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必须

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今天，我们缅怀老吴，就是要进一步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体谅群众的困难，多为群众办实事，以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

（注：诸咏芬同志解放后任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本文为诸咏芬口述，陈观法代笔）

(2008 年 11 月 12 日)

珍惜平等亲密的同志式关系

——怀念吴学谦同志

·夏禹龙·

我和吴学谦同志是在1945年年初认识的。当时已是抗日战争的后期，迎接胜利是当务之急。而南洋模范中学是上海一所中学名校，在此以前，却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好不容易通过各种关系发展了三个党员，在1945年年初建立了党支部。由于对这个学校工作的重视，当时已担任市学委副书记的吴学谦同志就越过中学区委，直接领导这个支部。我还在高中二年级读书，作为入党稍早的一个，尚未满18岁，就担任了支部书记。按当时地下党中学基层组织的情况，支部书记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何况我当时还很幼稚，各项工作的开展大多由吴学谦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应该说，当时工作的开展是比较顺利的，不久就逐步打开了局面。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刻。当时，为了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南模团契（党的外围群众团体）在学校走廊里办了一份名为《南针》的壁报，内容中有一些趣味不高的东西。贴出以后，遭到高一进步同学何志禹、洪澎霖的抨击。我把这一情况向吴学谦同志汇报，他认为这是一场误会，要我直接找他们俩谈话，进行解释和沟通的工作。我遵照他的意见去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没有多长的时间，就发展了他们入党，很好地开展了党在高一年级的工作。到同年8月，日本投降，为了准备迎接新四军进驻上海（这一意图后被取消），召开群众大会与校方发生冲突，我因而被开除，从此与吴学谦同志就不再有联系。但是，南模地下党的工作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直到1949年5月上海

解放时止，南模先后发展党员累计达135人，成为上海中学中的一座进步堡垒。当然，这是南模历届支部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吴学谦同志领导的开辟工作功不可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我曾在青年团市委开会时碰到过吴学谦同志数次，但只是打打招呼而未有机会深谈。不久后吴学谦同志调北京团中央工作，就不再有什么接触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因修改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曾多次应《红旗》杂志社邀请赴京。期间，我曾到中联部宿舍拜访过吴学谦同志。虽然时隔二十六七年，吴学谦同志并不见外，仍与过去地下工作时一样，同我亲切交谈。当时的谈话内容许多都记不起来了，但有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就是关于陈一鸣同志。陈一鸣同志曾被打成右派，当时尚未平反。长期以来，关于右派问题是一个禁区。1962年甄别，都不包括右派。而吴学谦同志却十分坦率地表示：“我和陈一鸣一起工作过，对他很了解，我看他没有什么问题。”我当时有点吃惊，在我这样一个长期没见面的一般同志面前，能对这样一个具有政治风险的问题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确有些意外。

后来，吴学谦同志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公务繁忙，我也不愿意去打扰。直到1993年11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又去拜访了吴学谦同志一次。这时，他已经退下来了，在谈话中，他关切地问起我一些高干子弟在上海的活动情况，我就自己所知作了回答。

从仅有的这两次接触中，我深切地感到吴学谦同志的平易近人和真诚相待。参加过地下斗争的同志，许多人都怀念当时党内平等亲密的同志式关系。解放后，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不断，党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而且官气上升，官腔流行，党员同志间逐渐缺少亲切和真诚，像吴学谦同志那样身居高位，而能继续保持地下党时期那样平易、亲切、坦率、真诚的作风，保持党员间同志式的关系，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由衷地尊敬和怀念吴学谦同志。

深深怀念吴学谦同志

· 李翼振 ·

吴学谦同志于今年(2008年)4月4日清明节驾鹤而去,我深深地怀念着对我影响深远的吴学谦同志,久久难以平静!

我最早认识吴学谦同志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沦为"孤岛"的艰难岁月里,我深切感到吴学谦同志是抗战时期上海进步学生运动中既隐蔽又活跃的一面热爱祖国、引人走上革命道路的旗帜。他团结学生青年,和蔼可亲可敬。

1937年7月,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日军进攻上海,各界民众热情支援"淞沪抗战"。不久,国民党军队败退撤走,上海租界地区成为日寇包围的"孤岛",惶惶不可终日。

那时,我家原住上海南市,我刚刚小学毕业,战乱中随家迁居租界。租界周边,"膏药旗"耀眼刺目,持枪日兵站岗设卡,凶神恶煞,过往行人,没有人身自由。

我经过补习,进入跑马厅西侧的新环中学初中上学。国难当头,中国往哪里去?学生青年前途茫茫。幸而,新环中学原是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召开第一次成立大会(未成功)的场所,当时校内还有进步学生进行半公开的爱国救亡活动。星期假日,三四个同学聚集在课余教室里,相互传阅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著作,谈文艺,也谈时局。我后来也参加了这项有意义的读书活动,得益很多。一天,一位年龄稍长的青年来到了我们的读书小组会中间。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化名叫"林青",也不知道他上的何校?家住何方?就是这位林青同志,每次

一来就同我们亲切地谈论大家关心的青年学习和今后前途问题，谈论当前抗日救亡等敏感问题。原来，他是学协组织派来指导我们读书小组活动的领导同志。

1938—1939年之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离重庆，潜抵上海，后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日寇傀儡，公开投敌。上海全市各校进步学生，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新环中学学生听说该校校长在南京附逆，当天就把学校食堂碗盏砸得个稀巴烂。大批学生离校，集体转往附近的漱兰中学（前南菁中学）上学。

在学协的领导下，我们渐渐知晓中华大地上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寇拼杀。抗日乡村间还有手持棍棒严查路条的年幼红小鬼，令我们十分向往。

在学协的领导下，我们勤奋学习，广交朋友，还进行了慰问八百壮士、纪念“红五月”等多种群众性启发觉悟的活动。“五月的鲜花……”歌声至今偶尔还回荡在我年老的耳际。后来，我们还有针对性地投寄散发宣扬新四军、策反敌伪人员的传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林青同志推荐我们阅读斯诺《西行漫记》，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高举抗日大旗，深得人心。林青还给我们带来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一文，大大增强了我们对抗日前途的认识和信心。

在学协领导下，我渐渐形成了对共产党的信仰和理想，我初步得到了组织纪律的锻炼和考验。

在“孤岛”环境下，在国事世事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林青同志的到来和他的谆谆教诲，为我们拨开了迷蒙的云雾，见到了中华民族努力奋斗，前途坦荡的光亮。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突然袭击新四军部队，无端取消新四军番号，这使我们又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真相，我们更为觉醒。就在这个时候，在学协的引导下，我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1年6月23日，在上海公共租界摩尔鸣路（今茂名路）东侧里弄一个亭子

间里，在一个庄严而简朴的仪式上，我正式宣誓入党。我清楚记得，那天上海报纸恰好刊登外电报道：德国发动进攻入侵苏联国土，苏联人民奋起开展了卫国战争。

我入党时，党支部书记原是同校高年级的聂慕贤同志，他当年中学毕业离校后，支部书记是另一位高年级的陈光耀同志。

吴学谦同志的真实姓名和他的去向，我还是在十多年后全国解放许多年时才知道的。1953 年，我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到了北京，进入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那时单身住在总社西门小招待所楼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同宿舍的一位从东欧归来的同志那里，见到一张非常面熟的照片，那就是林青。一打听，原来他现名吴学谦，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我惊喜异常。1954 年下半年，我进马列学院（后为中央党校）学习，见报载吴学谦同志率青年代表团出国访问的有关消息，我兴奋地给他写信，说明自己原名李翊俊，在上海“孤岛”时期学生部门入的党。他忙于出国行程，由他夫人毕玲同志代为回信。后我应约前往团中央拜访，一见面，果然吴学谦同志就是林青同志。别后离情谈个没完。他和夫人都很热情，留我在他们家用午餐。好事连连，不久，经吴学谦同志联系，我又终于找到了当年与我同校高年级的最初入党介绍人聂慕贤同志，他已改名聂慕，在国防大学工作。当年我入党申请书就是由聂交给吴学谦同志经组织批准才入党的。

吴学谦同志，我入党的最早引路人，我深深地怀念着您！

安息吧，亲爱的吴学谦同志！

（2008 年 7 月党的生日前夕，北京）

悼念吴学谦学长

· 廖贤金 ·

惊悉吴学谦学长逝世，心情十分沉重。哀悼的同时想起了往日的几件旧事，写出来作为对他的沉痛悼念。

1949 年 3 月的某一天，中共上海北站区委书记李国富同志，来到上海宝山路暨大学生宿舍找到我，郑重地对我说："现在党有个绝对保密的任务交给你去完成。"他当即递给我一张照片。我一看，觉得面孔很熟。我噢一声地反问："这不是我们暨大同学吗？"李笑着答道："就是你们暨大外语系的学生吴学谦，所以你要绝对保密，不能给第三人知道此事。"他还说："1948 年 1 月 29 日的'同济大学事件'，他亲自到同济大学指导斗争工作，突然反动派军警包围了同济大学，他被反动军警扣留，他说自己是暨大学生，有事到同济找同学，军警查无可疑实据，只好通知暨大校长李寿雍把他接回暨大。现在敌特猖狂查找我们地下党人，市委为了绝对保护好吴学谦的安全，要给他另办一个不是原来姓名的'国民身份证'。你不是在上海市民政局有关系吗？你设法通过民政局的关系人，秘密地把吴学谦同志的'国民身份证'办好。"

为了保密，我只好亲自去找在上海民政局办公室工作的陈素贞同志，设法完成了这个重大办证任务。

上海解放后，上海学联曾组织展出解放前被敌特迫害的进步同学的实物和资料，于 1949 年 6 月的一天，我特地把保存下来的地下党员黄镜如被特务殴打的血衣送去学联参展。正巧，在上海学联门前遇上吴学谦同志，他主动向我走来打招呼说：你是暨大阿廖吧！并且简要询问了暨大发动同学参加南下服务团的情况

和同学情绪。这是我首次直接同吴学谦同志谈话和接触。

1978年年底，我右派平反后从青海调回公安部工作时，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务长的陈振宜同志来看望我，谈及“文革”时期他被错定为叛徒的过程中，吴学谦曾出来为他说过话。陈振宜询问我说：“解放前在暨大，我同吴学谦从没有来往过，也不认识他，为什么他冒着风险给我说话呢？”我对陈说，你1949年1月6日被捕时，吴学谦同志是上海市学运的主要领导，理应知道你被捕的前后情况。我记得你被捕后，区委书记李国富对我说：依党的纪律，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理应撤离，但因工作需要不能撤离，特规定每天同他碰头一次，如有变化立即撤退。每天碰头的规定，直到你从特务机关移送到监狱才停止。据此，我想吴学谦同志在“文革”这个是非颠倒的时刻，为你被错定为叛徒出面说话，这反映了吴学谦同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高尚共产党人的品质；也反映了他虽身居高职，仍然关怀下级党员干部疾苦困难的良好作风。

往事如烟，人已仙逝，只有回忆与思念，我悼念你。

吴学谦学长，你走好！安息吧！永垂不朽！

一个特殊的任务

· 王悦玲(原名丁雪美) ·

1948年3月,我突然接到复旦分支部张渝民的通知,要我到他家中去接关系,有一位上级领导要找我,我好奇上级领导找我有什么事?我如约来到张渝民家中会客室,见到一位高个子先生坐在沙发上,他首先自我介绍自己叫老吴,因领导复旦地下党的费瑛去香港学习,由他来领导复旦党支部,他给我一个任务:他告诉我,在"五·二〇"运动中被捕的葛嬉月,已于3月16日从曹家花园出狱了,现在家中,要我和她去接上组织关系。我告诉他:葛嬉月被捕前已不属于我领导,由徐祖德领导她。原来我曾领导过葛嬉月。"六·二三"运动后,根据上级指示,复旦成立两个分支部,将平时不怎么暴露的同志组成一个分支部。我是这个分支部书记。徐祖德是另一个分支部书记。分支部成立后,我将葛嬉月的组织关系交给徐祖德。葛嬉月被捕前已由徐祖德领导,我去接关系,行吗?老吴说:徐祖德已毕业离校,复旦能和葛嬉月接上组织关系的只有我一人了。所以只有找我去接上关系。他要我去葛家时要提高警惕,注意周围环境。于是我接受了吴学谦同志给我的任务,去了葛嬉月家中,和她接上关系,完成了老吴给我的任务。不久费瑛从香港学习回来了,仍由她领导我,我也见不着老吴了。我当时也不知他真名叫什么,以后我把葛嬉月的组织关系移交给浦作同志,他当时叫老金。

1948年6月,我撤退到华中解放区,在华中党校15队学习。上海解放前,我们参加了第三野战军第五纵队第三中队,渡江南下去解放上海。在丹阳时我被调到李昌同志那里工作,准备去上

海筹建华东团工委与上海市团委。我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工作。接管了后来成为上海团市委的房子。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成立后，1949 年 6 月吴学谦同志任团市委秘书长，我在上海团市委研究室工作，组长是谭营生同志，由李昌同志直接领导。我们部门虽不同，平时见面时，我和老吴有说有笑，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吴学谦同志调离上海团市委到团中央去工作了。可他 1948 年给我的任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008 年 6 月 22 日）

吴学谦与明夷印刷局

· 支梅芳　孔大成 ·

黎明前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猖獗。国民党政府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削弱、压制国统区人民的民主运动。当然，对日益高涨的学生爱国运动更不例外。

1946年，吴学谦担任上海市学委副书记，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与学委书记张本一起领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这一时期，吴学谦的对外公开身份是立达图书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吴学谦却积极地为学生运动而奔忙。他经常以“辅民”为笔名，在《学生时代》、《青年知识》等杂志上，发表文章，领导和指导学运工作。

1948年上半年，由中共地下学委创办，坐落在北京西路1393号的立达图书服务社，因内部有一位工作人员的哥哥被捕，党组织考虑到可能会事牵“立达”，宣布关闭。

上海学委为使吴学谦能有个公开职业作掩护，于1948年6月用三根金条租下了小浜湾九号（今卢湾区巨鹿路305弄9号）的一幢房子，着手筹建一个对外公开营业的机构——明夷印刷局。

“立达”关闭后，将所有资金全部转移到“明夷”，其中有党组织的经费，有党外进步人士吴道南、陈秉国（他们是在“立达”工作的地下党员吴惠娟的哥哥和姐夫）捐送给“立达”的资金为使“明夷”有个可靠的“后盾”，特招在证券公司工作的进步人士洪鉴新（地下党员冯季衡婶母的弟弟）入股，既可弥补资金不足，又可掩人耳目。

“明夷”的机器设备由中兴印刷厂转让而来。中兴印刷厂由

地下工委创办，暴露后，设备急需转移。吴学谦接收了“中兴”的全部印刷设备，并拟写了《让盘受盘协议书》。事成之后，“明夷”借两辆卡车将设备暂运别处，将厂房安妥之后再移至工作地点。

“明夷”的厂房和设备都十分简陋。厂房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底层为印刷间，二楼前楼是经理室，后楼是办公室，三楼是排字房，亭子间是营业部孔大成的寝室，在底层搭了个阁楼，堆放纸张原料。设备有：四平开面印刷机一台，圆台印刷机二台，全张切纸机一台，刻字架一台及铅字字样等。后来又添置了必要的机器设备和配套设备等，从而缓解了印刷时间紧与数量多的矛盾，提高了反复排版而磨损铅字的使用寿命。

经过三个月的筹建，1948 年 9 月，“明夷”印刷局正式挂牌对外营业。吴学谦直接领导了“明夷”，人员的配备，都征得吴学谦的同意，经过严格的挑选。“明夷”有自己的党组织，孔大成为党小组长，同时又是“明夷”的“股东”、“经理”，冯季衡是“股东”、“协理”，许华任营业部主任，一些工作人同陆续由“印联”调来。在“明夷”工作的同志，都要进行保守机密的教育，不能对任何人讲自己或别人在“明夷”工作，不能与外人有联系。

“明夷”的同志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排除各种困难，齐心协力，积极努力地工作。“明夷”要求其所有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掌握自己的业务，而且还要钻研其他技术，做一个多面手，以备不测。比如，当时从中兴印刷厂移交来的铅字中，存在大小规格不等、字样不全的现象，像“共”、“党”等字样，到铸字所去购买，恐怕会引起敌人怀疑，“明夷”党组织号召大家动手，学习刻铅字，同志们积极响应，日夜勤学苦练，手上磨出了泡，也没人为此放弃刻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同志们终于掌握了刻铅字技术，解决了燃眉之急。

“明夷”日夜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存在着相当大的危险性，时刻都有暴露的可能。党组织教育同志们，一方面要树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斗争；另一方面，要善于同敌人展开巧妙的隐蔽斗争，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同志们根据党组织的要求，群

策群力运用各种办法迷惑敌人。比如，在门后安装电铃，规定进出与发现敌情的暗号，安装隐蔽底稿、印刷品的“机关”，布置了销毁钻版和铅字版的措施等。另外，每人发十块大洋，以备必要时利用军警贪财的弱点进行疏通。平时，大家都十分警惕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旦发现敌情，大家相互配合，随机应变，与敌人展开机动、灵活的周旋斗争。“明夷”的主要任务是印刷上级领导交来的秘密宣传稿件，同时为避开敌人的视线，还公开承接一些诸如练习簿、信、信封、发票本、卡片之类的小型印刷品。

“明夷”为配合上海的解放，为党做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先后透过“明夷”印刷的宣传稿件有：《告全市人民书》、《告国民党军警人员书》、《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在学委的领导下，学生们将这些传单通过各电影院、大楼屋顶热闹地点，散发给过往人群。东吴法学院的同学们，把传单直接投进国民党军人俱乐部的围墙内。许多同学还积极开动脑筋，将传单放入合法单位（如国民党教育局等）的信封内，投寄给国民党人员，有的同学还将传单塞进对象住宅的信箱或门缝间，不少同学直接将传单投进国民党机关的院墙和警察岗亭内。传单源源不断地从各个渠道流入国民党的内部，它触动了敌人的神经，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国民党人员在接到传单后，主动向我党表示要悔过自新，多数人在行动上有明显的收敛，尤其在国民党下层官员里，思想波动较大。

“明夷”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艰苦的基础工作，为学生运动印刷了大量的宣传品，并安全护送到指定地点，转送给党组织，保证了学生运动的顺利开展。上海学生的宣传工作，对鼓舞上海各界人民的革命斗志，对瓦解国民党政府，动摇军心，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明夷”的同志们带着胜利的喜悦，纷纷踏上新的革命征途，明夷印刷局担负的地下印刷的光荣使命圆满结束。

附录：1948年下半年，地下党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筹建地下印刷厂。在上海地下市委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同志（现外交部部长）的领导和指挥下，短期内就办了起来，定名为明夷印刷局，地点在巨鹿路305弄（小浜湾）9号。当时吴学谦同志向冯季衡同志和孔大成同志布置筹建地下印刷厂的任务，说在天潼路顺和里办的地下印刷所，因一名员工出了问题而暴露了，必须迅速转移印刷设备。吴学谦同志当场从身边拿出组织上准备好的一张《让盘受盘协议书》，写明该印刷所负责人潘震无意经营印刷业务，愿意以若干钱盘让全部印刷设备，孔大成愿意受盘。吴学谦同志指示孔大成同志，持此《协议书》既可用作找潘震同志接关系的介绍信，又可在遇到国民党特务时用作掩护脱身。孔大成同志与潘震同志接上关系后商定，由潘震同志立即将印刷机器拆卸包装。

（摘自《新四军印刷厂印钞厂革命斗争史料选（二）》，作者系地下党同志支梅芳、孔大成等）

有关学谦同志的二三事

· 穆广仁 ·

20世纪40年代后期，学谦同志在上海局地下学委担任领导工作，我曾经在南京地下学委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虽然同是在第二条战线上奋斗，学谦是高层次的上级领导人，在地下的环境中，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解放后又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酷和恐怖的1967年，我才有机会与学谦同志见面。

那时，我刚从开罗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造反派到处夺权，批斗各级党政领导人，大批共产党人都成为革命对象，许多工作都处于瘫痪状态。这年5月，亚非记协要在北京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当时“极左”成风，上级要求这次会议必须开成一个“左”派的会议，把亚非记协纳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轨道，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亚非记协的指导纲领。因此要派人到一些成员国物色一批新闻界的“左”派人物来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国内许多新闻单位的干部都被打倒了，不得出国。我刚刚从国外回来，趁我尚未被打倒之际，让我去完成这项任务。要访问的名单中有阿尔及利亚、阿联(埃及)、马里、巴基斯坦等国。作为驻开罗的记者，除对埃及新闻界略有所知外，我对这些国家的新闻界情况毫无所知。我只好求助于中联部。

我拿着一封介绍信来到中联部。造反派把我引到一间会客室。然后由一位负责监管吴学谦的人把他召来。学谦同志大概是亚非司的负责人，看样子虽被打倒，但也还得由他出来接见。会见时那个监管人员始终站在一旁。学谦同志脸色暗淡，说话谨

慎小心，声调低沉。他简单地介绍了那几个国家的情况，并特别提到，阿尔及利亚新闻界“左”派人士与法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建议我到巴黎与法共（马列）人士接触一下。据此，我到巴黎首先找到“靠边站”的黄镇大使，在他的住所秘密会见。经过黄大使的安排，得与法共（马列）领导人儒尔盖秘密会见。孰知他的夫人就是阿尔及利亚的新闻界“左”派人士。但由于其身份特殊，不便公开出席亚非记协会议。接着，我前往马里，马里新闻部长戈洛戈婉拒亚非记协的邀请。总之，所到几个国家都没有完成邀请“左”派人士与会的任务。

亚非记协书记处的扩大会议结束后，我也被列为批斗对象，遵照周总理指示，新华社驻外记者都集中到外交部（在外交部街的老部）参加运动。后来又被诬为“潜伏特务”下放干校监督劳动，未再参与任何工作。“文革”结束后，由于我担负着新华社国际新闻方面的工作，而学谦同志被调任外交部担任部长，我们之间接触多了起来。1984 年起，我调往开罗，负责建立新华社中东总分社。1985 年，吴外长应邀访问埃及，我有机会与学谦同志畅谈。在他下榻的宾馆中，我们作了一次与访问无关的私人谈话。我俩都对解放后极“左”路线的统治下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感叹不已。20 世纪 40 年代为了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在斗争中成熟了起来，参加了党的队伍，成为第二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建设新中国准备了大批干部。但是解放后的近 30 年期间，他们却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品。

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地下党出身的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得以启用，但他们的年龄多已是花甲之年，在政治舞台上上演了昙花一现的一幕。他们在谢幕之后，也还发挥了一些余热。举个小例子，1997 年，京沪宁的一批当年第二条战线上的老战士们极力促成“五·二〇”运动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首先由南京的一些老战士（他们是“五·二〇”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先驱）提出，要求在北京的老友们通过一定的渠道，向

中央领导建议举行纪念活动。当时某些中央机关对“五·二〇”运动不甚了解,反应迟缓。不得已,我向吴学谦同志求助。我到学谦同志家里面商。学谦把钱李仁同志也找来共商。学谦以极大的热忱,凭借着他在上海地下学委的老关系,当场拨通上海浦作同志(宁沪苏杭17院校学生举行“五·二〇”大游行前夕,上海地下学委派浦作为随上海学生赴京请愿代表团的代表)的电话,要浦作联系一些老战友向中央提建议。浦作立即联络了吴增亮、马飞海、陈一鸣,以他们四个人的名义向江泽民同志写信,建议举行“五·二〇”运动50周年的纪念活动。江泽民批给中办,同意由中办发通知给南京、上海、北京三地,分别在三地举行纪念活动,内容包括在上述三地举行纪念性座谈会,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向当代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上海同志希望学谦到上海参加那里举行的纪念会。学谦同志不顾年迈体弱赴沪与会。行前,他要我帮他起草一份发言稿(上海《解放日报》有报道)。他参加上海的纪念活动,表明了他这位老一代青年运动领导者始终关注青年一代,也说明学谦同志终生与地下党、与革命知识分子有着血肉联系,始终热忱地关怀着他们的命运。

学谦同志远行了。我们深深怀念他。

(2008年10月20日)

注:吴学谦自于1997年5月19日参加上海纪念“五·二〇”学运大会后,他在5月26日夜半惊醒,他对我说,只觉得在梦中有许多上海地下党老同志在他身边,然后他对我说,这次活动很有所感,在26日半夜二时他就到办公室写了两句话:“在沪相聚谈何易,后会有期待来日。”* 我把这些记下来,当时以为还会有60周年纪念活动,2007年在北京举行纪念“五·二〇”学运时,他已卧床不能参加,是我代他出席的。

(吴学谦夫人毕玲补充于2008年11月)

* 纪念“五·二〇”运动50周年有感。

回忆我和吴学谦同志的历次见面

· 刘鉴农 ·

我和吴学谦同志相识比较早，到他过世时将近70年了。虽然后来未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但是地下工作时期的情谊却永远难忘。现在回忆起我和吴学谦同志的历次见面，仍有很深的印象。

我和吴学谦同志头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秋季上海租界的“孤岛”时期。当时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各学校学生进行反汪斗争。我所在的迁沪南通中学校长有投敌迹象，反汪斗争后学校就解散了。组织上要我转入租界当局举办的工部局育才公学去继续读书和开展工作。1939年9月，我在南通中学加入党组织，由男中区委金颐卜同志领导。因为转到另一所学校，他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出去，新来接我关系的就是过去从未见过面的吴学谦同志。还记得那是在四马路一家书店里，两人手上各拿着报纸装着看书，按约定的暗语交谈后，便像老同学似地漫步走出书店。来的同志年龄比我大些，穿着蓝布大褂，留着分头，讲着一口上海话。当时化名林青的吴学谦同志就是这样与我初次见面了。

那时吴学谦不到20岁，就非常关心同志。我刚16岁，还是初中生，虽然入党时也看了些革命理论书，但是看不太懂，总不如看革命文艺和报告文学等受教育影响深。我记得，吴学谦同志曾专门介绍我阅读生活书店出版的《新生代》，这是一本描写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故事的长篇小说。书中写了许多青年学生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抛弃死读书和醉生梦死，不怕警察大刀水龙的冲击，不怕被捕与牺牲，英勇地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使我深受

感动。同时也使我觉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在学生中应该怎样去工作和斗争。

育才公学和我原来就读的南通中学环境完全不一样。校长是英国人,实行的是英国式的教育,对学生的管制很严,不许学生有任何组织,学生也大多是洋行职员子弟。我当时从家乡来到上海不久,上海话也讲不好,开展群众工作比较困难。校内只有我一个党员,一学期下来,就认识了本班的同学,和少数同学交上了朋友,发展了几个积极分子,工作没有打开局面,自己也颇有些苦闷。这时,吴学谦同志不但没责怪我,反而从实际出发,经区委决定,将我从育才公学调出来,转到著名的私立学校上海民立中学去读书与开展工作,组织关系改由李琦涛同志领导。民立中学已经建立地下党支部,群众工作有一定基础,主要在高中部。我调去后任支部委员负责开展初中学生的工作。我首先通过初中的"学协"积极分子运用各种小同学喜爱的活动方式去开展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还在初中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了初中部的党小组。因此,也提高了我的工作信心与积极性。

我和吴学谦同志再次见面是解放战争时期,1947 年的上半年在上海新大沽路钟沛璋同志家里。早在 1943 年秋,经学委决定,钟沛璋和我等几个党员调往汪伪首都南京开辟学生工作。我们在那里根据党的"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把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工作开展起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帮助下回到南京,我们又领导了反对歧视沦陷区学生的斗争。后来,我们相继由组织决定调回上海。钟沛璋 1945 年年底回到上海,以后被派去负责利用合法公开出版、实为学委领导的《青年知识》杂志。1947 年年初我回到上海,开始组织关系还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联络处,没有具体工作,我就帮小钟搞《青年知识》的读者信箱专栏。此时已任学委副书记的吴学谦常来钟沛璋家里,他看到我已回上海,非常高兴。1947 年 5 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高潮到来,上海学联决定出版《学生报》。根据学委指示,钟沛璋和我立即转入筹备《学生报》的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也很快

转到上海学委，以后又要我参加上海学联党组，具体负责《学生报》的工作。我想，这些变动都与吴学谦同志对我的了解与信任分不开的。

1949年5月27日上午，在北四川路上海戏剧学院的人民保安队沪北区指挥部，我和吴学谦再一次见面。1948年5月，我在上海法学院“反美扶日”学生运动中被捕，后关在苏州监狱。1949年4月22日出狱，因上海尚未解放，组织要我在家隐蔽，等到所在地区一解放，就到沪北区委指挥部报到。那天，当我走进指挥部大楼的时候，里面挤满了人，我一眼就看到了许多地下斗争中认识的同志，大家热烈拥抱，泪水盈眶。此时吴学谦是地下党上海市委委员，负责联系沪北区委。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你不是刚从监狱出来吗？现在给你个临时任务，让你协助警委刘诚同志先到警察局去工作。原来上海刚解放，国民党警察局的警员们有很多思想顾虑，需要由大学生组成的人民宣传队去宣传党的政策。于是，我就随着刘诚到了沪北区各警察分局和地下党的同志取得联系，并在虹口分局的局长室召开了各分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会议。第二天，我将了解到的警察思想情况，介绍给宣传队的同志，然后带他们到各警察分局去向广大警员宣传。我们第一个去的就是北四川路分局，这是我一年前被捕最初关押的地方，当时充满了恐怖阴森，今天同学们却在这里扭起秧歌、演活报剧了，多么令人高兴。这项任务到第三天军管会来接管警察局就完成了。6月1日下午，组织上通知我去交大参加上海各界青年代表大会。会上我见到钟沛璋同志，他告诉我市青委准备筹办《青年报》，领导决定我也参加。市青委就在富民路43号办公，那里也是即将成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机关。李昌和张本同志是团市工委的正副书记，吴学谦同志任秘书长。这样，我们在这里又见了面。可是没有多久，老吴就和李寿祺同志被调往北京团中央派驻世界青联去了。

1954年年底，华东大区撤销，我从青年团华东工委调到北京团中央统战部工作。那时吴学谦同志已从驻世界青联调回团中

央，任国际联络部副部长。我们都住在团中央机关大院里，宿舍相隔很近，可以常常见到说说话，因为不在一个部门工作，而且老吴工作很忙，所以联系不是很多。1958 年以后，他调到中联部工作，家也搬了过去，接触就更少了。

1966 年“文革”开始不久，就听说吴学谦同志被关押了，林彪、“四人帮”造谣说上海地下党有问题。我和许多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也都受到审查。1969 年年初我下放到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后来全家人都分别下放，北京的家也没了。一直到 1974 年我才有机会回北京开会，只有几天。我尽量抽出时间去看望熟识的老同志。我在朱良同志那里听说，吴学谦已经放出来了，正在家里。于是我就赶到木樨地中联部宿舍去看望老吴。现在我想不起来当时见到老吴说了些什么，于是就查当年的日记。日记上也只有一行字：1974 年 4 月 14 日下午去吴学谦那里。我想那时还在“文革”中，我只能问问他的身体和家里人情况，他也不可能向我谈在狱中的情况。但是，我们地下工作的战友情在心中是相通的。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了“两个凡是”，中办“五七”学校撤销，我才从江西回到北京。我听到王传斌同志说，粉碎“四人帮”后老吴有一次曾对他谈起，刘鉴农是老实人，还待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汪东兴搞“凡是”，不要上当。当时我是相信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中办“五七”学校不能动摇，待在那里继续工作；不知道中央领导层邓小平、胡耀邦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斗争，自己也没有这个觉悟。1980 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和原来南京地下党的老领导朱启銮同志在一起。他谈起 1948 年年底在香港，曾和吴学谦同志一起学习，总结地下斗争，准备迎接解放，以后就没有见过，听说老吴在“文革”中吃尽苦头，想去看看他。我就给老吴打电话，他表示欢迎。这年 7 月 6 日星期天上午，我陪老朱去中联部吴学谦家里，大家谈得很欢畅，既回忆了地下斗争的艰险情景，又诉说了“文革”的残酷迫害，更展望了改革开放的美好未来。

以后，吴学谦同志担任了外交部长、政治局委员等领导职务，

工作很忙，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1997年是“五·二〇”学生运动的50周年，上海一些老同志向中央领导建议举行适当纪念活动，后来经批准在北京、上海、南京分别开了纪念座谈会。北京市委举办的纪念座谈会，邀请了在京的上海和南京地下党一些学生运动老同志参加。吴学谦是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上海“五·二〇”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出席的。鲍奕珊、顾光顺、屈元、徐萌山和我作为上海的老同志参加。参加座谈会的南京老同志是地下党学委书记王明远，副书记卫永清，还有穆广仁、王庆淑，他们更是“五·二〇”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人。“五·二〇”运动50周年，大家有机会在人民首都相聚都感到十分高兴。会议结束后，“五·二〇”运动时关系最密切的沪、宁两地老同志在这里合影留念（见《吴学谦》画册第39页，这张照片里的10位同志现在已有6位过世）。这是我和吴学谦同志生病住院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他住在北京医院，我和别的同志去看过他两次，都不认识了，出来后心中非常难过。相识了数十年的老领导、老战友从此不能以语言沟通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共同的理想信念与思想感情却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2008年4月4日，吴学谦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现在我只能以这篇回忆文章来寄托我的哀思与怀念。

（2008年10月18日）

深沉悲悼老领导吴学谦同志

· 姚明达 ·

今年春季从电视新闻中，惊闻吴学谦同志病逝。我从内心受到了一次极端悲痛的打击！学谦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

回忆往事心情实在难于平静！学谦同志是我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位引路人。1939—1941 年间，当时我在上海公共租界区立达学院初中上学，受到了当时党领导的上海市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的启发教育。当时学谦同志从校外以“学协”关系找我谈话，启发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动员我参加抗日救亡组织——上海市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经他引导，我从立达学院初中二年级转到上海民立中学初中三年级学习。1941 年 3 月 10 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前近半年内，学谦同志与我前后有十余次谈话，逐步启发我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他是我入党、参加革命的第一位导师，令我一生永志不忘！

特此撰文，并赋诗一首，以深沉悲悼老领导吴学谦同志：

惊闻噩耗泪悲溅，
往事连篇幻梦牵。
幸获开导真革命，
真诚感激此心丹。
双方相处何仓促，
件件桩桩遗残痕。
启示深诚思激烈，
终生反复意缠绵。

（2008 年 12 月 18 日）

回忆吴学谦同志二三事

· 费志融 ·

我于1942年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当时吴学谦同志是地下学委系统领导，是我的上级，长时间没有直接接触，因而知道事情不多。

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父母要搬家回乡下，怕我在上海生活无着落，要我一起回乡下。而组织上要求我坚持在上海斗争，这事向组织反映后，组织上派吴学谦同志亲自到我家，与我父母商量。吴学谦同志提出只要有些本钱，费志融可以继续留在上海一面经商、一面读书，经商所得可以维持读书。父母就拿出六听美国孟山都糖精（当时上海沦陷区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均以这类物品做保值东西），吴学谦答应可以这为本钱，经商办店，以收入维持生活。这样父母就返回家乡，我留在上海以读书为掩护，继续搞地下工作。从此以后，我在上海的生活靠组织接济或去当家教、考奖学金来维持。我考入中纺公司技训班和国立暨南大学后，主要靠学校供膳食或公费维持生活。在暨南大学读书时，发现吴学谦的旧式自行车在学校走廊里，才知道他也在暨南大学读书。后来同济大学学生罢课斗争，各大学都派代表前去支援，吴学谦同志很勇敢，身为高级领导还亲临现场指挥。之后学校被国民党军警包围，清理时，发现暨大只有老吴一人，立即叫学校的反动校长李寿雍和特务但家瑞来认领，他们都不认识老吴，就叫吴学谦第二天到学校谈话，从此吴学谦同志再也不去学校了。

上海解放后，我被派到当时人民解放军上海军管委轻工业处，参加军事接管工作，与地下党联系少了，有关吴学谦同志的事

也知道的少了。

直到1958年我调到北京，在国家纺织工业部机械局工作。当时吴学谦同志在中央联络部工作。由于他十分好客，曾到我家做客吃饭。更多的是他与毕玲同志在住地多次请我们吃饭，我印象很深的是毕玲同志亲自下厨房做“三杯鸡”，味道很好。

吴学谦同志任外交部部长时，对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不论上下级的关系都很热情。有位当年曾在地下工作，后又同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因受错误政策迫害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同在外交部工作的爱人也受牵连被下放到离北京较远的小城市工作，后来这位同志平反后重回外交部工作时，要求将其爱人调回。吴学谦知道后，立即叫人事部门负责同志办理此事，但人事部门有些为难，认为外交部下放的人很多，调回来较难办。吴学谦发火说：还有谁与他们两口子的情况一样！人事部的负责人无言以答，只好答应办理。吴学谦同志担任国家副总理后，我们联系就少了。1998年前后吴学谦突发重病，不省人事，住在北京医院，我经常去看望他，希望他早日康复，但他一直没有醒过来。

（2008年11月15日）

忆吴学谦同志的共产党人本色

· 金德琴 ·

吴学谦同志和我是同龄同时代人。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先后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在日寇汪伪白色恐怖统治下，在上海租界“孤岛”进行地下工作。当时我在光华附中、之江大学开展学生工作，由于分属不同的支部、区委，所以在党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下，与他并无接触。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上海全部沦陷。日本为加强血腥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分区封锁，突击搜查，捕杀抗日分子，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上海党（当时为江苏省委）根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1942年4、5月间决定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学生系统指定一部分学委、区委干部（其中有吴学谦同志）和已暴露的党员陆续撤离上海，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我留在上海，坚持工作，继续负责中学区委。1943年学委根据《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调查研究组。调我负责担任组长，参加这一工作的杨翰章（杨叔铭）、邝日安等同志，进行搜集、整理有关敌伪的统治经济资料。1944年夏秋之交，吴学谦同志由淮南华中局城工部调回上海，参加学委领导工作。前来接上我负责的调查研究组的工作关系。同时，交给我接上了丁景唐同志负责的文化宣传组。这个组有沈惠龙、冯大文等同志。吴学谦同志每周和我联系，听取汇报，指示工作。我和丁景唐同志谈工作，吴学谦同志有时也参加。在吴学谦同志领导下，调查研究组的工作继续收集有关敌伪统治经济的组织机构、政策、刊物、文章、论述和人

物，如日本财阀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头子几玉谦次等材料，进行整理、综合、研究、分析，提供组织上参考。文化宣传组的工作，继续办好《小说月报》和筹备《莘莘学志》月刊，通过这两份刊物组稿的方式，联系投稿的写作者和大、中学校爱好文艺的学生和社会青年作家。还寄发宣传品，在12月将近年底前，通过邮局有对象地寄送贺年信，宣传抗战胜利在望的形势。每次我们接头，吴学谦同志都是仔细听取我们的汇报后，概括扼要地提些意见，做出指示，有助工作的开展。

记得1944年12月18日，吴学谦同志通知我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淮南华中局城工部参加整风学习。我离开上海，奔赴淮南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全国解放后，吴学谦同志和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仍有接触见面。上海地下党搞学生运动的同志也常常谈起吴学谦同志。吴学谦和我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工作关系，但始终保持着真挚的同志式的情谊，在我的心目中，吴学谦同志的一生，他的思想境界、求是精神、朴素作风、重视真理、忠于信仰、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本色始终不渝。

“老吴这人很勤恳，没有一点架子”

——追忆老吴住我家的前前后后

· 费福泉 ·

4月4日傍晚6时15分，接到张漱芬同志电话，才得悉吴学谦同志逝世的噩耗，十分震惊又十分难过。我敬爱的老吴同志，老领导走了，没有熬过今年这个清明节啊。64年来的情景，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眼前：记得在1944年秋，改由鲍奕珊同志领导我之后不久，他曾引领老吴、“老王”（钱李仁同志）到我海宁路老家，借我住处先后开过几次会，从此我认识了老吴，当然那时还不知怎么称呼他们，但他温和沉着的面容已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和记忆。后来，在我参加男中区委工作后，有时“小胡”（李琦涛同志）身体不适，区委开会时，老吴来看望我们，问问有什么事，通报一些情况。从此，我才知道“老吴”这个亲切的称呼，他是我们上海学运的领导人，温文尔雅，态度诚恳。在1947年“五·二〇”运动后和1948年“同济事件”当晚，琦涛同志先后急匆匆地告诉我，要安排老吴暂时住我家，并告市校分区委诸同志不要到我家去。老吴住在我家的日子里，给我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美好的回忆，一直持续到她老人家辞世。她总是说老吴“很勤恳”，早晨五六点钟就起身，不停地在小纸片上写，然后就骑着自行车出去了。晚上回来，有时带些水果请我和我妈吃（那时我家经济很困难，靠我教书的收入和党组织的一点补助生活），他很亲切，很随和，没有一点清高和架子。

记得有一个晚上，他指着报刊上报道1947年9月22—27日在波兰举行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并在9月

底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全文，对我说：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即“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及战后时期的发展，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重要，是文章的关键（大意），言简意深，让我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大大提高了我的认识水平和学习能力（方法），迄今仍感到新鲜，很有启示。

特别是国民党反动军警镇压上海大中学生的“同济事件”当晚，琦涛同志突然赶到小东门十六铺我教书的夜校，告诉我老吴马上要去我家住一宿，事先没有思想准备，我当即告诉妈妈，她乐意地迅速地作了铺排安顿。第二天一早老吴离开了我家。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老吴好险啊！我一时又不清楚学委其他领导人有谁被拘捕！？我佩服他的沉着，不露声色，更加敬重他！

上海刚解放，5月28日我们北四川路分区委的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到横滨桥剧专报到，他见到我，笑眯眯地点点头，匆匆离去。后来才知他是按照地下党市委的分工领导沪北大区委的。不久，他去国外工作，后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期间，每当见到我（我在市青联工作），总要亲切地询问我：你妈妈身体好吗？代我看望她，1957年4月，他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首次赴日本访问后经上海去苏州休息、总结我去迎送他们。在宾馆休息时，他亲切地送了我一支活动铅笔（上面刻着日本茨城县）。那时是很珍贵的对笔，他拆了一支给我。这对我来说非同一般。在我经手接待青年外宾期间，一次他正在上海，当得知这天晚上琦涛同志要宴请朝鲜劳动青年联盟中央领导同志，他主动让我也出席。不然日后当他知道我这时也在上海，不见面会不愉快的。在宴席上，他主动关切地询问朝鲜农业收成情况如何。当时大家都关心着农业问题。以这个问题为谈话切入点，这位朝鲜同志很高兴地同老吴交谈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吴主动抓住各种机遇来做外宾工作，这也给我树立了榜样。在一次招待外宾宴会上，他对我笑着说：听说你不大安心做送往迎来的外宾接待工作？以后要让你去外国走走，体会体会青年外宾工作的重要性，增添感性知识（后来，在1959年夏，我去了维也纳参加世青联欢节活动，

深有感受)。他对我的关切、爱护,我永远铭记至今。

记得在1961年冬,我去京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期间,一次散会时他看到我,就说:明天休会,到我家去吃顿午饭,我家有一只烤鸭,招待招待你这从地方上来的同志。那天他邀约了老钱、费志融(我入党介绍人)一起吃了顿美餐,气氛十分融洽,像在家里一样无拘无束。临别,他专门关照我,向我妈问好。"文革"一场噩梦,听到他被关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我也被隔离,但仍关心着他。上海地下党学委系统出了那么多假党员、(突击)叛徒、特务,怎能掀起轰轰烈烈的第二条战线呢?! 20世纪80年代初,我出席全国工会外事工作会议期间,傅庆三同志受施惠珍大姐之托,要送两本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学运史》给老吴。老傅向他通报了我的名字,他说,我认识,晚上来吧。那晚我们同王关昶同志(施大姐的爱人,时任市总工会副主席)一起去了木樨地中联部内老吴家,他热情接待,并主动找到乔石同志(在资料室)说:上海来了几位同志,见见面。他亲自陪同我们去了乔石家。然后,他们又站在大院里,坚持一起等候总工会的汽车来接我们,同我们一一握手才挥手告别。这使老王和我们很感慨。

自1982年起到1987年我离休,我随张承宗同志去京参加全国政协全会工作(我趁机拜访在北京的老同志,征集党的统战工作史料;接应来访承宗同志的老同志),我才有机会多次趁他来探望承宗同志时见到了他。他亲自出席原上海地下党学委老同志座谈"组织史"的会议。还是那么温和亲切,一点没有"大官"(外交部长、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的架势,仍是"老样子"。他问我母亲的近况(1981年冬谢世),惋叹地说:你妈妈热情、豪爽、好客,凡认识她的同志们都称道她。承宗同志向他介绍,我正在征集党的统战工作史料。后来,他寄来《一九四七年上海学生的"五月运动"》(后来刊登在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和"向外宾介绍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工作"两篇稿件,并谦虚地说用不用由你们定,以表示对我工作的支持。有一次,当得知市政协机关的地点是原"丽都花园",便委托我携带一些食品,返沪后代表他慰问

住在机关北面的新闸路一条大弄堂里他的姑妈。第二天上午，我应约去木樨地中联部老吴家，毕玲大姐接待了我。客厅还是那么简朴。同时，他叮嘱毕玲同志关照我，送我的一瓶朝鲜酒，因我这年纪不能喝。他还是那么细心、关心，让我感到温暖。

1997 年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纪念“五 · 二〇”运动 50 周年座谈会时，我才发现他的身体状态不佳，讲话艰难。但在会后，他仍能认识我，叫出我的名字。想不到这是我俩最后一次的见面了 !!……我总是期待他、我所敬崇的老领导醒过来，像有的人出现的奇迹那样。每年元旦来临之前，我总是虔诚地写着贺年片，有时从张漱芳、龚兆源、浦作等老同志那里听到有关他的点滴信息，也感受到毕玲大姐的辛劳。因我深有感受，在老爱人袁各珍患病期间真是度日如度年、度年似度日地承受着一切一切。万望毕玲大姐保重；孩子们保护好你们的妈妈、奶奶，继承父志，造福于民。

纸短，绵绵哀思，说不尽的美好回忆；学运大事、党史大事，我说不上，只说些小事、家事来感受老吴同志的高尚品格，党的传统美德的体现。

写到这里，《新闻联播》播放了吴学谦同志逝世的噩耗，心头一阵阵的难过。老吴永远活在我们尚健在的学运老同志的心中！

（写于 2008 年 4 月 4 日，补充于 7 月 26 日）

怀念老吴

· 张征秉 ·

我认识吴学谦同志是在抗战初期，在“孤岛”上海租界市内他家里认识他的。我参加上海市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时，开始负责传递文件交通，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学校读书，碰巧我入学格致公学时遇到他时已是高三学生，并引起他的关注。他和钟沛璋两位同志都很关心我。我读书很上进，在班上被选为班学生会主席。因为我寄住在姑母家，她不是很愿意，老是为难我。我曾经被迫离开姑母家在同学家中居住过，但这只是临时的。这样使我想起离家出走，当时也有学生离校去大后方，我没有关系也就没有去。我在阅读《西行漫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本书后，我决心去延安，以后在吴学谦的帮助下又进一步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章，钟沛璋与我一起讨论研究，我决心参加共产党。后来在他们介绍下，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学谦与钟沛璋他们两人是我终生难忘的引路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一定努力实现我的入党誓言。

（2008 年 11 月）

回忆吴学谦同志

· 曹奇峰 ·

吴学谦同志曾是我的领导，也像是我的兄长。他的走，虽在意料之中，还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难过。

我第一次见到吴学谦同志，是在1945年春夏之交，那时，吴学谦同志是上海地下党学委的领导，我在地下党教委工作。教委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大约有三十来人，由我与他们联系，组织关系存放在我这里。后来，组织上决定，要把学生党员的关系转移到学委，吴学谦同志就代表学委来接收学生的组织关系。记得事先约好，接头的时候每人手里拿一份老《申报》。

接头那天，中午十一点，我在家门口等着，看到一位二十多岁、身穿蓝布长衫的人走来，他手里拿了一份老《申报》，我迎上去，和他对了暗号。那是一句口号，现在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对上暗号后，我们握了下手，算认识了。我带他进到我家，他先仔细察看周围环境，门、窗的位置，后院的情况等，然后我请他到我住的亭子间谈话，我们又重新热烈握手，双方都很高兴。他详细了解每个学生党员的情况，讲了把学生党员关系转到学委去的意义，又给我讲了革命形势、战争的情况等。那次见面以后，他派了学委的吴康同志，经常来和我们联系。他本人来过一两次，了解我们有什么问题。我对他的印象是，工作很认真、很细致。

1946年6月23日，地下党组织了全上海各界师生职工大游行。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进行时，我在马路上看到了吴学谦同志。按规定，他应当留在现场以外，但他还是去了，在现场了解情况，亲自指挥，纠正问题。游行队伍走到复兴公

园时，国民党布置了一百多名特务，等在那儿抓人。吴学谦同志作为领导处境更加危险，但他很勇敢，也去了复兴公园。最后我们都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此后一段时间，我与吴学谦同志接触不多。他的爱人毕玲同志，当时是地下党女中区学委的负责人，与她一起工作的有刘菱芬同志、我表姐马问清等。表姐住在我家，她们常来我家开会、吃饭，和我母亲比较熟，我母亲很喜欢她们。我有时会碰到她们，当时毕玲同志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开朗。后来到了北京，与她有了接触，她比我略大一些，对我一直很关心。

上海解放那一天，学委各级负责人在中国银行聚会，一起吃饭，我与吴学谦同志又见了面。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中学区的同志们在我家开会，共二十多人，其中有钱李仁、钱其琛、乔石同志，由吴学谦同志代表地下党市委来安排工作。我被派去一个印染厂，参加接管。后来，吴学谦同志被任为上海市青委秘书长。我心里想，吴学谦同志在地下党就担负比较大的责任，此时的职务似乎太低了一些，但我去他办公室看他时，他显得很坦然，很尊重解放区来的同志，一点儿没计较个人的职位。

不久，我们先后到北京工作。吴学谦同志到匈牙利任国际学联中国代表前，我们见过一次，后来他到了中联部，我在全国总工会，我们有时见面。“文革”中，得知他从狱中出来，我去他家看他，说起狱中生活时，他说他主要是看书、看报。他的沉着坚定，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文革”后期，有段时间，我们早上都到木樨地一带散步，常会碰到一起，一边散步，一边闲聊，他常关心我的身体、学习，我们走到全总大楼那儿分手，各自回家。“文革”后，上海的老同志来京时，我常陪他们去看吴学谦同志，他见了他们都很高兴，热情招待。

“文革”结束后，吴学谦同志任外交部部长时，我在联合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工作，一次，他接见教科文的副总干事，恰巧是我陪同副总干事前往。他接见完以后，又跟我谈了一会儿，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谈了对外交工作方面的一些意见，要我们把教科文工作做好。他对工作还是那么认真、细致。

和吴学谦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 殷振民 ·

作为一个同学和朋友，我和吴学谦同志在暨南大学相处的日子实在太少了，只有一年多。而在离校后的六十年漫长岁月里，我们又只见过三次面，会晤的时间总共也不过六七个小时。可是，在我的记忆里，还是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这些天，在我回忆过去和学谦同志在一起的日子时，这些沉睡多年的往事，都一个一个苏醒过来，越过遥远的时空，把我带进对学谦同志的深深怀念中。

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学谦同志（他在暨大的名字是吴庆德）和我就已经是上海康定路暨南大学的学生。那时我们虽然同校，却相见不相识。我们相识是在暨大从福建迁回上海以后。我记得1946年9月开学那一天，我在暨大宝山路二院教务处办理复学注册时，正好遇见他也在办同样的事。一看学生证编号，就知道我们都是康定路暨大的“老学生”，于是就攀谈起来。这样，就由相见而相识，开始了我们的“友谊之旅”。

第一次见面，学谦同志温文尔雅的风度，闪耀着睿智的目光，从容不迫的举止，温和的微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全班同学的眼中，他则是一个有教养的、沉默寡言、“安分守己”的“老实”学生。他每次来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是一边走一边向他遇见的同学有礼貌地点点头，打个招呼，然后找个座位坐下，打开书包，准备听课。他平时很少和同学交谈，也不参加校内的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他在班上是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人。

那时暨大的校舍是临时借用的旧校舍。教室里的设备很简

陋，除了一面长长的黑板外，就是一排排双人课桌，每张课桌后面放着一张长板凳。由于我和学谦同志的“老关系”，我们常坐在一起听课。日子长了，就渐渐成为习惯。对我来说，愿意和他坐在一起听课，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们读的是外国语文学。有的教师是直接用外语授课。讲授英国文学史的是在英国留学和生活多年的孙贵定教授，讲课时英语非常纯正流利。过去我的中学英语教师发音不准确，受其影响，现在我听课时就感到不适应，记笔记常常出错。学谦同志高中毕业于上海名校格致公学，英语基础十分扎实，听课毫无障碍，笔记书写清晰流畅，极少错误。我坐在他旁边，可以随时向他请教。他非常乐于助人，总是耐心指点，帮我订正。

虽然学谦同志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地下工作，但他对学习也不放松，基本上天天来上课。他在学习外语系的必修课之外，还常常利用空课时间去旁听中文系的课程。有时我也同去。我们旁听次数最多的是刘大杰教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他讲课生动精彩，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学谦同志有时也缺课，甚至接连几天不来学校。现在看来，可能是因为他有工作任务，对学习与工作一时无法兼顾。不过，发生这种情况的次数很少，对他的学习影响不大。

我有一种感觉，学谦同志好像很忙，每天都是来去匆匆，课后在学校逗留的时间不多。不过他有一个习惯，在离校之前，总要在教学大楼走廊里徘徊片刻，特别关注校内各系会和其他学生组织张贴在墙上的墙报。当时，校内进步学生组织与反动学生组织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经常张贴墙报发表政见，作为进行斗争的阵地。他走近这些墙报时，总要驻足仔细观看。我的政治感觉不敏锐，以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常常催促他：“快走吧，有什么看头。”他总是说：“看看，看看，看看上面都说些什么。”坚持看完再走。

学谦同志平时沉默寡言，但对我并非如此，我是他交谈最多的人。我们都是走读生，为了减少在校的时间，都是把上课的时间集中安排在上午或者下午，但免不了也有上下午都有课的日

子。那一天，我们就必须在学校附近的小饭店吃午饭。这时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候，饭后可以长时间无拘无束地聊天。我们谈话的范围很广泛，从个人经历、家庭状况、学校、社会到时事政治，无所不谈。我们谈话有一个特点，都是我说的多，他说的少。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默默地听，有时提一个问题，有时补充几句，有时发表不同的意见。他说话平和坦率，善于启发诱导，从不作政治说教，容易为人接受。交谈的次数多了，对彼此的思想和性格逐渐有了较深的了解，因而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作为同学，我和学谦同志几乎天天见面，而作为朋友，我们只在校外见过两次面（在学校附近的饭店吃饭除外），而且都是在各自的家里。1947 年 6 月，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城隍庙附近姐姐的家里。顺便说了一句，有空，请来玩。几天后的下午，他果真来了。他没有多逗留，看看我的房间，随便谈了一会，就走了。不久，我也到他家回访。他的家住在一幢并不高大的旧楼房里，其中有好几户人家。楼下是一间公用客堂，墙上有一个公用电话。我逗留的时间也不长，没有上楼，只在客堂里和他谈了几句就告辞。这是我们第一次互访，也是最后一次。

有一件事我至今还没有弄明白。1947 年夏天，我在镇江乡下度暑假，在秋季开学前十天左右，突然接到学谦同志的信，大意是在上海度假比在乡下好，建议我提前回上海。我回上海后，以为他会来看我。不料来看我的不是他，而是周望久同志（他也是与我关系很密切的同班同学，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党员），说开学前有一个参观“山海工学团”的活动，邀我一起去参加。“山海工学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年创办勤工俭学教育的地方，为世人所称道。那天来参观的人很多，都是学校里的进步学生。“工学团”的老学员一边领我们参观过去的设施，一边给我们讲说当年务农与学习文化知识相结合的情景，非常引人入胜。晚上还举行了座谈，内容是关于当前上海学生运动的情况。整个活动进行得非常热烈，一直到深夜才散。

开学后不久，我又参加了一次校内进步学生积极分子的非公开讨论会，主题是如何组织与发动广大同学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中来。会上有人提出是否可以把进步同学秘密组织起来，这个意见得到了很多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在这两次活动之后，我就感到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我不断向前走。

以后我又接连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是10月的外语系系会换届选举。以前外语系系会是控制在政治态度暧昧的学生手中。为了把外语系系会的领导权掌握在爱国进步同学手中，选举前我和周望久同志等同学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选举是在晚上举行的，参加的同学很多。学谦同志从来未参加过校内的公开活动，这次也来了，可见他对这次选举的重视。他环顾了一下会场，就径直走到我身边，拉拉我的手悄悄对我说："今天我投你一票。"会场的气氛很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志在必得。结果我们大获全胜，我当选为系会主席。

接着，11月我又参加了另一次对我对暨大都很重要的活动——创建暨大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雷社"。会议是在我姐姐家里举行的，解放以后，我才知道与会者除我以外，都是共产党员。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更好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一个暨大进步学生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是完全必要的。于是就在会上宣告"雷社"正式成立。王宗恕同志被推选为书记，我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从这时起，我就一步一步投入了当时的政治运动。

从以上开学前后的几次活动的回忆，我似乎感觉到暨大地下党组织当时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脉络：扎扎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为重振暨大广大同学的斗争精神，做好组织准备。我以为，学谦同志对此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因为他既是暨大的在校学生，又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1948年1月底，我们全班同学都在准备参加学期考试，却一连几天都不见学谦同志的身影，我去他家也没找到他。我们以为那时的"一·二九同济事件"，暨大没有发动广大同学去支援，因

此，他不可能一个人去参加。他到底去哪里了，难道失踪了？大家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下学期开学后，看到他被暨大反动当局开除的布告，才知道他与“同济事件”有关。他从未参加过校内公开的政治活动，为什么会一个人去同济大学，大家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疑问直到上海解放以后才得到解答。

两个月后，我也被暨大反动当局开除。1948 年 4 月，上海地下学联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上海大中学生春游旅杭活动。暨大进步学生在暨大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响应了学联的号召，由外语系和其他几个进步系会共同发起，并以“雷社”成员为骨干发动和组织了广大同学参加这一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我是暨大春游旅杭团的副团长，并在上海大中学生公祭于子三烈士时，代表暨大同学参与公祭，是三位公祭人（各代表暨大、复旦和上海幼师）之一，目标突出，成了国民党特务的重点迫害对象。回校次日，即遭特务殴打受伤，于第二天深夜在仁济医院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王宗恕、郑景渠等同志）。这样，我就成为我们班上继学谦同志之后第三个（第一个是周望久同志）被暨大反动当局开除的学生。我和学谦同志的学校生活就先后结束，暂时失去了联系。

我和学谦同志在离开暨大的六十年里只会见过三次。第一次是在 1949 年 6 月。

1949 年 4 月苏州解放前一天，关在苏州监狱的所有政治犯（汉奸除外）全部出狱。当天下午，我爬上南京开往上海的最后一次列车回到上海。考虑到回家不安全，就直接前往民主人士冷先生家，暂时寄住在他家里。上海解放后，我不知道去找谁安排我的工作，也没有人和我联系。就在我彷徨不安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我，主动与我联系的人是学谦同志。6 月的一天，我在暨大遇到党支部的同志，他们一见到我就急忙对我说：“吴学谦同志，就是外语系的吴庆德，正急着找你，请把你的住址留下。”没有想到次日上午八九点钟，我在冷先生家里突然接到学谦同志打来的电话。一拿起话筒，就传来他急促的声音：“你是殷振民吗？我是吴

庆德。你有没有参加上海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听到我的否定回答，接着说：“怎么他们没有通知你？这样，你明天上午到上海学联来找我，威海路陕西北路口。”就这么几句话，很简单。看来，他打电话的目的就是通知我去找他。第二天上午我就按照他的吩咐去上海学联。我还记得我在楼下等待时，他急匆匆地跑下来的情景。没等我开口，他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殷振民同志，你受苦了。身体还好吗？上海解放后，我一直挂念你，不知道你现在怎样了。我无法自己去找你，只好委托暨大党支部的同志设法与你联系。这个办法果然有效，很快就找到你了。我们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现在好了，又走到了一起。”我简单地谈了一下我最近的情况，他听后安慰我说：“你的工作好解决，就在上海学联工作，你觉得怎样？我现在正在开会。我们一道上楼吧，我开会，你坐在旁边休息。”

开会的房间在楼上的西边，与会者约十人。学谦同志继续主持会议，我就坐在一旁听。这时，他在我眼中简直判若两人，一反过去在暨大沉默寡言的常态，一边用笔在一张纸上指指点点，一边用明确果断的语言发表意见。会议结束后，学谦同志把我介绍给浦作同志，请他安排我的工作。临走时又嘱咐浦作同志，让我明天带领一个小分队去解放军部队 79 师的一个连队，协助部队进行宣传工作。我从连队回来后，就没有再见到学谦同志。后来浦作同志告诉我，他已调到团中央去了。于是，我们解放后的第一次见面，相处不过两小时，交谈不到一刻钟，就又匆匆告别了。

我们第二次会见是在三十六年后的 1985 年。

学谦同志调离上海以后，我们就长期处于音信断绝状态。1983 年，由于办理离休需要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历史的证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问他能否为我在解放前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况写个证明。比我预期更快，几天后就收到回信（由毕玲同志代笔），问我需要哪些方面的证明，并附上一幅在意大利拍的照片。于是，我们就恢复了联系。其后，我们又通了两次信。一次是我写去的，告诉他我已办好离休；一次是他写来的（仍由毕玲同志代笔），

信中又寄来两幅学谦同志亲笔签名的照片。另外，还谈了一些他对我的回忆："……老吴在晚上与我谈起你，回想在读书时，他虽不能暴露是学生党组织的领导人，但他对你的谈话是推心置腹的。他觉得你治学严谨，为人热情，不惜牺牲个人，为革命贡献一切……"学谦同志的两封信使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三十多年漫长岁月丝毫没有冲淡他对一个普通同学和朋友的平凡友情，这就引发了我想去看望他的愿望。

1985 年 11 月，县里的教育系统安排了离休同志去北京参观旅游。这是我去看望学谦同志的绝好机会，于是，就去信把我的愿望告诉了他。

那时学谦同志住在中央对外联络部大院内。我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就按约定的时间前往。快到对外联络部时，守候在大门前的毕玲同志就快步迎上来，大声说："你是殷振民同志吧，欢迎你来我家一叙。"随即领我进了院内的一座宿舍楼。我刚上楼，站在楼梯口的学谦同志就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殷振民同志，欢迎你来，我们多年不见了。"我说："有十三万多天了。"他立即纠正："不，是一万三千多天。"我们都感到离别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叙谈是在书房里进行的。我们一边吃水果，一边无拘无束地谈话，仿佛又回到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学生时代。显然，学谦同志很想了解我三十多年来的全部经历，因而我们谈话的格局就成了他问的多，我说的多。谈话是学谦同志先开始的，他第一句话就问："殷振民同志，我离开上海后，他们是怎样安排你的工作的？"我就把在上海学联担任福利部副总干事以及后来调到教育系统任三好中学校长的经过作了简要的叙述。接着他又关切地问："你有没有入党？"我说，还不是党员。我的回答使他感到意外，他有点遗憾地说："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介绍人？要是我在上海就好了，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我无言以对。

沉默了一会儿，谈话又重新开始。话题是我 1958 年离开上

海以后的经历。学谦同志对我怎样在“支边”的名义下被“流放”到宁夏，怎样从宁夏调回镇江市丹徒县（我的故乡）当一名农村中学教师，又怎样在“文革”时期当了三年“牛鬼蛇神”的坎坷遭遇，十分同情。听完我的诉说，感慨颇深地说：“殷振民同志，你又一次受苦了。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解放以后。你失去了太多的宝贵时间，这是无法弥补的，这样不幸的事以后不能再发生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经不起反复折磨。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好在你已办好离休，可以安度晚年了。”

学谦同志对我在农村的生活也很关心，从日常生活到生病就医都问得很仔细，觉得我的生活还不尽如人意，需要改善，建议我是否可以考虑把家迁到镇江市内去。

谈完我个人的问题，学谦同志又问起同班同学的情况。我告诉他，不久前上海的同学举行了一次聚会，大家都很想念他，都说，过去他在班上不引人注意，不知道他就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现在知道了他的身份，想见见他，却没有机会。他颇有感触地说：“我何尝不想能有这样的聚会，请你讲讲他们的情况，好吗？”

于是，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介绍：谁在上海，谁在北京，谁在国外，谁已成名，谁已早逝，等等。其中，有的同学名字他还记得，有的已经忘记，一点印象都没有。他似乎没有从我的介绍中得到满足：“真想亲自见到他们，以后会有机会的。”

在谈这些同学的时候，我和学谦同志在暨大的那些往事也同时涌上了我们心头。他若有所思地说：“殷振民同志，你还记得我们常常在暨大附近的小饭店吃饭吗？饭后聊天是令我们非常愉快的事。我觉得和你很谈得来，无所不谈。你喜欢唱歌，我爱听你唱。我听到你唱《太行山上》，就知道你是一个进步青年。”“当然记得，”我说，“那是我们谈话最多的地方。”但是，也有记忆模糊的事，当我谈起曾经到他家里访问他的时候，他竟大为诧异：“你到我家里来过？不会吧，你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我坚持说：“我是去过，你住的那幢楼房里有好几户人家，楼下的公用客堂里的墙上还挂着一个公用电话。”他还是半信半疑：“还有公用电

话？好像没有。”这时，毕玲同志插话说：“老吴，你的记性太差了，我到你家里去过，楼下是有一个公用电话。”毕玲同志的“旁证”终于使他想起来，高兴地说：“不错，是有，是有，你是来过。几十年了，有些事自己都记不清了。”回忆往事就像解数学题一样，想不起来的事忽然想起来了，是特别高兴的。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了。这时，我突然想起几乎忘记了一件大事：请学谦同志讲一讲他是怎样从“一·二九同济事件”的现场脱险的。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稍作思索，便对我讲述了全部经过：“事情是这样的，一·二九的那天，我也在同济工学院。前来支援同济大学的各大中学的学生被国民党反动军警以学校为单位分别强制集中在不同的教室，逐个查问。查问到我时，我听到一个手里拿着黑名单的特务低声说：‘名单上没有他。’正在查问我的那个特务就大声对我喝道：‘暨大就你一个人，你来这里干什么？等你们学校来人把你领回去。’我暗自庆幸，我并非他们搜捕的目标，心就安定下来。学校来认领我的人是反动校长李寿雍。他一看暨大只有我一个人，显得很得意，‘你看暨大那么多学生就你一个人来，还不跟我回学校去！’他把我领上汽车后，便盘问我为什么要来同济大学参加示威。这时，我表现得比平时还要老实，回答说：‘我不是来参加示威的。我有一个表弟在同济，我是来找他的。万万没有想到便被围困在里面，出不来了。现在面临学期考试，我正急着要回去复习功课。学校来领我回去，再好也没有了。’李寿雍信以为真，就在回校途中放我下车，对我说：‘今天先放你回去，明天来学校报到，我还要和你谈话。’为了避免我不到校引起李寿雍的怀疑。回家后，就以父亲的名义写了一封‘受惊过度，需要休息’的请假信给学校。后来回想脱险的经过，还真有点后怕呢。”

学谦同志讲完脱险经过，我们之间的谈话就结束了。在告辞之前，我有点犹豫地向他提出一个请求：“学谦同志，我想请你帮我办一件事。”他似乎有所戒备：“什么事？可不要让我为难。”一听我说来京旅游的同志要参观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想请他搞十

几张参观券。他便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题，这件事可以办到，明天就派人送给你。"

与学谦同志告别时，毕玲同志双手捧着一个正方形的纸盒对我说："这是老吴送给你的。"随即把它递给学谦同志，让他亲手交给我。打开一看，是一个镀金盘子，是他访问中东时带回来的。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只觉得我手里捧着的不是一个镀金盘，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浓缩的友情。

两个多小时没有谈完三十多年的往事，我们又分别了。在我走出对外联络部的大院时，送我的毕玲同志一边走一边真诚地对我说："殷振民同志，请你不要介意。老吴就是这样一个人，原则性很强，公私分明。他严于律己，对家属也要求很严，不容许以权谋私。他刚才误会你了，请你谅解。"我听了十分感动。其实，我一点也不介意，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应该肃然起敬向学谦同志学习的地方。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高尚情操。

此次北京之行，最大的收获是重温了那些几乎被遗忘了的往事和仍然燃烧着的友情。我很满足，不虚此行。

我和学谦同志的第三次会见是在1994年，也是11月金秋时节。这一次我是陪老伴赵丽卿来北京旅游的。我没像上次那样事先通知他，而是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早上才打电话告诉他我已来北京。接电话的是毕玲同志，她一听我想见学谦同志，就立即问他："老吴，殷振民同志来北京了，要来看你。请你安排一下时间。"随即从话筒里传来学谦同志的声音："就今天晚上，七点钟。"这样，我们会见的时间就很快定下来了。

当天晚饭后，我按时前去赴约。我们来北京之前，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除了会见学谦同志，还想与他合影留念，所以就随身携带了照相机。那时，学谦同志一家已从对外联络部迁至高层领导人的住宅大院。在大院门口迎接我们的还是毕玲同志。因为是晚上，只模模糊糊地看见他住的那一幢离大门不远。

毕玲同志把我们领进楼上的一间书房。学谦同志见到我们十分高兴。知道赵丽卿也是教师，就笑着说："你们是同行，能一

道来看我，我非常高兴。”我们刚落座，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吩咐毕玲同志：“请你先给我们拍一张照片吧”。毕玲同志立刻取来相机，给我们接连拍了两张，说：“一张给你们，一张我们留着”。这使我喜出望外，心想：我们竟想到一块了，难道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学谦同志最关心的还是我的生活。我告诉他，我已经在镇江市内租了一套房子，从乡下进城里居住，只是户口暂时还没法迁。他听了很高兴：“先安一个落脚点也好，以后的事再慢慢办。镇江这地方，我当交通员的时候，曾到过好多次。在我的记忆里，它是一个小城市，人口不多，市面也不繁荣。沿江有许多小旅馆、小饭店，看样子好像都是做接待来往客商生意的。解放以后，我还没有去过，不知现在的情况怎样？”为了改变过去镇江给他留下的印象，我就把镇江现在的情况详细讲述了一番。我说：“现在的镇江和苏南其他城市一样，面貌已大大改观，过去的那些落后的痕迹已经逐渐消失了。那里有你留下的足迹，你应该旧地重游，去看一看。”他正要回答，毕玲同志已先插话说：“对，应该去看一看。等老吴全退了，我一定陪他去，一定来看你们。”

以后我们就随便聊起天来，兴之所至，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最后，他若有所触地说：“殷振民同志，其实，我是很欢迎老同学来谈谈的，这样的谈话很愉快。”我能感受到，这是他有感而发的心声。

我十分感激学谦同志给了我三次会见的机会，在每一次短暂的会见中，被几十年漫长岁月浓缩了的友情，都给我们释放出了许多愉快和欢乐。

1995 年春天，毕玲同志寄来了我和赵丽卿在北京与学谦同志的合影，并说，希望日后能在镇江的江边再次合影留念。深感遗憾的是，这一美好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学谦同志已离我们而去，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位身居高位而心系普通群众的领导和朋友，是透明见底的清泉，暖人身心的春风。

（2008 年 12 月 18 日）

一次难忘的见面

·郭丰敬·

吴学谦同志是我们在地下时基层党组织的上级领导人的上级——学委副书记和市委委员。在上海解放前，作为基层党员一般是没有机会和吴学谦同志一起开会的。十五年前，我有一次机会参加了吴学谦同志主持的会议，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83年3月，张承宗同志动员原上海地下党员同志，以“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精神，参加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党史上海学生运动专题史料的征集工作。

参加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学生运动的原男中区区委同志和各校地下党组织都积极投入了回忆、编写学运斗争史料的工作。经过十年的史料征集，在上海的原男中区委委员们都主张出版一本有关男中各学校地下党组织解放前开展学生运动史料的专辑，当然这也是在北京的原男中区委领导同志们的愿望。这个计划得到了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批准。由于当年领导男中区学运斗争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在北京，有必要上北京请他们共同商定编选出版这本专辑的重要事项。

1993年12月初，潘文铮同志和我上北京，向解放战争时期原上海地下学委男中区委们汇报出书计划和进展情况。

12月5日星期天早上，会议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李琦涛、潘文铮、鲍奕珊、张征秉、王光华、曹奇峰、刘起林、王子成、郭坤和等。

吴学谦同志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和大家打招呼。这情景，使我想起了1949年6月间，上海解放不久，有一天的下午，他也是

这样满面笑容地来到陕西北路128号二楼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办公室。当时，上海学联刚从地下转到公开，和民青联共用一座楼房。学联的工作人员听说地下学生运动的老领导来了，大家都涌到民青联的大办公室里，争相要见上吴学谦同志一面。老吴很亲切地招呼大家围拢来。由于来的人太多，许多人只好席地而坐。当年，吴学谦同志是民青联的秘书长。他要调往北京工作，是来向民青联的同志告别的。接任民青联秘书长的是朱良同志。老吴和大家讲话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他的亲切的笑容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了。

吴学谦同志亲自来主持讨论男中各学校地下党组织解放前开展学生运动史料专辑的出版计划，我是很感意外的。1993年底，他刚刚从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转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公务之繁忙可以想象。然而，他把会议一直开完。可见，他对于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多么重视。

其实，吴学谦同志关心学运史料的征集工作是一贯的，例如，早在1985年6月29日在他当外交部长、公务极其繁忙的时候，就写了关于上海地下学委系统党领导下的秘密革命组织的证明信件：1988年5月1日，他还出席了原学委和男中区委部分成员在北京讨论上海解放前中学系统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问题的会议。吴学谦同志写的这份证明信，充分体现了他模范地实践“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精神。在信中，他负责任地指出学委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范围，“关于上海地下学委系统党领导下的秘密革命组织事，并非限于男中系统这一些，而是全上海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男中、女中等系统中均是党领导下的外围积极分子秘密革命组织”。他动情地肯定参加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的贡献：“这些积极分子在党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有的还担任全校性的群众领袖。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跟着党出生入死”。关于当时学委系统为何没有成立统一的党外秘密革命组织问题，他写道：“当时学委曾向上海局请示，上海局向中央请示后指出：为了避免破坏，以不成立全市性统一组织为宜，

可以由各支部用各种名称成立。不与别的支部及其外围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正是由于吴学谦同志对党的事业的极端负责精神和对年轻战士们的高度热爱，最后促成了党组织对上海学委系统解放前建立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认定，解决了参加这些秘密外围组织的大批积极分子享受离休待遇的问题。

对于这本专辑的名称，上海的男中系统党史征集组早先选用的书名是《革命的火炬》。报批出版计划时，张承宗同志在批语里写道：“革命史的内容与形式，要适合当前的形势与要求，为教育下一代服务，更生动活泼。为学生青年所能接受与喜爱。”根据张承宗同志的批示精神，上海的征集组提出了几个备选的名称，带到北京请大家选定。会上大家一致赞成采用《火红的青春——上海解放前中学学生运动史实选编》(以下简称《选编》)这个书名。

当谈到，编写编辑组希望把吴学谦同志写的《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一文选进本书的时候，吴学谦同志表示同意。接着，他说：“这篇文章是我1949年调到北京工作途中，在火车上构思，在北京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时候写成的。”老吴接着说：“我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好。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参加整风，回上海传达精神，我把整篇《反对自由主义》背好，到上海背给同志们记下来，一字不差。”他当时回忆起这件事讲得很随意。现在想起来，吴学谦同志不仅仅在于表达自己记忆力好，实际上，是说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对于反对自由主义、建设一个好的党风方面的重视程度。解放前地下党组织十分严密，每个党员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都是高度自觉的。我们每个地下党员在争取参加共产党的过程中，尤其是入党之初，都接受过严格的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的教育，同时，学习一系列秘密工作的规矩而且是每时每刻毫不懈怠地贯彻执行着。比如，在不打横关系、在严守党的秘密等等方面每个党员都是不敢有一点点自由主义的。由于当年党中央正确的革命总路线，和上海各级党组织执行正确的白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密切联系了群众，处处为群众利益而斗争，加上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保证，所以，自从刘晓同志受党中央委派来上海重新整顿党组织之后，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仅没有遭受过敌人的大

破坏，而且开创了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在谈到上海同志希望这本《选编》能够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能够运用这些党史资料来教育青年一代，因此，想请党的领导同志题写书名。吴学谦同志当即表示支持这个愿望，并说，你们只要写半页纸，说明你们的要求，交给我的办公室就可以了，我来替你们转。

会议结束之后，鲍奕珊告诉潘文铮同志，说是吴学谦同志邀大家中午到他家里去做客。这真是意料之外的消息！

吴学谦同志和乔石同志住在同一个不大的花园里，有警卫。也许鲍奕珊同志事先已经联系好了，他的轿车方便地进入了老吴的院子，没有在大门口滞留。一走进老吴住的两层楼房，底楼是一个大厅，普通的木地板。一半做饭厅，一半是会客室，都是普通人家的桌椅板凳，没有任何时髦家具，更没有什么豪华摆设。老鲍引领潘文铮同志和我登上二楼，到老吴的书房。在这个整洁的书房里，除了普通的书橱、书桌、靠椅，就是摆放着的一张长沙发。这就是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吴学谦同志的再普通不过的书房。

在上海地下斗争的时候，吴学谦同志是鲍奕珊和潘文铮的上级领导，现在却像是老战友叙旧，非常亲切。

毕玲同志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我们和老吴以及他的家人、工作人员一起，围坐在一张普通大圆台面周边，吃了一顿家常的饭菜。

饭后，老吴在客厅里继续和大家聊天，对于地方上人们开始反映的各阶层收入在拉开差距，非常认真地听着，但是没有发表意见。这件事说明他虽然主管国家外事，但是对于国内的情况仍然是很关注的。

为了让老吴有休息的时间，我们稍坐片刻就告辞出来了。吴学谦同志和毕玲两位站在门口和我们握手告别。依依惜别之情令人至今难忘。

在平和言谈中透出您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在与同志谦和相处中寄托您对事业的深切期望！吴学谦同志，我们永远崇敬您！

（2008 年 10 月 18 日）

迟到了53年的毕业证书

——暨南大学颁发吴学谦毕业证书

2001年11月9日，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院士，风尘仆仆从广州来到北京，在陈默、邱国良的陪同下，专程到吴学谦寓所，发给他一份早在1948年就该发的毕业证书。因学谦学长染恙住院，毕业证书由其夫人毕玲同志代表接受。

这是一份迟到了53年的毕业证书。

吴学谦学长，原名吴庆德，曾两度就读我暨南大学文学院外语系。第一次是1940年到1941年冬，当时，暨大的校舍已被日本飞机炸为废墟，为了继续办学，在当时上海的“公共租界”租了两幢房子。12月8日“太平洋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了租界，暨大待不下去了，决定内迁福建建阳。学谦学长要在上海坚持地下党工作，留在“孤岛”。暂离开了暨大。抗战胜利后，暨大于1946年迁回上海，在宝山路一带找到了几幢房子，作为临时校舍。学谦学长也在暨大复学，继续在外文系读书，直到1948年2月，学校当局以参加同济大学学生罢课斗争的“罪名”，把他开除了。

1995年北京校友会拍摄《暨南春秋》，曾采访过学谦学长，当他谈到这一段历史时，充满着对我暨南大学浓浓羡慕之情。他说：“……1940年我中学毕业准备报考大学，翻阅报纸，看到暨大文学院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如郑振铎、周予同、周谷城、王统照、洪琛、李建吾、楚图南、钱钟书等，这都是名教授呀，我喜欢文学，它吸引我抱着慕名之心情去报考。但是，我又担心我文学底子不过硬，怕考不取，为了保险起见，我先考外语系，因为我是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毕业的，外语比较好，有一点把握，考取之后再设法转系也可以嘛，就这样我考取了……虽然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没有

能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但出于青年的求知欲，除了我的必修课外，我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去听那些我感兴趣的课，如郑振铎先生、周谷城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课，让我受益匪浅。”说到这里，从他眼神里看得出来他对母校至今仍然饱含感激之情。

学谦学长在母校80周年校庆前夕写过一篇《怀念母校》，这篇文章开头的第一句：“暨南大学是我的母校”，他一语道出了他对暨南的热爱和怀念之情。解放后，学谦学长就回过一次暨南，那是他当外交部长期间，中英谈判之后，他送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在黄埔码头登轮之后在返回广州的途中，返校看看。美丽的暨南园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

学谦学长诙谐地说：“大学，我就读一个，就是暨南大学。从1940年到1948年，前后达八年之久，但最后没有毕业……”

当然，更没有领到毕业证书，一个为革命“被开除”的学生，怎么能领到毕业证书？但是，他是一个好学生，极好的学生，他的“被开除”，是光荣的“被开除”。这份毕业证书应该属于他，53年前就应该属于他。

（摘自《暨南渝讯》第106期，标题有改动）

关于上海立达图书服务社的情况

·曹咏沧·

1945年抗日时期，我原在日本上海江南造船株式会社（原上海英联船厂，杨树浦路通北路）造船车间做铜匠学徒工。抗日胜利后，日本投降，工厂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变为国民党官营工厂，他们以甄别“伪工人”的借口，大批开除工人，虽然参加了当时沪东四区机器工会领导的复工斗争，也未争得复工。从此失业在家，因母已死，父也出走，故寄住在姨父家中（江西北路武进路）。

1945年我报名进了上海市立十八民众学校。一天班主任张耀祥老师上课布置作文要我们写自己的“小传”，我在作文里写了家庭情况与自己的经历和失业经过，并提出了希望，能获得一份工作，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不怕苦，不怕累，不计报酬多少。过后张老师找我说，现在有一书店，需要练习生，待遇较低，供伙食，有住宿，你去吗？我马上答应要去。他就写了介绍信，要我到北京西路1363号（铜仁路东侧）上海立达图书服务社。

书店又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新少年报》合作，成为他们的发行处，新少年报社经理王业康（现中国青年出版社离休干部）经常来书店看望他们发行部的同志。店内的业务由王遇安负责。

除了书店工作人员外经常来书店的特别是1946年较多的是沪江大学的同学如顾方仰、包叔君、吴佩珍（女，上海女青年会工作）等。印象较深的有位骑自行车、戴眼镜的同志（上海解放后知

道他是吴学谦)。我们书店逢星期五休息,他来了王遇安就叫我出去玩半天再回来吃饭,有时他来书店总要买些《群众》、灯塔小丛书、密勒氏评论报(英文版)等杂志带回去。

1947年1月农历春节前,我回家送过年发的双薪,骑自行车途经四川北路武昌路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军用十轮卡撞倒在地血流满面,后被送往苏州河边的公济医院(现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住院近二个月,因颅底骨折压迫视神经导致右眼失明。出院后书店仍留我继续工作,王遇安又给我看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鼓励我学习保尔·柯察金,又给我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等书籍。在书店、新少年报同仁的帮助鼓励下,坚定了我要生活下去的勇气。

1947年下半年后,上海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1948年4月立达图书服务社突然宣布停业,也就在这时候,我就读的夜校——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冯援的同事梅继范老师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到该校与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合办余姚路第一儿童福利站(余姚路棚户民校)工作,担任“小先生”。组织上明确关照不要再回立达书店,不要再与书店的同仁有任何联系,从此我离开了立达书店,至于书店如何处理结束工作,我就不清楚了。

(2002年11月14日)

忘不了

·严家裕·

我认识学谦同志在1947年。当时，我任党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女中区委委员，学谦同志代表学委领导我们。他坚持原则、讲究策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国民党垂死挣扎，要召开国民大会。上海卫生局局长、中德助产学校和中德医院的校长和院长余松筠等竞选主任委员，助产士公会工长、国民党员谢能委先生选国大代表。他们规定：所有在校、在院学生和工作人员都要参加选举投票。群众对这次强迫选举十分反感。我党中德支部考虑要在已有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发动一次中德范围内的罢选运动。我把中德支部的这一考虑向学谦同志作了汇报。学谦同志不同意此罢选。原因是：国民党内天下乌鸦一般黑，余、谢当选和别人当选没有什么差别；国民党内派系矛盾重重，反对余、谢会被他们的对立面利用。他又一次强调，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教育群众、揭露国民党的丑恶面目，提高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性的认识。我把学谦同志的指示精神传达到中德支部并作了安排。选举当天，中德在前门设了投票站，后门摆了面包摊，号召后门周围的群众到前门投票，再到后门领取面包。于是，引来了一些乞丐、阿飞和流氓，他们多次进出前后门，反复投票和领面包。中德的同志广泛发动群众到后门看热闹。大家议论纷纷，“这叫什么选举”，“鬼把戏”，“骗人”，“不要脸”，“卑鄙”，“让流氓阿飞选举吧，我不投票”，“国民党快完蛋了，靠选举已救不了它了”。就这样，中德支部按照学谦同志的指示精神，实实在在地揭露了国民党的选举阴谋，提高了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本

质的认识。

1971年，听说学谦同志从监狱回来了，我去看他。到了他家才知道，学谦同志在“文革”中蹲了三年监狱。他告诉我，刚被捕他不知人们给他戴的是什么“帽子”，后来，监狱里的管事人向他宣布，他的“罪名”是叛徒、特务。听到这么一顶大“帽子”，他的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既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在狱中，他只许看《毛泽东选集》，不许看别的书。这倒好，他利用这难得的时间，用心学习毛主席文章，并结合着总结自己的工作。他相信党会弄清自己的问题的，相信自己今后还会工作。因此，他坚持锻炼身体，在这小小的牢房里来回走动、跑步。我当时见到吴学谦，虽然经过那么多的磨难，也消瘦了，但仍然是那么坚定、沉着、健康、乐观。九十年代他因病住院，当我去探望时已不能认识人了，我非常难过。

斯提芬和他的“政治交通”

· 章大鸿 ·

1949年5月，上海四郊碉堡林立，战况激烈。蒋匪军节节败退，解放大军迂回穿插，浴血奋战……春日下午，市区收音机中依然播出文艺节目，空中传响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随优美旋律升腾而起的是一首不同寻常的诗，由女声朗诵，诗名《旅伴》：

我俩默默相伴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感觉到你的跨步
坚定而执著
叩问着苦难的旅途
我们同步、同路
情同手足……

这是圣约翰大学（以下简称约大）中共地下党员于之写给他不知真姓实名的秘密工作战友斯提芬（Steven）的诗篇。

于之，原名王裕之，出身富裕家庭。1944年从约大附中升大学文科。抗战胜利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依然苦难，国民党反动派凶残腐败，发动内战，物价飞涨，饿殍遍野……面对丑恶现实，于之这个酷爱鲁迅、高尔基、岳飞、普希金的热血青年，与众多爱国青年一样，冲出象牙塔，走上街头，投身轰轰烈烈的反蒋学生运动（以下简称进步学运）。

约大虽是著名高阶层的美国教会学校，学生多半来自名门豪宅，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力量并不弱。于之随同革命洪流，冲击独裁政府，揭露狰狞真相；反内战，反迫害，要民主，要自

由……1946年1月13日在上海玉佛寺公祭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害；12月1日昆明惨案死难烈士的万余大、中学生集会上，他含泪以“莱卡”相机，摄下悲壮场景并参加游行示威。他义愤填膺，参加“反美扶日”、“抗议九龙暴行”、“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同济大学祁美路血案”等等一浪一浪的“学潮”，加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同军警特务流氓打手，同铁甲车、马队“飞行堡垒”以及骑美制“哈雷”摩托的宪兵，展开前赴后继的不屈斗争。在斗争中，于之提高了觉悟，经受住考验，早在1946年4月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复一年，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校内外展开。反动派的伎俩无非是恐吓、分化、造谣污蔑；而进步学运一方，是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伸张正义，争取群众。于之家的花园洋房大小客厅跳舞厅等，逐渐成为各校各线进行公开或秘密活动的场所。于之入党后，他的姊妹也都先后入党。于是，约大的、沪江大学的、学生礼拜堂的、女子中学的……各路人马进入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王家。地下党纪律严明，各路之间不准相互打“横关系”，故而只能“相逢不相识”，心照不宣。

政治斗争复杂而残酷。表面上看有时却很平常。在地下学委有力领导下，于之同他的战友，成功地组织起“皇家俱乐部”（Royal Club）、友宁俱乐部（Union Club）、“桥牌俱乐部”（Bridge Club）、“摄影社”等各种各样的团契，服务群众，联络感情。日常以交谊舞会、摄影、郊游、野餐、读书会、辩论会、家庭音乐会、歌咏会、助学、义卖、捐寒衣、棋牌比赛、春游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政治上中间或落后的同学向进步阵营靠拢。渐渐，少爷小姐与党的外围沟通了，交上朋友相互信任了，慢慢地无话不谈，休戚与共，思想认识开始转变了。

就这样，进步阵营迅速扩大，而校内那些三青团、国民党、特务、打手（有军统、蓝衣社等）越来越孤立。只能以加强镇压，秘密逮捕，乱开黑名单，抓人杀人的手段破坏学运。其效果适得其反。

于之先是骑摩托车上学的。约大校址在中山公园后门，离市

中心较远。时见他与一帮子好友，七八辆摩托车沿苏州河开来，抵校门口，一字排开，携书下车走进校园。谁会想到这些穿皮茄克、跨车带女友的俊男倩女，竟有当局视作“匪谍”、要搜捕消灭的中共地下党。

于之在校的工作成绩，曾受约大党支部口头表扬。1948 年于之调到中共地下新长区（新成、静安、长宁区）宣传部，继续秘密工作，如撰写印发《告国民党军、警、宪、特书》策反传单，利用摩托车悄悄散发；收听并记录解放区广播后传播重要新闻和评论等等。领导人是一位开朗和蔼的女同志，说话带宁波口音，待人亲切。在她的建议下，利用他爸爸对他的疼爱，于之不骑摩托了，他向爸爸要辆新汽车，自己开。

1948 年春，于之接到通知，驾车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方花园大门外，与一位吴先生接上关系。于之准时到达。手表指针刚到 1 点，有位年轻人走近。戴金丝边眼镜，一身蓝色条纹西装，书生模样，风度翩翩。来者笑眯眯上车，靠于之坐下。对上了接头暗语，于之便发动汽车行驶，一边与“书生”随便谈开了。

“车子开得很好嘛！”那“书生”夸赞。于之说：“我很注意安全。但我不撞人可不保证别人不撞我啊。万一出了点事，警方问起来，我连你的大名也不知，不妥。”“书生”一脸轻松，不忙回答。于之又道：“想个名字吧，叫你斯提芬（Steven）怎样？”“嗯，斯提芬……好，好！那你呢？”“我叫华雷（Wally）。”两人相视笑了。那时代大学生与上流社会中人士爱取个洋名，就譬如曹禺《日出》中乔治 · 张，露西 · 陈什么的，平常得很。

从此，于之就与这位素昧平生一见如故的斯提芬经常接头，开始地下交通的危险旅程。有时白昼，有时黑夜，于之驾驶，斯提芬指路，左转右拐，时近时远，有时穿过闹市，有时路绕荒郊。于之遵守地下工作纪律，不该知道的不问。即便如此，他与斯提芬还是慢慢熟悉了，两人之间毫无拘束，坦率随便，话很投机。

斯提芬每次谈及全国形势，不断有好消息；同时很关心于之的家庭、生活、健康、兴趣等等，并充分肯定于之的校内外工作。

使于之感到党领导对自己的无比信任，平等相待、亲如手足，体现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每一次踏上危险旅程，频繁运送秘密文件、接送有关人士，有老吴斯提芬坐在身边，就不觉得危险，心中就有了底，只想把车开好，再累再险也愉快兴奋。任险象四伏，不断有警车、“飞行堡垒”、摩托车呼啸而过，有斯提芬在，于之便真正感到地下党党内特有的那种温暖。

从1948年到1949年春，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随着形势发展，顽敌更疯狂，宁可错杀三千，不愿放走一人。警车囚车，白天黑夜鬼哭狼嚎，路边随时“抄巴子”（突击搜身），任何百姓均可能被捕，酷刑逼供，秘密处死，不少受害人被装入麻袋，丢黄浦江……地下党为保存实力，通知党员不住家中，找地方隐蔽……天快亮，更黑暗。此时此刻，于之怎知身边这位平平常常的斯提芬，竟是中共地下学委，党的领导人吴学谦！而新长区宣传部的女领导就是老吴的革命伴侣毕玲。这几年来于之在进步学运中的工作斗争、觉悟提高，家庭剧变，人生新路……无不在学运党的领导与关怀下进行的，与老吴、毕玲等分不开。而此时，在最黑暗最危急的关键时刻，学谦同志亲自带路，让于之与他驾驶黑马伏克斯豪尔汽车，勇闯白色恐怖，舍生忘死，完成艰巨任务。

想想，真是危险哪！每一次出车，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捕牺牲，哪怕出一次小小车祸，若引来警方注意，都会惹大麻烦。且不说“飞车追杀”、“叛徒出卖”之类的情节，只须碰到一次街头每天都实实在在发生的“抄巴子”，就够呛了。因为车中的人物、文件、物件……均无可隐藏也无可隐瞒。不可能每次上下车之前，相互对好口径。如查问起来，必漏洞百出。而这样的鬼门关，还真让于之、斯提芬去闯了，而且闯了不止一次。

有一回夜里开车执行任务，昏暗路灯下，突然出现临时设置的路障，发现前面有几个警察拦路，手电光乱晃。于之忙踩刹车，稳坐车中，向前来弯腰察看的那个警员说了声：“这么晚，辛苦了！”那个警员用手电照了照，见车中两位，西装领带，神态自若；见轿车高贵气派，风驰夜行，吃不准是哪路神仙，不敢得罪，便退

走放行，去搜另几个倒霉的行人了。

这样的突击“抄把子”，白天也遇到过，幸好车后座空落落的，没啥东西。

远处的夜空，炮火点点闪烁。有一次驾黑马驰上南京路、过外白渡桥，向江湾方向走，开过五角场到了一座大院的边门停住。只见院内一幢大楼，斯提芬说，那是海军司令部。他下车，很快领几个人回来，把两只沉甸甸的大皮箱放入车中，紧接着马不停蹄又从江湾返回市区，趁着月色朦胧，把箱中一捆捆东西分送各区秘密联络点。那大皮箱不见了，但于之望过一眼便认出是自己家中的箱子，该是他妹妹悄悄取出交给组织派上用场了。看斯提芬的神情，这用场不小啊。

斯提芬有一天特地同于之谈了工作的性质与职务，严肃地说：“你现在是地下学委的政治交通，是可以在必要时传达我党指示指令的特殊交通。”

于之随时准备接受更重要的紧急任务。到1949年，于之家的楼房，因各条线上的人去得太多，怕不够安全。于之按斯提芬指示，要求父亲为他另租一套公寓，与他姐姐住下。瑞华公寓七楼，在霞飞路善钟路（今淮海路常熟路）口，宽敞豪华有厨师侍候。斯提芬以此作为市委活动新据点，来客不多，男女穿着整齐，神态闲适，坐客厅中打牌。主人于之，以音乐、咖啡待客，一面兴奋地听着各方面向市委汇报学运、工运、策反工作等战线的最新情况。

有一天正开会，突然敲门声很急，冲进来一伙国民党军官，气势汹汹，见到客厅中男女，便厉声问：“他们是谁？”大师傅吓得往厨房躲，于之与姐姐从容应对：

“我们玩儿牌啊，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军官们四处张望，于之与姐姐大大方方，打开房门和落地窗，任他们看。军官们拥向阳台，俯看楼前笔直一条善钟路与转角处的徐汇区警局，回头用粉笔在门框写上“平射炮台”四个大字，就哄地一下走了。估计还要到别处去观察地形，不是专冲着七楼来的。这炮，后来没来得及架起来。因情势紧张，瞬息万变，他们来

不及用就逃跑了。

住在高层的日日夜夜，感到地火奔突、大地震撼，于之以激情的而又不能太露骨的诗句，写下地下斗争不寻常的经历、不寻常的战友：

“天快亮了”你悄悄说
我们相视而笑　双手紧握
环目四周　一片萧瑟
但你我清楚，即将有
无数激昂的人群涌出
踏响如雷的脚步
如火山熔岩
疯狂般奔跑欢呼

到那时候
陌生而又亲密的伙伴哪
我要高高举起
熊熊喷发的火把
照亮你欢笑的脸
……

解放后，于之方知那天深夜运送的两个大皮箱中，满装《解放军入城布告》，上有朱德、毛泽东的签署。

“若不是用你的轿车，那大包大捆的要四处分发，怎么送？时间又紧……”老吴在青年团办公室沙发上回忆道，于之点点头。然而，当学谦同志征求他意见“对团的工作是否有兴趣”时，于之摇摇头。其实，他不是没有兴趣，而是已经下定决心，要长期深入生活，写诗。正如他在处女作《旅伴》结尾中说：

我要随你
踏遍所有苏醒的土地
在人生旅途互诉衷肠
挽臂迎向日出

30年后，诗人于之应林业部之邀，赴东北大兴安岭深入生活，途中又特地到北京老吴、毕玲的寓所相聚。热情拥抱，娓娓交谈，一如当年地下斗争时期，坐“黑马”，同生死，亲密无间。

史无前例的“文革”，竟把地下学运光辉历程肆意歪曲，反复审查。老吴被关进监狱。于之曾被关进牛棚，受尽磨难。第二次天亮之后，他们各自重上征途，殚精竭虑，做新的贡献。于之家当年地下学运的一些亲密战友，包括他可爱的小妹妹与妹婿，后来都曾在外交部吴学谦同志领导之下，有的任大使，有的任副社长……老吴是大家敬爱的好领导。然而在诗人于之心中深藏的老吴，却永远是沉着勇敢、亲切微笑着的斯提芬。

附：于之给毕玲的信

毕玲同志，亲爱的老领导，您好！

我的老友章大鸿（作家，解放前曾参加地下少先队活动）前来采访，促我回忆地下工作时期，在老吴与您领导下的经历。我十九岁参加革命，如今八十二了。往事犹历历在目，辗转反侧，夜不成寐。

地下党时期，虽工作紧张，环境险恶，秘友战友间一律平等，共同对敌。同志间的感情是最深最纯的，没有高低尊卑，级别派别之分。都是为祖国、为人民、为理想而战。我与老吴、您和地下工作时期一些战友之感情，永远保持着那份纯真，永远不变。

我挖目开颅，身残志不残，喜看改革开放，国泰民安，中华复兴而笔耕不辍。如去北京，一定去看您。我母亲一百零六岁，她非常喜欢儿媳侑桢，甚至胜过女儿。我们全家都好。

祝

长命百岁！

于之（王裕之）

2009. 3 上海

附：

旅　伴

·于　之·

我俩默默相伴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感觉到你的跨步
坚定而执著
叩问着苦难的旅途
我们同步　同路
情同手足

夜风凄厉
群峰窒息
林木战栗
处处弥漫惨白冷雾
但魂魄　没有被长夜淹没
星火正四处闪烁
热血沸腾成地火奔突
在底层孕育一个爆发
爆哪，爆它个天翻地覆！

“天快亮了”你悄悄说
我们相视而笑　双手紧握
我环视四周　一片萧瑟
但你我清楚　即将有
无数激昂的人群涌出
踏响如雷的脚步

如火山熔岩
疯狂般奔跑欢呼

到那时候
陌生而又亲密的伙伴哪
我要高高举起
熊熊喷发的火把
照亮你欢笑的脸
我要随你
踏遍所有苏醒的土地
在人生旅途互诉衷肠
挽臂迎向日出

1949 年 5 月
上海解放前夕

深切悼念吴学谦同志

· 王传斌 ·

吴学谦同志因病去世了，在他得病之后，我总是期望着他能好转起来，但是，病魔最终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和吴学谦同志相识已有五十多年了，我对这段漫长的经历进行了回忆、整理，以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寄托我的哀思。

1954年，当时我在青年团华东团委工作。记得是在秋初时节，学谦同志陪同世界民主青联代表团到上海访问，时任华东团委副书记的杜前同志约我去看望学谦同志。当我们到达旅馆时。只见他正忙碌着，大概在讨论什么问题，一边发言，一边还要给不时前来请示的同志以简短、明确的答复，场面热烈，充满着青春的气息。那些同志都“老吴”、“老吴”亲切而随意地喊着，他神态自若、坦然地答应着。在忙碌中他向我们简要介绍了这个代表团的特点，主要是对我既赞扬，也有一些疑虑；对反帝、和平等和我有相同观点，但又有不同政见。因此，接待工作要细致。直到深夜，他们还在紧张地工作。这就是我和学谦同志初次相见的印象。

华东团委于1954年撤销，1955年春我调到团中央统战部并兼任全国青联的工作。学谦同志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我们虽然工作单位不一样，但在外事工作方面有着共同的任务。我初次参加外事工作，有些拘谨，怕犯错误。学谦同志就和我说，外事工作没有什么神秘，人们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只要按党的指示和外交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做，就会逐渐学会的。同时，学谦同志还有意识地约我参加外事活动。1955年秋初的一天，他临时来约我到机场送外宾，我不愿去。他说此人重要，多去些人好。

我即和他一同前往。一路上他说了有关外事工作的一些问题，还谈到每天早上挤出时间学习法语的事。

1955 年 7 月下旬，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活动，国内一些团省委书记和团中央的部长们都是代表团成员，我也是成员之一。中国青年代表团包括文艺、体育等团在内有七百多人，学谦同志是团长之一，带队从北京乘火车前往，我和他同住一个包厢。在满洲里换乘苏联火车，列车经过苏联境内大的车站都有苏联青年举行迎送仪式，双方还要讲话。老吴只是出面几次，其他则请各团省委书记分别出面讲话。这种相信他人，而不是自视内行、包揽一切的做法受到大家的赞许。苏联境内沿途所见并不像想象中的富足，对此老吴还向大家作些解释。在火车上漫长的七八天中，我们相互交谈，谈到工作、生活等诸多事情，他还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打领带，一路上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

由于各团省委书记和团中央的部长们大都是第一次参加联欢节，既高兴也有些担心，在联欢节期间怎样进行活动？都想请老吴作些介绍。他说，联欢节将有许多国家的青年参加，也带着各不相同的政见。中国代表团将会受到欢迎，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阐明我党的政策、主张，在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民主的大前提下团结起来。对不同观点则不予争论。代表团离京前，耀邦同志已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实际中贯彻就行。各位都有着接待外宾的经验，我们共同努力，相互协作，一定会进行好这次活动的。大家对他的讲话表示赞同，没有再提出其他问题。

联欢节开幕式隆重热烈，紧接着就是各青年组织的联欢活动，中国代表团成为争相与之联欢的热点。学谦同志和棠亮同志进行了恰当的筹划安排，对苏联、东欧国家及其他重大活动，学谦同志尽量参加，同时安排团省委书记和团中央的部长们分别参加其他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在联欢节热烈紧张的节奏中，学谦同志沉静地和钱李仁、朱良、谢邦定等同志商讨有关世青、国际学联及其他问题，还得应对一些临时来

访者。我除参加联欢活动外还临时负担一些迎送活动，和老吴等人相比工作要轻些。

联欢节后一部分外国朋友应邀来华访问，我参加了在北京的一些接待活动。有位叙利亚青年曾和我几次交谈，他对反帝、反殖、和平等问题都表达了和我们相同的观点，但言辞中有些不实，似乎有随声附和以求我方同情之感。我觉得有些不大正常，随即报告了学谦同志。他答复说，此人是叙利亚一个报社的编辑，他可能有求于我，要求援助。你注意不要随意答应他的要求。事后，学谦同志告诉我，那位叙利亚人再三提出援助要求，经请示廖公后，给予他小额援助。从此事中我感到学谦同志观察了解情况是细致的，能由表及里地分析情况，而不是只看表面、一般化的东西。

学谦同志主管外事工作是很忙碌的。当时我们都住在正义路3号团中央机关大院内，他住在南小楼二层西侧，我住在北小楼一层西侧，离得很近。经常看见他手提公文包、着装整齐地去上班，晚上下班则很少见到他。记得有一天我和张超同志站在楼前谈事，学谦同志的母亲在一旁看着儿子走向办公室的背影，和我们说，看你们多好啊，能有个休息时间。我那儿子啊整天忙得很哪！一天到晚地忙个不停，人还没到家，电话铃就响了，有时半夜三更还得回办公室。我们和吴老太太半开玩笑地说，你儿子工作重要，就忙呗，你给他做好吃的补补身子啊。老太太说，我想法买到火腿烧大白菜，蛮好的。很可惜，几年后老太太就去世了。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期，团中央已划定了右派分子的名单，但是为了达到上级所要求的应占5%比例标准，拟将几位同志重新“升级”定性为右派分子。为此，书记处召开会议，学谦同志和我都参加了此会。主持者已做内定，只求大家通过。对此与会者显然持不同意见，会议沉闷。主持者坚持己见，要求大家表态通过。这时，任大学部部长的曾德林同志发言，强调应从实际出发，不能为完成上级的数字要求而伤害一些同志的政治生命。对他的发言大家一致赞同，主持者无法再坚持下去。耀邦同志最后结论定案，不对一些同志再升级定为“右派分子”。会后，我和老吴

议论了当天的会议，对主持者的极“左”及其他一些不妥当的做法表示了不满。老吴说，对干部要看其长期主要方面，不能抓住一点不放，那会伤害很多人的。这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背后议论，学谦同志对待同志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学谦同志和我在1958年秋末同时接到团中央组织部通知：离职到中央党校学习。我们高兴地做了准备，就在去党校报到的那天却又接到通知，由于大跃进工作紧张，各地抽不出干部来京学习，中央决定今年暂停一期，你们仍回原部门工作。不久，在书记处会议上耀邦同志说，王稼祥同志（时任中联部部长）最近又催问学谦同志去中联部报到的事，请快去吧，不然他又要催了。很快，学谦同志就正式调到中联部工作去了。

1960年7月我被转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同时去的还有从中央团校选拔的二十多位男女干部。我初到联络部真是“土包子干洋务”颇感生疏，幸好部长钱李仁和钱大卫、朱良、李淑铮等同志热情耐心地帮助和支持，我也决心边干边学，并和新来的同志一道学外文。许多同志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以后成为联络部的重要骨干。

在此期间，我曾到中联部开会、听取文件传达等见到学谦同志，那时他负责非洲处（后改为局）工作，他说部长们领导水平高，作风很好，对工作要求严格，一切均需严谨细致。他日常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也时而出国考察等。

团的“九大”于1964年秋天召开后，我被“转业”到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含亚非团结委员会，简称和大）工作。这是民间外事机构，归属中联部领导。我分工有关亚非团结工作和机关事务等，日常多是和棠亮、学谦和唐明照同志联系。他们都有较高的水平，且谦和民主，能及时答复问题。他们有时到和大来，对有关问题都是商量解决，绝不指手画脚地教训人。我到中联部列席部务会议时，学谦同志向我介绍出席会议的各位负责同志的情况，说秘书长张香山同志和唐明照及其他同志（还有两位女士）都通晓一门或两门外语、熟悉所主管地区的形势及发展、能及时研究、

提出分析材料和建议，成为领导的得力助手，他们经历过许多考验，能够担负重要责任，为人却很谦逊，和这些同志一起工作能得到很多教益。从学谦同志简短的介绍中，我了解他虚心学人之长的好品德，这是搞好团结的重要因素。

学谦同志负责非洲工作时很注意加强一些非洲进步组织相互之间的联合与团结。为促进罗德西亚（即津巴布韦）革命派的团结，我们特邀其主要负责人面谈，虽几经劝说，效果不大。学谦同志让我出面谈。我说，连你都谈不好，我怕难以完成任务。他说，尽力做吧，试试看。我和该负责人作过数次交谈，此人机智聪慧、头脑清楚。对我们谈的表示赞同，表示联合是很好，但是实现很难。我问原因，他坦率地说，原因有二，一是现实斗争方式不同；二是历史原因，这是主要的。从老祖宗传下来就和另一派不合，非洲人的习惯就是对老祖宗传下来的事情谁也难以改变。如果我带头改变，就会受到本族人的反对。我将谈话的情况报告了学谦同志，他说此事在预料之中，非一日能调解成，继续做工作吧。以后，该负责人回国之前，学谦同志又和他谈了几次。

学谦同志对非洲的一些事务能作冷静的思考、分析。1960年4月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当时几内亚独立不久，总统塞古杜尔执政时间不长，但每次出场时军乐队都要高奏颂歌，退场时亦然，其他还有一些过分铺张的场面。学谦同志担心地和我说，刚刚上台，热情可以理解，但长此以往，特别是在群众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就会脱离群众。这些非洲的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如果他们能够访华，和我们的领导人交谈就好了，这样可以获得教益，以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1965年在加纳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学谦同志针对恩克鲁马总统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以后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计。在科纳克里会议结束后，我们乘飞机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停留一天，曾随团长廖承志同志到大西洋沿岸城市卡萨布兰卡游玩，学谦、朱良和我三人曾谈论了中苏关系对世青的影响等问题，我们三人还在大西洋边合影，是随团新华社记

者照的，照片拍得很好，现在看真是使人感慨万千！我们那时还是那么年轻！以后，朱良同志由此去匈牙利世青。学谦同志和我经莫斯科返国。

“文革”开始后，我是和大“文革”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一切都按以往历次运动的方式来对待。我对这次运动的意义很不理解，很快就变得被动。对群众中出现的两派斗争没有积极引导或采取其他措施，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有人向学谦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他随即打电话询问情况，并说，要理解“文革”的意义，适应新情况，认真领导运动的进行。我尽力去改正，想跟上形势，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在制订筹办支持越南抗美斗争支援大会的方案中，仍是按以往的办法上报，中央在对方案的批示中批评说：没有反映出“文革”的新形势，那里的“文革”没有搞好等。和大接到批示后，造反派沸腾起来，立即对我进行批斗，将我拉下马，靠边站，列入“牛鬼蛇神”另册。此后不久，造反派又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是中联部揪出了“大特务”吴学谦，现已被康生批准逮捕入狱。还说应当查查那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这显然是针对我所说的。我想，老吴怎么一下子成了特务？我绝不可能，绝不可能听信这些胡说八道！可是和大的造反派却认真起来，认为既然抓住了大鱼，就会抓到小鱼。有一天造反派忽然通知我开批斗会，我到了以后，女主持人立即严肃宣告：隐藏在中联部的“大特务”吴学谦已被康老（生）批准逮捕入狱，王传斌必须立即交代和吴学谦的关系，立即全部揭发吴的犯罪事实。我对此茫然不知，而造反派严加追逼，说：你和吴学谦的关系这么密切，还不知道他的罪行？必须交代！我说不知道吴学谦有什么罪行，我只知道他向我介绍如何做外事工作。造反派听了大声对我喊叫：都到这时候了，你还在保护他？他在监狱里正在写供词，把你的情况都供出来，到时候有你的好日子过，有你的好房子住！我再次说明没有听到过他有什么反革命言论。造反派又诱供说，你想想他教你做过什么？我说，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在去华沙的苏联列车上和老吴同住一车厢，还是他教我第一次打领带的。最后，这位女造反派说

吴是大特务，是战略特务，当然不会零星地说（此为原话，因使我记忆太深了）。这次会后没有再继续追查，对此，我也没有写任何材料，但在内部却给我加了一条“保护大特务”的罪名。

1969年年初我奉命去办和大干校，先在京东双桥农场附近的何家坟，两年后又迁到河南周口地区郸城县，一直到1971年的冬天才被调回北京。这时，原来和大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到对外友好协会，工作由外交部领导。这几年期间，我不知道学谦同志的情况，回到北京不久就从棠亮同志处得知他仍在狱中，听说有可能释放。我多么盼望他早日出来，恢复名誉和工作。以后，学谦同志和朱良、李淑铮等同志一起来我处看望，我看他颜面未改，精神如前，只是稍稍驼背。见面后大家都很高兴，我询问他在狱中的情况。他简要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捕，那些所谓“罪名”纯属瞎编胡说，在那里管得很严，连报纸都不许看。幸好我随身带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简要本，我就天天读，现在我能把语录和老三篇正着或倒着背诵下来。我又问他为何驼了背？他说，在狱中睡的床太短，腰不能伸直。而且睡觉时必须朝着警卫，日子长了就成了这样。我劝他抓紧时间恢复过来，不然会见外宾不好看。学谦同志询问了和大“文革”中一些老战友的情况，他对杨朔同志被迫害去世很是气愤和惋惜，说，军代表为何不干预呢？我说这不可能啊。他还询问了廖公、耀邦同志的情况，我如实告诉了他。他临走时说，以后抽时间好好谈谈。可惜的是以后因我工作调动太忙未能如愿。

1972年春，我到驻意大利使馆任政务参赞兼驻圣马力诺总领事。在此期间我曾多次应邀到意共执政和影响较大的地方参加友好活动、参观访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没有恢复正常关系之前，我们是不敢随意接触意共党员的，在交谈中不能谈党的关系，只有谈政府、国家之间的关系。

对于和意共的关系问题，使馆早已写了“对意共情况的分析和建议”的报告，由于“四人帮”在台上没有敢报送。打倒“四人帮”后，姬鹏飞同志过境意大利，我们请他看报告，建议应当恢复两党

关系。他看后说写得很好,应当报告。以后我们将此报告上报了国内。

随后国内关于和意共恢复关系的指示来了,1979 年国内派来了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吴学谦同志,在罗马和意共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见,谈判恢复两党关系。双方经几轮谈判达成了共识。在各党保持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国际共运和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旗帜下,正式恢复了两党的关系。意共对此非常满意,热烈赞扬中共所作的非常正确的重要决策,这是促进国际共运团结的一个重大步骤。同时,也称赞学谦同志能从大局着想,为恢复两党关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等。我参加了会谈的全过程。事后,我陪同学谦同志到佛罗伦萨参观艺术展览后,他随即回国。

学谦同志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随后任部长后,我在驻外使馆任大使,受他的直接领导,每次回国述职都向他当面汇报和请示,他都仔细地听着,或插话询问,对所请示的问题他都及时予以答复。

我在驻尼日尔使馆任职期间,学谦同志于 1981 年曾到中非共和国作内部访问。中非和尼日尔虽是邻国,由于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未能前往相见。事后学谦同志有所问及,我如实相告。

我在驻巴基斯坦使馆工作期间,曾多次奉命前去接送我国领导人或其他重要负责同志过境,大都在夜间。其中,曾多次接送过学谦同志,我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简要汇报使馆工作、巴政局及所需请示的问题,他都耐心听完并作明确表态,随即将国内及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和形势等向我作简要的介绍。最后一次是他出访国外后回国,他说,这次回国后马上和英国外长杰弗里 · 豪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英国总是妄图控制香港的主权,我则坚持中央既定的香港必须回归中国的原则,这是绝不能让步的,但在方法上可以灵活。学谦同志所谈言语虽不多,但言简意赅,使我在使馆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能心中有数,辨别方向,避免盲目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1985年10月，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访华，学谦同志全程陪同。在上海市举行的宴会上，哈克总统致答词中说“感谢吴学谦外长的陪同”，他听后立即从餐桌站起来和我说“得赶快告诉新华社的同志，仍按副外长的头衔发消息，不然影响不好。”（当时内部已决定11月公布老吴任部长）他随即离去做了纠正。此事的起因是胡耀邦同志和哈克总统会谈时说，阁下此次访问很好，很重要，我们派即将担任外长的吴学谦同志代我陪同。所以哈克总统的讲话是有根据的，但学谦同志对此的处理是很谨慎、细致的。

在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我回国有事需请示他，即请其秘书“约见吴副总理”，此话恰好被他听见了，他立即单独对我说，老王，你可不要按职务来称呼我啊，还是按以前叫我老吴好。这虽然是小事，但让我知道他没有因职务提升而改变，我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原来革命同志的亲密关系。

1986年年底，我奉调回国卸任后，学谦同志曾请有关部门为我找个临时工作岗位，但未成。以后我到全国老龄委工作，他对我说，老龄工作很重要，这对你也是个恰当的安排。因学谦同志职务升迁后工作繁忙，彼此联系就少了，有时见面也未能多谈。

1996年后听说老吴病了，我想按老吴的身体情况，即使得了小病小灾，过些日子就会好的。1998年有人告诉我学谦同志已住院治疗，我马上赶往医院探望。恰好在著名中医李辅仁大夫处相见，看到他表面仍如以前，但脑子已逐渐衰退，不认识人，不能讲话。我有些着急，试图用使他激动的办法促其好转。李大夫知我的用意，但认为不会起作用。我问李大夫此病能治好吗？他慎重地说治着看吧。以后我又几次去探视，一直不见其病情好转。护卫的同志说，首长的吃饭、睡觉都可以，就是病情不见好转，我们也着急，这么好的人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呢？我无话可说，只能向他们表示感谢，请他们费心费力照看老吴。

随后曾和毕玲同志联系过，总是盼望学谦同志能好转过来。但我们的期望始终未能如愿，学谦同志最后还是离开我们而去

了。他走得太早、太快了！这严酷的现实令我们痛心，令我们难过！

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我和学谦同志相识、交往已有五十多年了，我看到他的长处是多方面的，使我感受最深的是：

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党的忠诚战士。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贯彻党的指示和政策。他正直廉洁，宽厚待人，是一个老实人。

他经受过地下党时期极其艰险环境的考验，他经受了莫须有罪名的磨炼而使他更刚毅、坚强。在荣誉面前他永远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

他长于思考，冷静沉着，心灵深处蕴涵着青春的生机，在革命需要之时，他则不失时机、勇敢稳健地走出重要的一步。

学谦同志有许多长处和值得记忆的事迹，我谨以此文表达我的思念吧。

永别了，学谦同志！我永远怀念着你。

（2008年9月18日）

深深怀念我敬仰的老领导吴学谦同志

——回忆学谦同志关于争取中间分子的片断事迹

·梁畊·

1949年8月14日至9月8日，世界青联与国际学联共同在多瑙河畔的历史名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首都布达佩斯举办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联欢节的后期，世界青联还在布达佩斯闻名遐迩的国会大厦召开了第二次世界青年代表大会。

年仅33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肖华率121人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欢节的各项活动。另外，由肖华率领26人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席了世界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其中包括吴学谦同志、柯在铄和我。

吴学谦同志、柯在铄和我在布达佩斯相聚。柯在铄和我是在北京大学的同窗好友。一天，柯在铄对我说："梁畊，你在1947年的五·二〇学运期间，秘密去上海参加重建全国学联的代表大会时，吴学谦同志就是领导你们的上级领导人之一；他的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学委副书记。"此后，我们三人便常在一起聊天、谈心，回忆在北平和上海的那些艰苦斗争的岁月……

世界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否认和打击中间势力的观点和言论。例如，苏联青年代表团团长、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哈依洛夫在发言中说："现在国际生活中有种势力起作用……在世界青年运动，我们也看到在民主阵营这边进行斗争的力量和在民主的敌人那边进行挣扎的力量，要谈超乎两种势力的

可能性，都是谎言和欺骗。”

吴学谦听到这些言论，就低声对我说：“看来需要在国际青年、学生活动的场合，宣传争取中间分子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古人说得好：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散会后，学谦同志几次约我到多瑙河边促膝谈心，有时柯在铄也来聆听。学谦同志亲切地说：“你们两位都参加过国内的学生运动，也都知道，唯有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分子，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对势力，例如：国民党的党棍、学阀、三青团分子、特务等。”

学谦同志强调指出：要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绩，就需充分了解中间分子的思想状况、生活习惯、个人兴趣和爱好，以便运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法、方式来做工作。这样，就可组织歌咏队、体育会、话剧团、壁报社、课外的学习小组，甚至办食堂、同乡会、英语会话班、宗教性的唱诗班，等等。假以时日，就会事半功倍，取得好结果……先进分子不要骄傲自满；相反，要时刻谦虚谨慎，不急不躁。即使工作一时看不到成效，也要耐心等待，以便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使中间分子逐步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和觉悟水平。做思想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学谦同志随即把话题转到在国际场合宣传争取中间分子的问题上。他说，在国际场合进行宣传，困难肯定会大些。这是因为彼此的历史传统、文化修养、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爱好、兴趣都不尽相同。因此，我们要加倍地耐心细致，有的放矢，不要太多地讲大道理，而是要讲事例、摆数据，必要时要引用学者、专家、社会名流、政治活动家的名言、警句，来丰富我们的阐述……同时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我们的对外宣传能力。

世界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学谦同志以驻世界青联代表的名义，率中国学生代表团出席于9月中旬在索非亚举行的国际学联理事会会议。代表团成员有柯在铄、黄振声和我。

学谦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国际学联格罗曼的工作报告表示赞同；对国际学联工作的成就表示祝贺；对增进国际学生

团结与合作的方针予以积极评价。

学谦同志还指出，据悉，中国学联的会员人数是国际学联会员人数的1/3。中国学联的会员人数还将继续增长，这是因为中国学联的领导一贯认真开展群众工作，大力争取中间分子；并在工作中运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方式，因此，得到同学们的赞扬、教授们的支持和社会人士的同情。国际学联行政秘书布利克曼在东南亚青年学生会议后访问上海、北平时也感到，进行群众工作、争取中间分子的政策就是中国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学谦同志在索非亚理事会的发言是第一次在国际学生会议的讲坛宣传争取中间分子的问题，反应强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也给我上了一堂以争取中间分子为主题的对外宣传课。

从1949年秋至1950年底，学谦同志一直关心我在国际学联的工作情况，并嘱咐我仔细观察西欧国家中间分子的动向。要尽量搜集资料，进行分析、整理，作出判断，为国际学联的大、小会议的争论，预作思想准备。

1950年年底，学谦同志和我离开布拉格回到北京。学谦同志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任副部长，我在学谦同志领导下任联络科科长。

学谦同志告诫我，工作条件已发生变化，有机会接触亚、非、拉美国家的中间分子，也要观察他们的思想动向，这是在日常工作之外，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事情，希望做得好一些，尽管要牺牲一些业余的休息时间……

学谦同志长期的循循善诱，帮助我查找了日常工作的“盲点”；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提高了执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尤其是争取中间分子的重要性，使我受益不浅，并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2008年12月）

缅怀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吴学谦同志

· 徐葵 ·

20世纪50年代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我在吴学谦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了近十个年头。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岁月，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于1949年5月在北京市从东单区人民政府被调到初建的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吴学谦同志于1949年6月从上海市调到北京团中央工作，他于6月到北京后即准备随肖华同志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并由团中央和全国青联派他在联欢节后留在国外担任我国青联驻世界青联的代表，后因未能取得去法国签证到当时设在法国巴黎的世界青联总部工作而回国。他回国后就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担任副部长、部长等职，开始几年还兼任国际联络部的党支部书记。我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时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22岁的小青年，虽在上大学的几年中曾在重庆和北平参加过当年高涨的进步学生运动，有参加革命工作的热情，但在政治和业务上还是很幼稚的，可以说我是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后，在吴学谦同志的领导、指引和帮助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回忆那段时期，我觉得自己从吴学谦同志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品德和素质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尤其有很大的启示和示范作用。

第一是他的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和谦虚朴实的作风。他在我们中间是个长者和领导者，但他非常平易近人，毫无高高在上的

架子。他对部里的同志们都很真诚、热情和友善。我们当时对他从不以职务相称，而称他为“老吴”。他在工作中谦虚谨慎，讲究务实。看到下面的同志在工作中存在缺点或问题时总是进行耐心的帮助，从未见过他对下面的同志有斥责和发火的情景。大家在他的领导下在工作中心情都很舒畅。当时部里的同志为了开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同志之间充满着团结、平等和亲切的气氛。

第二是他在对待和使用干部问题上始终坚持五湖四海，重在表现的政策，尽量调动和发挥同志们的积极性。在上世纪50年代，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在学校里学过外语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吴学谦同志由于过去长期领导学生运动，很了解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能全面和准确地掌握对待青年知识分子的政策。他对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出身的干部始终坚持重在表现，放手使用，尽量调动与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不把家庭出身作为衡量和使用干部的框框。由于他作为党支部书记准确地掌握了对待青年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来自各方面的同志在工作中积极性都很高，使大家较快地形成了一支能适应工作需要的队伍，为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就出身在上海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52年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我得知我的父亲解放前在我们子女不知情的情况下曾用我们子女的名字作户名购买了他的一部分股票。我从我在上海的哥哥那里知道此事后即向党支部书记吴学谦同志作了汇报，并提出了我对处理这部分股票的意见：如我们父亲把这部分股票给我们，我们就拿来交公；如他仍要这部分股票就让他改用他本人的户名。经党支部研究后，吴学谦同志答复我说，我们党的政策现在不是鼓励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交公，因此要你们的父亲把这部分股票改用他自己的户名为宜。后来我就根据党支部的意见回复了我在上海的哥哥和弟妹

们，他们要我们的父亲把这部分股票改用了他自己的户名。自从向吴学谦同志讲清了这件事后，我在团中央丝毫也没有感到此事在对我的信任和使用上产生任何影响。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却成了对我进行审查、抄家和关进“牛棚”的一个主要问题，当时团中央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力图抓住这个问题把我打成“混进党内的资本家”，以作为胡耀邦在团中央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一个例证。“文革”后我到中联部吴学谦同志的家拜访他，向他讲了我“文革”中因这个“股票”问题而在团中央受到的遭遇，他对我说他对当年处理这个问题还记得很清楚，这是组织上已经知道并处理了的事情，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我听到他这几句话心中真是感到莫大的安慰，同时联想到他本人在“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严重迫害，被囚禁于牢狱达三年之久，对他也深感同情。

第三是他在工作中勇于开拓，善于带领大家在工作中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学习和提高做外事工作的本领。对在上世纪50年代初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来说，外事工作完全是一门新的业务。吴学谦同志带领大家在当时我国因受到西方封锁而对外交往很有限的情况下努力寻找开展与国外青年组织建立联系，扩大对外交往的途径。他通过向大家传达和讲解中央领导同志和团中央书记处有关外事工作的政策和指示，通过带领大家从事翻译工作，参加对外国青年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和组织我国青年代表团的出访活动，通过去国外参加或在国内组织国际会议等实践活动，逐步掌握和提高了做外事工作的政策和业务水平。吴学谦同志一贯鼓励大家在工作中克服困难，提倡勇于实践和探索的精神。1953年我参加他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去奥地利参加国际青年权利大会，大会组织者要我们自己为中国代表团组织大会的中文同声翻译，吴学谦同志委托我去组织这件事。我从未接触过国际会议的同声翻译工作，不知如何去做，他鼓励我大胆地到现场去观察学习，掌握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本领。我通过这次会议学会了组织同声翻译的一套技术，后来在国内就承担

过世界青联北京理事会会议等大会的同声翻译组织工作。正是在吴学谦同志的带领、鼓励和帮助下，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有一批同志在这段时间得到了迅速成长，掌握了做外事工作的本领，后来分配到其他外事工作单位，成为那里的骨干力量。

第四是他在国际工作中具有明确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在领导我国青年学生组织的外事活动中一贯强调要多做争取中间群众的工作，努力贯彻广交朋友，争取群众和扩大我国国际影响的方针。我想他这种思想是与他解放前长期在地下领导学生运动、做群众工作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是分不开的。他经常说，先进分子在广大人群中总属少数，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常占多数，先进分子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开展能吸引中间分子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与中间分子交朋友，才能把中间分子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才能推动进步事业的发展。在国际活动中，情况也是这样。可是，当时在我们参加的世界青联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苏联青年组织在那里推行的却是一种关门主义的方针，他们往往把中间分子和持有与他们不同观点的群众看作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助手或帮凶，不注意去做争取中间群众的工作。吴学谦同志开始参加世界青联和国际学联的一些会议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向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外事部门反映了这些情况。20 世纪 50 年代中，我团中央在中央的指导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对世界青联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式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促使世界青联开始重视对亚非拉地区，对中间地带群众的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从而拓展了世界青联在世界青年中的影响。正是在广交朋友和广泛争取群众的思想方针下，我团中央和全国青联在那时与世界青联合作邀请了一个成员十分广泛的国际青年代表团来华访问，还在 1957 年莫斯科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之后，冲破美国当局的阻挠邀请了一个广泛的美国青年代表团访华，邓小平和周恩来同志当时曾先后接见了这两个代表团，并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坦率的交谈，解答了代表团成员们提出的种种

问题，使他们大大增加了对新中国的了解。这是我们当时在与我国建交国家还很有限的情况下努力争取与世界各国青年，包括美国青年广交朋友，扩大我国在世界青年中影响的两个成功的例子。我参加了上述第一个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和邓小平同志与他们的会见，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以上所述的这些方面都使我体会到，20 世纪 50 年代我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在吴学谦同志的领导和帮助下度过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不论在外事工作的具体业务上，还是在外事工作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上得到锻炼和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对我后来的一生都是十分有益的。今天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我不能不经常缅怀自己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吴学谦同志。

（2009 年 1 月 4 日完稿）

永远怀念吴学谦同志

· 何振梁　梁丽娟 ·

吴学谦同志离开我们已半年多了，在八宝山灵堂向他深深鞠躬最后告别的情景还是那么清晰。半个多世纪前我们有幸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言传身教，对于我们这两个刚进革命机关的青年人的成长至关重要，成为我们终生受益的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俩是在1950年先后调到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的。那时我正在上海震旦大学做毕业设计，奉调至团中央。丽娟则是由上海派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选调至该部工作。

刚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时，听说部领导之一的吴学谦同志长期从事上海地下学运的领导工作，在全国解放前即派驻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我们向团中央报到时，他刚到上海与毕玲同志结婚。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吴学谦同志和毕玲同志都是过了30岁才结婚。我们俩先后参加过上海地下学生运动，所以能在领导过上海轰轰烈烈的地下学运、担任过上海地下学委副书记的领导手下工作，心里十分高兴。丽娟是上海沪江大学地下党的普通党员。当年毕玲同志是上海教会大学区委，也只有沪江大学的支部书记认识她。但是学谦同志初次见到丽娟时开口便说："你就是那个'小热情'吧？"一个从未谋面的高层领导居然知道连丽娟自己都不知道的外号，使丽娟惊讶不已，也使她终生难忘。

当初团中央机构不大，实行供给制。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十分融洽。丽娟调到国际联络部后就搞秘书工作，与两个部

长共用一个办公室。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丽娟的办公桌就在学谦同志的办公桌斜对面。国际联络部与学校工作部、少年儿童部三个部组成一个党支部，学谦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丽娟是这个支部领导下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我们俩学着做团支部工作，也在国际联络部的日常工作以及团支部工作中逐步互相了解和最终建立了毕生不渝的感情。

国际联络部最初只有一个人搞秘书工作，那是罗琚同志，丽娟调来后两个人一起搞。之后不久，学谦同志接受丽娟的建议，把曾在清华外文系就读过的罗琚调到主要搞外事活动的联络科，以发挥她的外语特长。秘书工作处理的文件多，丽娟的书桌上常常堆满了文件。坐在对面的学谦同志亲切地开玩笑说："我要给你画张漫画，书桌上是堆得高高的文件，你被埋在里面找不到了。"提醒丽娟文件工作要掌握轻重缓急。这种批评不是疾言厉色，但使丽娟记住了一辈子。

学谦同志工作作风平易近人，但十分严谨认真。对各科室送来的文件，他不仅要求中心明确，并且表达要清楚，文字要简练。他对文件阅读很仔细，连标点符号也都动笔修改。文件到他那里从来不会仅仅画个圈就能过关。文件需要修改时就把执笔者找来交换意见。办公时他十分专注，效率很高，从来不会有聊天的时间。工间休息时间他和大家一起打排球，大家围成一个圆圈，笑着闹着，非常高兴。

学谦同志不仅要求干部认真工作，而且很关心、注意对干部的培养使用，以求提高其工作水平并充分发挥其潜力。当年许多机关都还不十分懂得正规的文书处理归档制度，中直机关请苏联专家来上课教授。国际联络部也安排丽娟去学习。那个年代还没有圆珠笔，写字是用带金属笔尖的钢笔沾墨水写的，记录不方便。学谦同志把自己的钢笔（自来水笔）交给丽娟用，那是支枣红色的名牌"英雄牌"钢笔，上面还刻了"毕玲"二字。这份礼物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珍贵的，一般说来，常人不会把这样珍贵的礼物交由他人使用，但学谦同志想到的只是工作，只要有利于工

作，他从不考虑这些“小事”。他从国外长期工作结束后回国时，带回世界青联送给他的一辆自行车。当年拥有一辆自行车很不容易，但他简单地说了声“交给联络部用”，就归公了。在当年北京的公共交通还不发达的时期，这辆自行车为联络部工作人员外出办事，如办理护照签证、采购礼物等，立下了汗“马”功劳。

丽娟在学谦同志身边工作仅五年。我则更短，我在团中央工作的两年多期间，参与了多次由学谦同志主持的接待工作和出访活动，包括学谦同志任副团长的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个体育代表团（1952年）。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响应“技术人员归队”的号召，调至二机部工作。但由于当时北京的法语人才不多，所以我在二机部和国家体委工作期间，都曾被“借调”回团中央随学谦同志出国。从学谦同志身上，我努力学习到作为一名外事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品德。

尔后，学谦同志调至中联部工作。我们忙于事务，疏于问候。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我们自农村回到北京，得知学谦同志遭无端迫害，我们不能理解这样一位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发动波澜壮阔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会有“问题”。等他出狱，我们去中联部看望这位被平反的老领导。学谦同志给我们的印象是少了当年的洒脱，表情有时凝重。之后，我们逢年过节去看望他和毕玲时，逐渐又见到这位老领导恢复了当年的敏锐、儒雅、乐观时，我们无比高兴。不久，学谦同志担任外交部领导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我在体委主管对外、对台工作，因为经常有事要请示学谦同志，工作接触就较多了些，并有更多机会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和对事物精辟的分析。特别是在亚运会前夕解决台北代表团参赛名称的问题，我多次听到他坚持原则又充满智慧、从实际出发、充满灵活性的教导。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和不顺心时，也愿意向学谦同志倾诉自己的心里话。而学谦同志总是像师长和兄长那样开导我们。

学谦同志和毕玲同志对于我们俩结成终身伴侣，也是起了关键作用的。当年我们在团中央开始的恋爱是支部书记毕玲不顾

世俗的偏见、力排众议加以批准的。1953 年年底我们结婚时我已经调到二机部工作。婚礼举行地点是在我机关的一个办公室，把办公桌拼连在一起，桌上摆了些花生、瓜子和硬水果糖。我们两人的家人都在上海，双方的领导人就是证婚人。我的证婚人是领导我的处长，也是上海老地下党员。丽娟的证婚人则是学谦同志。学谦同志和毕玲同志一生感情深厚。我们的婚姻受到他们的祝福，我们两个人以他们俩为榜样也已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今天我们自己已迈入高龄人群之列，尽力奉献有限的、余下的光和热。当年曾带领刚参加涉外工作的我们，帮我们奠定了扎实工作基础的敬爱领导和良师益友学谦同志，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享有崇高的地位。

不尽思念　认真学习

——怀念吴学谦同志

· 程极明　孙稚如 ·

1995年冬天，吴学谦同志在从政协岗位上退下来之前，到南京来调研。省委机关通知我们和陈慎言（江苏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地下时期是常熟沙家浜党组织领导人，曾在老吴领导下工作过）夫妇去金陵饭店。我们一听，是吴学谦夫妇请我们去，非常高兴地去了。没有想到这竟是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不胜欷歔！

见面时，老吴说，他退下来了，以后下午都在家，欢迎我们去他家聊聊。后来，极明去北京开会，知道他已经有病住院。老同志劝极明不必去了，老吴已不认识人了，徒增家属亲人的悲伤。自此，我们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直到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知道亲爱的老吴仙逝了。我们只好含泪回忆他。

根据地下党和团中央机关的传统，我们从来不以官名称呼他，一直叫他老吴。回想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精明实干，作风朴实，实事求是，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使我们永远难忘，也永远向他学习，吸取营养。

解放前，他曾是地下党上海学委的副书记、大学区委书记，也兼任过复旦大学总支书记。他知道极明，但是极明不认识他。极明1947年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以后，党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就在学委的领导下工作。他是很了解极明的。1957年在莫斯科青年联欢节期间，刘晓大使（地下时期曾任党中央上海局书记）到中国青年代表团驻地，老吴把极明介绍给他，说“刘晓同志，这就是复

旦的程极明”。刘晓同志当时亲切地摸摸极明的头，极明像孩子模样在母亲怀里腼腆地笑了。极明感到十分幸福！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真正的亲人。

1955 年，我们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以后，在我们出国以前，老吴和我们做了一次长谈。他对如何工作，做了详尽的指示，特别指出，最近党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指示如何正确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通力合作，特别要和苏联代表团合作，尊重苏联同志，要和苏联同志经常交换意见，相互协商，但是也要采取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真理和原则。在国际学联书记处会议上，可以表达和苏联同志不同的意见。他还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要认真地执行。当然，任何重大事情，都要向上级及时请示汇报，不能自作主张。

他还针对稚如舍不得离开孩子，亲切地说，稚如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儿子身体又不够好，思念孩子是难免的。但是，要顾全大局，不要让机会从身边溜走，如老想念孩子蹉跎岁月会后悔的。

他对我们从事的外事工作，指导得很细。有一次，他提醒极明，在外事场合，说话不要太多，要学习周总理，言简意赅，恰到好处。他指示我们，要把身边的年轻翻译同志培养成党员。

1958 年春，老吴带团路过布拉格，发觉稚如刚开过刀，身体虚弱，就主动提出，让她随代表团回国。回国后，谈到今后工作时，稚如表示愿意做少年儿童工作，认为人的一生，少年时期极为重要。老吴点头，表示赞同说，尊重你的意见。稚如就调到少年部去工作了。

老吴真是名如其人，很谦虚，实事求是。1957 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时，苏联同志提出 1959 年联欢节在中国举行。老吴要驻世青的代表钱李仁同志和驻国际学联的我，分别去了解举办联欢节要花多少钱。我们了解详细情况后，提到部务会议上讨论，大家主张不在北京举办联欢节，因为花费太大，当时我国国力不够。他很支持这样的想法，并积极向领导反映。

他对于在国际组织中发生的突发事件，不匆匆作出结论，而

是指示用较长的时间认真做调查研究，了解真相，也不随便伤害同志。

在“文革”期间，我们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时时刻刻都在关心过去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听到一些关于老吴的传闻，我们根本不相信。“文革”结束后，我们去北京拜望了他。他谈起被关在秦城监狱里的三年。他说，他每天坚持在七平方米的小屋里走路，以保持体力，又朗读书籍，以保持不要失语。他说，在那段期间，他为许多同志写了外调证明，他记得为极明写了关于解放前组织复旦大学应变委员会的事，说明这是根据市委指示做的，没有错误。我们看到他依然那样乐观、坚强和健康，从心里感到高兴。我们对国内外形势交换意见，感到心是相通的，也十分欣慰。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机会成为老吴面前的两个小兵，感到十分幸福和荣幸。只不过我们没有把他的长处和优点学到手，这是引以为憾的。只好在残余的岁月里，继续学习，寄托思念。

（2008 年 9 月 18 日）

怀 念

· 周久华 ·

2008 年 5 月我从电视广播中听到吴学谦同志病逝的消息，他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感到万分悲痛！

首先我想到的是要去北京向他作最后的告别。女儿陪同我，乘飞快的列车抵达北京。在朱善卿、张天震夫妇的帮助下，我们到吴学谦同志家里设的灵堂前默哀致敬，并向毕玲同志表示慰问。5 月 10 日又去八宝山公墓向吴学谦同志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解放后，我才知道吴学谦同志是我地下党的学委负责人。回忆 1947 年在南京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五 · 二〇”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旗帜，喊出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就是在党组织和吴学谦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我是南京金陵大学的一名学生，也参加了“五 · 二〇”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使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我于是投入了党的怀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终生为祖国的富强、民族振兴而努力奋斗！

1951 年当我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时，又在吴学谦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国际青年统一战线工作，接触了不少国际青年朋友，参加了一些国际活动，使我开阔了眼界，放宽了胸怀，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奉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在吴学谦、区棠亮等领导同志教诲下，我还懂得了很多很多……我虽然离开团中央联络部已经整整 50 年了，但仍念念不忘在团中央的短短 8 年，因为这里蕴藏着五十年代的情怀。

吴学谦同志请安息吧！我会牢记您的教诲！

（2008 年 10 月）

深切怀念敬爱的吴学谦同志

· 王露仙 ·

吴学谦同志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特别在我从事外事工作的起步阶段，乃至对以后的成熟与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的、敬爱的好领导。他忠诚于革命事业，廉洁奉公，作风朴实无华；对干部搞“五湖四海”，悉心培养和扶植。今天，他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

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在上海，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就读于由美国、法国教会办的“洋”学堂。上海解放后，我加入了新民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次年，经考核，我被调往北京的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下称联络部）工作。当我第一次穿上配发的灰色列宁装时，心情十分激动。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初见“老吴”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吴学谦同志是在联络部的办公室里，只见一位身穿西服洋装的“外人”，当时以为是来访的客人。后来才听说，他就是联络部的一位领导同志。解放前他曾是上海地下学运领导人，解放初派往国外工作，那时是他刚从国外回来。在随后的接触中，我觉得他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官架子”，我也就跟着别人叫他“老吴”，感到十分亲切。

联络部领导对我们这些从“洋”学堂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工作、学习到生活都抓得很紧。每天上班后，安排我们第一个小时是业务学习（自学外语），晚饭后，规定在办公室进行两小时的政治学习。主要教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遇有外宾接待任务，事先召集参加工作的人进行短期口译培训。

循循善诱，悉心培养

我到联络部后，开始在秘书科同两位党员老大姐一起工作。秘书科就在部领导工作套间的外间。每天我见老吴从早到晚地工作，勤勤恳恳，十分繁忙。由于离领导近，常能亲耳聆听老吴同志的不少教诲。以后，又安排我到联络部的各个科室进行短期工作，使我对青年外事工作有了一个轮廓性的了解，并提高了办事能力。最后，我被定位在“东方科”（后称亚洲科）。1954 年，我在联络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战士。1955 年春节，我和同在联络部工作的岑悦芳同志喜结连理，联络部为我们在团中央院内操办了婚事，老吴同志亲自为我俩证婚。我的家人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革命队伍中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友爱温暖的气氛感染了他们，给我的家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1958 年，老吴被调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之后，我有幸被借调参加中联部接待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成员都是大学生，他们是来华学习取经的，我的具体任务是在我方向外宾介绍中国革命工作经验时，担任即席翻译。在六次经验介绍中，老吴介绍了关于上海学运的公开与隐蔽战线工作方面的经验。外宾对此反应强烈，收获颇丰。对我来讲，不仅在业务方面得到了重要的锻炼，更是一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生动实践，使我受益终生。

工作细致周到，率先垂范

1957 年夏，我刚从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回来，不久被通知要接替一位同志的工作：到印度去参加国大党青年部的年会，团长是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同志，代表是老吴，我担任翻译工作。当时，因业务情况要从头熟悉起来，我感到思想压力较大；而且两位代表都是“大领导”，担心自己完不成任务。但是事实教育了我，在印度逗留期间，我处处得到老吴的关照和帮助，最后基本完成了任务。其中有两件事至今让我记

忆犹新，对我的触动很大：

一是我们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后，主人安排我们住进一家旅馆，让西元同志和老吴合住一个套间——里间是卧室；外间是个会客室，放着沙发、茶几等。考虑我是女性，他们就将我安排在一个单间独住，但是离老吴他们比较远。老吴得知后，立即关照我把行李放在那里，白天可在那里休息，晚上就睡在他们会客间的沙发上。老吴这种从安全出发，细致周到的考虑和安排让我非常感动。

二是会议结束后，主人安排我们连同苏联代表团团长波波夫和男翻译米沙一起到新德里以南的阿格拉进行参观游览。交通工具是一辆半新的、没有空调的小卧车。明眼人立刻就能看出，如此小的空间怎能容得下除司机外的四男一女呢？何况两位苏联同志均是膀大腰圆、身高马大。当时，为了尊重主人的安排，老吴把西元同志和波波夫安排在后座，让我坐在他俩中间，我不折不扣地成了“三明治中的火腿肉”；然后他就同米沙两人挤在副驾驶座上。凭心而论，我是不愿意和米沙挤坐在一起的，可因任务在身我又不能不跟着去。对我讲，服从这样的安排是可以接受的，可是老吴却太委屈自己了——他既是领导，个子又比我大，同米沙两人挤在司机旁边实在太难为他了。车子启动后，我的思想一直在翻腾着，直到中途停车稍事休息时，我才向老吴提出同他交换座位的想法，他虽接受了我的建议，但还是带着关心人的口吻说：“你行吗？……”接下来，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我小心翼翼地坐在米沙和司机之间，而米沙却高兴地哼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的歌声同发动机声交织在一起……我一路上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直到旅途的终点。

从上述两件不大的事情中，可以看出老吴同志那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处处为他人着想的高贵品德。

吴学谦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的优秀品行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2008 年 10 月)

春风一样的温暖

· 钟小满 ·

吴学谦同志在清明时分逝世。他走在了一个全中国人祭奠先人、缅怀英烈的日子。尽管知道他的病已无法医治，但他的离去让我感到无比悲痛。

我原是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一名普通干部。1953 年从上海杨浦区团委调入。杨浦区团委在 1952 年至 1953 年间先后有四人调往团中央。鲍奕珊同志、钱其琛同志、吕毓瑛同志和我四人中，只有我和吕毓瑛分在联络部。1957 年“反右”斗争之后我同爱人调离团中央来到杭州浙江大学外语系任教直至离休。我在联络部工作了不到五年时间，而且又只是一名普通小干部，吴学谦同志时为副部长（部长是区棠亮同志），但他的为人和作风都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他对我的关怀和帮助始终如一，没有因为我的离去而有所改变。

我记得在联络部没有人称呼他为“部长”，都叫他老吴。我没有见他发过脾气或训人。那时部里有联欢活动或有同志结婚，他一定是被开玩笑的对象，没有人因为他是领导而觉得有什么拘束或不自在。他真诚地关怀和帮助同志，同志们愿意向他敞开心扉。我离开后几十年来，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或思想上有想不通的时候都向他倾诉求教，他都亲自回信给予帮助。每次出差来杭，一定叫我去看他，即使在他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后，也是一样。我去北京出差，他和毕玲同志一定要让我住在他家，晚饭吃什么，早饭吃什么他都过问，他总让毕玲同志给我做好吃的。饭后聊天，他和我什么都谈，他的坦诚、他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和他的真知灼

见都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在他那里我就像是回到了家，和家中的亲人在谈话，既受教育又极为温馨。

吴学谦同志在外事工作中的作用给我树立了榜样。他告诉我要和来华的外宾交朋友，尤其是年轻人。他说这些年轻人将来可能就是各国的领导。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在他的领导下，我和来浙大工作的外籍教师及来学习的留学生努力交朋友，建立友谊。尽管这些人知道我是党员，还知道我是党的基层领导，但他们都和我很好，说“你是值得信任的朋友”。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已是中年，虽在不同国家工作，我们仍保持联系，保持友谊，这正是吴学谦同志对待外国友人的精神与理念的传承、生根、开花、结果。

吴学谦同志严于律己，非常清廉。他家没有豪华装修，也没有高档家具。他出差出访从不带毕玲同志。有一次吴学谦同志来玩，毕玲同志也来了，我很吃惊。毕玲同志说这次是坐火车，有空位子所以才来的。如果是乘飞机肯定不行。

吴学谦同志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在我心中都像是家中的兄长，永远难以忘怀的兄长。

（2008 年 10 月 12 日）

想见音容云万里
恩听教诲月三更

——怀念吴学谦恩师

· 李燕杰 ·

吴学谦同志的名字，是我在20世纪50年代就听说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后来，我之所以能和吴学谦同志见面，是因为他爱人毕玲同志的关系。我念大学时，毕玲同志是我敬爱的老师；后来我留校工作，毕玲同志是我尊敬的领导。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我与毕玲老师一道关在“牛棚”中，在受迫害时，我们经常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聊天时，不仅受到毕老师的教诲，而且经常听她讲到吴学谦同志在上海地下党英勇斗争的事迹，所以吴学谦同志一直是我敬仰的长者，并默默地以他为师。

我从吴学谦同志身上学到学习、工作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主要是三个方面。吴学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过，我也做过共青团的工作；吴学谦同志做过外交部长，我多次到海外为驻外使团演讲；吴学谦同志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当过10年全国政协委员。总之，在我的人生路上，经常默默地向吴学谦同志学习，从他身上感受一位有学问、有智慧的老革命同志成功的真谛。

第一，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较长时间，做青年团工作。我是在1949年年初由革命青年联盟的盟员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我转团以后，一直当团干部，特别是胡耀邦同志担任团中央书记，胡启立、胡克实、王伟、王照华和吴学谦同志担任团中央的领导工作时，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或者说是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忠于革命事业，热爱青年，关心青年，时时处处为青年着想，帮助青年进步，他们与广大青年如师如友，亦师亦

友，记得在1964年参加团代会时，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使我进一步明确了作为一个共青团干部肩上的责任，之后多次见到吴学谦同志，他总是那样和蔼可亲，而且循循善诱，我从他身上感受到老一代革命家对年轻人的关爱。后来，我说："青年是我师，我是青年友"，"学生是我师，我是学生友"，"你要关心祖国未来么，首先要关心青年一代，你要关心青年一代么，首先要关心青年的教育"。我强调把教育视为一种艺术，被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这些想法都与吴学谦等领导同志的教诲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曾召开一次外交部驻外使节团的政工会议。耀邦同志在会上鼓励我要到海外为使节团留学生演讲称我为"巡回大使"。有一次，吴学谦、毕玲二同志请我与郭海燕等到他们家中吃饭，在座有吴学谦、毕玲老师，还有吴晓镛夫妇。吴学谦同志告诉我外事无小事，出国演讲既要大胆，又要慎重，因为到外演讲和在国内演讲不一样，一定要想到自己是代表国家。特别是在我出国演讲时，是由党中央、国务院组团出国的，我经常想到吴学谦同志的教导，认真按照他的教导办事，几次出国前集中到中南海202学习准备，一方面认真学习中央的精神，又要了解海外使节团、留学生华人华侨的情况，另一方面又要研究演讲的艺术，所以我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波兰、南斯拉夫等国演讲时，不仅没出纰漏，而且受到热烈欢迎，这都是与吴学谦、毕玲的帮助分不开的。

第三，我担任了十年全国政协委员，吴学谦同志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作为一个政协委员，不仅积极参政议政，而且经常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联络。我在任政协委员期间，不仅认识了许多民主人士，而且认识了许多学术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我请他们担任我所办的学校、社团、杂志社的顾问，如侯仁之、张光斗、白杨、谢添、吴祖光、沈醉等，还经常学习、阅读吴学谦同志的讲话。即使后来不当全国政协委员

后，我仍然注意吴学谦同志的讲话及文章，并从中受益。

吴学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对党和人民做了巨大贡献的一生，也是十分关心后学的一生。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与帮助下，在青年工作、外事工作、政协工作中，在地球村到过680个城市，演讲4000余场，著书40余部，其中都渗透着吴学谦老师的心血。吴学谦同志走了，我十分怀念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记在我的心中，我将永远不忘他的教诲，永远向他学习，做一个让他永不失望的好学生。

深切怀念尊敬的学谦同志

· 李淑铮 ·

我心目中和蔼可亲的老领导、难得的良师益友吴学谦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五个多月了，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和业绩、崇高思想和品德，以及他的朴实优良的作风，仍不时地浮现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忘怀，成为我无尽的思念。

早在1947年春末，在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的国统区上海，我党完全处于地下、单线联系的状态。但是，一次难得的工作机会，我有幸认识了吴学谦同志。1952年年底，我从苏联共青团中央团校第一期中国班学习毕业回国，并在我国中央团校理论班学习结业后，被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那时吴学谦同志任副部长，不久任部长。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六年，一直到1958年10月学谦同志调离团中央。1978年3月，我调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三局局长时，吴学谦同志是中联部主管副部长。在他的领导下又工作了四年多，直到1982年4月学谦同志调任外交部领导。此后，虽然没有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但是还常有机会接触，聆听他的教诲。回顾这六十多年的交往，特别是十年多的直接上下级工作关系，通过学谦同志的言传身教，使我得益匪浅。

为迎接学运高潮，亲自培训党支书

1947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一党员家参加支部书记培训班。培训班的导师就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学委副书记的吴学谦同志。这是我初次认识他。培训班期间，学谦同志全面分析了全国和国统区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上级党组织

的重要指示，着重指出，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强化独裁统治，弄得民不聊生。当时，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处于高潮。我们应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开展维护学生权益、形式内容多样的生活和经济斗争，再视情况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其逐步认识到学生生活的恶化是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结果，从而使斗争内容转变为以政治斗争为主。他还强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在斗争中必须注意掌握斗争的策略和方式。当时我虽是上海市立第一女中的党支部书记，但还只是入党不到两年、不满18周岁的青年，没有多少政治经验，对革命斗争的全局形势知之不多。培训班尽管时间不长，但收获不小。通过培训，使我对市一支部的学运工作更加心中有数。此后不久，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五 · 二〇”运动。市一女中支部在女中区委的领导下，在学谦同志指示的指引下，终于成功发动全校学生参加了5月23日、24日两天全校大罢课，成为全市大中学生总罢课的组成部分。这是由国民党重点控制的市立女中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胜利的取得，和学谦同志的支书培训及有关重要指示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吴学谦同志作为上海学委副书记，亲临学运第一线，结合上海学运具体情况，坚决和有力地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局关于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和蒋管区学生运动的有利形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斗争的五月运动的指示精神，领导作为蒋管区举足轻重的重点大城市上海学运，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震动全国的“五 · 二〇”总罢课斗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政治影响。“五 · 二〇”运动受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由此可见“五 · 二〇”运动的巨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深入细致领导作风的楷模

我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由吴学谦同志领导的六年工作中，印象最深的是他深入细致的优良领导作风。凡是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他都亲自过问，深入了解问题的方方面面，做到心中有数，以利于亲自动手，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1954 年 8 月 9—15 日，世界青联在北京举行世青理事会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多边活动，有 68 个国家的 263 名各国青年代表与会。周恩来总理为此亲自代表中国政府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会议讨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青年运动等议题。我们除了做好东道主外，重点是准备好一个有分量的发言。早在几个月前，学谦同志就主持成立起草小组，并由他亲自挂帅，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字斟句酌，直到满意，才定稿送审。结果，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青年为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一定胜利”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好评。整个会议在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主要由学谦同志领头抓总。整整七天的时间，白天要参加会议，现场领导处理有关事宜，还要准备第二天及几天后的重大活动，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到了晚上大家都已筋疲力尽，但是学谦同志仍坚持每晚召集各组负责人碰头会，汇报当天情况，部署次日工作，一直到清晨。会上，很多同志实在支撑不住，自己发完言后就呼呼睡着了。但是学谦同志始终精神饱满，亲自主持会议直至作出决定。他的细致周到、一丝不苟的精神，感染了大家去克服疲劳，坚持到底。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78 年 3 月，我调任中联部三局局长。三局是主管西亚非洲地区的局，长期以来由吴学谦同志负责。他从 1958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 月近二十年的时间一直主管这个地区，先后任五处（局级）处长、西亚非洲组（局级）组长、三局局长。1978 年 2 月学谦同志任中联部副部长，但仍主管三局工作。我上任前，学谦同志找我谈话，详细介绍了三局的工作。他强调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共产主义运动在非洲短期内还不可能大规模地发展起

来，因此有关共产党的联络和调研工作几乎微乎其微，但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却蓬勃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研究。为此，在他的创导和直接指挥下，中联部从1973年开始创刊出版了题为《非洲动态》的不定期内部刊物。报道内容以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为中心，包括非洲社会，特别是部族社会的阶级结构情况；非洲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各种思潮；已独立国家的革命发展动向；未独立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新老殖民主义和美、英等大国对非洲的政策等。《非洲动态》一直坚持出版了179期，直到1980年年底为止。很多重要文章都由学谦同志亲自挂帅修改。《非洲动态》的编辑出版，不但得到了从中央领导到各有关部委、研究机构等方方面面的广泛好评，而且在三局以至部内再一次掀起狠抓调查研究之风，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善于研究分析问题的干部队伍，为此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以创新精神，率先开拓我党同非洲各国政党交往的新局面

早在1977年下半年，学谦同志经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认为有必要冲破我党只能同共产党和工人党交往的框框，开展同非洲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的交往。他率先倡议、经部领导同意并和外交部联合上报了请示报告。197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联部、外交部《关于黑非洲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党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由学谦同志主持起草的请示中强调指出："在当前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同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团结，""主动而又适当地开展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对其中要求同我党建立一定关系的民族主义政党，在策略上可灵活掌握，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适当放松，可以有选择、有重点地以我党的名义同他们进行一些联系和往来。"

根据中央批准的指示精神，从1978年1月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中联部先后接待了索马里、坦桑尼亚、苏丹、赞比亚、塞拉利昂、多哥、几内亚、塞内加尔等八国九批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执政党代表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党大多邀请我党派团回访。

1979年12月4日至1980年2月11日，以吴学谦同志为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索马里、坦桑尼亚、赞比亚、布隆迪、扎伊尔、多哥、贝宁、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塞内加尔十国。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和主管局长，在学谦同志的率领下，实现了一次长达两个多月的非洲之行。这是我党第一次接受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执政党的邀请，以党的名义派出的代表团。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受到了各国党的破格接待。十国中有八个国家的总统接见了代表团。我们同十国党的领导人进行了20次政治会谈，并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有力地增进了同非洲国家执政党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对推动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以此为契机，开拓了我党同非洲各国政党交往的新局面。

学谦同志走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存活在我的心中。

吴学谦同志给我留下的一些记忆

· 蒋光化 ·

盛世铸辉煌，向往思故人。怀念吴学谦同志。

1963年，我从中央高级党校调来中联部工作时，同吴学谦同志素不相识。但听传闻，吴学谦同志是一位有名气的革命领导干部。有丰富的国际工作经验，善于谋略。当时中联部或中央组团出访、参加国际活动，吴学谦同志等总是团里的“干将”，是中联部部长得力的左右手。吴学谦同志的魅力，使我萌生了对他的尊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领导干部新老交替提上了议事日程。原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同志，从革命事业需要出发，自觉拥护和积极贯彻中央关于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政策，并积极举贤荐能。1981年年底，李一氓同志主动辞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众望所归，吴学谦同志接任了中联部常务副部长职务。本人时任中联部礼宾局局长，因工作关系我同学谦同志的接触逐渐多了一点。在实际工作中，我感受到，学谦同志稳重谦逊、平易近人、待人和善，总是笑盈盈地对待同志，没有官气，使人感到亲近，愿意接近他。除工作中接触，有几年春节期间，我总是登门给他拜年，学谦同志不是伏案就读，就是挥毫泼墨操就书法。像学谦同志这样的领导干部难得有点休闲时间，但他很乐意同我共叙节日的欢乐。

1981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副书记、副省长、副市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及地方外事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吴学谦同志偕我一起作为中联部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前，学谦同志做

了认真仔细的准备，作为中联部在这次会议上要讲点什么内容及相关问题，主持召开了部内厅、局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大家意见。地方外事工作会议之后，学谦同志主持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亲自传达贯彻了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这次地方外事工作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同志主持并讲话，他强调会议的目的是：就国际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决地方外事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1981年8月27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谈话纪要和胡耀邦同志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外工作问题所作的重要讲话。黄华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讲话。吴学谦同志代表中联部，着重就党的对外工作作了全面系统发言。

学谦同志强调说，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是我国整体外事工作的一个方面，是全党的共同事业，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为“三和一少”平反，否定了康生极“左”条规，扩大了工作面。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党的对外工作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局面。他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党的对外工作具体情况和经验体会。在谈到今后党的对外工作时，学谦同志强调贯彻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在对外工作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宽党的对外工作。做好同老党恢复关系，开展第三世界民族民主政党的工作，逐步开展同社会党国际及其各党的交往。他还阐述了开展这些政党的方针政策，并强调根据形势的变化，认真落实党的对外工作方针政策和对工、青、妇国际工作的方针，积极支持工、青、妇国际活动。吴学谦同志代表中联部所作的发言受到了会议同志的热烈欢迎，我都为之感动。就连主持会议的宫达非同志也为之动容。他们表示，

平时很少听到中联部的声音。吴学谦同志关于党的对外工作发言，内容充实、新鲜，使其对党的对外工作打开了思路、拓展了视野，影响非常积极。

1988年春季，我率团访问了安哥拉、莫桑比克、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冈比亚和吉布提，路过了加蓬、埃塞俄比亚、埃及和新加坡。我驻这些国家的使馆和商代处的同志们，同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热门话题之一，是他们积极评价吴学谦同志担任外交部长后外交战线的新气象。他们希望我们反映一些情况和他们的某些想法。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在大三角中继续保持更佳的地位，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更加灵活应用策略、利用矛盾和有关方面的弱点，适时处理好中美、中苏关系；其二，加强自身实力；其三，不失时机地继续重视并切实改进对第三世界的工作，尤其对非洲的工作。大使们还期待继续推进使馆的改革。大使要有职有权，使馆人员要精干，大馆不在人多而在精，小馆强调实需而不虚设。总之，涉及的问题都很重要。他们对吴外长在外交部推进改革期望值很高。言下之意，这些问题应向吴外长反映。我们表示很乐意向吴外长反映这些意见。回国之后因为未见着吴外长，未能当面向吴外长反映他们的意见。除向中央全面报告了代表团出访的成果，还就使馆同志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以代表团的名义专门向吴学谦外长写了报告。

学谦同志刚任外交部长后，有一次在外交部召开使节会议，我作为中联部代表参加了会议。利用会议休息之便，我信步走进了学谦同志的办公室向他问好。自以为这是一个不占他多少时间的良机。殊不知作为外交部长，别人休息，他回办公室处理文件，一片忙碌景象。虽然我已感到来得“不是时候”，但学谦同志虽忙得不可开交，同样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区区一件小事，充分体现了学谦同志的思想、作风和品德的高尚。

（2008年11月10日）

光明磊落　两袖清风

——怀念吴学谦同志

· 杨茂林 ·

吴学谦同志和我们一起在中联部工作20多年，后来调党中央和国务院担任领导职务。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领导，也是我非常敬佩和怀念的一位同志。

他为人正派，待人诚恳，敢讲真话，严于律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让我怀念的事情很多，现简单列举几件具体的事情，以表达我对学谦同志的缅怀。

注重调查研究，办事注意从实际出发和按政策办事

我记得在1965年部里几十位干部一起赴湖北省麻城县参加“四清”工作。春节前返京过年，部党委组织有关同志听取“四清”工作组同志的情况介绍。之后，学谦同志让我单独向他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工作队的情况。我把我经过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关情况和我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实地告诉他。

他听后连连点头，说：“看来那个地方确实问题不少，值得重视。但这些问题我认为不能完全责怪基层干部，有许多问题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有关。我们应该考虑到领导应承担的责任，对基层干部不能犯一点错误就一棍子打死，还是要多教育，帮助提高认识，对个别确实很坏的‘四不清’干部应按政策严肃处理。”

他还特别提醒我说：“一是要掌握政策，二是要摸准情况，三是要注意和地方干部、群众搞好关系。”

他的简短话语，使我开阔了思路。在那个什么政治事情都非常敏感的时期，他敢把问题一针见血地说出来，是他为人、为官真实品质的体现，也是对我的极大信任。这样的领导才是好领导，才是真正关心下级。他的提醒，会使我更注意掌握政策。我很感动。

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不忘为党担忧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自己已被夺权、靠边站、挨批斗、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关心着部内运动的发展情况。

有一天，“造反派”责令我在冰天雪地里抄写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学谦同志趁没有人的机会，凑过来假装看大字报，低声问我：“你参加‘造反总部’(当时中联部的一个群众造反组织)了没有？”我明白，在当时，他提出这样的问话，已经是冒着风险了。我说：“我如果参加了‘造反总部’，就不会被责令在这里抄大字报了。”他觉得与我对话风险小了一些，又问：“为什么不参加？”我说：“和你一样，我也靠边站了。”

当他知道我已经被责令下厨房劳动后，就放心地问我：“你对打倒伍修权怎么看？”我说：“没有事实根据，想打倒就打倒，这是不可能的。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这是政治斗争，关系人的生命的大事，不是闹着玩的。”他点点头说：“是啊，应该要慎重。闹不好要死人的。我担心这样下去要出大问题的。”他正想打听其他“当权派”下落的问题时，“造反派”喊我们赶快去参加批斗伍修权的大会，小声谈话就此停止。这是我们在造反派夺权后第一次有机会偷偷交谈。

后来，他不幸被抓入狱，剥夺了人身自由，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交谈了。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学谦同志在中联部工作期间，一直住在中联部。后来担任党中央、国务院重要领导职务，有好长一段时间仍居住在中联部。其间，我从没有听到他本人及他的家属、身边工作人员向中联部提出生活上的特殊要求。当与他住处相邻的其他领导人的小楼

装修一新、添置新家具、更新灶具之后，他仍然不让为他装修房子、更新家具。他说："我的房子蛮好的，有工作的地方，也有睡觉的地方就行了，何必折腾花钱呢！"

中联部的出国任务比较多。他在审批出国团组、迎宾往来费用时，一贯从严掌握。他总是强调：出国团组人数要在胜任任务的情况下，做到少而精，行程路线要合理，尽量不绕行，能省则省，避免浪费。

他自己出国访问，如果不是工作必须，他绝不会带夫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出去。有一次我遇到他的夫人毕玲同志，在闲谈中，我说："你怎么不跟学谦出去看看，开开眼界？"她说："一是我不愿意当那种陪着到处游逛的夫人，浪费国家钱财；二是如没有工作需要，老吴也绝对不会让我跟他去。老吴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浪费老百姓的血汗钱。"她半开玩笑地说："我是沾不上老吴的光了！"从她的谈话中不难看出，学谦同志是如何严格要求家人的。

一次小小的误会

学谦同志刚任部级领导后，部行政部门的一位同志到学谦同志办公室了解他在办公、住宿方面缺少什么东西，准备按部级干部标准配备。那位同志认为这是领导提升后的例行工作，大家都明白，就没有说明来由，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就对学谦同志说要更换点什么，增加点什么。学谦同志没有意识到行政部门是根据自己的提职来做工作，误认为来人动机不纯，是为了讨好他，有些生气。他立即将来人打发走，又马上给我打电话说："××怎么这么拍领导？这样的人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最好调换他的岗位。"

我了解清楚情况后，告诉他这是一个误会，这个同志是按照规定去做工作的，只是工作方法太简单了，我们会注意教育。学谦同志明白了，他也觉得自己没有问清情况，对此表示歉意。

（2008年12月20日）

永远怀念老吴

· 郑忠祥 ·

老吴走了，他离我们而去，从此人天相隔，相见无期。我又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想起往事，想起他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情谊，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举手投足，一幕幕展现在我脑际，我心中感到十分悲痛。

我是1964年大学毕业后来中联部五处的，不记得是谁告诉我，我进五处是老吴从政治处亲自挑来的，后来他还决定让我去伊朗学习波斯文，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也未能去成。几十年过去了，他对我的信任和关怀，仍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和温馨。

回忆老吴，我和原五处的同志都不会忘记他的一串脚步声。他上班来了，他的脚步声进了办公大楼，一直响到二楼，向右转有一条长长的过道，他的脚步声一直响到他的办公室。这脚步声有着他的性格，是那么爽朗，那么坚定，它似乎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和力量。几十年过去了，大楼已经不再存在了，但老吴的这一连串脚步声却永远响在我的耳畔。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微笑着，他的形象一直萦怀在我心中。

我也不会忘记，1964年，我曾跟老吴等到湖北麻城长岭岗参加四清。在农村，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作了亲切交谈，要我们好好向农民兄弟和地方干部学习。有一次，农民朋友为了迎接我们，还做了湖北麻城特色菜——肉糕招待我们。按规定下放干部不能吃鱼吃肉，老吴说：“吃吧！这是农民兄弟的心意，我们可以多付一些饭费。”平时，他还亲自和农民一起参加插秧、车水等劳动。1993年，老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了，他还念念不忘麻城的老

乡，专程去那里看望了他们，并和他们合影留念。从这张照片，我又一次见到了老吴的为人挚城。是的，真挚真诚的友谊是永存的。

回忆老吴，我想起在五处工作时，最高兴的事是全处同志围坐在他身边，听他吹风，听他分析国际形势。大家刚刚坐定，当时还很年轻的蒋忠瑜，总是“捷足先登”为老吴茶杯里续上水，这时老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中华烟，这个动作也很有他的个性，将烟“笃笃”在桌面上使劲地敲几下，再迅捷地点燃，接着，向我们介绍他出席亚非拉三洲大会（1966年年初）的情况，他还谈到周总理同他谈参加三洲大会的方针等。他每次吹风，总是像和家人聊天一样，有一次，他把两只袜子也脱了，像在自己家里那样，光着脚和我们谈着中东形势。我们原五处许多人一定会记得那次聚谈。原五处几位领导都有很高水平，我们对他们一直怀着崇敬之情，听他们吹风，经常使我们乐而忘时，常常连饭也忘了吃。

我由衷地景仰老吴，不仅是因为他没有一点官架子，还因为他有很高的政治、业务和理论水平。他是一位专家型的领导人。他研究非洲问题是个权威、专家，毛泽东、周恩来接见非洲朋友，他是经常参加的。他的口语很好，能说几种外语。他研究非洲问题是直接看法文、英文资料的，走进他的办公室可以看到他书架上、办公桌上放着不少英文、法文等原版书。最近，我从一篇文章中还知道，老吴英文这么好，是他从小就学习英文。他的爷爷把他送到上海英租界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他爷爷在上海拉过马车，也许因为他与洋人说话不通，想起要让孙子学好英语，真是一位有远见的老人。也可以说，是他老人家，为我们国家培养出一位饮誉中外的外交家。当然，老吴有这么高水平，还由于他长期的外事实践。他是一位十分勤奋好学的人，是一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也是一位令我们十分钦佩的人。

“文革”中老吴遭受了种种迫害，还被关进牢狱。1970年，他出狱后不久到“五七”干校劳动，正好我们同在一个班，我们还一起推过架子车，一起上县城卖苹果。我看到过一个批示，上有江青批语：“此人我不了解，请恩来同志阅定”。周总理批：“此人到群众中接受教育”。是敬爱的周总理把他从牢房里救了出来，不

然他还得受迫害。我认为应该把这些情况告诉他，有一天我们聊天，正好周围也没有别人，我偷偷地把以上情况告诉了他。我感到和老吴什么话都可以说。

老吴还亲自参加过我的婚礼，这使我感到十分自豪和幸福。那是1975年，老吴和其他同志一起送给我珍贵的结婚礼物。那天晚上，他还亲临寒舍参加了我的婚礼。我们的婚礼简简单单，他来了，我和爱人一起为他点了一支烟，他乐呵呵地向我们表示祝贺，他还对我夫人说："你叫赵兰香，太好了，和我们耿部长夫人的名字一字不差。"此情此谊，至今还历历在目。回想起来，我们未能专门为他做点准备，真是太过意不去了。

后来我离开了中联部，调到中宣部新闻局。那时，他每隔几个月到中南海中宣部会议室召开一次外事工作会议，我代表中宣部新闻局参加会议。我怕影响他工作，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但他总是主动向我打招呼。每次见老吴成了我那时的一件乐事。

20世纪90年代，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了。一个晚上，我去他家拜访。心想，现在他是一个大官了，不好随便说话了。一进门，老吴领我到了二楼会客室，服务员为我沏上一杯绿茶，老吴打开一瓶糖姜干，使我感到老吴还是像过去一样，可亲可敬！接着，他如数家珍般谈到了原五处的老人。那次，不知怎么还谈到了邓小平理论，他指出："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邓选》上的，还有他平时说的话。"我请他举例，他说："华人经济圈，这些虽然在报刊上不多宣传，但这些思想的确有它极其深远意义的。"他还和我谈到新闻学，他认为搞新闻要善于抓好问题报道等。他还谈到了他的儿子晓镛，他的话语充满着对晓镛深深的爱，我见到了伟大的父爱。那是我同老吴最后一次见面，那是一次极为难忘的、如沐春风的谈话。

老吴去世将近一年了，我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师辈——学谦同志的哀思。每每夜深人静时，我会临窗向不远处老吴家眺望，总是泪下沾襟。老吴，您值得我永远怀念。

（2008年11月22日）

吴学谦同志是我们敬佩的领导和师长

· 周士琴 ·

吴学谦同志在上海地下工作中的惊险艰难经历，在领导学生运动中的坚定、勇气、智慧和才干；他在团中央领导国际部工作时，以他的不懈、坚持和创新，为新成立的共和国开拓并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对外工作的事迹；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政治坚定，对事业的忠诚；我多是从书本和同志们的介绍中得知的。我正式开始在吴学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时，已是“文化大革命”最后多难的两年。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很大冲击，他从不违心地对两派对立做无原则的表态。他曾身陷囹圄，1970年底他回到中联部。在“四人帮”横行的困难年月，我们从他的言谈中，感受到的是他对党、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忧虑。周总理逝世后，特别是1976年清明节前，从3月中旬起，天安门就开始了对周总理的群众性悼念活动，吴学谦同志的心和大家一样，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切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清明节前夕，4月4日星期六，我们局的同志在上午做好了花圈，交通处的同志们积极支持，同意下午派车，送我们到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为了不连累学谦同志，谁也没对他说，也没向他请假。其实，他都看到了，也知道了我们要做什么。后来我们得知，他自己也是去过天安门广场的。在清明节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四 · 五事件”，“四人帮”镇压了天安门的群众，此后的追查运动搞得人人自危。这时学谦

同志再一次从容地保护干部，不搞人人过关，只安排学习有关报刊文章。在他的引导下，局里的气氛很平和，使当时分属两派的群众在天安门事件前后，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观点渐渐接近，信任感渐渐增强，不但没有相互揭发批判，反而出现了趋于团结的局面。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一天，我被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温和地告诫我说，以后在班车上说话，不要太随意。我立刻意识到，他指的是我曾在班车上说过讽刺“四人帮”的政治笑话。他又补充说，向我反映情况的同志不是告你的状，而是希望我提醒你，怕你出事。他的告诫和解释，不仅让我感觉到他对干部的爱护，更令我敬佩的是他对自己政治态度的坦诚，这使我更加确信，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者。

1976年，华国锋同志接见西亚非洲局的外宾，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同志趁吴学谦同志汇报完外国代表团的情况离开会见厅的几分钟，指着吴学谦同志的背影，向华国锋同志介绍说，这是中联部的一位老局长，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政治上可靠，为人正派，业务能力强，外事工作经验丰富，还懂外语。吴学谦同志在中联部的工作，正像耿飚同志概括的那样，是以他自己丰富的阅历和长期对外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能力，带领我们完成各项任务，并在工作过程中培养教育我们成长的。

吴学谦同志在组织领导对外接待工作的同时，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启发和引导我们，并亲自动手做扎实的调研工作。六十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为配合当时对非洲的工作，他和张香山同志一起主持领导编写“非洲手册”，为中央以及从事非洲地区工作的领导和研究机构提供了第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全面、系统、概括地介绍非洲的文件材料。七十年代，他组织领导西亚非洲局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刊物“非洲动态”，反映当时非洲重要国家的国情、党情、对外关系等政治动态；反映美国、当时的苏联以及欧洲各国对非洲的政策动向和活动。由于吴学谦同志的引导和教育，使我们认识到调研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克服对调研工作因其不在台前而忽视，或因其艰难而畏惧的顷向，在西亚非洲局

重视调研、学习调研蔚然成风。

吴学谦同志在调研工作实践中教给我们的一些重要指导思想，成为我们调研工作的方向。他曾针对当时干部中只注重调研主管党派情况的倾向，引导大家加强对有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调研。他说，中联部是党的对外联络机构，工作对象主要是有关党派和政治组织，但有关党派和政治组织所处的国情，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土壤，是他们制定纲领、开展活动所依据的客观条件，也是我们分析判断他们的政策的重要依据。所以，一定要了解他们所在国家的有关情况。1976年我们同土耳其一个新建的政党开始往来，这是第一个与我党建立联系的土耳其政党，为了加强国情调研，他让我通过当时在驻土耳其使馆工作的同志，订了一份报道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英文期刊。当时局里主管土耳其的干部英文力量不强，他就亲自阅读，由此可见他对国情调研的重视。他还强调要注意对美、苏和欧洲主要国家对西亚非洲的政策和动向的调研，因为西亚非洲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曾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战后大国以不同方式企图控制这些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都受到有关大国和大国之间争夺的影响。他还强调注意了解这些大国对本地区的调查研究的动态和成果，以利于我们把握自己调研的重点和方向。他的这些指导思想使我们在调研工作中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种在广阔深刻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调研工作及其成果，为后来中联部对外联络方针的重大调整，特别是对开展与民族主义政党的联络工作，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准备。

吴学谦同志在工作实践中因势利导，因人而异，用心使用和培养教育干部，许多人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发挥自己所长，成为重要的业务骨干力量；还有许多人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逐渐成长为独挡一面的领导干部。在办“非洲动态”期间他放手重用当时的业务骨干，同他们一起确定每期的内容，由他们组稿编辑，支持鼓励对非洲已有相当研究的业务人员为“非洲动态”供稿，在局里形成了一批稳定的撰稿人。他所放手使用的这些编辑和研究人

员，后来有的成为中联部局一级领导，有的成为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一级领导，有的则被评为研究员。西亚非洲局的许多同志都受益于吴学谦同志的培养教育。有一位在研究伊斯兰教方面取得很好成绩的同志回忆说，他钻研伊斯兰教问题是从吴学谦同志与他的一次谈话开始的。他说，有一天，吴学谦同志像跟他聊天，又像了解情况似地问他，伊斯兰教为什么能在西亚非洲地区的政治生活中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宗教的教派之间矛盾斗争的根源是什么。实际上是给他出了调研题目。从此，他开始认真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结合历史和现实，系统地研究伊斯兰教，特别是什叶派问题。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写了多篇论文，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做了有分量的发言。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学术权威纳忠教授，在读了他的一篇论文后评价说，这是截至目前，对伊斯兰教什叶派最好、最系统的研究。还有一位同志有与上面同志的经历相似，吴学谦同志问他为什么许多有影响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高举阿拉伯统一的旗帜，但始终没有成功的统一行动。此后，阿拉伯统一问题就成了他长期研究的题目。他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可惜他英年早逝，他的努力还没来得及被社会科学界认可。这样的事例还有许许多多，在怀念吴学谦同志的宏大队伍中，站着这群他用心血培养起来的人，这些人深深地向他致敬，把他称为自己的师长。

吴学谦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在我们心中铭刻下的一切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我们永远怀念他。

谦谦君子　虚怀若谷

——怀念吴学谦同志

· 彭望东 ·

吴学谦同志1958年至1982年4月在中联部工作。他调到外交部后，从副外长直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住在中联部。与中联部结下了珍贵的半个世纪的缘分。学谦同志作风简朴清廉，平易近人，工作卓越，在中联部有极好的口碑。平时部里一般工作人员都亲切地叫他“老吴”，只在正式场合称呼“学谦同志”。

2008年4月4日，学谦同志去世后，有人在网上发布了几张有关他的家居生活照片。人们见到身居要职的吴学谦同志竟是居住普通的宿舍，家中没有豪华家具和家电，只见屋中一台老式的21寸彩色电视，几包普通牛奶，墙上贴着“五讲四美”宣传画。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着如此清廉普通的生活，显示了他崇高的品德，许多人看后感到意外和震撼，产生了崇敬之情。我印象中，学谦同志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了工作。他不喜欢也没有时间闲聊，与周围同志保持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他甚至说过，他不喜欢参加遗体告别、追悼会等活动，那只会增加生者的悲痛。但是，他对职工生活、对所领导工作的同志的进步十分关心，他乐于向职工作出访报告。有次我向他报告，建造机关职工宿舍的塔楼工程的立项和经费纪委已经批准。他由衷地说，好啊，这下能解决不少职工的住房困难了。他喜爱学习、看书，那时出版社内部发行一些苏联、日本等国作家写的文艺小说，供领导同志阅读，他都会登记购买。除此之外，没有见他有什么业余爱好、休闲活动或是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张罗些什么，安

于简朴清淡的生活。他很长时期住在机关的职工普通宿舍，最后居住的是一处旧的招待所。那是解放初期建造的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面积不大，因年代久远，有些构件已经腐朽、漏水，室内光线昏暗。中直管理局对这所房子检修过一次，厨房地面铺了普通的酱红釉方瓷砖，墙面贴了白瓷砖。从来没有听学谦同志对居住条件提过什么要求。

学谦同志毕业于中国百年名校格致中学（当时称英租界工部局格致公学）和暨南大学外文系，加上本人的天赋和勤奋，他在英、法文等外语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经过在严酷白色恐怖环境下进行革命斗争的磨炼和考验，解放后一直从事青年和民间国际交往工作。像他这样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专业水平、很高的理论修养和优秀品德的领导干部调到中联部工作，应该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在同一层次的领导干部中也是拔尖的。但是，学谦同志在中联部工作期间，始终是谦虚谨慎、全力以赴，不敢有丝毫懈怠地对待和做好每一件工作。他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关系大起大落的时期，工作十分繁忙紧张。学谦同志长期分管西亚非洲地区的政党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政党和其他进步组织都希望了解中国，要求同中国建立党的来往关系。西亚非洲地区幅员辽阔，约有 70 多个国家。有的国家民族独立运动伊始，国家情况千差万别，大量开拓性工作要从最基础做起。有次学谦同志说，非洲有的国家和我国义和团时期情况差不多。中联部从事这一地区工作的业务部门是新建单位，研究基础和人员的水平与工作需要差距很大，需要在工作中培养提高干部队伍，迅速开拓工作局面。除日常负责的工作之外，学谦同志还经常临时承担一些重大任务，出访一些与中国尚未建交的国家，开展民间外交来往。如：以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代表的身份，参加历年的日本反对原子弹爆炸大会；1979 年 3 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赴罗马，就恢复中、意共产党关系，与意共内部会晤。促使中断了十多年的中意两党关系于 1980 年正式恢复，对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

大论战及与在“文革”中中断关系的一些国家共产党恢复关系意义重大。

参加对外活动责任重大，特别到非洲地区工作，距离中国路途遥远，有时为了节约经费，更广泛地开展工作，他经常是一次出访，争取同时去多个国家访问。1979年年底，学谦同志曾率领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一次访问非洲十个国家。而且他多数是去进行艰巨的开创性工作，由于条件差，不确定因素多，工作更显繁重劳累，他的体质不算强壮，实际上经常是超负荷工作。有次，学谦同志去参加一个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开国大典，到达后，接待人员接不上头、食宿以及如何参加活动等一时都无头绪，要靠自己紧急寻找各种关系和想办法，解决各种问题。他从来不讲工作劳累困难，每次出国回来，经常是当天就上班了。有同志问他，怎么不休息一下，倒倒时差？他风趣地说：“我们这些跑码头的，习惯了，不用休息。”

学谦同志身体力行，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十分重视总结对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因此中联部同志能够在他参加一些重大的外事活动之后，听到他精辟、生动的报告。例如，他是较早到古巴访问的一位领导同志，回国后给部里同志作报告，讲到卡斯特罗佩手枪接见外宾的风格和古巴见闻等情况，使大家对当时的古巴有了生动、感性的了解。他给有关业务局的同志出课题、出思路，引导大家开展研究工作，并认真地修改下面同志撰写的资料和稿件。“文革”前，中联部印刷出版了各国基本情况和专题资料约2400册，其中西亚非洲地区各国资料占了不少数量。以后，中联部又与国内有关的专家学者一起，编写出版了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非洲手册》，这也为国内全面开展非洲工作提供了权威的参考材料。他遵循中央指示，筹建了亚非研究所，将分散的专门人才，组建成专门研究机构，为更有效地开展亚非地区的工作，提供了有力保证。

1964年，我与五局中层领导王岳同志（已故）一起在湖北麻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王几次讲到，不少年轻同志到五局工

作，待遇清贫、任务繁重、要求严格，很多方面的条件比不上分配到其他单位的同学。但是他们在老吴领导下，工作舒畅，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因此能凝聚在一起，安心工作。

当时中联部许多从事业务工作的同志中，曾有接待和调研工作孰轻孰重的争论，即应该以哪方面的工作为主。学谦同志以自己实践经验和垂范榜样，辩证地、最富说服力地诠释了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中联部业务干部正确处理工作关系，科学有效地开展调研工作和提高自己，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学谦同志平时很少谈论自己，特别令人伤感的是，他最后十年的生命旅程在病床上度过，直至平静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大家，没有留下回忆录，自传之类的文字材料也几乎没有。但是当我们缅怀学谦同志光辉的一生时，他的形象竟如此高大鲜明。学谦同志作为革命者的一生，是圆满的。他将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为外交工作竭心极虑，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为了工作孜孜不倦、勤奋学习。他全心全意工作，安于简朴清廉的生活。他不管职务地位如何变迁，始终以普通劳动者自居，谦和诚恳地待人接物。他不屑个人名利，甚至个人遭受到打击、冤屈时，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豁达乐观的精神世界。学谦同志以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在中联部同志们的心中，矗立起一座丰碑，天长地久、永不磨灭。

（2008 年 7 月）

回忆吴学谦在中联部领导抗震的几件事

· 林华轩 ·

1976年吴学谦在中联部任三局局长并为部务会议成员，受部长耿飚委托，指导部内行政工作。同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国家地震局宣称，有迹象表明北京地区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部里调我去充实抗震工作。我说，我在部里搞了二三十年业务，行政工作非我所长。吴学谦说，现在行政工作繁忙，人手不足，你去行政局抓一下抗震工作，三年后再回业务局。

吴学谦当即对我部抗震工作做了细致的安排说：前几天北京市委开会传达中央指示，要大家对近期可能发生的地震提高警惕，做好思想上和物资上的准备。要加强值班，一旦有震情，要立即动员群众疏散，但不要在楼房旁边搭抗震棚，这不安全，而要利用我部西院当时的大片空地由行政局供应木材和油毛毡，供各家各户盖抗震棚。搭建时不要阻塞道路，不要损坏电缆和树林。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正值凌晨四点钟，北京有强烈震感，群众纷纷逃出屋外，不敢回家。当时宿舍外挤满了逃出的人群。吴学谦当天就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动员大家去西院盖抗震棚。他也在西院搭建了抗震棚。当时西院人声喧哗，人头攒动，成了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地。许多人冒险回家抢出衣被在抗震棚中建立避难处所。幸好房屋没有倒塌，只是饮水、吃饭和上厕所成了问题。吴学谦又指示行政部门让食堂及时供应热水和伙食，并且开放了西院平房旁边的几个厕所供大家使用。

几周后震情没有发展，大家情绪开始稳定下来。抗震棚中的生活使大家熟悉和亲近起来，大大增强了同志间共患难的团结合作精神。吴学谦和其他部领导同志多次前来看望大家，亲切地问寒问暖并帮助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难题，充分体现了党临危不惧、始终关心群众安危的精神，深得群众好评。

（2008 年 10 日）

忆吴学谦同志

· 丁杏芬 ·

惊悉吴学谦同志逝世的噩耗，深感悲痛。我曾在学谦同志直接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亚非洲局从事对非洲的联络和调研工作长达20多年。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以及他对下属干部，包括我本人的谆谆教诲几十年来一直萦绕脑际，成为我为人处事的遵循准则和毕生追求。

对党的信念忠贞不渝

学谦同志一贯坚持党性原则，爱憎分明，从不趋炎附势。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肆虐的腥风血雨时期，对于“四人帮”通过媒体为篡党夺权鼓吹的种种谬论以及对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诬陷和攻击，学谦同志都敢于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并且以他数十年革命斗争实践加以批驳，乃至嘲讽。这方面的事迹值得我以浓墨重彩敬告读者。例如，他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曾说：“我们大家都要争当演员，学会演戏，因为现在是演员当政嘛！”不言而喻，这是学谦同志对“四人帮”头目江青的绝妙讽刺。我和一些同事们听了他的这番议论都面面相觑，担心他会因此遭到厄运。

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日益加快，学谦同志同中联部一批部、局革命领导干部被“夺了权”，继而又以“叛徒”、“特嫌”之名被关在中联部办公楼内“隔离审查”。这时学谦同志实际上已失去人身自由。但他对自己所处的险恶环境全然不顾。当时我曾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多次陪学谦同志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调查小组。学谦同志在回答他们有关上海地下党斗争和地下工

作者所谓“特嫌”等问题时，总以自己亲身的斗争经历，耐心地、实事求是地介绍地下党的斗争史和他所了解的地下党员、地下工作者的斗争事迹，从不诬陷好人。对于个别别有用心的调查人员要求证实某些地下工作者的“叛徒、特务罪行”时，学谦同志总是据理驳斥或严词拒绝。为此他曾数次遭到这些恼羞成怒的来访者的训斥。

由于学谦同志敢于同“四人帮”作顽强斗争，他必然会遭到“四人帮”步步升级的迫害。在他被“隔离审查”不久，“四人帮”又以“中央监护”为名，将他投入秦城监狱，使他遭受了数年的牢狱之苦。但是漫长的“铁窗”生活丝毫未动摇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贞不渝。他出狱后不久，我便去他家探望他。我问他对党组织是否能查清自己的地下斗争时期的历史有过担忧。他即毫不犹豫地作了下列回答：“我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坚信党组织一定会查清地下斗争时期的历史并且作出公正的结论，还我历史的清白。”

“文革”期间，中联部曾受到“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上有“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代表中央分管中联部，下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坐镇”。但是中联部的广大群众本着“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的信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四人帮”的斗争，其激烈程度和持续之久，同中央其他部委相比毫不逊色。王力垮台后，中联部大院内群情激奋，揭批王力及其后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学谦同志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群众斗争的行列。在中联部首次揭批王力的群众大会上，他走上主席台代表西亚非洲局的领导发言，表示坚决支持群众揭批王力的罪行。他的行动不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同时也激励了一些持观望态度的革命领导干部很快站出来支持揭批王力的群众斗争。

“文革”中由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挑唆以及群众中存在的“派性”，中联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较长时期存在着尖锐对立。学谦同志对群众组织的团结十分关心并且以实际行动努力促进两派的大联合。他曾告诫我对不同派别的同事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多做自我批评，不要对以往的是非恩怨争论不休，更不要追

究个人责任。我在钦佩他博大胸怀的同时，也深刻领悟到“责己严、待人宽”的做人道理。在中联部群众组织大联合的进程中，我按照他的教诲，不断反思自己的言行，同不同派的同事搞好团结。

难忘悠悠往事

学谦同志对当时的西亚非洲局的一帮年轻人来说不仅仅是可敬的领导人，更像是慈爱的长者。他对我们年轻人的关怀、培养，乃至呵护的事例不胜枚举。那时他担负着70多个西亚非洲国家联络和调研事务的领导工作。他日理万机、日夜操劳，很少有闲暇时间。但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同事们为我在办公室举办的简朴婚礼，令我这个远离家乡、孤身在外的年轻人备感温暖。我为能被分配到党中央机关，又在学谦同志这样的老革命领导下工作，感到无比自豪，对未来满怀憧憬和幻想。后来分配我做《参考资料》刊登的非洲地区剪贴资料的分类工作。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剪贴资料足有几寸厚。将它们分类送到主管人手中是件烦琐又耗时的工作，对自己的中外文水平的提高没有多大帮助。我认为这种简单工作一个初中毕业生便能胜任，让我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高材生来承担简直是“浪费人才”！不久我便提交了请调报告。学谦同志亲自找我谈话，教育我一切要从人民利益出发，以党的需要为己任。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党把你从一个苦孩子培养为大学毕业生和党中央机关干部，你怎么能对组织分配的工作挑肥拣瘦？况且你刚出校门，各方面的水平同工作要求相距甚远。即便现在委你重任，你也难以胜任。你现在应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中外文水平和业务能力。资料工作能为你熟悉非洲情况提供学习机会。你要懂得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学谦同志对我这些谆谆教诲让我受益终生。从此我对组织分配我的工作不挑不拣，事无巨细，总是全力以赴，力求完美。同时我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水平。不久，学谦同志便放手让我担当一些重要的翻译任务。1961年我陪南非共产党代表团在国庆节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1963年我担任了参加

在伦敦召开的反南非种族隔离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声翻译。我对首次同传任务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学谦同志又一次找我谈话，勉励我要有自信心，认为我当时的水平足以胜任此项工作。他还不无幽默地鼓励我说："不要因为一些外国代表的英语比你好便感到胆怯。他们还不懂中文哩！"他的鼓励给了我充分的信心去完成此项艰巨任务。自此以后，我泰然迎接外事翻译战线的一切挑战，敢于承担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政要时的翻译任务。"饮水思源"，我深知学谦同志为我成长里程的每一步倾注了心血。

学谦同志"爱民如子"，有口皆碑。他于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解放后又一直奋战在外事战线上。因此，他的英语基础扎实、口语娴熟，还粗通法语。他利用这一特有优势，给予青年翻译人员全方位的教育培养。他能充分体恤给中央领导人当翻译的种种艰辛。例如，为带乡音的中央领导人当翻译时，有时会听不明白他的个别词句。而作为译员，我又不能向他询问。这时学谦同志会及时为我作解释。也有个别中央领导人向我问起个人经历问题，而我又不便回答时，他也会代我作答，帮助我摆脱尴尬局面。

在非洲局期间，我为学谦同志充当翻译的次数多得记不清了。他在工作中对我的关心照顾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例如，在同外宾的重要会见、会谈、通报国内外重大事件或系统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情况前，他总会将准备的主要内容写成提纲交给我阅读，以便我做到心中有数。在宴请外宾或出国访问途中，学谦同志有时会突然用英语同外国人直接交谈，同时提醒我抓紧时间吃点东西或争取休息片刻，以免饿坏肠胃，过度疲劳。

成立初期的西亚非洲局，青年翻译占了人员的绝大多数。他们中普遍存在着重口译轻调研工作的偏向，错误地把调研视为"坐冷板凳"的没出息工作。学谦同志并未采用灌输大道理的方式来纠偏，而是身先士卒，亲自抓调研，以此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常年坚持阅读有关西亚非洲地区的英国和美国杂志。美国《新

闻周刊》和《时代杂志》更是他的必读刊物，即使在升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后也从未间断。他经常把重要文章推荐给相关人员阅读。遇到西亚非洲地区发生重大事件时，他会及时召集“务虚会”，以他渊博的国际知识在会上向大家介绍重大事件的背景，借以开阔大家的思路，并且提出一些思考题目，供主管人员撰写调研文章之用。

日常生活中的学谦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为了躲避余震的危险，家在中联部大院内的学谦同志一家人和西亚非洲局的一些同志暂时都到比较坚固的办公大楼内留宿。各办公室成了临时的男女集体宿舍。每到傍晚在院内乘凉时，大家便围坐在学谦夫妇周围倾听他们俩饶有风趣地讲述上海地下党的斗争史和他们的婚恋史。学谦同志叙述了他同其他地下党学委领导人如何在茶馆中领导青年学生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示威活动，以及他如何躲过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拘捕。在他讲述的生动故事中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这位智勇双全，曾多次成功地战胜反动军警镇压的地下党领导人竟会败给了一头狡猾的小毛驴。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学谦同志因频繁参与领导青年学生的反蒋斗争而面临暴露身份的危险，因此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他转移到新四军解放区工作。学谦同志抵达一个交通站时，一名交通员接待了他，还为他牵来了一头毛驴。他是党组织派来护送学谦同志去新四军军部的。他让学谦同志骑上毛驴，他在前面引路。他们走了一段路程后，他对学谦同志说，“我们已进入安全地带了，这里离军部不远了。我要回交通站接别的同志。只好让毛驴带你去军部了。好在它很熟悉这段路，也可称得上是‘老交通’了。”这是一条乡间土路，既狭窄又坑坑洼洼，两旁栽有不少柳树。交通员离去后不久，貌似温驯的小毛驴便开始作弄人了。它专挑有柳树的路边走。这就害苦了学谦同志。树枝不断划蹭他的脸。他脸上划出了道道血痕，使他疼痛难忍。更糟糕的是他还得用手扶住眼镜，否则会被树枝碰落。他开始想用大声呵斥制伏它，但它根本不予理睬。于是他便用鞭子

抽打它。这下惹怒了它。它不断蹦跳，企图将他掀翻在地。无奈，他只得放弃骑驴，跟在慢悠悠的小毛驴后面朝新四军军部继续前行。最后，学谦同志感慨地总结道："看来不仅对敌斗争需要讲究策略，就是对顽劣的牲口，你要是不懂得对付它们的办法，你也照样要吃亏。真是隔行如隔山啊。"

举不完的事例，道不尽的思念。凡是熟知学谦同志的各级干部都异口同声地称颂他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是大家学习的楷模。我们中一些与他朝夕相处多年，担任过他译员的老翻译们在他的追悼会上缅怀他时动情地相约：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国那边找到他时一定面告他，我们还愿给他当翻译。

学谦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愿您一路走好！

（2008 年 8 月）

吴学谦同志逝世期祭

·宋庆才·

相见时难别亦难　生离死别近一年
欲见音容空有泪　故人入梦常思念
相逢好似初相识　尽数功德实在难
成丁前夕加入党　践诺马列成自然
反帝救国为大众　身处逆境而不颤
建国前后任要职　赤胆忠心厚望焉
洞彻中外古今情　远见卓识重调研
“文革”动乱遭迫害　刚正不阿驳诬陷
拨乱反正新建树　外交战线创局面
言可经纶行可钦　明月清风永不眠
丰功伟绩炳穹苍　英灵永垂人世间
等闲暂别犹惊梦　殷盼有缘再晤颜

（2008年冬）

学谦同志是我的好领导

· 吴兆契 ·

1942年，烽火漫天，我考进了暨南大学，翌年赴内地。暨大的学习与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思念当年的同窗好友和莘莘学子。2004年，毕玲大姐前来参加暨大校友召开的年会，我对她说："我是暨大校友。我认识学谦同志，可能学谦同志并不知道我也是暨南人，但他是我的好领导。"

1949年，我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61年调亚非研究所。同年，毛主席指出：我们对于非洲历史、地理、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些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忙，在一两年内出这么一本书。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我们全所同志集中力量编写这本书。最后由吴学谦同志主持，廖盖隆同志参与，集体讨论，逐段逐句加以修改。其中翻印多次，最后定稿，学谦同志为此付出很大精力。书名定为《非洲手册》，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主要供领导参考。周总理1964年出访非洲时，该书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周总理对《非洲手册》给予了极好的评价。这也是学谦同志主编的重要著作之一。

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非洲广大殖民地，经过非洲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纷纷取得了民族解放的胜利，绝大部分殖民地，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吴学谦同志与非洲老一辈领导人都有过接触，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对他们给予支持和帮助，做了大量工作，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积极贡献，增进了中非友谊。吴学谦同志不愧为非洲问题的专家和实践家。

1964年，在亚非研究所的基础上分别成立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吴学谦同志兼任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吴学谦同志与乔石同志解放前都是上海学生运动领导者。乔石同志解放后担任浙江省共青团领导工作，后调鞍山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20世纪60年代初调来北京参加撰写反修文章后，学谦同志请他来中联部担任五处（后改局）总支书记，从而加强了五处的领导力量。

吴学谦同志曾就读于上海著名的格致中学，然后升入暨大，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在暨大先后读了七八个年头。解放后，他从上海调到共青团中央，1959年任中联部五处处长。学谦同志很有才华，中外文俱佳，思想、理论水平很高，分析问题深刻、敏锐。“文革”以后，为适应非洲形势发展的需要，主持“非洲动态”的工作，每期稿件，他亲自修改定稿，以供中央领导参考，博得好评。学谦同志曾经表示调查研究很重要，如可能他很想以后做些调研工作，这是对我们做研究工作的莫大鼓励。

吴学谦同志非常关心干部的成长，待人亲切，同志们都以老吴相称。他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文革”后期，中联部干部纷纷从干校回部工作。当时研究所尚未恢复，他把研究所的干部逐步安排在处里帮助工作，从而安定了人心。他积极筹划恢复研究所的工作，1980年西亚非洲研究所终于得到恢复。

吴学谦同志教育我们不要追逐名利，他自己身体力行。他认为给中央服务是首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他在考察苏州时，感到环境优美，文化景观深厚，希望将来有机会在苏州安居，表明他淡泊人生的心态。

20世纪80年代，吴学谦同志调任外交部领导，后又进任国务院副总理，但对我们研究所的发展依然关切备至。

（2006年4月1日）

严谨宽厚　一心为民

——怀念老首长吴学谦在非洲路上的教诲

· 李肇星 ·

在我的职业外交生涯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人和事，而这里我想谈及的是我的老首长吴学谦同志。

学谦同志病卧北京医院多年。我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和部长期间，大约一个月去看望他一次。最初一年他似乎还认识我，有两次还拉着我的手不放，后来每次就只剩我一个人暗自难受了。

2008 年 4 月 4 日，老首长走了。他严谨、宽厚的音容和一心为民的品德更加崇高鲜明了。

学谦同志 1982 年自中联部调到外交部之前，我从未见过他。是那年 12 月在访问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几内亚、赞比亚、纳米比亚等国的路上，我这个新上任的新闻司外国记者处副处长才有幸初次见到他这位就职不久的外长。在他之前的新中国前五位外长，我是从纪录片电影和电视上认识的。

那次访非，新闻司只去了我一个，要为会谈会见写吹风稿、管理中外记者，业余为外长做了两次翻译，还同外长聊了一次天儿。见了面，就发现这是一位学之不尽的好老师，一位值得尊敬的首长。

学谦同志待人宽厚，总是多看部下的长处，体贴部下的难处。访问期间，我国同安提瓜和巴布达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位年逾七十的大使来报告这一消息，一时记不住这个国家的名称，说不清楚它的地理位置。有些年轻人就笑话这位大使。学谦同志说，那么大年纪，又没带笔记，记不住这么长一个名字，不奇怪。老大

使可能是抗日时期的干部，没有机会学多少世界地理知识。他别的方面长处一定很多。

学谦同志愿意和年轻人交流，作风平易，从不摆架子，对新干部用起来很放手。有一场礼宾计划外的活动急需一位法文翻译。他问我："我的法文不大够用，肇星，你学过法文吗？"我答："只学了一年。"他立即说："那你就来当主翻，有些词我可帮忙。"就这样，我这法文"三分之一瓶醋"为外长当了法文主翻。宾主都满意。若干年后，我在法国外长为我举行的正式宴会上用法文致辞时，又记起老首长的鼓励。

在访问另一个国家时的一次会谈中，一位第一次担任外长英文主翻的小伙子没学过当年在南部非洲常出现的一个关键词"种族隔离"。学谦同志提醒了两次，他仍记不住，还是在用一个同义词。学谦同志说："这个词不宜用别的词替代。肇星，你在非洲待过多年，这段话你来翻，下一段他再接着来。"又让我把这段插曲给外宾解释一下，免得把人家弄糊涂了。他还安慰那暂休三两分钟的年轻译员别紧张。他就是这样，对事情考虑得周到，工作上要求严格，对别人的感情照顾得细致入微。

有天晚上他找我聊天儿，亲切地说：这几年在非洲工作的经历很好，正像在国内有机会在艰苦省区锻炼几年一样。做人做官、内政外交都触类旁通。一个人、一个国家都千万别忘本，别忘记穷朋友对自己的帮助；要平等待人，不染上嫌贫爱富、世态炎凉的坏毛病。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要团结、相互学习，有意见当面说，表扬的话可以背后说。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要真正记住个人很渺小，伟大的是我们共同的祖国、共同的党中央、共同的为人民服务事业……

部长的教诲令我深为感动。好像是为了表示谢意，我给他介绍了我不到30岁时在当时肯尼亚外长办公室看到的一段座右铭："永远不摆架子，架子是扔在地上也没人捡的东西。"他听后表示赞同并开怀大笑。

访非之后，学谦同志和部党委在外交队伍建设上有一些重大

举措：坚决消除“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加强团结，让外交为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加快提拔年轻干部，包括在外交官系列中新加“处级参赞”一档；外交官政治上要强，业务上要精，要懂点经济、要中文好，至少能用一门外语工作……

非洲之行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学谦同志单独交谈，但言传身教的效益不是以时间长短来计算的。接替吴学谦任外长、在非洲最艰苦地区工作过的钱其琛同志告诉过我，师长教的和学生学的，都重在真实有用。

人民至上、大局为重、学识无涯……学谦同志的典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原文载2008年9月10日《中国文化报》）

忆吴学谦同志二三事

· 李道豫 ·

在大学求学时，就听到吴学谦的名字，在学生运动中他是地下党市委学委的著名领导者，当时的人们都知道，解放前上海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对解放大军起了很有力的配合作用。但一直到1982年他到外交部工作，我才第二次见到他。学谦同志到部里上任之初，普遍找各司领导谈话，了解情况。我当时在国际司，随同其他司领导一起，向他汇报了司里工作情况。他态度谦和，十分平易近人，问得很细，问业务范围、分处情况、当前工作，还问到干部情况等，不停地把我们所谈内容记在小本子上。这次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久我调到日内瓦工作，就少有机会见到学谦同志了。

1984年年底我调回国际司。在我到司里上班前，吴部长同我谈了一次话。他先让我谈谈对工作有何想法。我谈到接手工作有些犹疑胆怯。他鼓励我要坚持原则，大胆工作，强调要团结全司同志把工作做好。他简明扼要地谈了工作任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及时地指点和教诲，鼓舞了我，至今难忘。

吴部长到部正逢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外交政策和方针进行调整。他贯彻中央的精神十分坚决而迅速。记得我回国际司不久，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紧急传达中央的指示，部署调整裁军、核试验等问题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向全世界展示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他逐字逐句地口授上报文件的关键内容，要求我们立即把有关文件起草好，尽快上报。他自己迅速传达中央精神不过夜，也要求我们雷厉风行。

学谦同志作为外长每年都要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这是很辛苦的出差。我在1985年和1987年两次有机会作为代表团成员随行。每次在纽约逗留一个星期到十天。他除了在大会发言，宣讲我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各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外，还要同各国外长会见、出席工作餐会，同大会主席和秘书长会晤以及主持国庆招待会等等四五十场活动，一天多达八九场。一场接一场日程排得非常紧，当其他国家得悉我国外长到达纽约的日期后，要求会见的人天天增多，一再突破原定日程。前方代表团为了减轻吴部长的工作负担，建议婉拒几场会见。吴部长传下话说，人家要求会见是对我们的重视，要尽量见，时间不够要挤时间安排。学谦同志在纽约不顾疲劳，不停歇地参加活动，他对每次会谈事先都作了详细的准备，尤其是与重要国家外长的会谈，更是反复思考。会谈时针对不同国家不同人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娓娓道来，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吴外长在任时结交了众多国家的政要，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要人到诸如英国副首相杰弗里·豪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等发达国家的朋友，他们都对吴外长的为人和外交风格，怀有敬意，感到钦佩。

1987年那次从联合国回来途经南京，江苏省外办希望代表团能给他们讲讲联大开会有关工作情况。吴部长让我去谈谈。去前他很认真地特别交代我，在讲联大工作情况时尽量少提他，要多讲整个代表团的工作。当时我不大理解，他是代表团团长，谈联大怎么能不提他，后来我才懂得他丝毫不愿张扬自己。他发自内心的谦逊律己精神，令我感动。

学谦同志平日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跑步，长达三千米，即使在国外出差也尽可能坚持。在纽约，有一次周末访问一家大学的会议中心，地处小山坡。他清早五六点钟就到山下，从山下跑步到山上。只见美方的随同警卫一个大个子气喘吁吁地跟在他后面跑，还拉下了一大段距离，成了一则笑话。

1988年春学谦同志就任副总理到国务院上班后，除了有时陪同他会见外宾，就很少有机会见到了。

1990年2月，组织上已通知我准备去联合国工作。不久又告诉我，吴副总理作为我国特使将出席纳米比亚独立庆典并顺访加蓬和尼日尼亚，部里决定让我随同，代表团有中联部朱良部长和许庆善局长，还有我部非洲司、礼宾司等有关领导同志。从吴副总理到上述那几位领导同志，都是非常熟悉非洲的。而我是第一次去，很庆幸有这次机会去近距离地跟班学习。纳米比亚原是在南非白人政权的委任统治下，当时名为西南非洲。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经过长期争取独立的斗争，终于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结束南非的委任统治，并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普选。独立斗争的领袖努乔马当选总统，并确定3月21日正式独立。我国长期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斗争。努乔马是我国的老朋友，吴副总理和随行的一些非洲专家都同他很熟悉。此行的任务除了祝贺独立、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外，还要当场完成建交、签署公报。

行前，首先就遇到行程路线的问题。国际航班要经停南非。我国与南非白人殖民当局没有关系，吴副总理一行当然不能走此线。只有取道博茨瓦纳，再乘包机转入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得和克。根据吴副总理的指示，要尽量节约开支。不仅包了一架不大的飞机，而且和同去参加庆典的博茨瓦纳总统一行共乘一架飞机，他们代表团坐在前舱，我们坐在后舱。在较小的飞机上，后舱颠簸较大，显然是不舒服的。吴副总理却安之若素，再三交代我们要尊重和照顾同机的博茨瓦纳朋友。

吴副总理一路上利用途中转机或经停的时间安排会见，不放过任何做工作的机会。在伦敦转机时会见英国副首相杰弗里·豪，交谈了国际热点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从伦敦到博茨瓦纳的途中经停卢萨卡，吴副总理下机休息时与赞比亚国防安全国务秘书会见，就南部非洲形势和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

20日下午，从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飞抵温得和克。下机后就发现，原来南非行政当局始终抓住政权不放。一直到午夜零时，正式举行仪式，降下南非当局的旗帜前，所有的安排都是由南非

当局负责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纳米比亚政府零时成立时，政府机构没有建立，各部人员还没有安排好，不可能马上正常运行，果然现场相当混乱。当日午夜，独立仪式在温得和克体育场举行。吴副总理在贵宾席上，随行人员在看台上。“温得和克”原意是“风口”，夜里风更大，我们都没想到要带风衣，颇感凉意。我们很早就到场，在凉风里等了相当的时间，仪式开始。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讲话后，南非当局的旗帜徐徐落下。零时正，纳米比亚国旗庄严升起，高奏纳米比亚国歌。努乔马宣誓就任首任总统。次日上午议会开会，首席法官、议长、议员相继宣誓。下午，在体育场举行大会庆典。总理、各部部长宣誓就职。到此时，新政府外交部仍然找不到管事的人。会见努乔马和建交会谈等，对方都没有人来作安排。根据我国同努乔马政府的友好关系，签署建交公报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事，但是此时能否签成，却成了未定之天。吴副总理一面按照东道主的安排参加必须参加的活动，同时还应约会见了南非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曼德拉、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罗马利亚外长、巴基斯坦总理顾问等，另一方面时刻在思考在此特殊情况下，如何完成建交的任务。吴副总理认为在纳米比亚政府尚未正规运行的短暂时刻，必须绕开通常必须通过的政府机构和官员，直接找老朋友努乔马总统谈建交事。鉴于第三天，22日下午我们的包机就要离开温得和克，事不宜迟。吴副总理当机立断，指示许庆善局长设法直接接触努乔马安排会见。努乔马总统当时的确日理万机，忙到难以想像的程度。但一听到中方的关切和要求，立即挤出时间安排在我们离开之前，在机场会见吴副总理。22日下午我们提前到达机场，只见努乔马总统正忙着送别离境的贵宾。不一会儿他走进休息室。他见到吴副总理后热烈拥抱握手，老朋友相见分外热情。吴副总理转达了我国家领导人的问候，祝贺纳独立斗争的胜利，并转达了我国家主席对努乔马总统访华的邀请。关于建交，谈得十分顺利，纳方完全同意我方公报草案。双方当即把文本准备好，努乔马总统和吴学谦副总理在文本上正式签署。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吴副总理一行轻松愉

快地走上飞机飞向下一站……

学谦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可是陪同他出差的种种情景仍然宛如昨日。他那慈祥和蔼的笑容至今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他的崇高品德依然令我们深深敬佩和仰慕。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高度负责，执行任务全力以赴。他胸怀大局，高瞻远瞩。他光明磊落，真诚坦率。他虚怀若谷，自律清廉。他生活俭朴，从不要求特殊待遇。到外交部后职务连连升迁，房子却始终不变动。对干部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又热情关怀，循循善诱。他是一位大首长，同大伙相处完全没有架子，真正做到平等待人。凡是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都铭记着这位好领导。

我敬仰的老首长学谦同志

· 黄桂芳 ·

2008年4月4日，是中国的清明节。我国外交战线杰出的领导人吴学谦同志，在这一天走完了他87年坎坷而光荣的一生。我同他身边其他工作人员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赶往他家灵堂吊唁并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首长送别。学谦同志一生为人低调，在党内外备受尊重。他为人师表，是我们晚辈为人做事的楷模。

平易近人的领导

学谦同志1982年4月从中联部到外交部任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同年11月，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除司机外，他没带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来。

1983年1月，组织上将我从外交部新闻司调任吴学谦同志秘书。从此，有幸在他的直接关怀、教诲下工作达八年之久。我第一次见到学谦同志是在当年1月22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到首都机场迎接他出访非洲归来。我简单自我介绍后，他握着我的手只说一句话："听人介绍过你，明天办公室见。"第二天，他翻阅急电后找我来，问我在他这里工作有何想法？我说："我从未当过秘书，担心当不好。"他说："我也从来没想过当部长。没关系，慢慢熟悉。让我们在一起工作吧。"在随后相处的日子里，他对外宾提到我时总说："这是我的同事。"人如其名，让我深感到这位首长谦和、可亲的品格。

学谦同志从1938年10月起就投身革命工作，曾是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学谦同志解放后历任团中央国际部部长、中联部副部长、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兼外长、副

总理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还任过两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从不以“老革命”自居，总是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偶尔被人问起他的历史，学谦同志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其中为革命事业付出多少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对说大话、空话、套话很反感。在外交部，每次开部党委会，他总是希望与会者发言时“态度明确了然，不要拖泥带水”。他自己以身作则，十分善于归纳会议要点，这让我（兼部党委秘书）在会后整理党委会《会议纪要》容易很多。

学谦同志就任外长、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足迹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在外交活动中，他尊重对方，不尚空谈，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他该说话时一定会说到位，但从不傲慢。无论对发展中的国家，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政要，他一概诚恳待人，平等视之，其实事求是的作风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交了很多国际朋友。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后任格鲁吉亚总统）、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和铃木善幸、泰国外长西堤等外国领导人都与他有良好的友谊。泰中友协会长、泰国前外长、总理差猜诚邀学谦同志到他家茶叙。1988年学谦同志访问英国时，杰弗里·豪曾专门请他到郊外的官邸做客。

勤俭朴素刻己奉公

1986年，学谦同志一家搬进中联部的住宅区后，就再没换过，也不愿把这所老房子装修装修。他怕花国家的钱，说“这个房子住得蛮好嘛！”学谦同志辞世后，很多人去他家里探望，都觉得他家的房子和普通人家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加简朴，没有豪华的家具。有人将他简朴家居的照片发到网上，感动了万千网友。

学谦同志历来生活简朴。他任外长出访期间，夏天常穿的西服是由50年代在团中央工作时穿过的衣服改制的。1985年，学谦同志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行李在托运时丢失了。我找到航空公司查询，航空公司接待人员说：“托运时皮箱散开了，我们看里边除了两件半新不旧的内衣，也没什么值钱东西，所以就没急

运送去。”这个解释让我啼笑皆非。

心中只有工作

为党、为国家“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是学谦同志终生的信条。他白天会见外宾、出席各种会议、找分管的部、司领导谈工作，下班后还要把《参考资料》等材料带回家继续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平时，可去可不去的活动，一定不去；可走可不走的地方，肯定不走。他常说，时间很有限，还是多留些给工作好。

“文革”期间，学谦同志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入狱近三年，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等病症，需要长期服药。但他每天仍超负荷工作。1984 年 9 月，学谦同志率团出席第 39 届联大会议。9 月 25 日，他一整天几乎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小会议室度过，先后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安倍、埃及外长马吉德等 12 位外长。为了准备这一天连续的会见，他在前一天晚间会见两位来自欧洲的外长后就“挑灯夜战”，翻阅有关资料和“谈话参考”，拟出会见提纲。第二天又起了个大早，亲自写出会见谈话要点。会晤外宾期间，我见他满脸通红，生怕出问题，劝他稍事休息。他只在会见间隙时喝点水，闭闭眼，又打起精神继续会见下一位客人。

学谦同志始终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对台工作“八项主张”，正确判断台湾问题总体形势，指导对台工作。1988 年 12 月 31 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十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学谦同志要出席并讲话。行前，他在中南海办公室突然脸色苍白，上吐下泻，衣裤全是脏物。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同北京医院联系，大夫要求马上送去急救。他却执意坚持说：“不行，我得去大会堂！”我们深知这场活动的重要性，且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便马上让他换上我们工作人员的西服、领带赶去会场。他强忍病痛，发表讲话。散会后，在我们催促下他才去北京医院就诊。急诊大夫火了，说再晚点送来，后果不堪设想。他只好被迫住院治疗，住院期间还老惦记着工作。

任人唯贤的外长

学谦同志奉派到外交部工作时，我国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文革”的一些后遗症还未全部消除，干部关系尚未理顺。学谦同志在部党组（后改为党委）会上指出，我们应当切实贯彻中央拨乱反正指示，在外交部强调“五湖四海”，不搞亲疏。他说：“我们要‘海纳百川’嘛！不管原先来自部队、党的地下组织，还是从地方、高等院校调来的干部，只要忠诚于党的外交事业、德才兼备的同志都要充分尊重信任，要敢于、善于团结他们一起工作。”学谦同志说到做到，任人唯贤，从不搞小圈子。

学谦同志在干部使用上十分重视老同志的宝贵经验，积极让他们发挥作用。那时，有些领导干部还未“解放”，他多次要求组织干部部门抓紧工作，让一些尚未恢复工作但历史清楚、经验丰富的同志早日投入业务工作。至今，有些离退休的大使回忆起他们当时重上外交第一线的情形，心情还很激动。

学谦同志在外交部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提拔。他认为，这是一项对我们外交事业来说带有战略性、长期性的任务。有的年轻翻译，因为随行出访表现突出，他考察后就会向党委推荐，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总鼓励年轻同志积极参与业务工作。会见外宾前后，只要有机会就同他们促膝交谈，让他们大胆上岗。他对干部司负责同志说：要注意重点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年轻干部，对干部的使用不要搞“论资排辈”。他说，不能老让杨洁篪、周文重、李金章、翟隽、施燕华、王弄荃和邹明榕等同志长期当“翻译”，要让他们到第一线去锻炼、培养，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当年的“高翻”逐步成为今天外交部领导和外交战线的骨干，与学谦同志等当年部领导的关怀是不分开的。

关心下属和下一代

学谦同志对周围的同志尤其是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工作乃至生活都予以关怀。他为我们树立了做人做事的表率。有时，我们对某些国际问题甚至国内发生的问题感到迷惑，他总是耐心地

指导我们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求解，而且还常使用“不知这样看对不对”的谦词，让我们口服心服。在日常生活中，他没有特殊的要求，几乎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两样。1983 年底，他陪同耀邦同志出访日本临行前夕，我们办公室一位随行同志的孩子脚受伤，他对此非常关切，并当机立断让我替换，我便以这位同事的名字随访一周。1987 年 9 月底，我的年仅 30 岁的小弟因公出差沈阳不幸病逝，他得悉后亲切地安慰我，并特批我前往料理后事。他嘱咐我说：“人死后无法复生，要面对现实，勇于应对，安排好家庭老少日后生活。”几年后，我出国在外常驻，学谦同志出差路过我老家时还让办公室一同事去看望我年迈的母亲，令她格外感动。有时过春节，他和老伴毕玲大姐还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几位身边工作人员去餐叙。大家相聚谈笑风生，犹如一家人。……这类发生在办公室内的点滴小事，每当我们忆起，都深感到首长的关爱至深，非言语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平日在交谈中，学谦同志常说：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发展，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于年轻一代，国家要创造各种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茁壮成长。在学谦同志的主持下，外交部党委曾专门开过几次会议，听取外交学院领导的工作汇报，并对办学方针和具体问题作出指示。他说，外交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要从各方面加大办学力度，大力培养、造就外交人才。学谦同志曾两次出席外交学院校庆、开学典礼并致辞，对外交事业的莘莘学子寄予厚望。

学谦同志心里还常想着孩子们，说要让他们生活尽可能好一些，将来好报效祖国。1983 年 11 月他以国务委员兼外长身份陪同胡耀邦总书记出访日本。30 日下午，在圆满结束访问回北京的专机上，耀邦同志问：“学谦，日本朋友送给我们的奶粉，你说该怎么办？”学谦同志不假思索地回答：“就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吧。”耀邦同志很赞成地说：“好，给娃娃们喝。咱们想到一起了！”两位首长都有孙子，但他们不约而同想到的是幼儿园里的娃娃们。后来，这些奶粉分别送给了中办幼儿园和外交部的西郊、东郊两个

幼儿园。这件小事至今已过25年，我想，当年曾喝过“胡爷爷”、“吴爷爷”转赠奶粉的幼儿，现长大成为中青年，得知后一定会有许多感慨……

幽默显睿智

学谦同志办事从来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却会给不知情者误有“刻板冷漠”的印象。其实，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深知他是个和蔼可亲、有血有肉的长者。他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说有笑，不乏幽默风趣的言谈，从中凸现出其人品和深刻的人生之道。我仅举几例。

学谦同志1988年4月到中南海办公。有一次，外交部同志来汇报工作，开头称他：“吴部长，您好！”马上又改口：“吴副总理好！”只听老首长握着他的手让坐说：“就叫我‘老吴’好。”让来人不显得尴尬。接着，就谈起工作来。事后，他对我们说：“在中联部工作时，大家都叫他‘老吴’，海里（指中南海）大家以名字加同志互称，这样显出平等，相处也亲切、自然。不管职位的升迁变化，我们都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人，志同道合嘛！除非在正式场合，大家不要以职务相称，还是用‘同志’称谓好。”

提起称呼，我想起学谦同志说过他经历过的往事。有一回他到某地考察调研，见面时，有人介绍与会的有他们局的所有领导：付局长、郑局长、贾局长，还有一位局长助理。这些领导都讲了话。学谦同志事后笑着对我说：“到头来，我都搞不清谁是正局长、谁是副局长，大概都是真局长。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局长助理，他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我看了一眼，他大名下的现职务之后有个括弧，上面写着‘副局长级’。我明白他生怕人家对他降低身价，另眼看待。可见某些人对官职看得很重，受‘官本位’的影响太深！”

20世纪80年代初，我随学谦同志到广东和四个经济特区调研考察。在某县，他想同当地农民交谈。在地方同志的盛情安排下，步入一家农户。只见墙上都刷得粉白，皮质沙发前的茶几红布上摆放一大堆糕点，几大盘花生、金橘等水果。墙角大桌还置放一台大电视机。入座后，学谦同志笑道：“招待会的食品很丰盛呀！”当他问起“户主”在这个乡镇生活得怎样，今后有何打算？

那个穿着入时的“农民”眼望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背出：“自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乡镇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面貌日新月异，我们家和周围农户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回住地后，学谦同志说：“这样的交谈真没意思。地方同志没搞错吧，把内宾当成了外宾，就是向外宾介绍也要实事求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能背诵讲话稿呀！再说，该让我们随便走走看看多好，可以自由同农民聊聊，用不着由省、市、地、县负责同志‘四陪’。”当地同志本打算第二天再找一家农户，组织一场报告会“请首长作指示”，学谦同志以“我是来学习考察的”而拒绝这类“安排”。

学谦同志工作繁忙，要处理许多案件、审阅许多报告。他对其中一些长篇文书尤其是请示件充满政治口号或大段引用中央文件或领导同志讲话，总是“穿靴戴帽、空洞无物、不知所云”，很反感，说如同戏台上英雄人物脸谱化，每篇文章都千篇一律有什么意思！这样的文风应纠正！后来，我们办公室见到类似请示件只挑出中间可参考的部分让他审读。

以身作则严谨细致

长期的革命生涯，使学谦同志养成了工作勤奋、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作风。他在对有关问题作决定时，总要同周围相关同志商议，深思熟虑后才决定。

文如其人，他写文章也是反复核实材料，一再推敲，绝无不实之词。他写的《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一文，被认为是我党历史上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20 世纪 60 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政党和其他进步组织都渴望了解中国，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交往关系。学谦同志遵照毛主席“需要出一些简单明了的非洲方面的书”的指示，主持筹建了亚非研究所，参与组织编写了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非洲手册》，周恩来总理对该书给予高度肯定与好评。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周总理出访亚非欧 14 国中的 10 个非洲国家时就带着这本书。

在处理外交文书时，学谦同志更是慎之又慎。从内容到标题、标点都仔细审改，认真把关。1984 年 9 月 26 日，学谦同志以中国

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兼外长的身份出席第39届联大，并发表讲话。行前，他为确定演讲主旨，反复研读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和近两年小平同志与外宾的谈话记录，领会他老人家的理论思想。他几次分头召开外交部地区业务司负责同志参加形势务虚会、讨论会，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利用本届联大讲坛公开深入阐述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他同拟稿的同志讨论多次，并亲自修改、撰写有关段落。由于准备充分，在此次联大上的发言非常成功，受到与会者和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事后，学谦同志对我们说：要利用联大这个世界瞩目的讲坛宣传中国的立场观点，每年开一次会，不可能什么都说，确定主题、突出重点很关键。这篇讲话让人感到有新意，就在于小平同志对当今世界的精辟判断，各国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在工作中就是要有“认真”二字，稿子不要怕改，越改才会越成熟。

注重调研求真务实

了解学谦同志的人都说，他是个调查研究的高手。1943年，华中局撤销江苏省委，成立城工部，他就在部内担任调查研究工作。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国际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一直很重视调研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指导业务工作的思路。

学谦同志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每日要闻》、《新情况》(特字号)等。为了让部、司领导能及早得知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世界大事，每天一上班，他就让新闻司值夜班看电传的同志到会议室向大家报告要闻。学谦、其琛等领导同志有时利用这个机会当场研究、布置上呈材料。当年参与报告新闻的同志每当忆及这段往事总感到这是部领导给予的难得的锻炼机会，十分有助于他们提高政治敏感性、全局观念和综合归纳能力。

1988年4月，学谦同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在分管外事、侨务、港澳台等事务中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仅以外事而言，他多次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钱永年和其他负责同志，进行国

际形势分析和外交方针的研究，明确提出我国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他对外办同志草拟的材料一再斟酌，多次修改，定稿后上呈并作为1989年中央文件下发。这份文件还首次提出“全球化”的问题。学谦同志还就南海、世界石油等调研题目，布置国务院外办召集有关部委同志开会研讨。不少同志说，学谦同志提出的指导意见总要经过深思熟虑，对文件稿的修改改到点子上。参与起草的同志从中受益匪浅。

学谦同志出差在外总要随身带着小收音机，经常边吃早餐边听国际新闻。他说，只有掌握世界最新动态，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孤陋寡闻，就会成为新闻的“聋子”、“瞎子”，既不能同外界沟通，也不能很好地及时制定活动方略。学谦同志要求搞调研的同志一定要按毛主席对调研的有关论述去做，注意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以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为学习的榜样，搞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多次鼓励和支持外交部主管调研的负责同志多召开小型的国际形势务虚会、中美、中苏关系研讨会等，加大调研力度。

每当学谦同志在文电中看到好的调研成品，都很高兴，常向有关同志推荐。例如，1986年，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报回《一定要让雄鸡在尼日利亚长鸣》一文。报文不长，言之有物，标题也鲜活。学谦同志看后欣喜地说：“多好的文章呀！文中提到的‘雄鸡牌’蚊香既有助于驱蚊，又让我国企业获益，这个传统市场不能让外国挤占。”他常说，优秀的调研成品不在于以长取胜，关键是要有确凿的材料，明晰问题所在，提出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1988年4月，学谦同志担任副总理后，还分管旅游工作。他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在调研的基础上，从我国国情出发，首次提出了加强旅游业的软环境建设，强调要提高服务质量，积极稳妥地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

1991年初，我奉派出国工作。行将离开时，老首长给我鼓劲，让我到外交第一线好好干。学谦同志对我说：“今天已是信息时代，各方消息都可通过上网和其他媒体迅速获得，但尽快追踪国

际、地区形势，刻苦努力抓好调研、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不能丢！”我离开“吴办”在驻外使馆工作了近十年，每次休假回国时去看望他，老首长总要了解“前方情况”，并一再嘱咐我务必重视调研工作。1997年底，学谦同志对我说：现在正在筹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1999年5月成立后他任首任会长)，你以后回来要支持和参与这方面的工作。2000年7月我办理退休至今，就来到这个基金会(任副理事长)，竭尽绵薄之力。

学谦同志是我们这些他身边工作人员敬重的老首长，也是我们难以忘怀的“良师益友”。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让我们学习终生。他永在我心中铭记！我谨写此文以表达对一生作风正派、为人诚恳、平和朴实的学谦同志的深情追忆和无限怀念！

缅怀吴学谦
在对外工作中的亲切教诲

· 唐龙彬 ·

当我全神贯注地仔细翻阅《吴学谦》画册时，一帧非常珍贵的照片显示在我眼前，使我深深回顾起学谦同志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历历在目，久久不能消失。那是1986年10月的一天上午，邓小平同志陪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沅斋院内散步，散步后设宴款待女王等主要官员，当时学谦等陪同。那天阳光灿烂，秋高气爽。养沅斋院内的各种迷人鲜花盛开，秀丽芳香。小平和学谦等在庭院里迎候女王。小平对女王说："请到您很高兴，请接受一位老人对您的热烈欢迎和亲切问候。"并说："随着香港问题成功地解决，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努力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女王连连微笑点头。小平专门向女王介绍了学谦，他说："吴学谦外长，你们都很熟悉了，与你们的外长那就更熟悉了。他要全程陪同女王陛下在中国的访问，您有什么事尽管找他。"小平的会见和宴请把这次访问推向最高潮。女王平日说话不多，但这天显得格外高兴、活跃随便、谈笑风生，时而称赞中国烹调菜肴，时而谈及英国的雨水雾天。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着亲切友好的气氛。

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世袭的国家元首、司法首脑、联合王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国教的世俗领袖，女王虽不管理国家事务，国家的大政方针由内阁政府制定，但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在英国内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英各阶层人民群众中享有

很高威望和影响，博得英国人民的爱戴。同时她也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7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在英联邦内颇有影响。当时，女王已先后出访了100多个国家，每到一国，均受到隆重热烈的破格接待。在欧洲君主国家中，英国又是最讲究王室仪典排场和群众场面的国家。

这次是英国历史上君主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也是新中国成立37年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更是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发表联合声明后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做好女王访华接待工作，对进一步发展中英两国关系和促进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的顺利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党中央和政府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要求以隆重热烈、高规格的礼遇接待女王一行。专门指定学谦与其夫人毕玲全程陪同。我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管礼宾司的工作，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具体筹备和接待工作。

学谦自始至终认真贯彻和落实党中央的接待方针。以严谨踏实、认真仔细的一贯作风，亲自督办各项工作的实施。学谦深感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艰巨性，肩负重任。他亲自指挥和落实各项工作，时而到接待班子办公室听取大家汇报并及时提出要求。他强调说：我们自1985年以来，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对外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结合我国国情，在礼宾礼遇接待工作上做了一些重要改革和简化，如不过分讲究仪典、排场和群众场面，反对铺张浪费，力求务实有效等。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但考虑到英女王这位特殊人物和她的特殊地位，在英国国内和国外的重要影响，且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而现在还有待于今后的顺利实施。因此，我们在接待工作上要有所突破、要有新意、要有开拓创新精神，不能束缚在一些“惯例”上。礼宾、礼节要为政治服务，力求这次访问取得更为圆满的成功。经过多次认真研究并报中央批准，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的特殊安排：

（一）组织群众热烈欢迎

我们破例安排在女王抵达北京和到西安、昆明、上海、广州各

城市参观访问时，每地均组织近万名身着鲜艳服装、有各少数民族参加的青少年，在女王车队经过的主要干道，挥动彩旗、国旗、鲜花和气球，载歌载舞地热烈欢迎。尤其在抵达西安时，正下着蒙蒙细雨，车队在经过市中心钟楼时沿途欢迎群众放出500只吉祥可爱的鸽子，顿时只听到成群鸽子在天空飞翔的噼噼啪啪声。当时女王激动万分，吩咐司机停下车，她站立在敞篷车内热烈地向群众挥动双手致意，并不停地抬头凝视着自由飞翔在天空的活泼可爱的鸽子。她向我陪同领导人表示："这样激动人心的震撼场面使她实在太感动了。"在18日晚女王一行在结束为期一周访问乘皇家游艇伊丽莎白号离开广州黄埔新港时，在码头上举行了欢送女王的隆重仪式。学谦和毕玲同志、叶选平省长和夫人等前往码头送行。当天码头上张灯结彩，三千多名群众敲锣打鼓和挥动花束、彩带。乐队奏中、英两国乐曲。由一百多人组成的舞龙队举着"巨龙"朝着女王乘坐的游艇生龙活虎地起舞。女王满脸笑容地站立在游艇甲板上，依依不舍地、不停地向欢送人员热情挥手告别。之后，游艇在锣鼓、鞭炮声中起锚，徐徐驶离黄埔港。那时，停泊在码头周围的中、英两国以及英联邦国的船舶都挂满旗、开满灯以示热烈欢送。如此壮观动人的欢送场面是我国前所少有的。

（二）给予高规格、破例的接待

我们安排了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分别亲切会见并宴请女王等主要官员；李先念主席举行隆重庄严的欢迎仪式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隆重盛大的欢迎国宴。在学谦的竭力提议下，李主席和夫人林佳楣还破例应邀专程飞往上海，参加女王于15日晚，在上海港停泊的皇家游艇伊丽莎白号上举行的隆重答谢宴会，有学谦和毕玲同志以及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等70余人出席。那晚，游艇打扮得更加光彩夺目、灯火辉煌。宴会厅布置得富丽堂皇，水晶玻璃宫灯悬挂在大厅中央，颇有在伦敦白金汉宫的雄姿风格。这是一次英方精心筹办的隆重宴会，宴会餐具、名酒、名烟和食品都是专从英国空运到上海的。餐厅服务员均为训练有素、经

验丰富、身着王宫礼服的人员。席间还安排英国皇家乐队演奏中、英乐曲。女王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她说："亲王和她十分感谢中方为这次访问所做出的令人钦佩的安排。这次访问给他们留下了长久的记忆。"李主席说："女王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必将对中、英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接待工作上，学谦在重点强调要贯彻热情友好、以礼相待精神的同时，还要我们贯彻好不卑不亢精神。按照英王宫的规定，女王举行重大宴请时，应邀出席的来宾，除主要国家领导人外，一般要求来宾以单腿半下跪姿态亲吻女王戴有白色长手套的右手。学谦知悉后，要我们交涉取消这种做法。他说："英方要求别的国家来宾这样做，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而我们人员还是按习惯握手致贺。"

在我方人员与英方先遣人员商谈日程时，英方多次希望我方允许其两艘英国卫舰随皇家游艇在黄浦江上航行，同时为在皇家游艇上参加座谈的中、英经济企业界人士举行军事表演。英方强调说：这是一种传统做法。女王在访问一些欧洲国家时也有此安排。经请示报告学谦同志，以皇家游艇在我内河航行，安全工作应由我方负责为由，婉拒了对方要求，并表示，英军舰在我内河作军事表演是不适宜的。另外，英方还提出游艇停泊在上海港时由英方海军士兵身着军装持枪站岗。学谦指出：这不能同意。最后，经交涉英方同意由我国军队仪仗营派得力干部站岗值勤。

这次访问获得卓越成果，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表扬，而学谦同志在这次任务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学谦在广州向女王转达李先念的口信时说："女王这次访问在中、英两国友好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必将对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女王在离开广州回国前专门在其饭店住地接见了中方主要陪同人员，表示诚挚谢意。她特别感谢学谦和毕玲同志全程陪同，并对学谦和中方人员所做的亲切友好、细致周到的安排使她度过非常愉快的一周，表示由衷感谢。女王还

给我们一一赠送了有她本人亲笔签名的半身放大相片。最后女王还亲自交给学谦转李先念主席的感谢信，信中写道：这次访问令人心旷神怡，访问标志着英中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热烈友好的新水平。

在我写完这篇往年忆事时，我内心对学谦同志的敬佩和感激之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在外交部和全国政协工作期间，正是学谦先后担任国务委员兼外长、副总理、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兼管外事）的时候，因此，经常有机会亲眼目睹他在外事工作中的出色成就和亲耳聆听他的真诚教诲。这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记得在1986年1月，我从礼宾司司长被提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的领导岗位时，他代表部党委亲自找我谈话。他说：这是党对你的信任，也是外交工作需要，你要谦虚谨慎，要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要有充分信心把工作做好。这些话对我是最大的激励和鞭策。

学谦是我们的老领导、好领导，他长期不知疲倦、勤勤恳恳和默默无闻地奋斗在外交第一战线上，为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身居领导高职，但平易近人，对群众真诚热情，关心干部的成长和培养。他在召集有关研讨外事会议时，为了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总要一般主管、熟悉业务的干部参加。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的晚辈，每次见到他时，均习惯叫他学谦同志，不加任何职称（这也是他一向竭力提倡的），我们把他看做和蔼可亲的领导，和他交谈时，从不感到紧张、拘束，因而也能畅所欲言。他任人唯贤，严格要求自己，对同志们的缺点毛病能及时真诚指出。记得1990年年初，我从瑞典回国述职时，向他汇报了使馆工作，他在肯定使馆工作成绩后，对我对待某外交官的无理要求，未能及时提出批评之事严厉向我指出：对干部是要很好关心爱护，但不能迁就，这样只会害了他，也影响了工作。这次批评使我一生难以忘却。学谦平日生活简朴，衣着整洁、得体、大方，注意对外形象和仪表，他也要求我们这样做。在外事工作上他经常提醒我们不要铺张浪费，要节约外事开支。在我陪同他出访下榻在豪华饭店时，他总是要到代表团随行人员的住房一一问

寒问暖，因国外情况复杂，提醒我们晚上睡觉前要锁好房门，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健康。每逢代表团到饭店餐厅自费用餐时，他从不点高级昂贵的名菜名酒，也不让驻外使领馆给他送菜送饭。一天紧张活动回到住房后还自己洗烫衬衣和内衣内裤，从不送外花费，也不允许警卫、秘书代劳。他酷爱学习，在出访期间，晚上我们去见他时，总发现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翻阅中、英文报刊，或收看电视新闻。

学谦在对外交往中高瞻远瞩，与时俱进，富有创新开拓精神。他极力鼓励外事人员，尤其是驻外使馆主要外交官和外交部的司局级干部要走出去，多交朋友，可到外国朋友家里做客，或到高尔夫球场一块打球，以利联络感情。如自己家里条件许可，也可邀请外宾到家里做客，以增添个人之间的情感，他自己就交了不少知名的外国朋友。

以上写了这些往事，以作为我对老领导、好领导学谦同志的深切怀念，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优秀品德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2008 年 9 月）

陪吴外长秘鲁“历险”

· 朱祥忠 ·

1987年6月，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访问了肯尼亚、科特迪瓦等非洲七国后，经停马德里，去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三国访问。

我当时作为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简称美大司）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赶到马德里同吴外长会合，陪同前往访问。秘鲁是吴外长拉美之行的第一站，也是我国外长第一次访问秘鲁，因此双方都很重视。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我至今记忆犹新。

吴外长的随行人员除我以外，还有他的秘书黄桂芳（后为我国驻菲律宾等国大使）、美大司处长张沙鹰（后为我国驻阿根廷等国大使）和西班牙文翻译李金章（现为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等共九人。我们于6月7日凌晨2点50分，乘伊比利亚923号航班D10型飞机，从马德里起飞，经过15个多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中午11点24分平安抵达利马。

利马是世界闻名的“不雨城”。由于安第斯山的阻隔，来自大西洋的湿空气不能与西部上空冷空气相遇，致使该地区终年少雨。当地许多人不知雨伞和雨鞋为何物，更没有见过电闪雷鸣。其时秘鲁已进入冬季，气候更加潮湿、多雾，和我国南方的黄梅天相似。但并不冷，气温在15℃—19℃之间，穿一套西服即可。

我们一下飞机就发现有些不正常的情况。飞机不是按惯例停在利马国际机场，而是停在了附近的空军机场。秘鲁外长瓦格纳迎接吴外长时的神情也有些紧张，匆匆忙忙地把吴外长接走，随行的只有翻译李金章，而安排我国驻秘鲁大使杨迈乘坐本应

由吴外长乘坐的悬挂秘中两国国旗的主车，我们几个人则跟随其后。大家都没有进贵宾室，直接从机场出发。

更为奇怪的是，秘方准备的开道车和护卫车，没有跟随吴外长，而是跟随我们的车队，这时，我们已意识到是在充当替身了。

我们的车队前有开道车，后有护卫车，浩浩荡荡地开进利马市区，只见每个街口都布置了军用坦克和装甲车，沿途军警都是荷枪实弹，气氛非常紧张。到了市中心，我们看见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在谢拉顿旅馆门前。这是我们代表团原定下榻的地方，但车队经过旅馆门口继续前进。

我问司机，我们究竟住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外交部官员只告诉我跟着开道车走。"车队又绕了一大圈，却开进了海军俱乐部。我们进去一看，吴外长早已端坐在客厅里。他笑着问我们："你们怎么这样晚才到？"大家听了也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原来吴外长离开飞机场比我们还早，又是走的近道，当然比我们早到了。

这时杨大使才向我们解释说，秘方和我们使馆都先后得到情报，说搞恐怖活动的秘反政府武装组织"光辉道路"，准备制造一起国际事件，把吴外长一行作为"行动目标"。

因此秘方提出从吴外长的安全考虑，代表团改住海军俱乐部。但保留谢拉顿旅馆住房，访问日程也全部改变。所有这些，都不对外宣布，内紧外松。使馆把这一情况报告国内后，代表团已在从马德里飞往利马的飞机上了，国内来不及通知代表团，所以我们一直蒙在鼓里。

海军俱乐部实际上是军官们度假休息的地方，接近利马郊区，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四周重兵把守，戒备森严。院内无高楼大厦，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花草树木较多，整齐清洁。环境优雅安静，服务也很周到，比住在旅馆里舒服多了。这么大的一个院子被专门用来接待中国代表团，秘鲁军官暂停到这里度假休息。这不正是中、秘友谊的一个生动体现吗！

当地新闻记者到处找中国代表团采访，找不到。于是，第二

天利马报纸发表消息说："中国外长失踪了。"

吴外长在秘鲁访问的日程都是临时安排的，绝对保密，连代表团成员都是在出发时才知道去哪儿。

同时，到一个地点去也不是走正常路线，而是绕道前往，其中包括去总统府和外交部。有些公众活动被取消或改变了地点。例如，利马市政府拟举行的欢迎吴外长的仪式，改在军人俱乐部举行，华侨会馆原准备欢迎吴外长的盛大宴会被取消，改由吴外长在中国大使馆接见旅秘侨领。

吴外长风趣地说："没想到，革命后几十年，还到秘鲁来搞地下活动。"

8日，吴外长和瓦格纳外长在秘鲁外交部会议厅进行了工作会谈。瓦格纳对吴外长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他说，秘鲁现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是：民族主义、拉美一体化、反帝和不结盟。秘鲁高度评价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国际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感谢中国对拉美国家特别是秘鲁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秘鲁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祖国即解决台湾问题的正义立场；认为秘、中两国内外政策有广泛而深刻的一致，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稳固基础。

吴外长首先表示感谢瓦格纳外长热情友好的讲话。他说，中国和秘鲁都是文明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虽然地处东西两半球，相距遥远，但友谊的纽带把我们紧密相连。在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发展本国经济的斗争中，一向互相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近几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增进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政府愿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同秘鲁一道，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做出不懈的努力。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两国外交部之间不定期的、不同级别的磋商制度，通过各自大使或派有关官员相互通报自己国家的情况，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

9日，吴外长先后拜会了部长会议主席阿尔瓦、第一副总统桑切斯和总统加西亚等秘鲁主要领导人，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

阿尔瓦曾于1986年访华，他是中国的老朋友了。他说，中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印象。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发展变化如此之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特别感谢中国多年来对秘鲁的慷慨援助，特别是中国向秘鲁赠送一批手扶拖拉机和贷款并派技术人员帮助普诺省打井灌溉，为秘鲁贫困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表示，秘鲁在矿业和渔业方面资源十分丰富，希望在这两个领域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

吴外长表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力量有限，但将尽力为秘鲁的建设发展做出贡献，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中国愿意在矿业、渔业同秘鲁进行广泛合作，双方可以通过有关单位进一步探讨合作的途径和方式。

桑切斯是秘鲁有名的政治家，执政的阿普拉党的元老，双目失明多年，还是坚持抽时间会见吴外长。他脑子非常清楚，记忆力极强，每天有专人为他读报，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盲人副总统。他对中国十分友好。他对吴外长说，他很喜欢中国的古老文化，赞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说，早想去中国看看，但因双目失明，未能去成，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国的土地上走一走，摸一摸，以了心愿。

吴外长表示，中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他敞开着，欢迎他到中国访问。但他已于几年前去世，未能如愿，实为憾事。

加西亚总统在同吴学谦外长会见时说，秘鲁经济是附属性的，工业大都集中在大城市，政府想使商品经济有计划地进行，恢复民族特性，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但要付出很大的社会和政治代价。资产阶级利用新闻媒介和广告，宣传高消费等西方生活习惯和违背社会发展水平、实际上难以得到的东西。秘鲁社会改革基础应在农村，首先要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在近距离的观察中，加西亚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魁梧，英

俊潇洒，反应敏锐，充满活力。他于1985年当选总统时只有36岁，是拉美国家最年轻的总统。他对中国十分友好。加西亚在1984年曾率阿普拉党代表团访华，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给年轻的加西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

1985年他上台执政之初，就发出指示，秘鲁政府官员不得接受台湾当局的访问邀请，不得同台湾签署任何协议，不得接受台湾授予的勋章或其他带有官方性质的荣誉，也不得接受台在秘鲁设立的民间机构——“远东贸易中心”的宴请，不承认其有任何“外交特权”。后来，台湾当局还试图通过金钱收买同秘鲁建立“领事关系”和在利马建立“中央通讯社”分社，也均被秘鲁政府拒绝。

2004年1月，加西亚又以阿普党主席身份访华。他说，时隔20年再次访华，我看到了中国取得的惊人成就，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展现出来的卓越领导能力。阿普拉党重视中国的发展经验，愿进一步加强两党之间的密切交往与合作，成为中国与秘鲁和拉丁美洲的友谊与合作的桥梁。他回国后在报刊上发表长文，高度赞扬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中国奇迹”与“当年伟大的政治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的谨慎和智慧，没有重蹈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时期的错误”，而是将“高效政体”与“自由市场”进行了成功的组合。他还赞扬“中国是拉美的榜样”。

2006年6月，加西亚再次当选秘鲁总统。他表示在其第二次执政期间，将进一步推动秘、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

在会谈中，秘方还提出希望中方在其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谴责“光辉道路”组织的问题。10日上午，吴外长指派我同秘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

“光辉道路”组织自称“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西方称为“毛主义”，实际上其言行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1976年我国人民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实

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该组织认为“中国变修了”，“复辟资本主义了”，因此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多次向我驻秘鲁使馆投掷炸弹。起初还有人以为该组织同中国有某种联系，但他们的反华行动对此做出了最好的澄清。该组织不仅反对中国，反对美国和苏联，而且反对古巴和朝鲜等国，到处树敌。

1988年至1990年我在秘鲁工作期间，中国使馆又被该组织炸了两次，幸好无人员伤亡。后来该组织主要领导成员被秘鲁政府逮捕，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人数大为减少，活动基本停止了。

我向秘方解释说，正如贵方所知，中国同该组织无任何联系，“光辉道路”问题毕竟是秘内部事务，中方不便说三道四。秘方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在新闻公报中作如下表述：“在谈到恐怖主义问题时，瓦格纳外长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世界各地出现的这种不健康的暴力行为。吴外长表示，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各国内部事务可以由国内政策予以解决。”

11日早上，大家正忙着整理东西，准备去厄瓜多尔访问。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虚惊。

我在收拾行李时，发现公文包不见了。很奇怪，我记得昨晚还检查了一下文件，一件不少，然后把文件放在一个安全地方，把门锁好，才躺下睡觉，夜里无外人来过，文件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公文包里装有吴外长访问秘鲁、厄瓜多尔、智利三国的有关文件和资料，如果找不到，将是一起重大失密事件。这在外交工作中是最忌讳的一件事。我从事外交工作几十年，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真倒霉，今天终于发生了。个人受批评、挨处分都是小事，而国家机密遭受损失是大事，是无法弥补的。

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到处找，就是找不到文件包，我不得不向吴外长作了汇报。吴外长当时没有批评我，而是很镇静地对我说：“不要着急，再仔细找找。”并叫他的警卫孙起顺同志帮我找。

还是小孙有经验，他到我房间检查了一会儿，就从我的枕头

下面把文件包找出来了。

这时我才想起昨晚为了安全起见，把文件包放在了枕头下面，第二天早上不知怎么就想不起来了。陪同领导人出访的外交部地区司的同志是很辛苦的，白天要参加会谈、做记录和参加其他活动，晚上别人休息时我们还要到中国使馆去整理记录，把当天情况报告国内，往往要搞到深夜两三点钟，如果会谈内容多而且重要，则需要更长时间。第二天还要照常参加各项活动，睡眠时间很少。这次发生的一场虚惊，正是由于访问期间工作紧张所致。

好了，文件找到了，我感到如同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落了地，由衷地感谢孙起顺同志。这时出发时间也到了。

尽管当时利马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吴外长不得不进行“地下活动”，但访问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

（此文原载2006年10月23日《北京青年报》）

追忆中国前外长吴学谦

· 陈有为 ·

中国前外交部长吴学谦因病在4月4日离开人世。吴学谦是新中国第六任外长。1982年4月，在中共新任总书记胡耀邦的人事布局中，他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调任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准备接任外交部长。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吴学谦先后由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升任国务院副总理。高度政策水平与长期工作经验，使他很快掌握国际风云变幻与中国外交全局，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与决策，积极稳妥地执行中央外交方针。

吴出访过50多个国家，多次参加联合国大会与各种重要国际会议。他在推行大国外交，联合第三世界，捍卫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中任劳任怨辛勤工作，为开拓中国外交局面，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后来他又兼管港澳事务与对台工作，正确判断形势，制定对台政策，参与中英谈判，审议香港基本法与中英联合声明，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大业，解决香港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任务繁重，夜以继日工作，他即使身在国外，仍然坚持晨跑，保持身心健康。但据他儿子、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吴晓镛近日回忆，吴学谦在出席香港回归仪式的日子里特别繁忙缺少休息，以至发病住院。因此，“从某个角度讲，他把健康献给了九七香港回归”。

吴学谦在任期间面临过最为复杂与困扰的局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处理极为错综复杂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和中共高层领

导变动。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里根在竞选总统时公然主张跟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关于美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谈判又遇到重大障碍。后来几经折中达成协议，中美政府首脑在1984—1985年内接连互访，使两国关系进入迅速发展的“蜜月期”。

然而，邓小平高瞻远瞩，坚持苏联必须撤除妨碍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要求，反对改变中美苏三边关系基本格局。他认为吴学谦不宜到莫斯科去与葛罗米柯会谈，因为外长在政治上代表国家，中苏关系此时不宜升级。

实际上，邓小平当时审视大局明察秋毫，认为勃列日涅夫改善中苏关系的表白，只是一种离间中美的姿态。中国若迎合，不但不能解除莫斯科的威胁，反而会影响正在顺利发展的中美关系。

最后，吴未去莫斯科访问，改在纽约联大期间与葛罗米柯会见。在微妙的大三角关系中，中国这一姿态表明无意与苏重修旧好，但如华盛顿对中国不善，则北京手里仍然握有“四两拨千斤”的牌可打。

吴学谦深思好学，为人光明磊落，处事低调，平等待人，从不在下属面前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令人感到亲切随和。特别是在任用干部问题上，他能够德才兼顾，不拘一格，对此我有深刻体会。我曾在中央党报长期工作过，成为业务尖子，参加了不少重要评论写作。20世纪80年代初被外交部借调参加起草外交文稿。

1984—1986年，我先后在吴学谦与钱其琛指导下三次参与起草联大发言稿与其他出访讲稿，多次作为随行人员出席联大。

（作者系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原文载于2008年4月17日《联合早报网》）

怀念敬重的领导学谦同志

· 詹世亮 ·

（一）

我对学谦同志敬慕已久。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我从学校调出参与上海青年报的筹建工作，就知道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我们进行学生运动的上海地下党学委书记名叫吴学谦。6月，我在青年团上海市工委成立大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留有深刻印象。那时，他出任团市工委秘书长，穿着一套整齐的西服，风度翩翩。不久，他被任命为团中央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随同他工作的李寿琪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寿琪英文比较好，活动能力也较强，我认为他随同学谦同志工作很合适。我对国际问题比较有兴趣，因此一直关心学谦同志的行踪和活动。

1954年9月我被调到外交部工作，并在万隆会议后，被派到叙利亚、埃及等阿拉伯国家长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那时学谦同志先后在团中央和中联部从事国际联络工作，他长期负责非洲及西亚地区的工作，经常风尘仆仆，到西亚、非洲国家访问，为促进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交往做出重要贡献。他曾多次经过开罗，因此我有机会同他直接接触，并就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些情况向他请教，深感他待人亲切，为人谦和，平易接近。一次我回国探亲时，曾去他家中拜访，并见到毕玲同志。毕玲同志是地下学生运动的一位老大姐，上海解放初期担任静安区党委宣传部长。我在团市工委宣传部工作时，曾同她有过接触，她对我非常友好，我对她也很尊重，这次在北京见面，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后来，在“文革”期间，得知学谦同志

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而他刚正不屈，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在感到难过的同时，也增添了对他的更深的敬佩之情。

1982年4月，我在驻伊拉克使馆工作时，听到学谦同志被调到外交部担任领导的消息，非常高兴。1983年9月我任期满回国，被派到刚恢复不久的政研室担任参赞，对学谦同志的工作作风和待人接物也有着更多直接的了解。

外交部在“文革”期间曾是“四人帮”竭力插手的重灾区，派系严重，干部思想也较混乱，少数人还对从外单位调进的学谦同志存在一定抵触情绪。而这时正值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外交任务十分繁重，单身赴任的学谦同志肩挑的任务确实相当艰巨。但他不畏困难，沉着冷静，紧紧依靠党中央的领导，团结广大外交干部，认真掌握政策，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秉公办事；同时从大局出发，既坚持原则，又宽宏大度，倡导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他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从而逐渐克服了“文革”遗留的后遗症，使外交干部进一步成为一支团结进取、富有战斗力的队伍，得到大家的好评与拥戴。

这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外关系的新发展，进行了外交战略大调整。学谦同志领导广大外交干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并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根据我的直接接触，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就国际上整体形势和重大问题，进行形势务虚会，与会者可就不同意见展开讨论，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他在工作中能与时俱进，勇于进取。为了新的形势的需要，他积极倡导开展经济外交。例如，他支持政研室出版内部刊物“外交与四化”，交流外交工作为四化服务的经验。政研室还举办了经济外交培训班，请一些专家、学者讲课，各司抽调干部轮流参加。

（二）

1991年年底我从驻埃及大使岗位上期满回国，不久被任命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从事对国际问题的综合性、战略性研究。1993年3月学谦同志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时，

他充分发挥了长期在外交战线的优势，不辞劳累，大力拓展人民政协和外交活动。1993 年 10 月他率团出席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第二次对话，我是代表团成员。以后，我每年都要随同他参加各种国际交往和研讨活动，直至 1998 年他卧床不起。这几年我受到他的直接教诲，终生难忘。

学谦同志参加的这些国际会议，都是高层次的活动。1995 年他应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的邀请出访由舒尔茨担任主席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咨询委员会（毕玲同志也应邀陪同前往）。1996 年和 1997 年，他应邀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第十四次、十五次年会。在十四次年会上，学谦同志是特邀贵宾，在十五次年会上他成为准会员。该理事会的发起人是日本前首相福田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成员都是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约 25 人，每年举行一次，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提出建议。在这个理事会中欧盟国家占多数，同时也包括五大洲一些代表，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参加者身份高，所谈的往往是带根本性的长远问题，而且理事会重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成员也大多对我国比较友好。学谦同志非常重视通过这一国际平台，结交朋友，宣传我国的政策观点，并了解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动向，认为应该积极参加。

在去加拿大途中，经上海转换飞机时，学谦同志突然感冒发烧。抵达温哥华后，他除了同意不去参加第二天到外省参观的活动外，待烧退后，他坚持参加所有安排。在学谦同志首次出席在温哥华举行的年会上，会议把他放在比较突出的地位，他虽是特邀贵宾，但在开幕式上把他同其他国家前领导人一起安排在主席台上，并在宴会安排在第一席。

这时正值苏联解体前后世界处在深刻变化的时期，我国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起世人注目。学谦同志在会上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积极介绍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我国的内外政策，澄清国际社会的某些误解，获得好评。他在温哥华会议上根据讨论主题作了三次发言，在中心发言中他谈了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接着发言

的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立即表示赞赏他的讲话。学谦同志的发言，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对有争议的问题，如全球道德标准问题，他主张采取各讲各的、平等探讨的态度。芬兰前总理在会后对学谦同志表示同意他讲话的基本精神。在荷兰诺德维克举行的理事会上，学谦同志谈国际形势时，着重澄清中国威胁论等观念。另外还就世界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交书面发言，反映均很好。

学谦同志还善于通过这些国际会议开展友好活动，密切了我们同一些国家前领导人的关系，增进了国家间的合作。如在行动理事会诺德维克全会的会上，他同卡特、卡拉汉、施密特、弗雷泽等人分别进行了交谈，促进了他们访华的意愿。在这之前因为荷兰售台潜艇事件以及所谓人权问题，中荷关系不好。在这次会上，荷方对学谦同志热情接待，安排周到。首相科克主动找他谈两国关系问题，表示荷政府非常珍视同中国的关系，衷心希望中荷关系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荷兰女王在接见与会代表时，也主动上前同学谦同志交谈，希望两国关系尽快走出困境，并请他一定将荷方信息转达给中国领导人。

1996 年是泰国普密蓬国王登基五十周年，泰国法政大学举办了“二十一世纪来临：亚洲的崛起”论坛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庆祝活动。该大学会同泰国枢密院大臣西提联名邀请学谦同志出席该论坛会并对泰国进行友好访问。毕玲同志也应邀陪同访问（同时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讲的还有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和泰国前总理炳·廷素拉暖）。

学谦同志在会上作了“面向 21 世纪的世界和亚洲”的演讲，他除了谈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看法外，着重阐述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强调中国的发展需要稳定和繁荣的亚洲，亚洲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他还赞扬中泰友好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并在会上回答了与会者关于台湾、香港、南中国海等问题的提问。学谦同志的演讲，博得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和广泛称誉，泰国电台、电视台、各家大报都作了很好的报道。泰电视台认为吴学谦副主席的演讲对亚洲和整个世界

的形势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对中国的未来和亚洲的发展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泰中传统友谊，通过他这次访问也必将对泰中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学谦同志在活动中还重视和善于做人的工作。西提原来也是外长，学谦同志同他曾在柬埔寨问题上密切配合，友好合作，为柬问题最后解决作出了贡献，两人也成为老朋友。这时他已是75岁高龄，仍亲往机场迎接，单独会见和宴请，后来又陪同去普吉岛访问和再次宴请，反映了他对学谦同志的尊敬和他们相互间的友谊。访问期间，学谦同志还被当时刚上任的差瓦利总理单独接见；泰王姐两次会见，并设午宴款待；泰国上议院议长米猜，主动提出会见并在乡间别墅家中设晚宴招待。气氛都十分热情友好。学谦同志也建议抓住契机多做工作，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学谦同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无论在美国、加拿大或荷兰，当地的华侨、华人组织（包括一些亲台的团体）都联合起来对学谦同志的来访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在访问泰国期间，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专门邀请他参观亚洲电讯集团总部并宴请他，就增强该集团与我国的经济合作交换意见。当学谦同志从加拿大回国，在上海停留时，著名港商曹光彪专程来沪请他参观曹新近在淮海路投资合营的永新第二百货商店。

学谦同志具有战略眼光。他在首次参加国际行动理事会会议后，就提出：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变化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十分重视对国际形势进行中、长期和战略性的研究，当前尤其注意对中国的研究。我们也应着眼21世纪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制定相应的战略与策略。为此，要组织力量，培养人才。因此，当国研中心筹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以加强这方面工作时，他立即表示支持并慨允出任首任会长。他还介绍我去见经叔平、李储文等同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1998年年初学谦同志通过秘书告诉我，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

和夫人邀请他和毕玲同志再次参加预定在当年举行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咨询委员会。他如决定参加，将让我陪同前往。这时中美关系相当微妙，为了多做工作，加强沟通，我建议如他的健康状况适宜远行，就接受邀请。可是他从外地回来后，就卧床不起，历经十年终于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也失去了继续接受他教诲的机会，感到十分悲痛。在我脑海里经常涌现随同他出访的情景，学谦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注：廖世亮同志已于2008年10月病故。）

吴学谦：清明时节的告别

·秦雯·

2008年4月4日，清明节，87岁的老人，国务院原副总理吴学谦离开了人世。

为追寻吴学谦生前的足迹，记者相继找到几位曾经跟随他多年的工作人员。几位老人要求不透露姓名，皆以“身边工作人员”统一表述，因为“不要突出个人”是吴学谦一贯的处事原则。

吴学谦就任外长期间，足迹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据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外交活动中，吴学谦该说话时一定会说到底，但并不强势，尊重对方，很少空谈，就问题谈问题。无论是第三世界的小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吴学谦一概诚恳待人，平等视之。其务实作风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并因此收获很多友谊。

吴学谦的务实风格也影响了外交部的工作方式。他不喜欢繁复的批文程序，常常说：“同样在一座楼里办公，不需要公文程序，开个小会，碰个头，问题不就解决了，太多的手续既浪费纸张还耽误时间。”

吴学谦反对大话空话，不喜形式主义，喜欢讲实话。偶尔写文章，也是文辞朴实，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没有多余的言辞，“不穿靴戴帽”。

1984年，吴学谦主持了外交部的精简机构工作，初步建立了外交部退休人员制度。对外使馆也不再配备司机等公勤人员，要求驻外工作人员自己学会开车，几个人就可以经营一个大使馆。

吴学谦一方面精简机构，一方面提高驻外人员待遇，允许外交官带配偶。从吴学谦时代开始，中国大使馆“和尚庙”的历史

终结，之后，秘书、参赞、厨师等逐步放开，允许带配偶驻外。

吴学谦的出访团队总是很精简，几乎没有闲职，一般七八个人，从不带夫人出访，他的理由是“不要花国家的钱，又要麻烦人家”。国内出差也不带夫人。

吴学谦辞世后，很多人去他家里探望，才发现“这房子，真差劲”——没有任何装修，很简陋的厨房和卫生间，用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立柜。

在吴学谦任外交部长期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是有服装补贴的，唯独外长没有服装补贴，需要添衣装要申报批准。吴学谦就很少张口要衣服。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的西服是20世纪50年代任中联部部长时给配发的衣服改制的，还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衣服新，我们好歹还是80年代的款式。”

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1985年，吴学谦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大会，行李却在托运时丢失了。国内的工作人员找到航空公司，几番努力，终于找到了箱子。航空公司方面称：“皮箱破了，我们打开看也没什么值钱东西，除了两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就是一沓文件，就没再装箱运输了。”这个解释让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啼笑皆非，“但是从一个侧面，也让大家知道，一个外长破旧的皮箱里，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

198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十周年纪念活动召开前几个小时，长期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的吴学谦突然吐血不止，衣服上全都是血，但他依然坚持要参加纪念活动。因为按照安排，负责对台业务的他需要在活动中讲话。染上血迹的衣服肯定是不能穿了，工作人员你脱一件衬衣，我摘一条领带，他再拿件外套，给吴学谦凑齐一身装扮，“他对穿衣很不讲究的，实际上，穿我们的衣服比他平常穿的还新。”吴学谦就硬撑着参加了活动，上台讲了话。会后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医院时，医生火了：再晚一会儿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进入中南海后，身为副总理的吴学谦，

衣服仍然很少，仅有的几套西服拿去钓鱼台洗，还要从几百元的工资里扣除洗衣费。

1998年，吴学谦住院，本来就不多言的他话更少了。前两年还可以坐在轮椅上，2000年后就一直卧床，渐渐不省人事，不再能辨出旧友故人，最后连风雨相伴的妻子也不认识了。

2008年4月4日，吴学谦与世长辞，外电评价他在中美关系、香港回归、两岸关系上贡献突出。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第16期）

怀念老首长学谦同志

· 侯清儒 ·

2008年的清明，我们敬爱的老首长吴学谦同志走了，噩耗传来，让我悲痛不已。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我前往他老人家的住所吊唁，几天之后又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灵堂向他作最后的告别。看着老首长慈祥而宁静的面容，眼泪夺眶而出。回家的路上，禁不住让我回忆起在他身边工作时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

1982年11月，在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半年后，学谦同志出任外交部长、党委书记。此前部办公厅领导正式通知我，组织上决定让我给他当秘书并兼任部党委秘书。我当时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组织信任我，将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使自己有了一次更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担心的是，自己的能力和经验能否胜任？新首长是一个什么样性格和作风的领导，同我们属下好不好相处？同学谦同志第一次在办公室的亲切见面，以及此后多年的和睦相处，证明我当时的顾虑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平易近人的好领导

学谦同志是我们党在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一代革命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于革命事业，是我党上海地下组织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解放以后，学谦同志长期从事团中央和党的外事工作，历任团中央国际部长、中联部副部长等职，有着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和出色的领导水平。想必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决定委任他出任外长这一要职。但学谦同志从不以此自居自傲，沾沾自喜。他极少向人说起自己从事地下工作的光荣历史和为党的外交事业所作的贡献，始终谦虚谨慎，低调做人。我和他老人家相处近

八年的时间里，很少见过他对同事和下级发脾气、训斥人，总是那么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出国访问或到外地视察工作的闲暇，他总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家常，询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同他老人家在一起工作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非常温馨和愉快的时光。

平等待人的外交家

学谦同志对内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前辈、好领导，对外则是一位儒雅睿智、平等待人的外交家。在外事活动中，无论是大国强国，还是小国弱国；无论是政要显贵，还是平民百姓，他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待之，尊重对方、不卑不亢。学谦同志任外长时，正是我国对外关系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他广交深交各国政要和各界朋友。外交活动中，他既坚持原则、立场鲜明，又态度诚恳务实、讲求策略；会见会谈时，从不说空话、大话、假话，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抓住要点，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这些都给同他接触过的外宾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也因此深交了不少重要的朋友，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就是例子。1983年10月学谦同志以外长身份访美时，受到美国政府高规格的热情接待，里根总统会见，舒尔茨国务卿全程陪同参观访问，老朋友布什设家宴款待，布什夫人芭芭拉还亲自下厨做糕点甜食招待代表团一行。

英勇斗争、忘我工作的革命家

学谦同志怀抱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青年时代家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历经艰险，彰显了革命党人的英雄本色，“文革”时期，遭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深陷囹圄达三年之久，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革命的意志和锐气丝毫未减。出任外长时已年过六旬，他不顾高龄和多病的身体，忘我地为党工作。外交部是国务院机构事务最繁忙的部门之一，作为一部之长，其工作的重负和忙碌可想而知。他白天出席各种会议，会见来访外宾，找部、司领导同志商谈工作，批阅大量文电资料，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时间休息；下班时，还让秘书把没有批完的案子和没

看完的文电资料装入公文包内，带回家里继续批阅，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甚至次日凌晨。对此，他毫无怨言，总是叮嘱我们，有要案急案一定要及时送批，千万不要延误，给工作带来损失。出国访问期间，他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除每天写日记外，总要把当天会见会谈的有关资料再仔细阅读一遍，有时还要亲自动手修改和另外撰写谈话提纲和要点，然后频繁地出席各种外事活动，直至晚上回到宾馆，很少有休息时间。记得有一年我随他去北非突尼斯访问，一天安排了十多场外事活动，驱车往返数百公里，回到宾馆时已是深夜，连我这个四十多岁的人都累得够呛，他老人家却一点也不叫苦。1983 年年初，他陪我国家主要领导同志出访东非某国，由于代表团庞大、人数众多，所住宾馆房间不够，对方只能安排秘书、警卫和学谦同志同住一个房间。当时时值仲夏，天气炎热潮湿，气温高达三十多度，房间内空调又坏了，加上蚊虫叮咬，我们一夜未眠。但，第二天，学谦同志照常振作精神出席各项活动，还对我们说："非洲国家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兄弟，他们长期受殖民统治，经济不发达，接待条件有限，但他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应当理解。"学谦同志早在中联部时就长期主管亚非特别是非洲地区的对外工作，对非洲十分了解和熟悉。当外长后，他也极为重视对该地区的外交工作，始终把对非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和日程上。他的言传身教，对我这个长期从事对非工作的外交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年轻时第一次出国就去了乌干达，最后一任又出使津巴布韦，在非洲地区整整工作和生活了八个年头。首长说过的话，我始终铭记在心，下决心要尽职尽责地为发展中非友谊而努力工作。

1984 年年底我赴北美加拿大工作。1988 年 8 月回国后，又重新回到学谦同志身边。此时他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分管外事、对台、侨务和旅游工作。办公室也迁至中南海北区。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他积极参与制定和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外交工作方针政策，具体指导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外事工作，发扬他一贯秉承的"思想解放、开拓进取、好学深思、求真

务实”的优良作风，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为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从1988年8月起他还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对台工作中，他坚持中央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八项主张”，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和正确判断台湾问题的总体形势，精心指导对台工作，并亲自会见前来大陆的台湾知名人士，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学谦同志对侨务和旅游工作也十分重视，经常带领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同到有关省市进行实地考察，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如何做好侨务工作和大力发展国家旅游事业的指导意见。1993年3月，学谦同志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积极协助李瑞环同志抓好政协的各项工作，并充分发挥他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的自身优势，努力拓展全国政协的对外交往活动，为巩固和加强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新的积极贡献。他不愧为是我们党和国家事务的卓越领导者，他的杰出贡献和优秀品德将为世人和后代永远铭记。

1993年的冬天，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了中南海，告别了学谦同志，远赴我驻南太平洋一个岛国的使馆履任新职。自那以后，我虽然没有再在他身边工作，但我始终关心着他老人家离退休后的生活，惦记着他日益恶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不幸的是，在与病魔恶战了十多年后，他老人家终于离我们而去。每念及此，心情就会悲痛不已。他已永远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但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我们无尽的思念和记忆里……

（2008年9月）

和学谦同志“一起工作”的日子

· 袁祖德 ·

1984年8月29日，我向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学谦同志报到，担任秘书工作。学谦同志对我说：“你来了，很好。听说你不愿意来，其实没有问题，我们一起工作。”从此“我们一起工作”了近十年，直至1994年3月我最后一次随他陪同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访华结束。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十年，最珍贵的十年，学谦同志的言传身教是我一生中最受教育的十年。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作风与为人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直在激励着我“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一、呕心沥血，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

学谦同志在担任外长期间，先后出访50多个国家，走遍了世界，但并没有游遍世界。他严于律己，每次出访总是紧张忙碌，不知疲倦地工作。我担任秘书后第一次随吴学谦同志出访是1984年11月9日，学谦同志陪同李先念主席访问西班牙、葡萄牙和马耳他。11月22日下午在李先念主席结束访问马耳他的前一天，学谦同志带着我，马不停蹄，经两次转机，整整一夜多的飞行到伊朗访问，许多同志劝他中间停留一天，哪怕在使领馆住一个晚上，也可以好好睡一觉，但学谦同志坚持其一贯的作风，中途不停留其他国家。那天的行程是：11月22日下午3时5分乘AZ 491航班离开马耳他，经罗马、日内瓦、苏黎世、伊斯坦布尔，于次日8时10分抵达伊朗德黑兰机场，开始了对伊朗的访问。我一路上身兼秘书、警卫和礼宾工作，深感疲倦，但年过花甲的学谦同志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中。每次出访的日程安排也是超

负荷的，1985 年 9 月我第一次随学谦同志参加联合国年会，学谦同志除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会外的双边和多边会见，最忙的一天安排了 13 次会见，我们秘书为了防止张冠李戴，为他每场会见准备了一张可放入口袋中的小卡片，标明要见的人的姓名职务和要谈的问题，但由于时间安排过紧，一场见面尚未结束，下一场的客人已在等待，所以学谦同志来不及看小卡片，但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头脑清晰，反应快，又善于做工作，均取得很好效果。

在出访中有时还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学谦同志反应敏锐，都能及时妥善处理。1984 年 11 月 20 日下午，学谦同志陪同李先念主席前往参观马耳他港口途中，突然马耳他外长的汽车拦截了学谦同志的车，要求同学谦同志单独谈，学谦同志很礼貌地向对方作了解释。

1990 年 5 月 28 日上午，学谦同志陪同杨尚昆主席会见阿根廷参众两院议长及部分议员，阿方在议会大厦前举行欢迎仪式，以示隆重欢迎杨主席。但奏中国国歌时，学谦同志反应特别快，马上叫人制止演奏，原来阿乐队奏的是《中华民国国歌》。应该说，阿方本意是好的，但是分不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简称都是中国。错在阿方没有向我大使馆要国歌，让某些人钻了空子。

在学谦同志担任外长的七年中（1982 年 4 月至 1988 年 4 月），中国外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开创了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我国的外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二、深交朋友，打下香港回归的基础

学谦同志在香港回归这件大事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公开报道他的生平中未提一字。我亲身经历了他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四次会见，并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为香港回归打下基础。1986 年 10 月 12 日至 18 日，杰弗里·豪陪同英国女王访华，学谦同志全程陪同，从北京到上海、西安、昆明、广州，一路上学谦同志同杰弗里·豪多次商谈。1987 年 3 月 25 日至 29 日，学谦同

志访问瑞士,杰弗里·豪专程从英国飞到瑞士同学谦面谈。1987年9月,学谦同志出席联大年会,又同杰弗里·豪面谈。1988年3月10日至15日,学谦同志访问英国,杰弗里·豪亲自安排,隆重接待,10日抵达伦敦后,杰弗里·豪安排学谦同志前往郊外他的官邸Chevening城堡下榻并在城堡举行欢迎宴会。该城堡是个庄园,满园是树木草地,所以11日清晨学谦同志在园内跑步竟迷了路。接着杰弗里·豪陪同学谦同志到他的出生地威尔士参观访问。3月14日学谦同志在大使馆举行的答谢会上,杰弗里·豪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点之一是——共同承诺香港权力的顺利交接,忠实地履行联合声明。我们在香港问题上的密切合作是我们两国良好关系的基础之一,也是我与吴先生阁下密切的个人关系的基础。"他在讲话中还引用了鲁迅的话"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在十八个月内学谦同志和杰弗里·豪在三大洲四次见面,显示中英两国和他们俩儿的密切关系。

三、情系对台工作

1988年8月,学谦同志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副组长,从此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但长期紧张劳累的工作损伤了学谦同志的健康,1988年12月30日下午3时学谦要出席在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十周年座谈会并作主要讲话,两点多钟我到他办公室提醒他准备去大会堂,一进办公室我看到学谦同志埋头在办公桌上,我以为他累了在休息。我叫醒他。他突然一惊说走吧,这时我看到他胸前有呕吐的东西,那时他可能已昏迷。我说不行,劝他去医院。他说不行,这个会一定要参加。我们秘书再三劝说,学谦同志坚持要去开会,所以只好换上我们秘书的西服、衬衣、领带,由黄秘书陪同去大会堂。临行前学谦同志还有便血,因此我马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医生一听急了,说是十二指肠出血,要求他马上去医院,晚了有危险。因为学谦同志有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史。我给在大会堂的黄秘书打电话告之情况,但学谦同志坚持要等会议结束后去

医院。一送到医院马上就住院，经一夜一天抢救，基本上制止了出血。住了近一周医院，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学谦坚持要出院，又投入紧张的工作。这次十二指肠大出血大大损伤了学谦同志的元气，后来又加上春夏之交的风波，学谦同志忧国忧民，他的身体、精力明显地不如从前，但学谦同志对对台工作情有独钟，花了大量心血研究指导对台工作。他协助杨尚昆主席（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并同王兆国同志（中台办、国台办主任）密切配合，为对台工作开拓了一片新天地。对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在要不要成立相应的民间团体这个问题上，学谦同志坚持认为两岸要平等协商，经各方面协调磋商并经批准，于1991年12月16日在北京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从此开始了两岸间平等协商的历程，并于1993年4月底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汪辜会谈，达成了四项协议。今年是两会复谈和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值此之际，我更加怀念我的老首长学谦同志。

学谦同志在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四年半时间内，会见了众多的台湾各界人士，并以务实灵活的精神指导处理了对台情研究、对两岸经贸合作、两岸人员交流、台湾老兵遗产、台湾体育团参加北京亚运会等各方面大量复杂又敏感的问题。1993年中央领导换届时，学谦同志曾私下对我说，他并不想到人大、政协当什么官，倒愿做些对台工作，可见他对对台工作深有感情。

四、严于律己 为人师表

学谦同志平易近人，严于律己，一切从国家、单位和别人着想。他从中联部调外交部只带一位司机于师傅，他说之所以带于师傅，因为司机住在他家附近，免得外交部司机来回跑。于师傅听我们叫“吴部长”，似乎有些不习惯，他说在中联部，大家都叫“老吴”。

我第一次同学谦同志“相识”在1982年7月25日至31日，当时我在外交部礼宾司接待处工作，具体安排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访华，尼方提出只访问兰州和日喀则，为此北京接待人

员都先期到兰州，留下我陪同学谦同志于7月24日离京飞兰州。我是一个普通科员，从未单独陪过部长出差，真是诚惶诚恐，但学谦同志十分平易近人，他不带秘书，不要在机场订贵宾休息室（在头等舱休息室就可以），不让通知陕西省外办（飞机要经停西安机场），在西安机场餐厅吃午饭时，米饭很硬，学谦同志只吃了小半碗，为此我心中很过意不去。我万万没想到两年以后他竟要我当他的秘书。

我在学谦同志身边近十年，他从未带过夫人到国外访问，也从未带过夫人到国内出差。他担任国务委员后曾不想要警卫，也不想带警卫出国访问。学谦同志的健身活动是每天清晨四时左右就起床跑步近一个小时，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这对我们秘书警卫是件头疼的事，因为起不了床，但这项体育锻炼不麻烦人，也不花钱。自从1988年12月那次十二指肠大出血后，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后的忧国忧民，学谦常感到有些头晕，并日渐加重，从每天清晨跑步改为散步，我们都劝他到外地休息休息，但他说去外地，前呼后拥，麻烦多少人。

学谦同志虽然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08年11月）

一位铭师，一位尊长

——深切缅怀老首长吴学谦

· 孙起顺 ·

2008年4月4日清明节，全国人民悼念先人的日子，尊敬的老首长吴学谦走完了87年的生命历程，走完了70年的革命生涯，溘然长辞。我悲痛万分，沉痛缅怀。我有幸在吴学谦同志身边工作，他是我步入工作岗位后接触的第一位高级领导，他是我工作中的铭师，更是生活中的尊长。我会永远铭记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吴老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吴老逝世后，党和国家给予高度评价，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写了回忆文章，我辈本无资格写这样的文章，但老首长生前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也斗胆回想一点往事，以为缅怀。

吴老的工作几乎没离开过外事，所以出国访问很多，每次出国访问时的态度都是严谨的，他的形象代表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因此吴老在国外时对于自己的言行承诺也从不马虎。

在一次出访非洲国家时，按礼宾约定时间下午3点与其总统会见，首长一行人准时到达会见地点，而对方却迟迟未到。出国访问时间短暂，来去匆匆，等待的心情可想而知，其间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甚至想到取消这场会见。首长却稳如泰山，说可能人家也有突发事件，急需处理，我们再等等吧。最后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见到对方的人员。据我观察他急在心中，但在关键时刻，并不感情用事，善于掌控大局。他的宽容大度真正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更为中国外交增添了荣誉。

吴老就是这样的，无论走到哪个国家，无论国家的贫穷与富贵，无论国家势力的大或小，他总是以宽容大方的言行感染着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以一位优秀外交家的身份表达着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和爱国情怀。

使我记忆最深的是，1988 年 12 月 31 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十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吴学谦副总理应邀出席并讲话。那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们都劝他休息调养，但他淡然处之，始终全力投入工作之中。大会即将举行之际，首长的身体累垮了，在办公室上吐下泻，他吐的是血，泻的也是血啊！工作人员纷纷请求首长住院治疗，但他还是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继续工作，坚持参加了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刚一结束，我们疾速送他去医院就医。事后，主治医师毫不客气地冲我们发脾气："再晚一点就有生命危险了！"老首长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了医院，第一天在医院便血 13 次，住院时边治疗边工作，经医生精心医治稍有好转后，便急忙出院上班。

现在想想，首长对于工作的执著真的是不顾及个人安危啊！那时是 1988 年，如今是 2008 年，这 20 年差点儿就被首长对于工作的执著给湮没了，想来是多么让人揪心的一件事啊……

吴老在工作上，对待自己，对待家人，对待身边工作人员极为严格，并不"慈祥"，甚至是极为严苛的，堪称一位严苛认真的铭师，督导着我们，更是极为严格地督导着他自己。

吴老在生活中对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百倍关怀，体贴入微，时刻和蔼可亲，如同慈父，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这是我的同事，让"同事"们备感荣幸。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随同首长出访中东国家时，可能是水土不服或者对于当地的食物不适应，我身体十分难受。在进餐时老首长见我面色苍白，便问我是否身体不舒服，让我先放下手头的工作，好好休息，等身体好了再工作。虽然这些话在别人看来可能很平常，但是在出国访问之时，在没有家人嘘寒问暖的环境下，有这样的高级领导，在忙于外交大事之中，如同慈父般地微笑着关

照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无比的感动，也是万分庆幸能够跟随着这样一位好首长一同工作。

一位铭师，一位尊长。我敬爱的老首长，我热爱您，我缅怀您——吴学谦同志！

（2008 年 9 月）

深深怀念吴学谦同志的崇高品德

· 张龙海 ·

吴学谦同志是我国外交战线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今天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都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值得我们终生学习。

第一次和吴学谦同志的谈话

吴学谦同志是于1982年4月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的。当时我在礼宾司任副司长负责司里的全面工作，所以经常有机会向吴学谦同志请示汇报工作，而之前我与他并不认识。我第一次上他办公室请示工作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我进入办公室后，他就说："你坐啊，我知道你是礼宾司的张龙海，是上海人吧，有什么事尽管慢慢说。"他的态度非常和蔼可亲，一点没有他是部长那种令人生畏的感觉，室内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轻松起来。他十分耐心地倾听我的谈话，从不打断我的思路，等我说完之后，他才表明态度。他同意的不再重复，他不同意的，说明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处置。请示完工作，我走回礼宾司的路上心情十分高兴，心想中央给外交部派来了一位如此平易近人的好领导，真是我们的大幸。

鉴于礼宾司工作的特点，我经常去他办公室请示工作以及为他安排外事活动。在我们工作中出现差错或不妥之处时，他从不厉声训斥下级，总是平和地善意地指出问题所在，要求下级注意改正。他的那种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作风将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随吴学谦同志访问非洲11国

1982年11月吴学谦同志升任外交部长不久，中央根据当时

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对非洲采取一次重大外交行动，由当时中国总理率团访问非洲11国。时间从1982年12月20日起至1983年1月20日止历时32天，行程3.6万公里。吴学谦同志作为外交部长又是中国总理的主要陪同人员，参与了许多出访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当时我是礼宾司司长，曾参加了部分准备工作并作为一名陪同人员随访，在出访前和出访中有许多事情要请示吴学谦同志。在和他的许多次接触中，我亲眼目睹了他的崇高品格和优良作风。例如在筹备出访工作之初，他就嘱咐我说："非洲国家经济欠发达，接待外宾条件有限，大家要从政治大局出发，不要计较生活上的接待如何。"又说："非洲各国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民族自尊性较强，我们要尊重主人，客随主便，不要强人所难。"所以礼宾司在日程安排和接待规格上始终注意掌握这些原则精神。

在出访前夕，根据中央要求，由总理主持在中南海召开全团人员会议，讨论出访的各项重大事宜。会议要求：全体人员团结一致，遵守外事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求尊重主人，客随主便。非洲国家有的接待条件有限，要体谅主人的困难，生活上绝不计较……全团人员共有八十多人，来自十几个单位，包括媒体和机组人员，但是大家人心很齐，思想一致，每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和职责。在这方面外交部长吴学谦为大家作出了榜样。他们的平易近人和尊重主人的态度受到访问国官员的高度赞扬。尽管他们年龄大身份高，但是他们是遵守时间的模范。例如每次活动出发前，他们总是提前上车等候，总理一上了车，车队立即启动。好几个国家的礼宾司长向我夸奖说："像这样容易接待的高级人士是罕见的，中国朋友实在平易近人，遵守时间、尊重主人啊！"

在出访前和出访过程中，吴学谦同志数次对我说："我们这次是随总理出访，所以一切要服从总理活动的需要。"他对出席哪些活动，坐在什么位置上，住宾馆或旅馆时，给他住套房还是单间，从不计较，听凭礼宾司同志的通知和指引。除了两国政府首脑在

政治会谈时，商定由双方外长举行具体商谈的活动外，他不再提出为他单独安排这样或那样的活动。所有这一切对于负责礼宾工作的我，真是很大的支持和理解。

那次出访我们从北京出发时已是隆冬季节，但一到非洲，气候十分炎热，团里不少同志对气候不是很适应，不少人吃不下也睡不好。有的同志因水土不服而得肠胃炎或感冒，但是全团从上到下人人严格要求自己，不叫苦不抱怨。所访问国家中有的居住、饮食和卫生条件较差，吴学谦同志和大家一样从不提什么意见或要求。有时我去征求他对居住和饮食条件的意见时，他总是淡淡一笑说："主人能接待我们这么多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记得在某国访问时，当地气候十分炎热，宾馆内除了总理、副总理的卧室有空调机，其他人的住房既无空调也无电扇。室内温度高达三十多度，房里既闷又热，大家汗流浃背，夜里无法入睡。吴学谦同志和大家一样默默地忍受着。我们大使馆见此情景，把几乎所有的电扇拿到宾馆来支援我们，之后情况略有改善。

今天每当谈到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备的民主作风、平易近人和以身作则的品德时，我就会回想起26年前那次出访非洲11国时，吴学谦同志身上的那种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并引起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2008年10月31日）

怀念吴学谦

· 张庭延 ·

吴学谦久病辞世，虽有所预料，但参加告别仪式时，悲痛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吴学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长期主管对外关系。后来他又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仍负责对外事务。他先后出访50多个国家，多次参与重要国际会议和会谈，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与他接触很有限，但忆及往事，十分怀念他。

1983年5月，吴学谦出访朝鲜，我有幸随行。那时他刚任外长不久，是第一次出访。中朝关系悠久，不知从何时起，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双方主要领导人，也包括外长在内，上任后第一次出访，要到对方国家去。为了加强和发展中朝友好关系，吴学谦也沿用了这一做法。那次访问，受到朝方的热情接待和高规格的礼遇。吴学谦下榻最好的牡丹峰宾馆，与朝鲜外长许锦举行了会谈，金日成主席在百忙中接见并设宴招待。访问海港城市元山时，天气格外晴朗，参观后朝方特意安排在蔚蓝的海边垂钓，并支起白色帐篷，就地加工海鲜，品尝海味。那次访问，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和一些国际问题取得一致的看法，对推动中朝关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那是我第一次与吴学谦接触，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身为高官，但待人亲切，交谈随和。那次访朝前，他特别召集会议，听取关于朝鲜半岛形势的介绍，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在会上发了言。在往返平壤的国际列车上，他不忘到车厢看望大家，并坐下随便闲谈。记得他谈起20世纪50年代出任中国驻世界学联代表，在东欧一个国家工作，当时大家都很年轻，环境也不错，工作很顺畅，但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双边关系急转直下，工作上遇到很多困

难，也受到了锻炼和考验。他的随意谈吐，对年轻人不乏教育意义，至今言犹在耳。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我出使韩国后听到的事。1985 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举行万隆会议 30 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一些亚洲国家代表参加，吴学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出席。韩国也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派出的代表是政府统一部长官李世基。当时，中韩还没有外交关系，中国松动对韩关系的举措也刚刚开始，因此中韩关系在多边国际活动中还相当敏感。但在一次活动中，李世基主动找到吴学谦面前，致意后要求与他合影留念。事发突然，但是起码的外交礼仪，吴学谦当即欣然接受而未迟疑。我到韩国赴任后拜会已转任国会议员的李世基时，看到了这张被放大的照片，挂在他的办公室正面。李世基在交谈中告诉我，他当时被吴学谦的这种大国外长风度所感动，他十分珍视这张照片，因为他早就相信，韩国与中国迟早一定会建交，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92 年中韩建交后，热心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李世基多次访华，吴学谦在北京会见并宴请了他。对于中韩关系，吴学谦并不陌生，当年中韩关系的松动和改善，正是在他任外长期间促成的，这就使他与李世基多了很多共同语言。吴学谦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在李世基积极推动下，于 1994 年 4 月应邀访问了韩国。那次访问受到韩方的热情接待，韩国总统金泳三会见了吴学谦。特别是吴学谦与李世基，两人在韩国第一次相逢，握手拥抱，心情甚为激动。吴学谦夫人毕玲，本来极少陪同丈夫出访，那次也破例一起来到韩国，与李世基夫人晤面，从而使访问增添了亲切的家庭气氛。李世基全程陪同吴学谦访问，各项活动安排细致而周到，特别是两人多次促膝深谈，回顾了中韩两国的过去，更赞赏建交一年多来双边关系的飞跃发展，对于两国跨越历史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他们不胜感慨之至。

吴学谦学识渊博，处事低调，勤勤恳恳，一生成就了许多事业，非我所能概述，现仅以上述几点往事回顾，表达我对这位老领导的怀念之情。

（2008 年 4 月 17 日）

为国家四海交友 振华夏心系五洲

——追忆吴学谦同志难忘的两件事

· 刘俊华　赵建平 ·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吴学谦经历了许多国际间的重大事件。给他印象最深的，首先就是亚非拉革命风暴的兴起。吴老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事件。

就拿非洲来说，几百年来深受奴役的非洲人民在很短时间里就掀起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其势迅猛异常，令老牌殖民主义者无法招架。非洲的地图完全变了样。从中，吴老深切感受到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可阻挡。

吴老说："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总是心心相通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曾对非洲产生过很大影响，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他在会议期间与纳赛尔的会见更为增进中国和非洲人民的相互了解奠定了基础。多年来，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现在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已与中国建交。当然，民族独立只是革命胜利的第一步，非洲人民还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繁重任务。"

第二件给吴学谦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那场大论战。

吴老说，60年代初，苏联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遭到了中国的反对并由此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写了许多文章。现在，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文章也成为历史文件，但他认为，这件事十分重

要。这是因为它引起了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甚至对立面的重视和思考。从这场争论中可以得出一点，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多年的外事工作中，吴学谦曾在好多位领导的关怀下工作。当记者问到哪几位中国领导对他的影响最大时，他简捷而深沉地说："一位是周总理，一位是小平同志。"

多年以来，吴学谦牢记周总理的教导，始终坚持"广交朋友"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奉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外事活动中坚持对外国人"热诚相待"、"不卑不亢"、"以理服人"、"互相尊重"、"求同存异"。

吴老说："在外事活动中，朋友总是越多越好，敌人总是越少越好。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人不相信。他们问，你们这样的想法做得到吗？我们说，能做到，因为我们的事业是为人民的。"他举例说："比如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这一点，谁也没有理由反对。"

谈到这里，吴老拿起《中国之友》杂志，指着封面上的刊名说："'中国之友'这个题目是可以站得住的。"他希望《中国之友》的读者对象越广泛越好，鼓励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努力办好刊物，"为建立和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服务"。

今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吴学谦当选为副主席。目前，他依然像从前那样，每天5点钟就起来散步，坚持锻炼。另外，还利用空余时间练练书法、看看书。有时，还要写写回忆录。

吴老的家庭很幸福。除了老两口外，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并且有了一个上初中的12岁的孙子。吴老对记者戏称，他的家庭不存在"人口爆炸"问题。

（原文摘自《中国之友》1993年第四期。副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怀念吴学谦同志

·王 殊·

吴学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年了，但他谦虚谨慎的精神，不论是在抗战时期在上海认识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国际会议上碰到他，还是他到外交部工作后成了我的领导，我一直印象很深，而且始终是我的楷模。

我在1939年秋考入在抗战后迁到上海租界的苏州中学高中一年级，多次看到有一位年龄比我们大几岁的学生到宿舍来找我同班的钱梦梧同学。他衣着很朴素，有时找不到钱梦梧，就很谦谨地问我们他到哪里去了，见到后就一起出去，我们一直以为他是钱梦梧的亲戚。钱梦梧比我还小一岁，才16岁。可是，他人很老成，功课很好，而且读过很多的进步书刊，同我们几个同学时常谈起国内外的大事，我们对他很佩服。后来，他鼓励我们一起看进步书刊，白天有空各人自己看，主要是在晚上宿舍熄灯后坐在光线微弱的路灯下的楼梯上看进步书籍。有时，我们问到常来看他的那位学生，他说这个学生叫某某某，暨南大学的学生，是他的亲戚，常一起到书店去看书。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很快占领了上海租界，苏州中学停办，钱梦梧也到他老家常州乡下去参加江抗游击队了。到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我在南京遇到已担任江苏省委农业部长的钱梦梧时才知道，那时常来名他的学生就是在上海地下党学委负责联系中学地下党员的吴学谦同志，当时他还是入党不久的青年党员，因此吴学谦常来找他指导工作。

1958年年底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到开罗报道亚非团结大会时，遇到了同我国代表团一起前来参加大会的吴学谦同志。我就对

他说，我早就认识你了，但你还不认识我。他很奇怪地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起了过去的情况，他笑着说，抱歉，抱歉，我还不认识你。他那时已是中联部的非洲处处长（当时中共中央机关都把各个司称为处，后来才改称为司）、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的委员。在亚非会议后，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北非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包括埃及、摩洛哥、也门等国家先后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撒哈拉以南还处在殖民枷锁下的黑非洲要求民族解放的呼声也响亮起来。在开罗举行了第一次亚非团结大会，会后成立了秘书处，很多亚非国家也成立了团结委员会。后来，我在开罗多次遇到吴学谦同志，有时是参加大会，也有时是拜会秘书处的非洲各国的代表。在黑非洲国家相继取得独立后，我在一些国家也先后看到了他参加会议或访问。当时我们对非洲国家的情况还不太了解，他工作非常严谨，对非洲国家的代表很尊重，虚心地向他们请教。他对在非洲国家工作的一般的同志也很谦虚，听我们谈当地的情况和意见。尤其是后来他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后，在国内外看到我们时也一样没有什么架子，同我们谈问题和看法。

我调到外交部工作后，没有想到吴学谦同志在1982年11月担任了外交部长，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当时，我正在担任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一年多后在1984年4月他访问奥地利时，我同他已多年未见，他已是国务委员兼外长，但仍像过去一样的平易近人。我陪同他拜访了奥地利总理西诺瓦茨和外长莫克以后，他很关心和重视我国同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问题。当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核工业的发展，担负了和平利用核能和保障监督防止核扩散任务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国经过近两年在维也纳和北京的商谈和谈判，从1984年1月起刚刚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但还没有成为机构的指定理事国。机构内部美苏之间、超级大国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很多，情况复杂。吴学谦同志在拜会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之前，详细地问了我有关机构以及总干事的情况，而且告我今后随着核能

的发展，机构内外的矛盾增加，问题将会更多，我国初次参加，要好好研究，提出建议。当时，我们使馆是担负对奥地利和对包括机构在内的维也纳联合国事务的，这两方面情况不同，使用的文字语言也不同。我建议，我国应像很多国家一样，把对奥地利和对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分成两个使馆，以便加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和研究。他表示完全同意，等他回国后再办。在拜会机构总干事时，他先认真地听了机构总干事介绍机构各方面的情况，然后他表示我国将对机构的工作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对我国今后同机构的合作、我国成为指定理事国等问题说明了我国的立场。他回国后不久，我们就分成了两个使馆，对加强两方面的工作都有帮助。

我对他在工作中注意调查研究，印象一直很深刻。我在1985年年底从奥地利离任回国后，外交部要我去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他几次看到我时，他多次同我说过，对国际形势做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要认真客观。

吴学谦：我的朋友，我的知己

·[日]辻一彦·

与吴学谦先生首次见面

1957年4月，中国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代表团（团长是全国青联副主席刘西元）首次应邀访日。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青年访问日本。

在当时，邀请中国青年访日非常困难。比如保卫工作、对外界的影响等。当时的寒河江会长、福本事务局长等人做了大量工作，才使中国青年代表团访日得以实现。

时任访日代表团副团长、赴日本关西地区领队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国际部部长吴学谦一行6人，特地赶到长野来看望住院的我——这是与吴学谦先生的首次相见。当时的翻译是杨振亚。

长野疗养所听说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人要来，也确实忙了一阵。在接待室里，我们与吴学谦副团长海阔天空会谈了很多。

吴学谦副团长在感谢我对促进日中青年交流所作的巨大努力后，衷心希望我早日康复后访问中国。说北京也有专为亚非青年学生设置的结核病疗养院，万一有个什么也不必担心。当时正值苹果花开时节，我们一边欣赏着盛开的花朵，一边交谈，根本没有留意到时间的流逝。

临走前吴学谦副团长在我枕边放了一封十分珍贵的信。这是廖承志主席的亲笔信，其内容是说，对开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中青年友好交流第一步的我表示谢意；并对我去年访华未果感到遗憾，同时希望我康复后能访问中国，行期不定，随时恭候。我

与吴学谦握手告别时保证，争取尽快恢复健康，实现早日访华。

中国青年首次访日团在日本跑了整整一个月，与各地的青年团进行了交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不管怎么说，1956 年 22 名日青协访华团访问中国，与一年之后中国青年的回访的这两件事，是战后日中之间的一件大事。日中两国青年的友好运动因此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一次在访问岛根县时，吴学谦副团长与当时的岛根县联合青年团团长，即后来的财政大臣、总理竹下登，进行了深谈，并留了影。竹下首相自己也保存着那张照片。我与竹下首相还一起回忆过当年青年团活动的情景。

与吴学谦先生一年后的重逢

1958 年 4 月中旬至 6 月底，我应特别邀请首次成功访问中国。5 月杨柳吐絮时来到北京，在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部又见到了国际部部长吴学谦。

我们沉浸在一年后重逢的喜悦之中，彻夜畅谈了亚洲的青年运动。我离开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会长之职还不足一年，所以还是着力陈述了我的“东西桥梁论”。就是说，当时日本最大的青年组织“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应当成为架设相互敌对着的东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WFDY) 与西方“世界青年会议”(WAY) 之间沟通的桥梁。

这一想法关系到处于东西方对立阵营中的日本的外交政策。作为我来讲，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基本观念也发生变化。

那日关于亚洲青年运动、世界青年运动坦率地交换意见的彻夜长谈，至今闭上眼睛还会浮现出当年年轻的吴学谦的身影而值得永远怀念。

我能被特别批准住入亚洲青年学生疗养院也是难以忘怀的经历。

前面提到过，国际部部长吴学谦到长野疗养院来探望我时讲过，“到了中国，可到亚州学生疗养院去，那里有不少亚洲、非洲好多国家的青年、学生住院，值得一看。”所以出发之前就很关心这

个亚州学生疗养院。

当时在日本也有将学生患者送去住院的动向，但因为不发护照而未能实现。我决定访华时，日本结核病患者同盟长野支部也希望我能考察一下，所以我的日程中一开始就安排有访问该疗养院的项目。

在杭州与日青协访华团一行分手后，就经上海、南京回到北京，计划用四天时间访问位于北京郊外的 A.A 疗养院。

正值季节宜人的五月下旬，车子在金色的麦浪中行驶，到达建在北京郊外离永定河不远山坡上的美丽的疗养院。

这座疗养院是国际学联委托中国学联在 1954 年建造的。占地 9 万平方米，三座三层建筑的病房（建筑面积为两万平方米）。床位 300 张。当时住院的有来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尼、越南、朝鲜、叙利亚、约旦、蒙古等国 208 名学生和青年，也给日本留了 30 个床位，但因无人住院，就暂时让中国学生使用了。

一个病房住两个病人，设备齐全，与我住过的长野疗养所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我甚至想在这儿住上个一年半载的。疗养院把我当成了“客人”，但我不单纯是“客人”，而是想与住院的学生住在一起。院方爽快地说，这反倒是我们所期望的。因为过去前来参观的日本人总是一看而过，没有一个想与 A.A 疗养院的学生病人生活的，因此很乐意接受我的提议，并允许不隔离，可以让我自由行动，就这样以特殊病人的身份住进了疗养院。

吴学谦致辻一彦先生的信

辻一彦先生：

谢谢您的来信与照片，我参加在开罗召开的亚非青年会议国际预备会最近才回北京，回信晚了。

时间过得真快，北京一别已过半年，这半年中北京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工农业生产、文教事业与城市建设等各方面都搞得轰轰烈烈。北京已与您五月份见到的大不一样了。

关于日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及日中青年友好往来的问题，我

们在北京相互谈了很多。我们的想法看来您也能充分理解了吧。正如您访华期间所感觉到的那样，中国青年对我们与日本友人之间所构筑的友情非常珍惜。但是岸信介政府对我国一直采取敌视政策，致使两国人民与青年之间的友好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变本加厉进一步支持美国占领台湾。最近甚至借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复活军国主义势力。我想这一点您比我认识得更清楚。

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彻底清除一切人为阻挠我们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友好交流的障碍，才有可能谈及日中青年友好往来的顺利发展。中国青年将不惜一切为不断加深两国间的友情而做出积极的努力。我们也深信日本友人将进一步地做出努力。

值此迎接新年之际，祝您幸福的同时，也希望转告对日青协各位的新年问候。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国际部部长

吴学谦

1956 年写

与吴学谦先生 21 年后的重逢

1979 年，我随日青协访华团活动，再次见到“文化大革命”中在基层经受磨炼的全青联的老朋友，是我的一大收获。特别是 1956 年以来的知己，当时的全青联国际部部长、副主席吴学谦先生，能与他久别重逢，真是高兴到了极点。

我与吴学谦先生 1958 年 5 月北京一别，虽有过通信，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杳无音信了。从我 1972 年第二次访华到 1978 年 3 月第七次访华（第二次福井县民之翼）为止，他也是消息不明，只听说在地方上锻炼，却不知详情。

在 1979 年 5 月，我随日青协访华团第八次来到中国时，听说吴学谦先生回到了北京，就向全青联打听能否见一面。就在离开北京的前夕，吴学谦先生特地赶到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我们

阔别21年后终于重逢。

当时,吴学谦先生担任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听说下放河北农村干校去锻炼了。每天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夜里累得要睡觉,想看书也看不下去,每天搬砖头,搬石头是一把好手了。对劳动是习惯了,但不能为人民做事是最大的痛苦。”他用平静的语调谈着当时的体验。

“我也离开参议员的职位当了两年的老百姓了。”我说起自己的波折。吴学谦先生说:“我下放农村,但深信终有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是会到来的。所以一直顽强坚持着,现在终于又复活了。让朋友也争取重回政坛!”他鼓励着我,让我强烈感受到友人、知己是超越国界的,应当珍惜。

也是回报吴学谦先生的激励,其后我确实又再次复活进了国会,重新戴上了议员的徽章与吴学谦再会了。那时他已是外交部长了。

1991年5月3日,中日青年友好中心落成典礼时,邀请了日本以中曾根原首相、竹下登原首相(原岛根县青年团长)为首的很多政治家,我也以国会议员、原日本青年团协会会长的身份受到了邀请。

仪式结束后,我与老朋友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一起,手持铁锹种了纪念树。这对我来说是总结日中青年友好运动30年最适合的纪念了,心中十分激动。

(摘自[日]辻一彦著《日中青年友好五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吴学谦重视对日工作

——回忆同吴学谦相处的几件往事

· 杨振亚 ·

我曾长期在吴学谦同志领导下从事对外工作，主要是对日工作。20世纪50年代，我在团中央国际部负责开展同日本青年的友好交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吴学谦任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和副总理期间，我也调到外交部亚洲司，在他的领导下做全面的对日工作。我深深感到：吴学谦同志勤奋好学，求真务实，思想作风严谨，能准确掌握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不断引导我国的对外工作包括对日工作，排除干扰，扎扎实实地向前开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成果。即便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日理万机的繁重工作期间，吴学谦也一如既往地重视开展对日工作，这方面我从他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不少宝贵东西，受益匪浅。

这里我想介绍几件实例：

一、开拓同日本青年的友好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中日两国处于对立状态，两国青年之间也基本上没有交往。吴学谦作为团中央国际部长，一再告我，当前最重要的是突破，一定要想法同日本主要青年组织建立关系，再邀请他们访华，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友好往来，这样就有利于发展中日友好。按照这一想法，我们于1954年秋季，以“全国青联”名义，邀请在欧洲开会的日本青年团协议会（简称“日青协”）副会长铃木重郎会后经由莫斯科前来我国短暂访问，并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北京理事会会议。“日青协”是日本战后成立的最大全国性青年组织，号称有400万会员，大部分是农

村青年，主张日中友好。铃木重郎在北京期间，吴学谦同他多次接触会谈，介绍情况，双方终于达成建立友好关系的协议。

1956年年初，全国青联邀请“日青协”派50人的代表团在当年春季访华40天，但日本政府蛮横阻挠，后通过“日青协”的反复交涉和斗争，直到11月下旬才有22名团员获得批准成行。吴学谦认为，代表团反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是经过斗争后才来到中国访问，很不容易，我们应该给予支持，更加热烈欢迎，把接待工作做好。要让他们全面了解新中国情况，广泛同中国各界青年接触交谈，成为好朋友。在北京期间，吴学谦多次同代表团座谈，解答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访问很成功，这些团员回国后大都成为宣传新中国和日中友好的积极分子。

1957年春季，“日青协”邀请我“全国青联”派10人代表团访问日本一个月。代表团由团长、“全国青联”主席刘西元和副团长、“全国青联”国际部长吴学谦率领，我也随同前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访问日本的中国青年代表团。

日本青年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要求前来自己地区访问，与中国青年代表见面。“日青协”尽量予以满足，特将代表团分成两组，在一个月时间内分赴27个都、道、府、县和44个市访问，几乎每天到一个新县，大约同2.5万多日本青年和各界人士见面。所到之处，青年们成群结队，高举中日两国国旗，举行盛大欢迎集会，充分体现了日本青年和人民要求日中友好、加强日中青年友好交往的强烈愿望。

我和吴学谦副团长同组去外地访问时，一个重要收获是结识了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竹下登是岛根县人，当时他担任该县青年团会长，在我们访问岛根县时，竹下登以地主身份热情接待我们，双方谈得很融洽，成为好朋友。记得竹下登曾说，他这年33岁，对前不久结束的那场战争还留有惨痛体验，他憎恶战争，反对战争，今后决心维护和平，同中国友好，同中国青年友好，“日中不再战”。吴学谦当即表示赞赏他的想法，希望双方为和平、中日友好和中日青年友好而共同努力。后来竹下登在担任首相和

卸任期间，都热心于日中友好，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倾注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好朋友、老朋友。后来吴学谦在北京或东京也经常有机会同竹下登接触交谈，共商中日友好大计。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担任驻日大使期间更是同竹下登接触频繁，共同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我们访日期间，不巧“日青协”会长辻一彦因身体不适正在长野县疗养院治病休养，吴学谦决定和我一起前往看望慰问，并对“日青协”的盛情邀请和亲切接待当面表示感谢。当吴学谦在长野县疗养院内病室同坐在床上的辻一彦会长热情握手时，辻一彦会长十分感动，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谢，说我们访问日程繁忙，每天很累，还特地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看他，真有些过意不去。不过他能结识中国“全国青联”的负责人吴学谦，也十分高兴，希望我们今后永远合作下去。这时，吴学谦特地把从北京带来的以“全国青联”名义邀请辻一彦会长在身体康复后随时访华的函件交给了辻一彦，强调这是中方诚心诚意的邀请，只要辻一彦会长方便，什么时候来中国都欢迎，并介绍了在北京西郊新建的亚非学生疗养院情况，说必要时还可以在那里治疗休养。辻一彦会长感谢中方的好意。

翌年春季，辻一彦会长来中国访问两个月，并在亚非学生疗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成为该院建成后接收的第一位日本客人。后来辻一彦经常来往于中日之间，为开展中日友好合作与交流而奔波，每次来北京，只要有可能，吴学谦和我总会同他见面交谈，成为能够谈心的好朋友。在前不久出版的辻一彦著作《日中青年友好五十年》中，还刊载了“全国青联”副主席吴学谦1959年参加在开罗召开的亚非青年会议国际筹委会回到北京、看到辻一彦来信后而写的一封回信全文，说明辻一彦很认真地珍藏着这些友好交往的见证。1971年，辻一彦当选为日本国会议员，在前期为社会党、后期为民主党议员的长达22年议员生活期间，他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和青年之间的友好交流，

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6年“日青协”代表团首次访华和1957年“全国青联”派出的中国青年代表团首次访日，成为中日两国青年组织在艰苦年代开拓友好交往的大事，通过双方努力，终于冲破阻力，向前迈出一大步，为今后中日两国青年更广泛的友好交往铺平了道路。

二、推动实现胡耀邦总书记访日

胡耀邦担任党总书记后，日方一直希望能邀请胡耀邦总书记尽早访日，1982年秋铃木善幸首相访华时，代表日本政府向胡耀邦总书记发出了正式邀请。对此，吴学谦强调，从加强对日工作、发展两国关系的角度看，我应该对此事持积极态度，促成胡耀邦总书记访日。后中曾根担任首相，还特地派首相特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堂进访华，再次发出恳切邀请。二阶堂进特使访华时，胡耀邦总书记正在武汉视察工作，吴学谦外长特地陪同他乘机前往武汉会见胡总书记，双方谈得很好，胡耀邦总书记对其邀请表示愿积极考虑，二阶堂进十分高兴。

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应邀访日，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作为主要陪同人员随行，协助总书记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胡总书记把这次访日目的概括为30个字：谋求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实现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为了实现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通过胡耀邦总书记和中曾根首相的会谈，双方同意成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主要着眼未来，为发展21世纪中日友好事业提出积极建议。访日期间，胡耀邦总书记还向日本各界青年集会发表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邀请日本各界青年3000人于1984年秋季访华，举行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引起日方热烈反响。吴学谦对此都积极赞同，认为这具有深远意义。

胡耀邦总书记11月29日抵长崎访问，30日下午由长崎回国。外国主要领导人过去很少访问长崎，中国主要领导人访问长崎更是第一次。在长崎受到隆重热情接待，同时高田勇知事向我传话：希望胡耀邦总书记访问长崎期间，能对长崎县多年来一直要求设

立中国总领事馆问题给予积极回应。事出有因，原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1971年，两国关系处于困难时期，当时的长崎县知事久保勘一就对中国十分友好，在他的推动下，县议会于7月通过要求日中恢复邦交的决议，还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认为应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联合国大会很快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给日本政府以极大冲击，也给同日本有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沉重打击。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久保勘一知事立即率团访华，向中方正式提出在长崎设立中国总领事馆的要求，这在日本全国各自治体中是第一个。在1976年中国设立大阪总领事馆、1980年设立扎幌总领事馆后，长崎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了。

胡耀邦总书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在他的房间召集吴学谦和我等人进行磋商，吴学谦明确表示，考虑到长崎一贯对我友好，特别是在中日关系困难时期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新中国，给予我宝贵支持，对其设立总领事馆的要求不宜拒绝，可否表示原则同意。最后胡总书记表示赞同。

在29日的晚宴上，当高田勇知事当面向胡耀邦总书记提出希望在长崎县设立中国总领事馆的要求时，胡总书记当即给予肯定，表示原则同意，并鼓励长崎县发扬好的传统，继续为中日长远友好努力。高田勇知事十分高兴，一再表示感谢，说这是胡耀邦总书记送给长崎县民的最好礼物。

1984年12月，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同意中国在长崎设立总领事馆，1985年5月，总领事馆开馆，长崎县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

三、参加明仁天皇即位典礼，积极促成海部首相访华

1990年11月12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在东京皇宫举行即位典礼正式登基，继承皇位。

战后，根据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不拥有实权，不参与政治事务，但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天皇在日本国民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因此明仁天皇即位典礼也受到各国的重视，纷纷派出主要领导人参加。

考虑到中日友好关系，吴学谦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来日参加明仁天皇即位典礼。当时正值1989年春夏那场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进行制裁，我正在推动日本率先取消制裁，争取尽早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吴学谦副总理利用在日本停留三天之机，除参加重要庆典活动外，主要是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日方领导人和政界老朋友，阐明我国内稳定和改革形势，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为使两国关系尽早走向完全正常做了大量工作。会见中山太郎外务大臣时，吴学谦副总理赞扬他对两国关系的重视并欢迎他尽早访问中国，中山说他从1989年8月就任外相以来，就把日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课题，主张为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不应孤立中国。

吴学谦还会见了竹下登、宫泽喜一、伊东正义、渡边美智雄等老朋友，反复表明发展中日友好的重要意义，并希望他们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推动海部俊树首相尽早访问中国。

在海部俊树首相会见吴学谦副总理时，吴学谦表示欢迎海部首相早日访华，希望首相继续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发挥更大作用，海部首相允诺再作努力。

吴学谦结束了出席明仁天皇即位典礼的活动，在离京回国前，还特叮嘱我说，要把推动海部首相早日访华，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如果海部首相能在国家政府首脑中首先访华，不仅表明中日关系完全走向正常，而且在全世界也会产生很好影响。

在吴学谦副总理和我国政府有关各方面积极推动下，1991年8月10日至13日，日本海部俊树首相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次访问是1989年春夏风波后，国家政府首脑中第一个来中国的正式访问，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已恢复正常；我打破西方国家制裁的斗争，在两年零两个月后已取得重要成果。这也为中日关系面向未来，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

我失去了尊敬的战友

——致朱良夫妇信

亲爱的朱良和谭雅修两位先生：

我现在陷入深深的悲哀中，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了吴学谦先生逝世的报道，真是感到很痛心。

从1951年晚春，我在共青团国际部见过他以来，已过了50多年了。我留在共青团时，他教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活动，关心其他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那时候我很年轻，经验很少，而且幼稚，他的话语让我头脑明显觉醒并对我产生了强大影响。不仅这样，我们共青团干部在宿舍里共同生活时，他和他的夫人毕玲同志给我很大生活上的帮助。

至今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不能忘记他们亲密如兄弟般的关照。

我今天失去了伟大的尊敬的战友而陷入深刻的悲哀之中。

请您们向毕玲夫人转达我的深深哀悼之意。

细川清志敬上

2008年4月6日

我和他的友情将永恒不变

——致毕玲女士的信

亲爱的毕玲女士：您好！

前几天收到您寄来尊敬的吴学谦先生的画册，非常感谢。

凝视画册中的照片，我再次想起和他的许多令人怀念的过去。

从每张照片中，都好像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他说，在“文革”的时候，我被下放到农村时，中央指示我们每天给农民们发送《人民日报》，我很不情愿。但是那时和我下放到一个村里的胡耀邦同志对我说，“重要的不是报纸，而是通过发送报纸和农民们接触。通过这个机会，可以和农民多交流，多了解实际情况，这样才会把中国搞得更好！”

他的这番话，使我恍然大悟。

吴学谦先生被任为外交部长时曾对我说过，“没有中国的稳定，就没有世界的和平”。

在还年轻的日子里，您们在团中央的院子里拍的照片，好像对我说“田村三平，看我的儿子，长大了吧。”

读了您在吴学谦先生80岁诞辰时送的诗，“雪松志，寒梅骨，风竹情”我非常感动。整篇诗里充满了您对他的无限的敬意，深深的爱意和无私的关怀。

我会永远珍惜这本画册，倾听从画册中跃出的他的声音，我和他的友情将永恒不变。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更加长寿！

您们永远的朋友：细川清志

于2008年8月2日在大阪茅舍写

（毕玲注：信中的田村三平是细川的假名。）

回忆吴学谦副总理在对台工作上的重要贡献

· 唐树备 ·

奉命筹组国务院台办

吴学谦副总理大约是于1989年年底，奉命直接参与领导和管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台工作。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一中全会后，学谦同志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3月起，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此后，就由钱其琛副总理接替他参与领导和管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台工作。

我是1988年2月从华盛顿奉调回外交部，结束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历时4年半的驻美生涯。当时，外交部原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调任驻外大使，我接替他留下的职务。

大概是这一年的10月某一天，我接到外交部办公厅的通知，要我去北戴河参加一个会议。到达北戴河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后，发现应召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我以外，还有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李庆洲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耿文清局长、外经贸部负责台湾投资贸易的安民主任。当天晚饭后，我们一起走向海滨，面对后浪推着前浪的大海，迎着阵阵吹来的海风，一边散步，一边猜测和议论明天即将参加的会议的议题和内容。

第二天，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吴学谦、丁关根和我们四个人，开了半天的会议。吴学谦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的决定，他要我们汇报各自所在部门台湾工作的情况和任务、编制，并就拟设立的这个新机构的任务、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以及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已有的台湾工作部门的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

原来，1987 年 11 月，蒋经国决定开放台湾老兵前往大陆探亲，开始打开了台湾和大陆间几十年来被人为强制停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老兵回大陆探亲，引起了随之而来的台湾居民来大陆的旅游接待、两岸经贸往来和投资、两岸交流、婚姻嫁娶、财产继承等一系列涉台事务。原来的党内台湾工作机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已不能适应两岸之间民间往来蓬勃发展的形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筹组有行政和管理职能的政府台湾工作机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由于一些部门已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开展了对台工作或已经设置了对台工作机构，但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因此，会上的意见是，国务院新成立的台湾工作机构，应当起代表国务院协调和管理、指导各部门、各地方对台工作的作用。我想，以后应当是经吴学谦、丁关根研究并报中央批准，确定国务院台办工作的“八字方针”：协调、组织、管理、指导。中央已任命吴学谦兼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丁关根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国务院台办主任。而兼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的，是时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

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在中央的领导下，努力贯彻小平同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就台湾形势和对台工作中的重大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中央批准后执行。受杨主席委托，吴学谦同志还经常主持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碰头会，就台湾形势和对台工作中的重大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凝聚共识，形成政策选择，报请杨主席决策或必要时报请中央批准。那时，我作为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

主任，有时列席杨主席召开的中央对台工作小组会议；经常出席吴副总理主持的对台工作小组碰头会。

根据中央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具体领导对台工作策略和部署的调整

吴副总理直接参与领导和管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台工作的时间，大概是三年多一些，不算长。但是，这一段时间，正是国际形势和台湾内部形势开始发生大变动的时刻，也是我党对台工作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和政策的重要时刻。

就国际形势而言，1990 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这种现象使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共同对付苏联扩张的战略基础，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在新形势下，美国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多方遏制中国的发展，而台湾问题是它可以利用的一张牌。美方加强了对台湾的分裂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以牵制中国的发展。1992 年 9 月 2 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违背中美“八 · 一七”公报，宣布向台湾出售 1949 年以来的最大一笔军售、价值近 66 亿美元的 150 架 F-16A 型和 F-16B 型战斗机，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就台湾岛内形势而言，蒋经国 1988 年逝世，结束了在台湾长达 39 年的“两蒋”统治，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内的台湾分裂势力上台。立足未稳的李登辉，在上台初期，为了巩固他的权力，需要尽可能稳定两岸关系，需要争取主张“反共复国”的国民党内传统势力和反对台湾独立的民众的支持，因此，在改善两岸关系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或做出了某些姿态，如继承了蒋经国开放大陆老兵来大陆探亲的政策，并实际上有限度地逐步放松了台湾民众来大陆旅游、间接投资和各项交流；部分改变了“两蒋时代”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与大陆方面进行事务性接触商谈，后又同意进行汪辜会谈；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声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一部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两岸的国际争端”；由他身边的人与我党建立秘密接触渠道等等。

但是，随着逐渐排挤了原来掌权的国民党内的传统势力，一心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李登辉，在本土化、民主化的口号下，从隐蔽到后来逐渐公开制造“两个中国”。他借1991年5月1日台湾当局“结束勘乱时期”的机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提出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访问大陆，主张“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官方接触。他后来谈起当时的考虑时强调：“我国在民国八十年五月一日终止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已宣布内战停止，承认北京当局是个国家，但台湾也是主权独立国家”。

上述国际和岛内新形势表明：和平统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统一将是长期的过程。需要制定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方针、任务，作出新的工作部署。

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说过，蒋经国一死，关键问题就会出来。后来的形势发展表明，小平同志所谓“关键问题”，应当就是指台湾分裂势力猖狂进行分裂活动的问题。小平同志还指出，要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台湾的地位就稳定了。在中央的领导下，学谦同志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配合杨尚昆同志，具体主持了对台工作策略和部署的调整，抓住机遇，绕过暗礁，顶住逆流，推进了和平统一进程。

组织和主持第一次中央对台工作会议，确定新形势下对台工作方针、任务

中共中央决定，在1990年年底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中共中央召开的除台湾以外的全国性对台工作会议，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出席。根据杨尚昆主席的委托，文件起草工作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成员朱穆之同志主持，参加的有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台办、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等部门的同志。我奉命率国台办研究组的同志，参加会议文件起草工作。起草工作在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一幢小楼内进行。文件草稿出来后，学谦同志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的负责同志讨论、修改文件，并原则通过了这个文件草稿，在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由吴学谦报请杨尚昆主席和中央原则批准。

1990年12月6日到13日，全国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宋平、李瑞环等出席会议，并会见了全体代表。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还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由吴学谦主持，他在会议开始时和结束时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

经过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贯彻了邓小平对台工作的新判断、新对策。会议实际上调整了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规划和部署，改变了把两岸统一谈判列为当前首要任务的主张，强调“谈判可以在高层进行，也可以先从较低的层次开始。可以先谈统一问题，也可以先谈如何促进两岸双向交流，实现直接‘三通’。”“当务之急是要加强两岸的联系”，“对于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要进行广泛的接触沟通”。“应当进一步扩大人员交往和各种交流，特别是加强经贸往来”。杨尚昆对会议的报告中，形象地把当前的对台工作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两个基本点”，一是两岸经济合作，一是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

我记得，在学谦同志召开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碰头会讨论会议文件草案时，对李登辉是否会搞“台独”和我对他的政策，曾进行过讨论。尽管会上有的同志认为李登辉实质上就是“台独”分子，但会议仍一致同意以李登辉为谈判对手，“对于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的言论，以及缓和两岸关系，放宽双方交往的措施，应予热诚欢迎；对于台湾当局推行‘一国两府’、‘弹性外交’，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姑息‘台独’活动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以上引文见199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共中央召开对台工作会议的新闻。）

这就是说，李登辉走一个中国的路也好，走“一国两府”、“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姑息、支持态度的路也好：他有两手，我也有两手；在国际上，我毫不动摇地贯彻“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既定立场，在岛内，我要在“广泛接触”和“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面下工夫，使两岸人民在经济上有共同利害关系、思想上增加了解和相互理解、感情上趋向密切和融合。做到了这些，那么，如果李登辉是真的想发展两岸关系，我的上述做法对李登辉是助力；如果李登辉走的是分裂路线，我的上述做法就是对李登辉是牵制和遏制，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迂回包围。

李登辉在1993年汪辜会谈后公开亮出底牌，大陆方面不在国际上容忍“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在两岸关系上不接受李登辉所谓的“分裂、分裂分治”，台湾当局就阻挡两岸经贸交往和合作，搞“戒急用忍”，千方百计拖延两岸海、空直航。陈水扁上台后也继续了李登辉的上述策略。李登辉、陈水扁的上述策略，是建筑在这样的估计上：大陆现代化建设需要台湾的资金、管理经验和外销管道，因此，为了吸收台湾的资金、技术，会在一个中国这一原则问题上让步。

但是，大陆方面坚信，两岸人民同文同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陆改革、开放的巨大商机，是对台资的不可阻挡的吸引力，两岸经贸和人员交流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我完全不应当、也不必要为了促进两岸经贸合作而放弃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相反，在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和人员交流时，应当坚持反对分裂、反对“台独”的斗争。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两岸经济上密不可分的局面已经形成。2008年11月，“海协”和台湾“海基会”签署协议，确定两岸进行海空直接通航；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空前频繁；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更加巩固；反对“台独”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岛内形势和两岸关系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事实已经证明：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在学谦同志具体主持下，通过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形成的、后经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并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对台工作部署和基本策略，以及形成上述部署和基本

策略所依据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是正确的、成功的。

考虑到我党提出的国、共两党谈判的主张，台湾方面表示难以接受，因此，在为1990年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准备的文件草稿中，提出了“海峡两岸有关部门或个人以适当名义接触、商谈”的意见。上述意见，经吴学谦主持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讨论，并提交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讨论通过、报经中央正式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定了下来。这是适应台湾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两岸谈判名义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新举措，对后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成立和两会接触、商谈得以进行，确立了政策依据。

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不久，在吴学谦的推动下，经中央批准，以王兆国为主任的国务院台办和以杨斯德为主任的中共中央的对台工作机构，实现了“两办”合并。王兆国担任合并后的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两办”合并的新的对台工作机构，一直延续至今，实践证明，大大有利于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管理和组织各方面力量贯彻执行中央的对台工作部署和政策。

宣布“海协”与“海基会”进行接触商谈。指导“海协”与台湾方面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1991年11月7日，吴学谦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率海基会访问团来北京，就合作打击海上犯罪活动的程序问题交换意见的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

根据中央的决定，吴学谦向台湾方面宣布大陆方面决定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他告诉陈长文：这个民间团体今后合作的主要对象是“海基会”，当然也可以与其他愿意促进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台湾团体和人士合作；主要的工作目标是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和双向民间往来。为了积极推动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团体将接受有关方面的委托或授权，处理有关两岸往来中具体问题和涉及两岸事务性问题的商谈。吴学谦说：“我们成

立民间机构是为了扩大现有的两岸民间往来，增进两岸的沟通与了解。台湾当局的一些领导人一再表示希望我们成立一个这样的团体，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成立了这样一个团体，以便就两岸事务性问题接触商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基本方针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仍然坚持一贯的主张，由国共两党尽早接触，商谈祖国统一问题。在统一之前，两岸先开放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

1992 年 3 月，经王兆国主任批准，台办向吴学谦上报了《与海基会商谈中有关一个中国原则表述问题的请示》。

该《请示》称，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将于 3 月 23 日同台湾“海基会”就两岸公证文书的使用和开办两岸挂号函件的查询、赔偿业务进行商谈。此次虽属事务性商谈，但是否需要在协议文本中直接表述“一个中国”的原则，将对两岸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对今后两岸其他的事务性商谈起到某种示范作用。

考虑到台湾方面的立场，为有利于商谈和达成协议，《请示》提出了在不失大陆方面既定原则下变通处理的四种方式，即：

1. 不直接在协议中写明“一个中国”原则，但应表明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2. 如台方也不同意，拟以备忘录形式，写明“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属于“中国国内事务”，但不对外公布。

3. 如仍不能达成共识，双方在就“一个中国”的原则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各自向记者口头公开表明立场。

4. 在协议中写明：“海协认为商谈的问题均属中国的内部事务，双方据此进行商谈并达成协议。”

如对方对上述四种方式均不接受，为有利于两岸民间交往，我可同意与“海基会”作个案处理。同时公开表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主张。

吴学谦于 3 月 20 日在上述请示上亲笔批示：

“同意。看来对方想在文书验证问题上突破一个中国的原则，应予警惕，不能让其得逞。我们应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实事求是，灵活处理各类问题。同时，思想上要准备。对方态度上

横蛮，不讲道理，达不成协议。”

由于大陆方面坚持要在两会商谈中明确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要台湾“国统会”研究对策。“国统会”从1992年4月起开始研究，同年8月1日，李登辉主持“国统会”，通过了关于一个中国内涵的结论，其主要论点是三层意思：

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含义有所不同”，“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大陆，目前的政权仅及于台、澎、金、马”。

二、“1949年以后，中国暂时处于分裂的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两岸”。

三、台湾当局已制定《国家统一纲领》，“开展统一步伐”。

“海协”经过研究，建议以“海协”负责人发表谈话的形式回应台湾当局上述文件，经兆国报请吴学谦批准，新华社在1992年8月27日公布了“海协”负责人的谈话。谈话指出：

“8月1日，台湾有关方面就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与我会商谈事务性协议时有关‘一个中国’含义问题做出的《结论》中，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我会认为，明确这一点，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

我会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含义的理解。我们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立场是一贯的”。

“海协”负责人在谈话中建议：“双方在上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应迅速恢复并推进事务性商谈，争取积极的成果。”

正是经吴学谦批准的这个公开谈话，以及李登辉主持的台湾国统会通过的上述《结论》，为“海协”与“海基会”达成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提供了基础。

此后，两会在1992年10月底、11月初在香港举行工作性商谈。1992年11月16日，在香港会谈相互交换意见的基础上，“海

协”根据吴学谦的上述批示和经批准发表的“海协”负责人公开谈话的精神，将“海协”关于事务性商谈中口头表述的一个中国的要点函告“海基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函中并附上“海基会”在香港会谈中提供的口头表述：“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在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的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两会领导人汪道涵、辜振甫1993年在新加坡、1998年在上海，先后举行了汪辜会谈和汪辜会晤，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达成了开展政治、经济对话等四项共识。两会负责人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级共计进行了十多次商谈。尽管李登辉1999年抛出“两国论”后和陈水扁2000年上台后均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但随着台湾当局新领导人2008年就职后，双方确认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搁置争议，两会商谈揭开了新的一页。“九二共识”对实现两岸接触商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正是学谦同志，当年指导了“九二共识”的具体形成。

指示台办起草《白皮书》，向各国政府阐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起草该《白皮书》的缘起是，学谦同志随同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出访一些国家时，发现有的国家的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他感到有必要起草一份外交文书，系统地阐述上述有关问题。出访归来后，根据吴学谦的指示，台办商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决定成立部际的起草《白皮书》领导小组，由外交部、中宣部和台办负责同志参加，抽调了台办、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部

分同志，具体负责写作，历时多月才完成。后经中央领导审定，在1993年9月1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前夕，以国务院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的文书。这是中国政府第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被译成多种外文，由中国驻外使馆送交各国政府。也是在这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台湾当局策划了由与“中华民国”“建交”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七个中美洲国家，致函联合国秘书长，第一次正式提出台湾“重返联合国”案。上述《白皮书》的及时起草和公布，有力地配合了中国政府当时反对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等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斗争。

学谦同志为推动两岸经济交流、维护台胞正当权益、促进两岸交流，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下面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例。

例如，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台商投资项目，由于有关部门间认识不尽一致，难以落实。他在江泽民总书记主持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自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明了应该批准这个项目的理由。会议讨论后，有关方面批准了这个项目。也由于某些实际情况难以解决，学谦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还陈述理由，建议中央拨出一笔专款，支持两岸青少年交流。中央原则批准了他的建议。由于我列席了会议，目睹了学谦同志为此而作出的努力。

又例如，关于批准成立和管理台资企业协会的问题，由于事涉民政部、外经贸部和台办，职责划分和如何具体操作，有关部门间有不同意见。学谦同志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邀集了上述单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定了各有关部门在台资企业协会批准和管理工作方面的职责，并形成了文件，从而推动了台资企业协会的成立和日常管理。

又例如，北京举办亚运会，台湾体育代表团的名称是“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有关部门间看法不一致。学谦同志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同意在入场式和赛场上及亚运会组委会的官方文件上，一律采用“中华台北”，并通过民间方式，与台湾方面达成协

议，从而促成了台湾运动员 1949 年以来第一次来大陆参加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再例如，学谦同志和时任主管文教的副总理李铁映，共同批准在大陆设立台商子弟学校，允许聘请台湾同胞担任学校负责人、聘请台湾老师来校任教，在对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词句进行适当处理后可以采用台湾的教科书授课。这一开创性的政策，受到台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现在已在东莞等地建立了三所这样的学校。在这些学校毕业的中、小学生，他们的学历为两岸所承认。

（作者原任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悼念吴伯伯

——致毕玲阿姨的信

毕玲阿姨：

四月一日与明霞阿姨通电话，得知您为了吴伯父病危之事，每天至医院关心探视，晚心里亦担心不已；孰料昨日突见台湾第一大报联合报刊载“前中共副总理吴学谦病逝”之新闻，始知吴伯父已于四月四日过世，晚在此谨致深深哀悼之意，愿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并请您节哀顺变，以保重身体为要。

以吴伯父一生对中国之贡献，尤其在外交及对台工作上，实系不可多得之人才，其先知远见，为中国建立了极为稳固的基础，并在十多年前即主张“引进台资”，让双方的关系自紧张中获得苏解，将两岸人民之心声化为实践，这些伟大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会留白的。

由于吴伯父之过世，您多年来所担心记挂的事，应可放下，此后您及明霞阿姨更要为自己好好保重，颐养天年。

谨附上台湾报纸刊登吴伯伯病逝新闻一张，由于字体甚小，怕您不便阅读，晚另作一张放大的复印件，请阅。

毕玲阿姨，请千万保重，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是我们的宝，让我们晚辈再有机会与您相聚，共叙家常。

晚：陈杰敬上

2008 年 4 月 7 日

（毕玲注：此文作者陈杰系毕玲在中学时期同学缪进兰女士之子，缪已去世）

附：台湾媒体报道《吴学谦病逝》

［记者蓝孝威 / 台北报道］前中共副总理吴学谦，前天上午在北京病逝，享寿八十七岁。

吴学谦，上海市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外长、国务委员、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主管中共对台事务。

1988 年至 1993 年，吴学谦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国家主席杨尚昆担任组长，吴学谦是副组长。

吴学谦负责对台工作期间，强调大陆必须充分利用台资企业，一方面协助当时力图改革开放的大陆加速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希望借此遏制台独，达到“以民逼官、以商围政”。

吴学谦到大陆各地视察，常叮咛当地官员“多搞一些包括商业在内的引进台资项目”。他说，在经济上，如果大陆有许多台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台湾的台独就搞不起来，外国势力要搞，台湾的民众也会反对。

吴学谦说，从政治上来看，如果能吸引更多的台资到大陆办好企业，特别是大台商，搞上亿元的项目，对促进两岸共同发展来说是好事；两岸要多交流，除了吸引台资外，民间的交流也要做，各个领域的来往都要展开。

对吸引台资，吴学谦主张，“对台湾经济要放手搞，要敢于利用台资，让台资来得越大越好，同时也不放弃小的，中小的也要；台湾中小企业愿意到大陆来，因为台湾市场有限，而我们市场大。”

为了吸引重量级台商登陆，1992 年，吴学谦和当时担任国台办主任的王兆国，联袂至台商聚集的厦门经济特区视察，争取王永庆到厦门投资海沧计划，承诺给予台塑企业各种优惠措施，但在台湾当局反对下，台塑停了脚步。

母校发给吴学谦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唁电

吴学谦同志治丧委员会：

惊悉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我校校友吴学谦同志不幸逝世，暨南大学全体师生深感悲痛，特致以最沉痛的悼念！

吴学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吴学谦同志早年求学于暨南大学，是我校的杰出校友。吴学谦同志十分关心我校的建设与发展，曾多次视察我校并指导工作。2006年，时值我校建校100周年，吴老欣然为我校题词并捐款，给我校师生以巨大的鼓舞。

吴学谦同志的逝世，既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也是暨南大学的巨大损失。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早日把暨南大学建设成为特色鲜明、海内外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祈望亲属节哀珍重！

吴学谦同志永垂不朽！

暨南大学

2008年4月5日

清明一生　清明一别

· 徐春柳 ·

4月11日清晨，长安街上显得空荡荡。

共和国副总理吴学谦在这条路上不知道走过多少次，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这条路。儿子吴晓镛捧着他的遗像，警卫局的战士守卫着灵柩，一路平静。

“他以前走这条路是作为参加创建新中国、并为之工作的一个人，最后他完成了自己做的事情以后，最后向八宝山走，我觉得挺自豪，也很感慨。”吴晓镛说。

4月4日清明节，当天上午9点38分，吴学谦去世。吴学谦一生，为官清甚，断事明甚。逝于清明，是天意也是巧合。

那天没有沙尘暴，是一个阳光透亮的早晨，87岁的吴学谦像平时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但生理各项指数开始下降，一家人都围在身边陪着他，直到他离去。

领导学生运动的大学生

1948年1月底，身为暨南大学学生的吴学谦在同济大学发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活动，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学校。在这次运动中，他被暨大校长开除了学籍。直到2001年，在庆祝吴学谦同志八十大寿的日子里，暨南大学送上有80朵玫瑰的大花篮，补发了吴学谦在暨大的毕业证书，并授予学士学位证书。

吴学谦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一个小康家庭，从小上的是英国人在租界办的学校，学校里面的老师大都是英国人，吴学谦的英文正是在那时打下了基础。

吴学谦曾给家人讲过小时候的事情，调皮的吴学谦有时也会

挨外国老师的打，有一次外国老师要扇他，他一低身捡橡皮，老师失去平衡，差点摔倒，把同学们乐得不行。

吴学谦在中学以后家道中落，国家已经陷入了日本人的侵略当中。

喜欢看书的吴学谦接触到一些左翼的进步青年，他们介绍吴学谦看鲁迅的书，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吴学谦很快接触了共产党。

吴晓镛说："我父亲喜欢把问题明了化。比方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怎么做。他的一生当中实际上也用行动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做的就是不能让我们这个国家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地落后下去。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呢？很简单，我们中国人要站起来，中华民族要解放。具体怎么去做，他选择了共产主义、选择了共产党。"1939 年吴学谦正式入党。

革命中收获爱情的青年

吴学谦参与革命的同时也获得了爱情，他的爱人毕玲是上海地下党的老同事，一个非常开朗、有文化的沪江大学的教育系毕业生。

毕玲说："1947 年年初，我和施惠珍同志代表女中区委参加中学工委会，领导人是学委吴学谦。那时和老吴接触越来越多了，了解也渐深了，建立了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毕玲说，那个时候谈恋爱，并没有像现在年轻人那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们也就是在开会时见面，我有时偷偷地送给他一条烟才能说上几句话。那时，我们约定，不到上海解放那一天，绝不结婚。"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他们俩才结婚，并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吴晓镛。

不换房子的"老顽固"

吴学谦一家一直住在中联部分配的老房子里，木头窗户虽然刷了很多漆，但木头都开始开裂了，"因为工作的关系，让我有这个机会接近这位长者，走进他的家进行吊唁，看到吴老家中的一切真的让我惊呆了，堂堂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家中居然如此朴实平

凡。”“凤凰非常道”网站的网友说，他看到了毕玲老妈妈自己泡的糖蒜，老式的彩电，陈旧的家具。

吴晓镛回忆，父亲对这些从来不在意，他是一个平易近人、非常厚道、只会工作不会玩的人。“老爷子不愿意折腾，装修什么的好像一说这个事就是向国家提要求，他们觉得这个房子住得挺好。他的享受就是工作，比方说那时候他还在外交部，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有时候也说周末上哪儿玩玩。一次说去北京的郊区看看十渡挺漂亮的，司机也挺高兴的。可到那里什么也没有玩，照了两张相就往回赶。”

“文革”被关三年的“犯人”

“文革”中，吴学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8 年 3 月份，吴学谦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牢，被单独关押了两年零八个月。

“老爷子讲过，他的床板是木头的，褥子非常薄，而且一定要求你朝一个方向睡，被子不能拉到脖子上，怕你自杀，冬天是非常冷的，不管烧不烧暖气，也得露着肩膀睡。他冬天回家的时候，他的胯骨一侧是黑的，皮被压起了趼子。老爷子能够坚持下来，全靠毅力。”吴晓镛说。

为了找事做，吴学谦在监狱中苦练外语，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翻译报纸，从头到尾哪怕是天气预报，全部背出来，后来开始背《毛选》、《毛主席语录》。

1970 年年底吴学谦出狱到河南干校，继续接受群众监督。这时儿子吴晓镛到了山西阳高农村插队五年，买了些中国的大学英语教材，然后又买了几本简写本的英文小说，也开始学英语，搞翻译。“每个礼拜，恨不得每天都会给他写信。”吴晓镛写信把碰到翻译中的问题寄到河南，父亲看完了寄回来。“这么一来一回要一个月，但我们通了有一百多封信。”吴晓镛在父亲的帮助下，一个对英文毫无基础的人翻译了 60 多万字的小说。

任人唯贤的外长

1982 年到 1988 年，吴学谦到外交部工作，并担任了共和国第六任外交部长。“文革”之后的外交部面临干部的团结问题、派系

的问题、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的问题。本来都是挺好的朋友，“文革”中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了，“文革”完了以后又要在一起工作。在外交部，吴学谦被公认为有威信和凝聚力。据外交部内部人士介绍，他确实任人唯贤。只要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不管以前是参加哪一派的，以前是谁的人，都会用。“他不会记仇，有很强的包容性。他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斗过他，现在工作起来派什么重要的任务，没这个人什么事。他把工作作风带到了外交部，首先是干部团结的问题。”

据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外交活动中，吴学谦该说话时一定会说到底，但并不强势，尊重对方，很少空谈，就问题谈问题。无论是第三世界的小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吴学谦一概诚恳待人，平等视之。其务实作风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并因此收获很多友谊。

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泰国前外长西堤，都与吴学谦有良好的友谊。1988年吴学谦访问英国，杰弗里·豪专门把他请至郊外官邸做客。“一位领导人送给他一本书，是绝版的，拿小羊皮包着，大概是八几年出的书，老爷子对这种礼物非常珍惜，你送一个特别值钱的景泰蓝或者是玉雕，他倒不一定喜欢。”吴晓镛说。

坚持锻炼的“长跑健将”

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8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0周年纪念活动召开前几个小时，长期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的吴学谦突然吐血不止，衣服上全都是血。换了衣服后，吴学谦就硬撑着参加了活动，上台讲了话。等会后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医院时，医生火了：再晚一会儿后果就不堪设想。

吴学谦对待工作的态度让身边的人都很钦佩。“从来没有听说老头子倒时差的，下午三点从海外出差回来了，他四点半就回外交部开会去。”吴晓镛介绍。吴学谦到外交部工作时已经60多岁，“文革”中的监狱与干校的折磨都没有让他的身体垮下来，这要得益于他的跑步爱好。

就是在“文革”中住在单身牢房里时，吴学谦都没有放弃跑步，牢房太小就走对角线。他的牢房除了床以外走对角线三步到头，吴学谦每天在这个小空间里转来转去，走一千多步。他知道，要是不锻炼的话要么残废，要么得精神病。

来到外交部后，他每天从木樨地一直跑到钓鱼台东门，有四五公里的路。一次出访美国，美方的警卫都跟不上他的步伐。这个爱好在吴晓镛记事以来就有了，他回忆说：“我大概不到五岁的时候，他带着我到先农坛体育场看苏联马戏团，去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完了以后出来走另外一个门找不着公共汽车，他一直拉着我走回到团中央，回到家都已经十点了。”

与子对饮笑看回归的老者

香港回归是20世纪80年代对外交往中头等大事。中英谈判的最上层是邓小平和撒切尔，中间层则是吴学谦和杰弗里·豪。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香港1997年回归，老爷子可能还不会那么快住院。他把他的健康献给了九七回归。”吴晓镛介绍，因为九七回归以前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晚上九点多睡觉，早上起来挺早，起来散步，到外面看看。长时间的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对吴学谦的健康有所影响。“但换句话说，你不让他去或许他也会得病。”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完了，在香港工作的吴晓镛到君悦酒店看父亲。“他有点糊里糊涂，因为他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没有睡着，白天又开始犯困。”

但是晚上要放庆回归的烟火，吴学谦跟儿子说，咱们边看烟火，边喝点酒。酒店里面的小冰箱里的酒太贵，他俩让身边工作人员找点啤酒，身边工作人员说你就喝小冰箱里面的，贵就贵点。

“他说这个烟火咱们要看，这是咱们香港回归，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后来我一看，父亲衬衫都有点破了，裤子、鞋子也穿了很多年。”吴晓镛忙给父亲去买新衣服。

在吴学谦任外交部长期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是有服装补贴的，唯独外长没有服装补贴，需要添衣装要申报批准。吴学谦就

很少张口要衣服。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的西服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联部工作时给配发的衣服改制的，还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衣服新，我们好歹还是80年代的款式。”

九七回归后，工作时永不倒时差的吴学谦好像永远倒不回来，白天困了就睡了，半夜两点起来，还把阿姨叫起来烧饭。

“父亲有点糊涂了，后来1998年开始住院了。”吴晓镛很后悔没有跟父亲多交流，“他不是那种很会讲故事的人，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我觉得老头子的故事最终都是他带走了，以后谁也不能替他讲了。”

（此文原载2008年4月19日《新京报》）

“有大美而不言”

· 李景贤 ·

2008年4月4日，吴学谦同志因病在北京辞世。我没有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有过一小段跟随他在新疆考察的经历。每当回忆起这位身居高位，坚决反对搞特殊化，甘当一名普通百姓的老前辈、老首长，我往往欷歔不已，感触良多。

“一叶知秋”

1988年酷夏一天的下午，领导交给我一项比较特别的任务：跟随吴学谦同志去新疆考察调研。他时任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到了首都机场我才得知，这次飞乌鲁木齐，坐的是苏式“图-134”飞机，而且还是“过班机”：从沈阳飞乌鲁木齐，途经北京。我对送行的“中办”同志说，这种机型的安全系数和舒适度都比较差，又没有头等舱。又说，从北京直飞乌鲁木齐，每天都有好几班“波音”。“中办”的同志解释说：“原来是安排坐‘波音’的，但学谦同志觉得，目前这个航班从时间上看比较合适。他说，苏联的飞机也不错，没有头等舱不要紧，这样反而可以给国家省点钱。”记得当过吴学谦同志8年秘书的黄桂芳同志讲过类似的例子。吴学谦同志当上国家领导人之后，一家人一直住在他曾工作过的中联部住宅区，此后就再没调换过房子。有的人曾提出要把老房子稍微装修一下，他不同意，说：“在这里住得蛮好嘛。这种房子归国管局管，维修得花国家的钱，我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那天特别热，阴凉处也有三十六七度。我们陪同吴学谦同志一登上飞机，就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好像进入大蒸笼一样。机舱里已坐满了人，个个满头大汗，叫苦不迭。

因为这是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乘坐的班机，民航部门事先在第一二排给我们一行预留了六个座位。机舱内的座位很小，每排的间距又很窄。个子稍微高一点的人，坐着连腿脚都伸不大开。

吴学谦同志坐下后对我说："这次去新疆，我想选与苏联接壤的一两个地方看看，所以请你一同前往，到时候请给我讲一讲中苏边界的历史和现状。"我说："搞中苏边界，我是半路出家，所知甚少。新疆外办有位叫沈国光的'边界通'，他是上海人，特别精，对中苏边界西段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到时候请他详细向你汇报。"我见吴学谦同志也热得满头大汗，便说："苏联飞机的舒适度比较差，起飞前和降落后，机舱内都是不供冷的。"又说："要是改坐'波音'就好了，可以免受这种'罪'。"他听后淡淡地说："机舱内是闷热了一点，飞起来就凉快了；座位是小了一点，全程只不过飞四个多小时，忍一下也就过去了。"又说："现在坐飞机，比50年代坐苏式'伊尔-14'飞莫斯科，要舒服多了。"

我们一坐下，机长和空姐便过来向吴学谦同志致意问候。机长嘱咐空姐一定要细致、周到地"为首长服好务"。不一会儿，空姐先递上了热毛巾，之后便端着托盘过来，上面摆着七八种饮料，冰镇的和常温的都有，还有花生米、开心果一类小吃。吴学谦同志边拿矿泉水边说："不必送这么多东西来，上点矿泉水就可以了。"

飞机很快就起飞了，爬高之后，空姐又送来一大托盘东西，还问首长感觉如何，身体怎样。我对吴学谦同志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当时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便对空姐低声说："首长特别清廉，不喜欢摆谱。服务时请注意要适度。"没料到，空姐听后却委屈地说："细致、周到地为首长服好务，这是领导反复交代过的。不这样做，就完不成任务，会挨批的！"空姐还是时不时地过来送饮料、热毛巾，一再问首长感觉如何，身体怎样。吴学谦同志显得有点不大高兴，但还是客气地对空姐说："我也是一个普通乘客，应该与其他乘客享受同等待遇，千万别对我搞特殊。"

飞过太原后，机舱内广播"过一会儿就开始供餐"。空姐立即给吴学谦同志送来了菜单，看得出来，给这位首长的餐食是"特

供”的。菜单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客气地说：“刚在家里吃过了中饭，很快就要到乌鲁木齐啦，不必用餐了。”

我曾多次陪同吴学谦同志会见过苏联驻华的使节。每次会见前后，他总是客客气气地与陪见的同志交谈。但是我更深一点了解这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的负责人，这还是第一次。我这次在首都机场和“图-134”飞机上所听到、看到的，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小侧面，但却令我感叹不已：对于许许多多人“梦寐以求”的享受、舒适、惬意，坐在我身旁的这位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的态度却如此之“冷漠”！

一到乌鲁木齐，吴学谦同志便与新疆党、政、军的领导人“约法六章”：自治区的领导人不全程陪同，如有时需要陪，一人就足矣，不必兴师动众；所有人只坐一辆“金杯”小面包；所到之处不搞宴请，不搞群众迎送场面，不送“土特产”；他一概不作指示、不题词。

吴学谦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新疆四五天时间里，自治区只派一两名司局级干部全程陪同。他每到一处，都强调是来调研学习的。吴学谦同志与人交谈时，一律以诚相待，谦和、厚道、实在，丝毫不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只见到他“题”过一次“词”，那是应我的请求，在与我合影的照片背后写下了“吴学谦”三个字。

我听黄桂芳同志说过，吴学谦同志从1938年投身革命工作开始，一生简朴，当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后，依然过着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他家里并无豪华的家具与陈设。他穿的衣服大都是20世纪50年代在团中央工作时做的，有的甚至改了之后又穿。吴学谦同志今年逝世后不久，网上曾流传过一个“吴学谦的‘家产’展”，据说相当轰动，点击率很高。我听一位年轻朋友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一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全部家产，只有几件相当旧的家具，连当今一个科长的家产都远远不如！”

俗话说：一叶知秋。从以上种种不怎么起眼，有些人也许会感到不以为然的细微之处，也可以“知”吴学谦同志其人。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在新疆期间，与吴学谦同志朝夕相处。在餐桌旁，在汽车上，在宾馆的院子里，他常与我交谈，谈世界局势，问外交部情况，聊家长里短。在他的面前，我并不感到拘束，甚至连他是一名大首长，是位老前辈这样的感觉也没有。

吴学谦同志谈的最多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说曾在外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指当过第一副外长、外长），“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在部里影响之大、之深，局外人是难以想像的。”又说：“恩来同志的十六字箴言（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不仅外交部的同志，而且全国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应该终生努力实践。”吴学谦同志在谈到外事工作要“严守纪律”时，颇有感触地说：“恩来同志反复强调外交人员是‘文装的解放军’、‘外事无小事’。他之所以在第四句话的‘纪律’两字前面特意加上了‘严守’二字，是因为外交工作有其特殊性，面对的是外国人，必须慎之又慎。”还说：“在外交部工作时，常听同志们提起王幼平同志的那句名言——‘外交工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一位老革命、老外交的经验之谈。”接着，吴学谦同志给我讲了两个亲历的“事故”，让我们这些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引以为训，“在工作中，举一反三，时时处处‘如履薄冰’”。

这两次事故都发生在南京。有一次，吴学谦同志陪外国一位重要领导人在那里参观访问。这位贵宾前往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纪念馆参观时，一下车就吩咐“赶快将花篮往前面抬”！没成想，对方礼宾官竟把此事给忘了。贵宾顿时生气起来，说：“今天是专门来看我的老朋友的，可你们竟然连花篮都不给我准备！”随行的对方人员一听，一个个吓得脸色发白。吴学谦同志讲完这件事之后说：“发生这样的事，我方也不是没有责任。这里面有两个教训，一个是人家的，另一个是我们的。我方的教训在于：这么重要的一位国宾，他又前往这样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否要准备花篮，事先应主动与对方沟通，万一人家忘记了，也好提个醒。”

另一个“事故”发生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责任则全在我方。

这位贵宾参观完纪念馆后，本来要放映一部介绍周恩来同志生平的影片。当时用的是两部移动放映机。万万没有料到，片子一放就卡在盒子里，两部机子轮流试放，怎么都放不出来，急得放映员满头大汗。七八分钟过后，贵宾站了起来，冷冷地说："电影不看啦！"贵宾走后，我方人员立即开了个现场会。江苏省一位领导人很恼火，厉声质问："放映前试过机没有？"放映员沮丧地说："没有，我太大意啦，从前放过几百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幸的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句老话再一次应验了。

吴学谦同志此行到中苏边境地区去过一次。他熟悉两国边界问题，十分关注1987年2月开始举行的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他说："小平同志的决策很对，还是尽早把这7000多公里的边界划定下来为好。"对于第一、二次中苏边界谈判，吴学谦同志也多次谈到。他谈到、问到了许多问题，每次都很客气，常常用"不知这样看对不对"、"希望你讲一下"这类谦词，让我这个晚辈觉得面前这位老前辈真是人如其名。他问得很细，比如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双方目前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难点，等等。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跟随吴学谦同志在新疆考察调研的难忘时光，感触良多。他长我十八岁，按理说是我的长辈、首长，但在我的心目中，吴学谦同志更多的是个普通百姓，与你我他一样普通。

吴学谦同志一生敬重周恩来同志。在他的身上，也能看到这位世界伟人某种令普通百姓特别怀念的"特质"。这里可以借用庄子一名句说：吴学谦同志"有大美而不言"。

哭好官吴学谦

·李兴华·

肩负凌云万丈才，
一生抱负处处开。
疾恶如仇同敌忾，
笑对民众壮志来。
廉政洁身为人范，
论理议治外交彩。
卧病苦熬逾十载，
乘鹤西飞举世哀。

敬爱你的老百姓李兴华挽
2008年4月6日

（注：李兴华是与毕玲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同学。）

我的哥哥吴学谦

· 程惠甄 ·

11岁那年，我和父亲到上海去喝表哥的喜酒，在酒桌上父亲和伯父（哥哥的父亲）聊天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在北京有个哥哥。当时我年纪还小，觉得北京是首都，很遥远，很神圣，在北京工作的人都很有出息，慢慢就淡忘了这件事情。

直到1983年，有一次碰巧苏州的表哥张兆祥问我："你知道大辛（哥哥的小名）在北京做领导了吗？你认不认识？"我这才回忆起以前的事情，心里想好多年了，我认识的。于是我很冒昧地写了一封信到北京，信里提起我的父亲程志鹤。哥哥一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就知道是他的叔叔，很快就和我联系了。我听我父亲说，我们姓程是姓的奶奶的姓。

当年12月份，哥嫂就来信，邀我去北京。12月10日，我第一次到北京。当时天气很冷，已过花甲的嫂子到火车站来接我，火车晚点两个多小时，见到嫂子时她神情非常焦急。接到我后，嫂子和我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才到他们家。哥哥早已在门口等我了。看到我，哥哥眼里满是泪水，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妹妹，我想不到在乡下还有一个妹妹！"哥哥一家人对我都很热情，把我当他们的亲人。哥哥对我说："妹妹，从现在起我家就是你娘家，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他一点也没有官架子，我很感动，来时的担心也没有了。

哥哥嫂子先让我好好地休息了两天，到第三天晚上，哥哥就和我拉家常，主要问我这么多年的生活情况。连续聊了三个晚上，从哥哥的话语中感觉到充满了遗憾，因为没有能早一点和我联

系。他一直说妹妹一个人在乡下不容易，哥哥没能照顾到，现在好了，我们团聚了。

哥哥还通知了在北京的贾月珍表姐，让她陪我四处去逛逛。有一次我们两个人逛的地方多了，就忘了时间，到了晚上九点四十分才回去，把哥嫂急坏了。

哥哥一家人对我真的很好。有一个休息日，哥哥和我说："妹妹，你来北京我还没有陪你出去过，今天开车陪你出去一次。"那天我们都特别开心。

我第一次到北京住了两个月，后来就每隔几年去一次北京。嫂子一直嘘寒问暖，问我在北京生活是否习惯，每次来回都要给我买好火车卧铺票，准备好吃的东西。嫂子有一次开玩笑说："妹妹，家里的饭盒都被你带光了。"平时哥哥上班，嫂子离休在家，一直陪我。有一次嫂子带我去故宫后花园，进门看见一棵树，树上有两个树枝。嫂子就对我说："妹妹，这棵树就像你哥哥和你，同是一个根，生出两个分支，你们是亲人哪！"我至今记忆犹新。

哥嫂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记得那次哥哥从美国访问回来，嫂子正在感冒，他们儿子又不在身边，嫂子就让我去接。因为知道我要晕车，嫂子帮我准备药和很多东西。飞机误点，哥哥下飞机看到我很吃惊问："你怎么来了？"在回家的路上，因为他知道我晕车难受，所以在车上没抽一根烟，也没有和我说话，让我好好休息。

后来，我的子女也到北京看望舅舅。每次哥哥看到他们就要对他们说："年轻人要好好工作，做人要正派，要任劳任怨，不要因为舅舅当大官了就在外面招摇，你们要凭自身的真本事，给舅舅树立好的影响，舅舅革命了一辈子，靠的都是共产党。"

2006年4月，我到北京看望病中的哥哥，哥哥在病床上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听嫂子讲妹妹来了，他老泪纵横，我的眼泪也一直在流。心想哥哥干了一辈子的革命，老了得病，国家尽全力医治，但是没能医好，实在太遗憾了。哥哥是国家的好干部。从我第一次到北京，到后来二十几年，哥哥家没什么变化，一直都很

简朴。房子是国家分配的，家具都是老式的，我感觉和乡下的家具差不多，有的还不如。想想哥哥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真的是我的好哥哥。

嫂子在哥哥病重期间，还不忘联系我们，一直给我们寄东西。我对我的子女说："你们一定要听舅舅的话，好好工作，不要走歪门邪道，要正派做人，这样才能对得起你们的舅舅。"

（注：程惠甄是吴学谦堂叔之女，随祖母之姓）

舅舅教我如何面对困难

· 杨纯宝 ·

我自幼丧母，由外祖母照顾。1959年舅舅舅母把我接到北京，与他们一起生活。舅舅平时工作很忙，但他很喜欢晨练和散步。有时会让我陪他一起散步。在散步的时候，我和舅舅无话不谈，大到国内外形势，小到生活琐事。经常是舅舅出话题，我谈自己的看法，发表议论，再由他点评。这样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让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围绕着如何面对困难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国际上的逼迫、国内政策上的失误，天灾人祸使我国的经济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衣、食、住、行样样困难。当时在我看来，人人都在为衣食奔命，没有了理想，也看不见前途。但是舅舅却告诉我，面前确实有很大的困难，但对困难却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有的人一味强调困难，这也办不到，那也不可能，终日怨天尤人，空自叹息，无所事事，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困难依旧存在。另一种人面对困难不怕难，千方百计想办法，实实在在做事就能克服困难。只要大家参与，坚持下去，一定会做出成果的。

当时党中央号召大办农业，舅舅鼓励我大学报考农业机械专业，我听了舅舅的话，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大学新设立的农业机械系并被录取。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西北工作了十几年，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有了面对困难的正确态度，

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困难。

现在舅舅去世了，我也成了退休的老人。但是如何对待困难我一直记在心中。我还把这些观念教给了我的孩子，我相信只要他们学会了，也会和我一样，终生受用。

（2008 年 10 月）

追思表哥吴学谦

· 贾春龙 ·

表哥吴学谦如今已离开我们而去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外祖父吴杏林(吴学谦之祖父)原来是马车夫出身,家境十分清贫。后来靠勤俭节约积蓄些钱自己开了车行,办起了加油站,又在自家弄堂口开了一家小米行。

我外祖父生有一男三女,儿子吴增荣(吴学谦的父亲,也是我的舅舅)和三个女儿。吴学谦从小就过继给住在苏州的大姑妈,故称大姑妈为继娘;二姑妈吴仁娣(我的母亲),他称呼为大娘娘;还有一位小姑妈。除了他继娘在苏州外,其他兄妹均住在上海。那时,我们贾家因子女多,生活和居住都很困难,多亏外祖母照顾,帮我们在原上海新成区(今黄浦区)梅白克路(今新昌路)481弄483号(颐康里)的弄堂口上面搭建了一间楼房(上海人称为过街楼),吴学谦和我们均出生在这里弄内。我们一家和舅舅、舅妈、表哥、表姐两家紧密地连住在一起,他们住在里面的厢房,我们则住在外面的一房,因此他们进出时必须要经过我家房。我舅舅生有一男一女,儿子吴庆德(乳名:大新),女儿吴庆贤(乳名:金囡)。表姐吴庆贤婚后不久因患绝症而过早去世,留下一子。她在临终时曾托付哥哥吴学谦将来一定要照料好她儿子(即吴学谦现身旁的外甥杨纯宝)。为了不辜负妹妹的遗托,后来他把外甥带往北京居住,直到培养他进清华大学毕业为止,总算了却了妹妹的心愿。

1951年2月,表哥和他一起干革命的亲密战友——毕玲,经

过自由恋爱，在上海学联礼堂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张承宗同志，当年我才16岁，随同父母一起庆贺他们的婚典。

记得在抗日战争的敌伪时期，表哥在暨南大学读书，这些大学中的学子大多是些爱国的革命青年。表哥从读高中时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1939年5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那时他经常邀集一些有志的爱国青年，如：曾任上海团市委书记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琦涛和浦作等同志，常来我家的里屋房内关着门磋谈国家形势，研究革命斗争的策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才离去。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几次三番来我家盘问，又到左邻右舍去打听我表哥的情况。由于我外祖父和舅舅生前待人和气，与邻居们关系很和睦，敌人几次想从邻居中探到什么口风，却被好邻居们都一一掩饰了过去，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在那白色恐怖年代里，干革命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随时都有牺牲生命的可能。为了避开敌特的注意，他们准备转移目标，就在闸北区的苏州河畔开了一家小米店（招牌为益丰米行）作掩护，成为他们活动的联络站，很大程度上可遮住敌人的视线。

1949年全国解放，表哥也随之被调往北京团中央任职，从那时起他由吴庆德改名为吴学谦。

表哥生前为人坦诚，光明磊落，不仅对革命工作踏实认真，一丝不苟，而且生活上一贯勤俭朴素，他从不向政府伸手要这要那，即使在任外交部长、政治局委员，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始终保持革命的晚节。记得1982年10月1日，正逢国庆节暨中秋节，日本首相铃木应邀来我国访问，表哥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陪同首相来沪访问。中午，乘空隙时间，他向上海市委领导说，我姑妈住在上海成都北路，多年未相见，想去探望她一次，能否借一辆自行车，市领导立即答道：这哪能行？你是堂堂的外交部长，怎可以单身一人骑车上街。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最后还是由市领导派一辆轿车护送他来我家。又一次，1986年他陪同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来沪访问(这是他已任外交部长了)。抽空又来过我家探望表兄弟姐妹们。在临别送他到弄堂口,我便问他怎么不坐汽车来。他答道,汽车就停在南京路对面的墙脚根。从以上几件小事中不难看出,他在生活作风上处处严于律己,从不招摇。我周围的一些同志常对我说,你有一个这样大的中央干部哥哥,何不要他给你在上海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回答说,我这位表哥就是这样不愿为亲朋好友及家眷图谋私利的人,连他自己的儿媳妇至今还是北京市的一名普通工人。

2006年夏天,我携孙儿去北京姐姐家探望。那时,吴学谦已经住院快十年了,病魔迫使他失去了思维、记忆能力,也无法辨出人来。我问姐姐,是否乘我来京机会,去医院探望他一次。姐姐说,不是我不让你去,何奈嫂嫂毕玲她再三叮嘱过,外界人尽量少与他接触,以免病人受到感染。所以我也没能去成。今年4月5日,我接到北京来电说,表哥经抢救无效在4日病逝。这突然来的噩耗,顿时使我悲痛欲绝。总感到上次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心里内疚又遗憾。

表哥虽然已离开我们而去,可他的精神风貌、优秀品质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今日重叙他的旧事,以表对他的思念之情。

(2008年9月)

生死不离

·毕　玲·

安息吧！亲爱的老吴，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人去神留，多少亲朋好友怀念你。
感谢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从未听到过的事情。
你在家从不吹嘘自己，从不让我为你称誉。
当我俩都是六十多岁时，你走向外交战线；
我就离休为你服务，作为你的后勤。
直到你七十八岁开始，十年来卧病不起，
终于在二〇〇八年四月四日清明节，
你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与我永别。
感谢中央领导同志临终时来到你的床边。
当时还有五十多位同志赶来为你送别。
老吴啊！你享受这样的光荣厚遇，真是好福气！
现在我已年近九十，为了怀念你写几句肺腑之言。
我要学习你的美德，继承你的志愿！

安息吧！亲爱的老吴，请不要为我忧虑。
在党的关怀下，在同志们的爱护中，
我将安详地度过晚年。
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我就来到你的身边。
我将永远陪伴着你。
我们生时同甘共苦；死时葬在一个墓地。
我们永远生死不离。

（2008 年 12 月）

征途足迹　笔底波涛

——吴学谦纵论学生运动数十年追记

· 鲍世宰 ·

在地下时期，吴学谦同志在领导学生运动的征程中，写下了许多相关的宝贵文字；解放以后及新时期以来，他仍继续就此进行了可贵的回顾和思考。它们犹如笔底下的波澜和浪涛，记录了那个革命的年代，记录了吴学谦对青年学生运动理论和实践，不断进行总结和发展的绵长足迹。本文以编年方式，作梳理介绍。

一、1946年，发表在《时代学生》半月刊的专文——《上海学生怒吼了》

《时代学生》半月刊是上海地下学委领导的刊物，由学生系统的同志自己创办。创刊于1945年10月，1946年5月停刊，共出版了13期。这正是抗战胜利之初至1946年“六·二三”反内战运动前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时期。其间，1946年1月20日出版的第7期《时代学生》半月刊是“追悼昆明死难师生大会特辑”，报道1946年1月13日在玉佛寺举行的公祭于再大会和会后的万人示威游行，揭开了战后上海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新的一页。吴学谦笔名“辅民”的专文《上海学生怒吼了》，刊登在本期该刊的头条，全文2000余字。这似为他首次使用这个笔名，寓意“辅佐人民”（为人民服务）。

文章一开头就说：“一月十三日，这个伟大的日子，上海学生怒吼了！八年来郁积在胸头的愤怒、要求与渴望终于在这次呼喊出来了，历史将记载这一个伟大的学生争民主争自由的运动。”

文章接着分析上海学生为何“怒吼”的原因：“先是由于抗战

胜利以来政治不民主与教育不民主的结果。学费高涨，失学青年增加，多数学生的生活陷于困境，在伪国立学校念书的被诬称为‘伪学生’，当局以高压手段禁止正当的课外活动，用非法的开除、停学、扣分、不准考试、留级等方法来威胁压迫。他们以为用高压手段，可以使学生不敢起来活动，但事实恰与此相反，同学们是更加不满与愤慨了。因此当昆明惨案为学生们所知悉时，大家都愤怒地喊道：上海学生为什么不罢课！”

“其次是由于抗战八年以及胜利以来，上海学生艰苦奋斗，始终没有放弃过他们对祖国民族的责任。”

文章对抗战时期以及胜利之后上海学生不屈不挠的斗争进行回顾后，接着指出这次追悼昆明烈士的公祭大会和万人示威游行，标志着：“上海学生已发出争取民主的呼声，肩负起了民主运动号角手的光荣称号。”他要求“每一个参加公祭大会和游行的同学，牢记住以下几点：

第一，不要看轻我们自己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学生是有力量的。那天在玉佛寺，当局用刺刀、机关枪对付我们，阻止我们游行，可是在一万多人的队伍面前显得那么渺小！

第二，中国要进步富强，我们的理想要实现，只有靠我们自己起来争取，民主权利是不会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在学校内发动讨论，起来为民主而斗争。

第三，我们各校同学应该立即组织起来，推选能代表我们大家利益与意见的同学，来领导我们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显出我们团结的力量。

第四，这次大会及游行虽然成功了，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和松懈，今后的工作任务一点没有减轻，只要问一问：我们学校有多少学生参加了这次游行，还有多少同学为什么没有来呢？我们应该把大会的经过情形及大会的精神告诉同学们，应该立即展开校内的日常活动，这是我们的责任。”

文章最后说：“上海学生已经大踏步地走上为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大道，成为全国民主运动中的一支铁流，上海学生

的光荣革命传统已经因这次伟大的游行示威而发扬了，但我们还要把它发扬光大。上海的同学们，快团结联合起来，为着民主自由，为着新中国的实现而努力！”

正是这篇文章，吴学谦代表学委以公开的形式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正是在那时，上海广大青年学生为争取和平民主，为维护自身和人民的利益，在党的积极放手的领导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下，通过1946年上半年的助学、尊师、反内战和多种多样的团结教育活动，广泛地组织了起来，形成爱国民主进步力量的优势，从而在“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中达到高潮。

二、1947年，在《青年知识》半月刊上发表的系列专栏文章

《时代学生》停刊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了。经过1946年下半年的调整转换，随着摊贩事件和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发生，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迎接大规模群众运动和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学委领导的又一个半月刊《青年知识》出版。该刊原是蔡仪教授在重庆创办，已出至第5期。学委接过了该刊移至上海的登记执照及邮政信箱等条件，吴学谦亲自把关系交给了相关的同志，于1947年2月16日以第6期的序列，不失时机地迅速出版。《青年知识》出色地配合了1947年春夏之交的学生界一系列分散斗争，“五·二〇”运动的酝酿和发动，第二条战线的开辟与发展，整个波澜壮阔运动的全过程，其发行面超出了上海，达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城市。1947年9月因遭国民党当局追查而停刊。

当时吴学谦工作很重，上要向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报告请示，下要分工联系国立大学区委、私立大学区委和中学工作委员会（统管男中和女中），一度联系教会大学区委，他又是上海局下属的蒋管区学生运动小组的成员，还要直接深入基层和斗争现场。然而，他尽力抽时间为《青年知识》撰写指导性的专论，仍以“辅民”为笔名，在前后13期中多达7篇，每篇三千字左右，有的文章是在深夜和凌晨写成的。

1.《挺起身来斗争——论爱国民主运动的努力方向》（1947

年3月5日《青年知识》第7期）

1947年初，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后，国民党反动派以制造“二九”劝工大楼惨案等进行反扑，一部分学生干部对运动方向发生了某种摇摆现象，针对这一情况，文章指出这是由于有三个问题没有弄清楚：“第一个问题是，今天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在走向高潮呢，还是走向低潮？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广大学生群众一年来的觉悟程度缺乏认识。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反动派的进攻，应坚决予以还击呢，还是作暂时的退守？这是由于对反动派的力量估计过高，觉得太可怕。第三个问题是，暴露和突出是否值得？这是由于缺乏群众观点的缘故。”

对如何估计广大学生群众一年来的觉悟程度，他一连串用了几个“试问”：“试问今天哪一个同学不感到民族危机深重，哪一个没有政治苦闷，哪一个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哪一个对丑恶现实表示满意而安心读得下书，哪一个不恨特务暴徒的恶劣行为？”

文章接着指出：“国内外形势变了，群众认识变了，而我们自己的头脑跟不上。我们应该转变认识，转变思想，以最大的勇气与决心来领导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国家真正的独立、和平、民主未实现以前，爱国民主运动是只会发展不会停息的。这是群众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少数人的主观要求。假使我们正大光明地和群众在一起，便无所谓暴露突出，只有不发动群众，少数人包办一切，那才是暴露突出。其实，害怕的不应是我们，而应是反动派，只要看看中外历史就可明白，当一个统治者要依靠监狱屠杀来维持它的寿命时，那么死神已经在叩它的大门了。但反动派的力量不可轻视，它非常狡猾有经验。我们千万不能孤军作战，必须每时每刻依靠群众，大胆发动群众。我们要面对现实，克服困难，挺起身来斗争。”

2.《坚决开展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3月20日《青年知识》第8期）

为了迎接革命新高潮，端正学生运动的方向，紧接着上一期，他又写了这篇文章：

“最近十天以来，恐怖空气弥漫上海。到处传布着当局将大批逮捕爱国民主分子的流言，许多热心于爱国民主工作的同学接到怪电话、恐吓信、口头威胁，说什么不但要逮捕，而且要流血。……我们对于反动派的进攻，用不着惊慌失措，恐惧害怕。我们必须把运动坚持发展下去。我们的祖国，在政府依靠美国借款支持扩大内战的错误政策下，已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急关头；人民的起码生存权利，在好战分子的独裁政治下，已将剥夺殆尽。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伟大正义的爱国民主运动，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侵略政策；反对继续内战独裁；争取我们的生存与自由。”

文章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运动的范围与内容扩大，凡是有关同学的学业生活福利的问题，都应关心，并为争取这些要求的实现而努力，展开生活性斗争与活动。如私校的学费问题，国立市立学校的经费和公费额问题，清寒同学的生活问题，学校教育的设备与教育制度问题，同学的生活文化娱乐等福利问题。总之，各式各样的具体要求，都应包括在运动的范围内。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运动变为有血有肉，打下坚实不拔的基础。今天的运动需要同学之间的大团结，这个团结，不但是政治意义上的，还须是包括学业、生活、福利各方面的。把爱国民主运动看为单纯的一直线的临时性政治号召是不对的。”

文章最后说：“我们的运动是光明正大的，理直气壮的，我们的旗帜是鲜明的。今天的黑暗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新中国的曙光确实已经透露在我们面前了。”

3.《历史的镜子——为纪念五四青年节而作》（1947 年 5 月 4 日《青年知识》第 11 期）

文章首先阐述了五四精神，这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青年爱国家、争民主的英勇自我牺牲精神，各阶层的联合团结精神”。

接着，对五四时代当时面临的危机与抗战胜利后中国此时的情形作历史的对照，他说：“北洋军阀仰仗的日本帝国主义，换上

了今天的美帝国主义；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换上了今天不平等的中美商约；当时的政府专制横蛮，人民毫无自由，今天的中国又哪来民主？昆明惨案，南通惨案，李闻被刺，二九劝工大楼惨案，四项诺言一纸空文，美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与支持下的内战，从去年七月打到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听到来自各个角落里的苦闷的呐喊，这是弥漫全国的内战有以致之，物价直线狂跳有以致之，更是当局许多违反民意的错误政策有以致之，事态到今天已非常严重。”

文章指出：“自从抗暴运动和二九惨案同情运动以后，上海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着，两个月来，沪江大学同学罢课八天要求改革不合理校政，交通大学同学为贾子干同学被美商德士古汽车辗死而进行严正抗议交涉，同济大学同学为抗议驻军侵占校舍及殴伤同学而罢课三天，这使我们看到青年在今天时局中所遭遇的厄运与苦闷，已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同时也告诉反动派，今天的青年已经有了高度的民族民主自觉性，是不可欺的了！”

文章进一步指出：“可以肯定地说，反动派对于爱国民主运动，必将施出更疯狂毒辣的手段来，运动愈发展，斗争将愈尖锐。为了积蓄我们的力量，就必须学会灵活运用策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反动派毒计无法实现。最要紧的是以同学们的集体力量为基础，并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地孤立敌人，扩充我们自己的阵营。”“二十八年没有白过，今日的五四，已经有了更壮大的队伍，爱国民主运动已面临胜利的前夜，我们大家手携着手，努力学习，齐步前进！”

作者在这样说的时候，1947 年伟大的五月学生运动高潮正在一步步走近了。

4.《克服偏向求运动更广更深地发展》（1947 年 6 月 27 日《青年知识》第 14 期）

作者写这篇文章时，“五·二〇”运动已发生一个月，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下，广大学生英勇搏斗，社会同情都在学生

方面，爱国民主运动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空前广泛。此时，暑假行将开始，被捕同学尚未释放，一部分学生干部对运动如何发展，思想上产生急躁情绪。根据这一情况，作者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一方面总结过去一个月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克服工作中的偏向；一方面重新组织力量，领导运动继续向前。"

他指出："什么是运动更广更深的方向呢？首先，我们要使学生运动与社会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结合。在两个多月的暑期中，应该展开一个向工人、农民、企业家、士绅等等各阶层的宣传运动。这项工作假使成功开展，那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不仅不孤立，而且将显示出它更强大的力量来。在工作方式上是从集中发展转变为分散深入；在工作范围上是从一地一校转变到社会各阶层各地方；在工作内容上是从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争人权，发展为全国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争人权。其次，我们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学生自己的队伍，严防反动派的分化欺骗，同时必须为争取同学们的迫切利益而努力。物价飞涨，经济面临崩溃，下学期的学费问题成为空前严重的问题。暑期同学的学业进修问题，文化娱乐问题等，都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求解决。我们还必须全力营救被捕同学，同时要防止与警觉反动派利用暑假来进攻我们，如逮捕、扣分、开除学籍、分化同学团结、分化师生团结、压迫校方、制造谣言与恐怖空气等手法都会用出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动态，经常保持联络，如有变故，坚决以集体行动对付！"

文章最后指出："只要我们发扬五月运动中所表现的勇敢前进的革命精神，能够进一步认识反动派的进攻诡计，抱着虚心的态度学习以往的经验，我们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的队伍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将成为千锤百炼的一支铁流。"

5.《怎样总结五月运动》（1947年7月20日《青年知识》第15期）

"如火如荼的五月学生运动，经过了一个多月与反动派空前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以后，到六月十日全市大中学校第二次控诉总罢课，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为什么要总结？”作者说道：“伟大的五月运动是一只大熔炉，我们在五月里上了一课，领受了最宝贵的现实教育，我们的认识改变了，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我们更深地发现了同学的热爱真理的自我牺牲精神，更使我们体验到团结的力量，我们敢于唾弃一切反动派的威胁利诱，看到了光明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但是，这次运动对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有些什么意义，起着什么作用？在运动中，我们增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如何运用到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去？通过这次运动，我们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有什么新的补充、新的认识？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总结这次五月运动。”

“总结什么？”作者说道：“假如以各校五四纪念会作为这次运动的起点，以6月10日第二次控诉总罢课作为运动的结束，那么这次运动连续了有一个月又六天之久。而运动发生以前曾经有几个月的酝酿，运动结束后到今天仍在继续向前深入发展着，对于这样一个前后连贯的错综复杂的运动应从何着手总结，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作者说：“首先要总结这次运动产生的客观环境。是少数人煽动的结果呢，还是因为在内战独裁政策下广大同学的迫切要求所造成的？而运动发生后，反过来，对于国内形势，对于整个社会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什么作用，有些什么意义？这是首先必须讨论的，有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共同结论，才能进一步检讨其他许多运动中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对运动基本的总的看法。其次，我们要进一步总结运动中的许多中心工作，如关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团结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争取教授、教师，获得校方当局的谅解，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同情与后援等工作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这许多工作是非常复杂艰苦又互相关联的，又是我们在任何时候所必定碰到的和必须解决的。第三，我们必须详细地研究反动派进攻的各种手法，并检讨我们对付的办法。这次运动中反动派的进攻空前严重，毒辣狡猾，软硬兼施，骗打并进，正面进攻，侧面分化，打杀一阵以后，来一套威胁利诱。我们

要求运动的发展与胜利，就必须总结和学习对付反动派的灵活策略，保持同学的紧密团结，使我们老练起来。第四，我们要总结和吸取各种具体工作经验，以便更好地发挥创造性，如怎样组织纠察队、开大会、出快报、喊口号、写标语，怎样保护群众领袖、抵御特务的进攻，怎样开群众大会、制止特务的捣乱，怎样用‘对喊’、‘轮喊’的方法喊口号，怎样用通俗易懂的句子，怎样用柏油写标语。没有这些极其丰富多样的具体工作的创造，任务就完不成，原则就行不通。这些经验还没有普遍平衡的发展，为了更熟练地推动运动，就必须总结和学习这些具体经验。”

对于“如何进行总结”，作者写道：“既要防止把总结限制在自己所看到和体会到的局部范围内，见树不见林，错估了运动。自己学校罢课没有成功，就认为这次运动没有基础，这就应该把别的学校成功的例子拿来作比较，研究本校失败的原因。看到许多同学被捕、被打、被开除，就以为这次运动失败了，这就应该总结估计一下，这次运动教育了多少同学，团结了多少新的同学，扩大与发展了多少社会影响，对反动派有了多少打击等等，以此来研究成败。还要防止在抽象原则上兜圈子，不去切实研究具体实际的经验。同时，总结工作既要依靠发动群众集体讨论，避免少数人包办，又要提倡个人深思熟虑。我们宁要先考虑八个钟头，再来开两个钟头的会，也不要上场乱说一通，浪费时间。”

文章最后说：“五月学运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们应该赶快将这次运动详细总结起来，以更进一步武装我们的头脑，迎接新的更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6.《魏德迈应重视中国青年的意见》（1947年8月8日《青年知识》第16期）

1947年7月下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来华，以所谓“革新计划”继续寻求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独裁。吴学谦写此文以作评论。

“报载这次魏德迈以特使身份来华，其目的是为了‘调查’中国的‘现实局势’，这似乎是‘客观’的态度，但若听信片面的意见，

只以官方的报告作为反映中国实际情况的材料，那么这种调查，不是毫无常识，便是存心欺骗。”

“获得中国人民信任的美国对华政策，随着罗斯福总统与斯迪威尔（编者注：即史迪威）将军的死去而死去了。斯迪威尔将军主张积极抗战，反对独裁，反对以美械配备的武装保存在后方，用来包围与进攻积极抗日的人民军队。后来他被召回美国，但他遗留给中国人民的友情与爱戴是永远不会被忘却的。我们同样不会忘记，代替斯迪威尔将军的就是现在以特使身份出现的这个魏德迈。他和赫尔利一道，曾经在抗战后期支持政府消极避战、观战、拖战，保持独裁，不顾人民痛苦发展官僚豪门资本的政策。在抗战胜利后，他指挥美国军舰飞机装运大批军队到全国各地扩大内战，屠杀人民，又不断地从美国要来大批军火送给政府，鼓励政府大打内战的气焰。

“如今，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青年已经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提到与反对国内反动派卖国独裁内战的任务同样重要的地位，并把两者联系起来。这两大任务，不仅是今天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而且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要求。”

文章进而说道：“中国青年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带有先天的排外性。恰恰相反，中国青年对于外国一切进步的科学的东西，是特别感兴趣和努力学习吸收的。五四以来，当大量西欧科学文化传进中国来时，其中只要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强盛与中国人民解放的东西，都被中国青年所吸收消化武装了自己。正因为这样，中国青年最反对中国国内的一切封建压迫与专制独裁的腐败政治，更反对任何外国帝国主义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腐败政治的行为与政策。当日本帝国主义已被最后击败，当两年来爱国民主运动不断扩大，美国官方支持的内战独裁政策的一发不可收拾，美国当局是应该而且必须正视这一支中国人民力量的！”

这一番具有高度原则性和思辨力量的话，今天仍言犹在耳。

7.《大风暴的前夜》（1947 年 9 月 5 日《青年知识》第 18 期）

这是《青年知识》的最后一期。其时，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全

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加紧其统治区的白色恐怖，颁布“总动员令”和“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开除学生，解聘教授，《文萃》杂志遭破坏，富通印刷所被搜查，《青年知识》也受波及。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部署各界结合各自特点坚决开展反迫害斗争。

吴学谦在这篇专文中指出：“独裁者对学生运动的进攻在继续与发展，他们颁布了‘总动员令’，利用暑假学生分散的条件，在全国各地大批开除优秀学生，解聘正义进步教授，非法解散与取缔学生爱国组织与学生团体，安插特殊分子到各校、恐吓、黑名单、无头信、制造恐怖空气，并且在‘手令’、‘部令’的指挥下，压迫各校当局执行。但是，独裁者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的一切反动措施，都是彻头彻尾违反全体学生的利益与意志的，因此这种进攻已经遭到，并将继续遭到全体学生的猛烈反对。

“五月运动集中全面斗争告一段落，并不是运动的停止，而是运动的转换，是根据客观条件与学生要求的变化而转换，是从全面集中发动转变为各校分散展开，从正面坚持变为迂回前进，是把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行动口号再回到学生中和扩大到社会上，进行深入的宣传。这个转换是完全正确的与必须的，没有这个转换，则必然要遭到不可避免的打击。暑假中，在严重的政治压迫与特定条件限制下，由于学生集体努力苦干，在助学工作上创造了无数新办法新经验，并将助学运动与爱用国货反对日货的爱国运动联系起来。同时在恐怖气氛团团包围中，发动了反开除反解聘的斗争，揭发了当局的阴谋，取得了家长以及社会的协助和同情。毫无疑问，上海学生在今年的暑假中，尽最大的努力，克服了无数困难，从而加强了学生之间的团结力量，使独裁者的进攻没有得逞，取得了反击的初步胜利。”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学生运动的新发展，他说：“为什么说运动正走进了新的高涨，它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由于统治者继续不断的倒行逆施，它不仅可耻地宣布了八月十五日起开放对日贸易，而且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甘愿让美帝国主

义牵着鼻子走，为了乞求美帝国主义全面支持内战，竟不惜把中华民族的死敌日本法西斯视为朋友。这就必须团结全体学生以至全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反动政策。其次是，严重的失学危机威胁着最大多数的同学，成为学生的共同危机，因此就必须发动全体学生起来为抢救失学而斗争。大家都看到，在暑期的几次集会中，广大学生爱国情绪空前高涨，坚决反对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在助学运动中，他们不仅为了抢救自己的失学危机，同时更为了向社会宣传爱用国货抢救民族危机，整天在烈日中奔走流汗，从六月到现在，两个月来没有间断过！这种为同学服务，为求祖国独立自由的自我牺牲、英勇斗争精神，说明着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一定能够而且一定要担负起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

文章最后说：“在五月运动中，全国学生喊出了代表全国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呼声。在即将来临的大风暴中，全国学生也必然会高举反对卖国内战独裁压迫和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平的义旗，再一次地成为伟大爱国民主运动的英勇前锋！”这一预言，为不久之后发生的“抗议于子三事件”、“救饥救寒运动”、“同济一 · 二九斗争”等运动，以及大约半年以后的席卷全国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运动所证实。

三、1948 年，在香港学习班写的《当前上海学运中几个问题的总结》

1948 年初，上海局在香港举办干部学习班，抽调上海、南京、西南等地党的负责干部，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中央文件，总结工作经验，为迎接城市解放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好准备，确定工作方针。自当年 1 月起分批进行。4 月至 6 月，上海学委系统有张本、雷树萱、蔡英平、吴增亮、鲍奕珊 、施惠珍、费瑛，与教委、科技委为一班。吴学谦、吴康参加的是 11 月的最后一批，由刘晓主持。同一批的还有工委张祺、陈公琪、职委陆志仁、周炳坤、教委陈育辛及南京、武汉二人。于 1949 年 2 月初结束。1948 年初，吴学谦已被任命为地下上海市委委员，并一度代理学委书记。

吴学谦曾就参加香港学习班事，在《难忘的岁月》一文 (1994

年为怀念吴康而作）中说，他和吴康一起坐长江轮的统舱到武汉，再经粤汉铁路去香港，“在香港，我们七八个从上海、南京来的地下党同志住在一幢小楼房，工作安排得很有秩序，清洁卫生一起动手，早上出去爬山，白天学习讨论，晚上有空时就聊天。就在那里，我和吴康商量后，写了《当前上海学运中几个问题的总结》。”“1949 年 2 月，北平、天津已经解放，刘晓同志催我们马上回上海工作。我们坐海轮回上海，到上海才知道，上海地下党机构体制已经改变，以迎接上海解放的需要。”“在香港三个月的生活是令人难忘的，时间不算长，但我们都觉得收获不小，都觉得比过去懂的多了些。”

同样，上海解放后不久，吴康也曾对我们这些年轻同志讲述香港学习班的事，那么兴奋地说到许多感受和收获。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 1979 年，上海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陆志仁同志看到《当前上海学运中几个问题的总结》的档案后，告知了吴学谦同志，他十分高兴。随后，市委党史征委会学运史征集组将这一文件送去北京，李琦涛同志阅后转给了吴学谦。1986 年 8 月 3 日，吴学谦将修改后的文件寄给了吴康，并附一信：“从李琦涛同志处得到你送给他的我在香港写的学运总结稿。这次利用去北戴河期间作了文字修改和有些提法的改动，基本内容未动。现送上请你核阅，有些地方你认为还需要修改的，你尽管改，我不再看了。”

这样，学运史征集组便着手准备把这个文件收入到正在编撰的《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一书中去。同时，吴康和浦作遵嘱将该文再作了若干文字斟酌。

1990 年 11 月，《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写出第六稿（送审稿），浦作和吴康二位相继赴京，再次征询在京老同志对这部史稿的意见。同时，由浦作再次将吴学谦的《当前上海学运中几个问题的总结》稿送至吴家，再请他过目。期间，浦作因重感冒先期回沪。稍后，滞留北京的吴康于 11 月 26 日给我来信说：“浦作同志感冒好了没有？请你及早告诉浦作同志，老吴 48 年在香港

写的那篇总结文章，我们作了一些修改，浦作同志送去，老吴已仔细审阅，他完全同意我们提的修改意见，并同意作为学运史一书的附录发表。老吴复印一份后，已将原稿送给上海市府驻京办事处，从机要交通局通过上海市委，寄到上海给浦作同志，请浦作同志注意收取邮件，这是毕玲同志告诉我的。”

这样，这篇总结历经吴学谦本人的审阅再审阅，正式刊载在1991年“七一”前夕，与《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一同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一书中。这一过程，体现了吴学谦认真严谨的作风，也反映出地下党老战友互相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当前上海学运中几个问题的总结(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香港写)》是学生运动史的经典著作，对学生运动的历史作用和上海学生工作的特点，对于积蓄力量的问题，对于“不平衡性”问题和各类学校、各种学生的特点，对于斗争策略问题等，作了深入精辟的总结。反映出作者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把握，对上海学生工作情况的深刻了解和思考，处处闪耀辩证法的光芒，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全文8000余字，由于过去已经发表，并将再次全文收入在这部纪念文集中，因此这里不作内容的具体介绍。

四、1948年，在香港学习班写的另一个文件：《上海学生工作近况报告》

香港学习班上除了总结工作外，各委还须向上海局写出书面工作报告。吴学谦与吴康研究后，代表学委写出了这个工作报告。1992年，我们在上海档案馆查到了原件，系蜡纸刻写的油印件。刻写蜡纸是吴康的笔迹。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有：1948年秋季开学前后上海学生工作环境，开学后各校群众工作概况及我们的布置，开学前后的党内工作，目前形势下上海学生工作几个应该重视的问题，以及几个具体问题的请示等。全文23000余字，篇幅较大，过去未曾发表，摘录介绍如下：

“(一)1948年秋季开学前后，上海学生工作环境

各校开学时间都较迟，全市学生数量并未减少，可能有些增

加。各私立大学学生均有增加，国立大学稍减，原因是经费问题及为了保留较多青年军保送额。约大不收除中西、圣玛丽、约中之外的中学毕业生。专科学校除中华工商外均有增加。中学也略增。

开学前夕，中央日报社论强调“匪谍学生”在暑期大事整顿，训练干部，计划在开学时抓住学费和反迫害问题，展开全国性学潮。上海三青团刊物也一再这样叫嚣。蒋介石在币制改革演说中，把镇压学运视为和币改同样重要的稳定后方的两大方针之一。

上海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全面镇压学运与学生活动的方针，在具体实施办法上则是镇压与督导两者配合进行，相互为用。根据已有材料，表现为下列几个特点：

1. 公开露骨的禁止活动。采取了开除群众领袖和活动分子，封闭校内刊物壁报，解散社团，社团重新登记，新生入学思想训练，严禁他校黑名单学生转学，禁止一切开学时的常例活动，取消或限制学生自治会、级会等的民主选举，加紧功课高压，宣传反苏反共。在开学头一二星期来势凶猛，但不久矛盾百出，为群众冲破。这种高压政策，还包含着引诱我们起来与之进行准备不成熟的斗争这样的策略阴谋，企图给我们以致命打击，使我主力再遭损失，但因我未轻举妄动，使之不能实现。

2. 加强各校训导机构的统治力量及反动性。复旦、交大、东吴、光华等校撤换训导长，各中学由教育局指派或在训导处内任职监视。

3. 加强御用活动，以图转移群众情绪。采取提倡体育，出版校方主办的御用刊物，包办文化娱乐活动。交大组织了属于国民党全国基督教联的团契，以最落后的方式拉拢。约大封闭了我们领导的《约翰新闻》，另出校方御用的《Saint John's Dial》的中英文周刊。

4. 加强下层特务力量，以中间群众面目出现，暗中监视搜集情况和盯梢等秘密工作。此外，各大学大批吸收青年军复员生。

但是，第一，学校上层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复旦朱家骅派与

CC 派倾轧显现，光华朱派三青、吴绍澍派三青、青年军三角斗争大打出手，暨大特务但某与田某争功互殴。各校下层三青、小特务情绪低落，大同一特务向我表示他们无前途，共产党要来了。这种矛盾有利于各校群众工作的开展，在利用矛盾中冲破镇压。第二，学校行政出现空前未有的危机，十月半后抢购风起，物价直线上升，时局因前线溃败急转直下。教职员学生伙食问题非常严重，在我们离沪时，交大、同济、浙大、暨大、大夏、中正、京沪、师专、新陆师范、市立女师等，均只一星期左右存粮。以前收到的学费和领到的经费，已不足一个月的用处。教职员工的薪金待遇，也出现了发放困难。学校行政的这种空前危机，就使当局要求他们原来一套安定学校镇压学运的方针大打折扣，甚至无法执行。

教授教员严重的生活困难问题和思想情绪的变化：刚开学时，某些政治头脑糊涂的教职员，对蒋经国存在很大幻想，有的把历年积蓄的黄金美钞拿去兑金圆券。随即，抢购风潮发生，物价剧升，战局急变，给他们原来想法以沉重打击，情绪起了急剧变化，甚至在教室发牢骚，大骂蒋经国，对蒋军作战完全悲观，说共产党要来，不少人听短波，看《字林西报》。他们的生活陷入痛苦深渊，浙大教授十月底断粮，交大教授在我们办的“交卖会”上，拿出旧西装什物换钱。许多人自己去轧户口米。在几个学校兼课的教授所得薪水连车钱也不够花，他们经常脱课请假。约大讲师助教连家属要求在学生自办食堂进膳，若干院长主任的家属也托我们食堂代买猪肉蔬菜。教授们普遍渴望了解我党对大城市的文教政策，那些非唯物主义的课是否还能上，教会学校产业会不会没收。有的人害怕战争，因而存在上海国际化的幻想。他们的思想正在急变，对共产党的认识在改变。他们的苦闷提供了我们非常有利的条件，应主动掌握条件，大胆接近，加强师生关系，开展广泛互助运动，使广大中间教授逐渐靠拢，孤立极少数反动上层。

开学以来学生群众情绪：经过五六月反扶日反迫害运动，三个月暑期分散，特刑庭镇压穷凶极恶的高压，造成群众情绪上一

度的恐惧和消沉。群众的看法是今后学运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法了，但并不否定过去学运的价值，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反动横暴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又因大批群众领袖和活动分子被迫离沪去解放区，感到下学期无人领导的苦闷。开学后，群众从分散到集中，对活动的态度比过去慎重了，不轻易表示意见，对当局和校方的反动措施敢怒不敢言，采取消极反抗。约大发生集体转系，不参加校方开学礼拜，不唱美国国歌。大多数学校的群众，在关系熟悉的朋友之间，以及在较大的生活性文化娱乐活动中，仍表现相当活跃的情绪。具体特点之一：急求对局势变化的了解，《展望》、《观察》、《新闻天地》等内幕杂志销量大增，出版之日，一天售完。我们翻印的《群众》杂志文章，辗转传阅。济南战役、王耀武被捕经过、蒋经国走向失败，特别是对军事消息，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非常有兴趣。特点之二：生活不安定，上课情绪不安，开学不久伙食就糟，菜越来越坏，米成了碎米，食堂里发牢骚、敲饭碗的群众性分散自发斗争普遍发展起来，到11月10日以后已到了普遍酝酿阶段。如果国民党仍无救济办法，一定会发展成极广泛群众性、统一战线的反饥饿求生存斗争，教授同情，校方无法阻止。特点之三：各种文化娱乐性活动得到广大群众热烈参加，中学各校秋游参加很多，交大马思聪演奏会挤满一堂，各校成立班级、系科、学生自治会等机构，均得到热烈响应。虽然在我们11月14日离沪时，还未表现出集中的斗争，还处于分散酝酿的形态，估计在教职员生活、第二次交费、膳食和公共汽车涨价、学期提早结束、学校会不会南迁等问题上，将会发生大小波动，斗争正在集中。

（二）开学后各校群众工作概况及我们的布置

1. 争取新阵地、新阵地机构。由于暑期敌人进攻及原来的群众领袖撤退，使各校不能以原有组织机构开展工作。争取新的群众组织机构的领导权，成为开学后群众工作第一任务。方针是发动群众，利用合法，争取新阵地，大体上是有成效的。一是自治会、系科代表会、膳食委员会、系会、级会机构，大部分是成功的，已选出：交大系科代表会、浙大自治会、复旦系科代表会（银行系争取

过来)、约大膳委会、沪江膳委会、师专、新陆自治会,均胜利。男女中学,与三青比,占绝对优势。私大三青虽强,也未能包办一切群众组织机构。但这种阵地夺取,要成为广泛群众性的有力组织还差很远;党员及党的领导者布置上还存在形式主义、事务主义老一套作风;要每一组织成为群众性巩固堡垒,还要艰苦努力。二是普遍发展下层社团工作,方针是不先立名目,不重形式,以免重叠而群众不扩大。求先交朋友,扩大团结,在群众自愿自觉下建立相应组织,这尚在开始阶段。我们把主力放在下层,只有下层显著发展,才能坚持上层领导权,不怕敌人进攻,确保力量积蓄和壮大。三是渗入敌人御用机构,利用合法开展工作,进而包办其工作,渐而渗入其重要部门,占领其全部阵地。典型的是在约大,我们渗入到御用的《Saint John's Dial》,慢慢包办其工作。在中学这成为争取阵地工作的重要方式。四是,在敌强我弱或力量相交错的单位,争取打入三青机构,或与三青合作(指群众福利工作上),争取我威信,以三青的坏行为坏作风孤立上层三青,瓦解下层三青。师专、新陆的自治会及膳食委员会斗争,大夏某些系会的选举,都得到证明。

2. 生活性群众活动和生活斗争。开学时,主要发动集体文化娱乐活动,中学及若干大学郊外秋游人数很多,迎新、社团联欢、参观、音乐会反应热烈,起到了恢复群众情绪,争取我初步合法地位与威信,及群众阵地领导权的准备,当局及校方阻止,被群众冲破。但存在事务自流倾向,束手束脚,只求搞好感情,不引导启发群众诉说内心痛苦,感情不深。随着物价猛涨,各校群众开始普遍酝酿生活斗争,交大“交卖会”全校师生员工热烈响应,约大教职员工要求参加我办伙食团,可见端倪。10月底,群众情绪酝酿更热烈,若干学校已有行动,新陆新生90余人要求住宿占领房间,大夏反对增加膳费、酝酿拒交,同济发生吃白粥事件等。我们的方针是:充分酝酿,等待条件成熟,坚决领导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生活斗争,不在群众情绪未足够成熟、热烈要求斗争前轻举妄动,以防被敌人抓到机会打击主力。斗争爆发时,必须有计划地使用力

量。在斗争酝酿时，提出要蒋经国拿出办法来，要政府给配给米及其他配给品等口号，以便争取中间群众，并在行动中领导中间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

3. 揭露和平阴谋，争取政治上对群众的发言权和领导权。刘不同的《大学评论》散布和平空气，逼蒋出国，致蒋毛公开信，11月第一星期和谣空前严重。群众并不跟他跑，却引起对战局和中国前途的注意，一些群众认为：中共强大，中共不参加，就不可能和平；国民党垮台已毫无疑义；三次大战要爆发，中国要成为美苏的牺牲品。我们的方针是：不以正面揭露和平阴谋为主，着重宣传以下四点，从政治上提高群众：一是宣传我党政策，特别宣传城市政策及具体故事（济南战役逃出的教士和商人）；二是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战果，认识解放军的力量；三是宣传和平的先决条件是清算四大家族，蒋政权投降；四是客观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爆发的根据。宣传方式采取自下而上，深入而与生活相结合的漫谈方式，从浅至深，从侧面启发到正面揭露。学联不发表正面驳斥，但通过《学生报》及油印的“战讯”，搜集具体材料，揭露其阴谋，并主动影响教授。

（三）开学前后党内工作

1. 学习“八一”社论和党对今后工作任务的指示，结合总结工作。从8月中开始到9月底，一个半月时间组织党内讨论。开始时，不能全盘贯彻文件精神，经过深入讨论，对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局势有了正确的认识与信心，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把“争取全国范围的胜利”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实际斗争的任务了。

与此同时，学习讨论组织上关于今后工作任务与方针的指示，对我们研究今后学生工作任务方针在思想的启发与指导作用是很大的。因为不仅经过了有领导的反复讨论，而且还用书面指示，帮助大家弄通问题，使同志们了解与明确。其中所提出的一年来六个经验教训，和今后策略总方针的精神，给我们以很深的影响，对于在敌人币制改革与特刑庭传讯进攻的严重环境下，掌

握基本形势和对我有利的因素，指示具有很大启发。可惜由于暑期中要应付敌人进攻，未能更深入完成过去工作总结，不能更深刻更丰富地来吸取指示中许多原则性很强的意见。

2. 讨论与确定1948年下半年学生工作任务与方针，各区在讨论并订定本区本支部具体方针时，以下列问题为重心：一是，关于今后上海学运发展的估计与我们的方针。在国民党反动镇压下，由于国民党本身不可克服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必然造成国民党与广大学生群众的愈益深刻的对立，这就造成广大学生起来反对国民党压迫的群众性斗争发展的必然性，但这种斗争的充分成熟和发展，必须是在广大中间群众的足够酝酿，广泛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国民党高压政策破绽百出的条件具体时，才有可能。我们的方针是，加强主观努力，团结群众，争取同情，加速这些条件的成熟，在斗争时机到来时，领导斗争发展，突跃前进，壮大自己力量，并在斗争过程中，发挥斗争的群众性、社会性与自发性的特点，在情况开始变化时及时转换或结束斗争，不僵持在一个问题上。二是，关于学生工作如何加强与推动社会重点部门工作的问题，讨论了学生开展社会工作任务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规定了各校开展社会重点部门工作的具体单位，及如何发挥学生家庭周围的社会关系等。三是，关于领导深入下层，加强重点的意义和方法。四是，关于彻底纠正过去统一战线中对教授、校方的左的关门主义偏向。检讨了过去对教授工作的利用观点，对校方无区别的敌视观点，思想上对社会力量支援学运的轻视。明确了必须把争取教授，瓦解分化校方中的反动派，争取中立分子（特别是中学校方），扩大社会援助的工作，成为今后学运的经常基本工作之一。五是，关于策略上的巩固与发展，上层与下层，党团与支部，学联与各校支部等问题，如何正确了解其相互关联性，及联系具体情况确定具体方针。六是，根据中央关于上海工作有冒险倾向的指示，我们作了对过去学生工作中冒险倾向的初步检讨，检讨内容准备以后另文详述。

3. 敌人进攻与大批撤退暴露力量。暑期中，敌人于8月26

日开始，大批拘捕各校暴露的党员与群众，被拘传的共92名，其中党员20名，绝大多数在狱中表现良好。11月初已释放出42名。营救工作在继续进行中。党内检讨了这次大逮捕，决定更彻底地把在敌人面前暴露的，有黑名单的，或不易取得合法身份难以立足的党员及群众，一律坚决撤退至解放区学习或分配工作。到10月底已撤退500多名，内党员400名，详细名单陆续交上海组织电中央转组织关系，其中曾任支干以上党内干部50名。撤往地区以苏北最多，其次为皖西银屏山区、鄂北江汉军区、浙东四明山区等，直接到华东军区及东北局、冀东军区正在开辟交通线。把撤退中的群众领袖组织了两个沪杭苏赴解放区学联代表团。在苏北合德华中党校已集中200名以上学生党员，训练班（上海队）抽调学委蔡、胡，区委张、王各二人，支持训练班工作。撤退工作到11月初将全部完成，这样就对党的隐蔽工作有了很大帮助，敌人可能摸索到的线索大部分已因此而切断，使今天各支部可以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开展工作。关于交通工作情况另文详述。

4. 党内力量调整。由于敌人进攻与大批撤退暴露力量，造成党内组织的下列情况：一是，各支部力量（领导力量及组织力量）普遍削弱；二是，群众领袖的撤走，影响各校原有群众组织的坚持，使本学期对群众的领导上增加了困难；三是，支干的大量撤走，新干部不能及时培养，造成党对支部领导吃重；四是，男女中及专科学校的力量严重分散，关系多。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采取：第一，加强重点。所有大学都要加强。中学、专科学校适当裁撤，把党员集中到重要学校，男中从60多所减至20多所，女中从30多所减至20多所，专科从10多所减至6所。第二，发展党员。目前党员数量为800人，其中基层学校600人、学联、全国学联、交通工作、其他特殊关系约50余人，杭州70人，苏州50人，大学20人以上支部6所，其他各为10余人。经征求各级同志意见，准备到寒假时争取发展基层学校党员一倍（600），大家认为完全有信心。第三，领导深入下层。从学委到各级区委，均指定单位加强领导，深入到基层里去进行调查研

究，帮助支部贯彻方针。第一批深入的情况证明，这是保证实现任务和改造领导本身的有效办法。第四，缩编中学党内组织。把男中8个区委缩为4个，有些干部调入支部和大学。女中区委不减，各委员均深入一单位。学生方面的教员工委50名党员，全部转给教委。抽调男女中委员会书记2人，到工委和教委工作。第五，提拔培养新干部，特别是支干一级干部及各校新的群众领袖（党团工作人员），他们现在主要问题是对党的政策不够了解，党内工作经验缺少，政治水平不够高。第六，根据工作需要，学委增加一人，国大增加2人，中学增加4人，都是补充调走的委员。第七，在克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加强党的纪律及工作积极性这一工作方面，我们在全党讨论“纪念王孝和同志牺牲及开除学生工作叛徒张××”的决定时，取得极大收获，在学生党内形成一个响亮的富有战斗性的号召，纪念会出现热潮，许多党员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纪念献金2700余元金圆券，金饰不在内。因此目前学生党内团结一致，艰苦工作，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

（四）目前形势下几个应重视的问题

1. 提高党员政治水平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求党内加强时局形势的学习，熟悉党的城市工作政策，规定各支部以此成为组织生活内容之一。

2. 抓紧有利形势，在群众的生活斗争中全力发展重点部门的工作，争取党在基本群众中获得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除了领导学生群众开展求生求学（学校不停办）斗争以外，应提出师生合作维持教学的安定，反对学校搬家，作为防止国民党把学校南迁的企图，作好进一步保护校产的准备。

3. 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问题在我们离沪时组织上已提出来，我们认为，为了保证调研工作在短期内切实生效有成绩，必须抽调更多党员，使这项工作成为党的日常中心工作之一。

4. 在统一战线方面，要对中间教授展开放手的政治上的争取工作，宣传我党政策，加强他们对新中国前途的认识和信心。同

时，应运用学生党员及群众的家属社会关系，争取民族工商业家不南迁不逃难，宣传城工政策。通过学生所联系的资本家是极广泛的，最近许多有党员到解放区的家庭反映，他们的变化很大，每天收听短波，希望共产党快来。应通过已去解放区的党员，给老师、家庭写信，在政治上争取他们。

5. 目前工作上可能产生的两种偏向。一种是，某些干部表现急躁与冲动的情绪，企图立即发动大斗争、大运动，思想上觉得原来的工作方针与策略太迟缓，特别是11月上海抢米风潮四起，物价狂跳，和谣盛行，军事局势非常有利，更发展了这种情绪。另一种是表现为事务主义，看不到群众的急变，看不到有利的工作条件，不善于抓住有利条件大踏步前进，不善于提高群众，壮大我们的主观力量。我们提出：必须做到在政治上教育群众，走在群众前面，不被群众冲动情绪所包围而迷失方向，同时在群众斗争中，既要不丧失时机突跃前进，又要在策略上处处谨慎，不过早暴露主力。

（五）几个具体问题的请示

1. 全国学联迁移至华东解放区，或是根据香港组织上的意见迁香港的问题。

2. 汉口工作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根据组织通知，建立了汉口的工作关系，已调去八个党员，希望立即设法转去，以利开展工作。

3. 南京、福建、香港等零星关系五处，可否在这里交给组织。

（编者注：以上关系均有具体名单及情况介绍，此处从略）”

这篇1948年的《上海学生工作近况报告》，我们作较详细的摘要引述至此。1948年下半年，是转向下一步迎接上海解放的一个阶段，学委和吴学谦在香港给上海局作此报告，充分反映出对时局形势发展的正确认识，对党的方针策略的坚决执行，对学生运动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工作的缜密而创造性的思考。在当时的地下状态下，在报告中能对许多细节和数字，作出如此详实的反映，既是长期训练所形成的严谨作风，更是对党忠诚的表现。

文中的许多文字和语言，对于当年的地下党同志，在今天读来，也一定是耳熟能详，似曾相识，备感亲切的。

五、1949 年，《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后不久，吴学谦同志奉调团中央国际部赴京。在北上的列车里，他构思了这篇文章，抵京后即在招待所里写成。在匆匆的旅途之际，告别曾经长期战斗过的上海，作者握笔写此文章，充分体现了他的责任、勤奋和感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时记忆还很新鲜，便及时把它写了出来。

这篇文章的正式发表，是在时隔三十年之后的 1979 年 5 月，刊登在了由张承宗同志主持的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上。尔后，1982 年 2 月再次刊登在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的《上海青运史资料》第一辑。1994 年 11 月，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火红的青春——上海解放前中学学生运动史实选编》一书出版，又将这篇文章登载在该书的卷首。

此文为 5000 多字，记述 1949 年 3 月至 5 月解放前夜三个月的上海学生运动，也就是他在 2 月初从香港学习班返回上海后，直至上海解放的这段惊心动魄的迎接黎明的时间。文章开头部分，首先以 500 字，对上海学委在江苏省委和上海局、上海市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12 年的艰苦奋斗，到上海解放前夜，党的学生工作已经有了强大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就此作了明确完整的概述。然后，以主要的篇幅，对解放前夜三个月的上海学生运动，分为解放军渡江以前和渡江以后两个阶段，进行了高度概括又具体生动的回顾，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

这是吴学谦的重要著述之一，这本纪念文集也将予以收入，此处不再作内容的详细摘录。

六、1958 年，《解放前中国学生运动情况和经验》

这是吴学谦同志调任中央联络部工作后，向亚非国家政党和进步组织的友人，介绍中国学生运动的讲话稿，3400 余字，摘要

如下：

“(一)中国学生运动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要求，他们常常由于不满现状，加上进步书刊的影响而接近和参加革命，他们所走的道路是经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始终重视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国学生运动在中国革命中起着某种程度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1. 学生运动常常是革命来潮的信号，或对革命运动作了有力的呼应和配合；2. 革命的学生知识分子在工农群众中起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桥梁作用；3. 学生同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上层)有广泛的联系，学生运动推动着统一战线工作；4. 学生运动是党的干部的来源之一。

(二)中国学生运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学生工作的阵地，中国学生运动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党的领导保证了学生运动的正确方向。中国学生运动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根据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同情况，及学生运动成熟的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方式和要求，如：下乡宣传、街头宣传、到根据地、参加游击战争、到工厂农村搞文化工作、通过救济慈善工作了解劳动人民等，实现与工农相结合。中国学生运动应负担经常向革命根据地输送干部的任务。学生运动还应组织新文化和新启蒙运动，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办刊物，搞读书，引导知识青年认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反对腐败，警惕堕落，激起走向革命的情绪，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扩大革命人生观和社会观的影响，讨论中国往何处去。

(三)党在学生运动中的斗争策略

1. 在革命高潮与低潮时采取的不同策略。在 1941—1945 年革命运动低潮，提出‘勤学、勤业、交朋友’，以保存和点滴地积蓄革命力量。在 1945—1949 年高潮时，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在斗

争中壮大力量'。2. 根据反帝反封建总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同的政治口号,在每一项具体斗争中,提出能动员广大群众的行动口号。3. 斗争方式:在运动高潮时,采取罢课、游行等集中的全面的斗争方式,在运动低潮时,利用学生会、系会、级会等各种合法条件团结群众;经常的思想启蒙工作和多样的组织活动(读书会、合唱团、伙食团),是发动集中斗争的基础;罢课、游行示威等尖锐的集中斗争,应有理、有利、有节,适可而止,及时结束战斗,巩固胜利,准备新的斗争;由于我国民族危机深重,学生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抓住某一具体事件,发动反帝的爱国示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争取学生切身利益的生活性斗争能动员最广泛的群众参加,其规律往往是由局部的生活要求发展为政治性的群众示威,如从反饥饿开始,发展到反美反蒋。

(四)组织形式

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组织形式。高潮时,运用全国学联或地方学联作为号召斗争的旗帜;低潮时,主要通过校内各种合法组织来保持和广大学生的联系;国民党欲通过官办学生自治会来包办学生活动,我们的方针是大力争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使之成为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活动和发动集中斗争的公开合法机构;根据群众的兴趣爱好,建立学术、文化、体育、同乡会等社团;参加社会团体,长期耐心工作;积极分子组织有高级和低级的多样性;党在学校的支部应成为校内一切组织的实际指挥部,通过校内的党员、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在各种合法组织里的工作实现领导。

(五)统一战线

学生运动有可能争取教授的同情或保持中立,一方面要在斗争中避免与他们对立,另方面通过斗争本身去影响他们,推动他们进步,对有威望和正义感的教授,派优秀生和'得意门生'进行个别争取;针对教授、教师面临的学术上和生活上的问题,提出适当口号;每次斗争都发动学生访问教授教师,说明斗争目的;对学生家长、社会著名人士,以及军队、警察,都提出适当的口号

争取，取得最广泛的社会同情，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从以上文字表明，这是一篇纲领性的学生运动经验总结，我们能感受到它的系统性和重要性。

七、1979 年，《访问吴学谦同志谈话记录》

1979 年 7 月 9 日晚，吴学谦在北京寓所，应约接受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金立人、谢圣智访谈。毕玲同志间或插话。记录稿约 7000 字，经他本人阅核。这里选录部分要点如下：

（一）从抗日战争初期，直到上海解放，上海学生运动是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领导学委的先后是江苏省委、华中局城工部、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上海地下党坚决执行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不断总结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经验，用来武装全市地下党员。学生运动发展壮大，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二）学委的组织系统，学委——区委（大团体党组）——基层支部，党员多的学校成立总支，各校支部是各校学生工作的地下核心组织。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我们在主要的大学和中学都建立了支部。著名大学党的力量很强。从抗战到上海解放，上海学生党组织系统没有一个支部被破坏，这在地下党历史上是很成功的。

（三）学委对学生运动的领导通过两个系统实现。一是党内系统，即学委、区委、党支部，把中央、上级党委的指示传达到每个党员。另一个是通过公开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秘密的），布置全市性的集中斗争，如学委通过学联党组，把党的主张和号召传到各校学生会和全市学生。

（四）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委执行“七大”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总方针，在学生中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从 1946 年起，每隔半年出现一次高潮。

（五）从全局看，上海各校的国民党三青团处于绝对劣势。只有个别大学和中学例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国民党三青团

都不行。我们占了绝对地位，可以把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群众动员起来。

（六）在学生运动中，我们很重视统一战线，争取家长和社会的同情。教授和教师是各支部主要争取的对象。

八、1983 年，《关于一九四七 年上海学生五月运动的情况》

此文刊登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44 期上，概述了五月运动的发展过程，约 3000 字。这里选录的是与五月运动时期上海局对学委的领导一段相关的记述：

“五月运动时期，上海学委的上级直接领导人有钱瑛同志和张承宗同志。他们经常出席学委会议，传达上海局的指示和指导学委的工作。他们传达上海局的指示，有时采取发表个人意见的方式。同时，在一些关键时刻，刘晓同志也直接找学委，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我记得，当时上海局对于一月抗暴运动至五月运动的指示，总的精神是：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和蒋管区学生运动的有利形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斗争，同意学委自一月抗暴运动以来决定发动的各项集中斗争。大约在五月下旬，华北学联有人提出‘无限期罢课’的口号，刘晓同志要学委注意斗争的策略，及时改变斗争形式。刘晓找我谈过，他认为这次五月运动有点像 1925 年‘五卅’运动前夕，群众运动发展很快。他说提‘无限期罢课’口号不合适，因为中间群众不能接受，并且会丧失社会同情。他要求学委注意把运动引导向深入发展。”

“除了上述的上海局对于群众运动的指示精神外，学委在运动期间，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的决定，例如成立上海学联，撤退暴露的党员，组织营救被捕学生的措施等，都是在事前请示钱瑛同志或张承宗同志以后才执行的。”

“钱瑛是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来上海的，上海局成立时，她是以刘晓为书记的上海局领导成员。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等从大后方撤回北平、天津，学生党组织也跟着到平津，组织关系继续由钱瑛（上海局）负责联系，称为平津南系。上海局还决定成立蒋管区学生运动小组，在钱瑛领导下，不定期举行会议，参加小组的

有：吴学谦（上海）、朱语今（西南）、王汉斌（平津南系）、赖卫民（云南）、洪德铭（杭州）等，主要是互通情况，交流经验。钱瑛曾要求把上海的一些经验介绍给各地。”

九、1996年，吴学谦为张承宗所著《晓珠天上——往事回忆及其他》一书作序

1996年张承宗同志的文集《晓珠天上》即将出版，这是他此前出版的另一文集《红艳千般》的姐妹篇。其时已在病中的张承宗请吴学谦同志为之作序，吴学谦欣然同意。由我们拟出初稿，经吴学谦同志审阅修改而定。

序言首先说：“张承宗同志的文集《晓珠天上》即将出版，我先读为快。读着他的文稿，就使人感受到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新事物的满腔激情。”

接着说：“我知道，早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张承宗同志就花了一年多时间，组织力量出版了《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上、中、下三册，收集了上海解放前各系统地下斗争的回忆录，我写的《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也在其中。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时候是憋了一股子气的，因为十年动乱中把地下党、白区斗争说得一塌糊涂，横加指责，甚至恶意诬陷，出三册纪念集，也算是一种自我平反。他说，我们参加过这个斗争的同志不写谁写，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后来，在《红艳千般》文集中，他更是用许多笔墨，比较系统地回忆总结了上海地下斗争，回忆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工作。当时，刘晓、刘长胜等同志或年迈多病，或已作古。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王尧山、张承宗等一批老同志的牵头，没有张承宗同志等这样自己动手执笔，那么许多珍贵的史料将会缺失和湮没的。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接着又说：“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的笔并不仅仅止于历史的回忆和总结。他的目光和笔触更是紧紧地注视和反映着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各个方面的新事物，这部《晓珠天上》所收录的主要就是这样的文稿。他表达了自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决拥护，字里行间充盈着一股油然而

生的欣喜之情。我们许多老同志，过去为人民的解放而投身革命战争或地下斗争，今天年纪大了，老而弥坚，依然深切关注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步伐，正是因为我们始终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个我党的根本宗旨。张承宗同志把他的这种思想，这份情意，倾注在了他的文集里。也正因为这样，他能以高龄之人，广交各界朋友，把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做到海外，为了人民的利益，胸怀坦荡，挥洒自如。”

在草拟的原稿中，原来有这样一段：“承宗同志长我十来岁，是地下时期领导过我的老同志。在他领导我的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学谦同志作了重要的修改和增补，在“领导过我的”前面，加上“直接”二字，成为：“承宗同志长我十来岁，是地下时期直接领导过我的一位老同志。”并且又增加了“他工作勤奋，思想解放，作风细致，实事求是”的一段评语。

十、1997 年，吴学谦为《浦江忠魂——张承宗纪念文集》作序

1996 年 12 月，张承宗同志逝世。不久，老同志们着手编撰《浦江忠魂》一书以志纪念，再次请吴学谦同志作序。1997 年夏，吴学谦在参加香港回归活动回京后，审阅了我们代拟的序言草稿及部分纪念文章，于 8 月 21 日托毕玲同志在我们的草稿后面写道：“老吴已阅此稿，他说这稿子写得很好，把他要说的话都写出来了，非常感激，没有什么修改，请发稿。”

序言这样说道：“去年春天，承宗同志在病中。他让我看当时他即将付梓的《晓珠天上》文集稿，希望我写一个序言。我拜读之后欣然命笔。一年之后的今天，我再握起笔来，为承宗同志的纪念集写这篇序言，我的思绪仿佛还留在一年之前，总觉得他还没有走。”

“时间有时是很无情的。去年一月我就得知他患病。五月我去上海，到医院看望他，医生向我说了他的病情，我在他的病室里待了很久，说了话，留了影。我们一心希望他能恢复过来，到年底终于未能留住他。”

“然而时间抹不去这位老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我们心中的重要位置，他的人格力量始终深沉地感染着大家。这一点，从这本纪念集的许多文章中也都反映出来了。”

序言较详尽地叙述了他与张承宗的交往，具有文献价值，摘录如下：“承宗同志长我十来岁，是地下时期直接领导过我的一位老同志。我和他相识，是在五十多年前的1942年秋天。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为日伪所统治，环境更趋恶劣。中央为了保护白区党组织，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从上海撤至根据地，区委以上的负责干部也相机撤退。省委驻地移到了淮南根据地天长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西北面的泥沛湾，附近有个叫顾家圩子的大庄子则是我们干部训练班的地点。我就在那时认识了承宗同志，他是从省委情报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撤至那里的。1943年三、四月间，华中局撤销江苏省委的建制，成立城工部，仍然领导原省委所辖的工作。刘晓和刘长胜同志先后担任部长，承宗同志任秘书兼组织科长，我在部内担任调查研究工作，这样接触就更多。我们一起参加整风，还参加部队活动和生产劳动。他平时话不多，但很善于思考。我们性格相近，我很尊重他。记得当时不断地有上海党的各委、各方面的同志，张祺、陆志仁、马飞海、王中一、刘峰、张本等来汇报研究工作，大家相见很是热烈亲切。我和承宗同志住在一个房间，有一段时间同住的先后还有浦作等同志，我们空下来就议论上海什么时候能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用怎样的方式解放。还议论解放后一定要把跑马厅改造成为‘红场’那样的广场。当时日本还占领着上海，但大家对前途充满着乐观和信心。有一天晚上，承宗同志突发急性阑尾炎，长胜同志让我们几个年轻同志用门板把他抬到卫生部医院，崔义田部长亲自给他动手术，长胜同志在他床边守了一夜，这就是当时我们同志之间质朴而真挚的感情。

“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中央指示要从农村工作为主转到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并重，里应外合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我和城工部一些同志又被派回上海。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

华中局决定成立以刘长胜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承宗同志担任市委委员。他迅速赶回上海布置党内的各委同志，学委系统他找到张本、陈一鸣和我，传达了中央关于发动群众、里应外合、以武装起义来配合新四军进攻上海的指示。稍后，中央又审度了当时的形势，撤销了对上海进攻，停止武装起义，地下党仍转到继续长期隐蔽，开展群众斗争，壮大人民力量。此后几年，开辟和发展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上海地区波澜壮阔又艰苦扎实的斗争中，在上海局和刘晓、长胜同志的领导下，承宗同志负责上海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运动，有一个时期曾分管联系学委。后来他担任市委书记，我也参加了市委，我们共同战斗直至上海解放。'丰记米号'就是在1945年9月，我和有关同志协助承宗同志筹划建立起来的市委秘密联络点。

"上海党组织非常重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抗战胜利后，上海学生系统的群众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放手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从生活斗争着手，逐步引导、提高、与政治斗争结合。许多'非法'的工作，我们用合法形式来做，注意掌握斗争艺术，同时始终致力于发展统一战线。上海学委系统党组织的，这些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策略运用上的经验，深得中共中央上海局分工指导全国青运工作的钱瑛同志的赞赏和肯定，并向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推广。可以说，这与承宗同志早期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基层群众工作积累也是分不开的。想到当年我与他的接触，我记忆的屏幕上会不时闪出一个个镜头：1946年'六·二三'反内战大游行前夕，刘晓同志和承宗同志向我们学委传达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有关指示精神，并要求在大游行中以学生起带头的组织作用和公开的指挥作用。游行当天，承宗同志和张执一同志等一起来到设立在北火车站附近天目路上的秘密指挥部，和我们学委同志一起指挥游行队伍。还记得1948年初的一天，学委和国立大学区委正在研究部署抗议港英当局制造的九龙暴行的斗争，承宗同志特意打来电话，指出'要多买一点美国货'。这是暗语，意即斗争的主要矛头要针对

美蒋，不使国民党当局欲将事件局限在‘反英’上，转移人民反美反蒋视线这样的图谋得逞。还记得上海解放的前夜，在非常紧张而繁重的战斗任务中，承宗同志十分重视抓紧、抓实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上海各方面情况的大量数据和资料，为上海的接管作了充分准备。

“解放后，我很快调去团中央国际部，以后我们工作不在一起，但彼此的情况仍时有所闻。1951 年，我陪同世界青联主席贝林格到上海，抽空去看望承宗同志。我在结束陪同外宾的活动后，趁便在上海与毕玲同志举行了结婚仪式。承宗同志代表刘晓同志和他本人，特地来向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就在那一次，我们原上海地下市委的全体委员，根据承宗同志的安排，由负责世青联接待任务的浦作张罗，在外滩和平饭店一起拍了一张照。这是解放前夕领导上海革命人民，配合解放军的进攻，开展护厂护校，使蒋匪破坏计划归于失败，并协助解放军顺利接管，全市秩序迅速恢复的，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上海市委，我们那一班人留下的唯一照片。

“粉碎‘四人帮’以后，承宗同志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来看看我们。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担任繁重的领导职务的同时，立即把注意力投向党史和人民革命运动史的征集编撰工作。正因为有王尧山、张承宗、张祺、陆志仁、马飞海等上海党史征委会一批老同志的亲手带动，才使上海的党史和人民革命史工作有了丰硕成果。这不仅早已把十年动乱中对白区斗争和地下党的恶毒诬陷击个粉碎，而且使当年在第二条战线中心地区之一的上海，成万共产党员，几万积极分子，广大人民群众和无数爱国人士，其中包含着已经牺牲了的许多英烈，这样一支巨大的队伍，艰苦战斗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经验，在相当程度上得以保存和再现。

“同样令我们十分钦佩的是，承宗同志晚年在致力于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的同时，他的思想、目光和笔触，更是紧紧地注视和反映着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新事物，并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写了许多文章。他早年长期从事党内工作

和领导群众运动，而在晚年出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协的领导工作。他同样能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把港澳台和海外同胞的爱国团结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有创造性。可以说，这是他思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根本准则的又一次升华。”

十一、1997年，在上海市纪念“五 · 二〇”运动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五 · 二〇运动是第二条战线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

1997年5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教卫党委和共青团市委，召集部分老同志和青年学生代表，在上海友谊会堂，举行纪念“五 · 二〇”运动50周年座谈会。吴学谦同志到会作了以此为题的重要讲话。到会的还有王尧山、马飞海、钱李仁、鲍奕珊、吴增亮、陈一鸣，市委副书记陈至立等。第二天，《解放日报》头版作了报道并摘要刊登了讲话内容。2002年5月，在“五 · 二〇”运动55周年时出版的《红浪——五 · 二〇运动在上海》一书，以此讲话为代序。

吴学谦同志在讲话中，对这场运动作了高度精炼的概括和表述，这就是：“‘五 · 二〇’运动是第二条战线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

对于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作了两个方面的集中阐述，他说：“‘五 · 二〇’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有力地配合在战场上同蒋军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为埋葬国民党政权，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了加快蒋政权覆亡的重要作用。第二，‘五 · 二〇’运动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准备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在参加‘五 · 二〇’运动的几十万青年学生中，一大批地下党员、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和积极分子，输送到各新老解放区和农村游击区，或者在蒋管区继续斗争。全国解放后，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有的被选拔为各级党政的领导成员。尽管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不少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有的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

们仍然在科学技术、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各个领域辛勤地工作，默默无闻地为建造新中国的大厦添砖加瓦。有一些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艺术家。其中有不少人已不幸去世。中国人民将不会忘记他们的！”

讲话还寄语当代青年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国学生运动的光荣爱国主义传统，勤奋学习，艰苦奋斗，把个人命运融入祖国的命运之中，在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价值。”他说：“当前，国际上总有一些人不愿看到中国的富强，不愿看到中国人走自己的道路，总要分化、西化中国。我们青年学生就要争这口气，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自尊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十二、1998 年，吴学谦同志为《冲破黑暗迎曙光——同济一·二九事件五十周年》一书作序

序言开头说：“1948 年 1 月 29 日的同济事件离今年已有半个世纪，那时我们这些人都在上海从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许多事情都还记得。而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看的也更深刻些。”然后，就以下几个内容作了阐述：

1. 第二条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创造。

2. 党中央和上海局，在许多关键时刻，从宏观把握到细节部署，领导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发展，保证了学生运动的正确方向。

3. 学生运动在整个人民运动中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是以大约每隔半年一次的高潮，和各次高潮之间深入细致的群众活动，这样的规律向前发展的。

4. 第二条战线中的学生运动之所以成为人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它是党领导下的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一代青年在其中成长起来，他们不但是埋葬旧社会的号角手，而且锻炼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

这篇序言全文约 4000 字，原稿经吴学谦同志审定。这可能是他关于学生运动的论述的收笔之作。1998 年春节，毕玲同志在给上海市委党史征委会学运组陈一鸣同志的信中说道：“寄来的

书(指《浦江忠魂——张承宗纪念文集》)收到,我读后给老吴转述,他很高兴,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我读好几篇文章很感动人,可惜我们二人都不能写了,尤其是老吴。”

回望历史长河,一路编摘至此,我们心中充满着对吴学谦同志的敬重和感激之情。他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和上海学生运动这许多珍贵的文字,留下了他的睿智和力量,留下了他在我们心中深深的怀念。

附录：

上海不了情

· 吴学谦 ·

我是上海人，祖父是上海郊区杏林县真如镇的农民。我从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在上海念书、长大。我的进步思想也是在上海得到启蒙。随后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直到193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现在粗略地回忆一下参加革命以前的一段生活。

家庭盛衰

在我出生以前，我的祖父已离开真如到市区英租界一家姓徐的公馆当马车夫，他工作勤奋，为人忠厚。他省吃俭用，积蓄了一些钱，就离开了徐公馆，独资经营出租马车的生意。不久，上海盛行汽车，他改营汽油和汽车零件买卖。我的家庭经济进入“小康”，在我幼年时家庭生活相当富裕。

在30年代前后，世界经济进入危机，波及上海。加以我祖父是个文盲，不善于经营商业，家庭经济急剧恶化，商店倒闭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1937年），我家已从“小康”降到城市贫民。

两种不同的教育

我进小学时正逢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夺取了政权。我在市立和安小学读书，使用的教材是国民党统一编写的，宣传孙中山，每周朗读一遍，并在周会（星期一早上）讲孙中山的故事。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本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开火），所称淞沪战争。我家中急于盼我将来成为洋行职员，好

挣大钱。因此想尽办法让我考入洋人所办的“格致中学”,此学校归英国当局公部局所管,其学制不同于一般。它实行从高小三年到高中共八年一贯制。校长是从英国请来的,还请了许多英国人当教员。学校课程表面上英语课同中国语文课并重,实际上除了地理、历史等课程用中文教材以外,其他的物理、化学、数学等都是英文教材,甚至手工课也是英国人教。如果让中国老师教,他们也得讲英文。其时见到英国教师要叫“Sir”或对女教师叫“Madam”。校服是蓝布大褂,再戴上一项英国式的学生帽。这是一个洋气十足的;又是盖上半殖民地烙印的洋学校。但是老师工资高,学问水平也高,学校管理也严,所以学生们对于基础课学得比较扎实。

我进入格致中学的时候,感到同和安小学大不一样,书包很沉,内装好多本进口的教科书,还有从国外进口的练习本。这些书和练习本,必须从外国书店才能买到。每天上课学英文要占去一半以上时间,听英文、讲英文、念口诀。在上海人看来这是学习“吃得香”的学问,学生中也有人以为这样学习使自己“高人一等”。但大多数学生还是不满意的。在我学习不久,高年级同学一是为了反对学费太高,二是为了英语教材中把中国人有辫子,翻译成“猪尾巴”(Pig Tail)。同学们很气愤,反对这种做法。学校里请来了一位新老师,那时我已上高中二年级,这位老师叫余之介(已故),他给我们上国文课,他启发我们认识社会,认识抗战,并让我们阅读左翼作家的作品,使我们对新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产生了兴趣。从而关心国家大事,注意正在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觉得我们不能再糊涂地读书,要改变生活!我们既已懂得了新道理,就想要有行动,开始广泛地阅读进步书籍,并出刊物,经常与几个同学共谈国家大事及自己今后的出路。

上海名为“孤岛”,因为它属于英法帝国主义管辖,日本人不占领租界,但人们的思想是管不住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各种形式已经在这“孤岛”上发展起来。党在学生界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

在各校建立了“学协”小组，开始时是半公开的，到了1938年已转入秘密状态。我就在那时参加了“学协”，也就是找到了革命道路。“学协”的革命火种在格致中学迅速传播开来。到了1939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在上海学生中继续开展工作，扩大团结面，发展抗日的力量，上海地下党领导按照中央的指示，定出“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39年到1940年上海学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汪斗争”。我已于1940年高中毕业。到那时，格致中学已有五位中共党员，“学协”会员更多。这是在洋人所办的中学中开辟的第一个坚强的学生运动阵地。

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

· 吴学谦 ·

抗战以后，中共江苏省委按照毛主席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字方针，在上海的工厂、学校、商店、银行等基层单位重建党的地下组织，开展群众工作。负责开辟学生工作的上海学委，在江苏省委领导下，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白区工作方针，紧密地依靠群众，坚持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条件，开展多种形式和内容的群众活动，不失时机地领导群众同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在广泛的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和党外积极分子队伍，积蓄力量和保存力量。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将近12年的艰苦奋斗，到上海解放前夜，党的学生工作已经有了强大的基础：在全市主要大中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在大多数学校的学生会中确立了进步力量优势，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联成为各校学生会的指挥中心。上海学生经过反对日本侵略者法西斯统治和针对美蒋统治的大规模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锻炼，他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了，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里就上海解放前三个月的学生运动作一简略的回顾。

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可以分为解放军渡江以前和渡江以后两个阶段。在解放军渡江以前，上海国民党当局虽然已经公布“戒严法”，实行法西斯统治，但由于南京政府为了争取喘息时间，还在玩弄假和平阴谋。它对上海的革命群众运动暂时又收起

赤裸裸的血腥镇压的手段。国民党控制的各学校当局，眼看着蒋家王朝分崩离析，行将覆灭，他们中的多数都在考虑自己的前途，不愿再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充当镇压学生运动的凶手。因此，我们还可以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开展公开合法的群众运动，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发展党组织，为解放上海的最后决战做好准备。解放军渡江以后，面临死亡边缘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于4月底对上海各校学生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中，上海学生运动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各校党组织紧密地依靠群众，同群众一起坚守阵地，坚持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存了力量，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1949年3月初，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发动蒋管区群众运动配合我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的指示，在各校开展了揭露“假和平”阴谋、争取“真和平”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是结合各校群众为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许多具体斗争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群众对于国民党当局叫嚷的“全面和平”毫无兴趣，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上海什么时候解放？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前，怎样才能在反动派的暴政下安全地生存下来？针对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提出了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储粮应变、争取生存、争取“真和平”的口号。这一口号不仅反映了广大学生群众的要求，同时也符合教职员工和大多数学校当局的利益。因此，运动具有广泛的基础，超出了学生的范围，从而形成了以学生群众为基本力量、团结教职员工、联合一部分上层当局的广泛统一战线。

这次运动首先在国立大专院校普遍开展起来。当时，家在外地的自费生断绝了经济来源，交不出伙食费，要求实行全面公费，得到了绝大多数有能力交费的学生的支持。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强烈要求全校学生采取行动，展开争取全面公费的斗争。在教职员工方面，由于伪金圆券日夜贬值，物价飞涨，工资收入根本不可能维持生活，他们要求按物价指数发薪，希望同学们给予支持。

我们在开始发动争取“真和平”的群众运动时，并没有同上

述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这就使得运动局限在少数先进分子的圈子内，而如果让群众的争生存斗争停留在单纯的经济要求上，那么这一斗争就可能被敌人分化瓦解，甚至遭到残酷的镇压。为此，党组织作了如下布置：

1. 各支部发动群众支持自费生的斗争，成立 10 个国立大专学校争生存的联合机构，加强领导，把群众实行全面公费、按物价指数发薪的要求同当前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作为宣传工作的中心内容，说服群众在具体经济要求上不对国民党反动派抱幻想，根据斗争策略的需要，准备作必要的让步，适可而止，动员群众积极参加争取“真和平”的政治斗争。

2. 在各校争生存的合法斗争掩护下，开展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活动：建立各种内容的护校队，如纠察队、救护队、宣传队等，而以发展宣传队为重点。参加宣传队的同学组织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学习党的城市政策；收集材料编写街头活报剧、学唱解放区流行歌曲，排秧歌舞，画宣传画；利用民众夜校打入原有的民校或者开办新的民校，并开展学校附近的工人和贫民的工作，等等。此外，还组织一部分同学分工调查收集全市各区社会经济情况和战犯特务的地址、名单。这些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参加，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市大中学校。群众通过这些活动，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解放上海同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各种活动。

在群众已经发动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各校群众组织的领导。党组织决定利用当时敌人表面上对学生活动有所放松的时机，在下列两类学校中发动了改选学生自治会的斗争：一类是在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最重、学生会领导权被三青团、国民党特务控制的学校；一类是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还没有建立起群众自己组织的学校，许多中学属于这一类。这次改选运动除了个别学校外，都搞得很好，参加投票的同学达 90% 以上。许多中学把改选自治会同讨论应变计划、组织宣传队的活动结合起

来，进一步发动了中间群众。到4月中旬，我们在全市62个大中学校建立了全校性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它们在各校党支部的秘密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通过上海学联的渠道，在大约30个没有党支部的中学加强了进步力量在学生自治会中的影响。

为了确保党能领导学生群众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上海党组织决定抓紧当时的时机，大胆吸收一批新党员，扩大非党积极分子队伍。这次大发展既是形势的需要，也具备了客观条件。1948年秋天，上海党的学生组织曾经有过一次大撤退，把大约一千名在历次斗争中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通过秘密交通转移到山东、皖西和浙东等解放区。这次撤退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党的各级组织隐蔽得更好了，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许多支部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数量减少了，不能适应当时群众运动的规模和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上海学生经过1947年以来历次政治斗争的锻炼，觉悟大大提高了，其中的积极分子盼望着早日参加组织。他们迫切要求党加强领导，使自己的斗争跟得上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这次发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绝大多数新党员是在斗争中表现好，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先进分子。

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各校积极分子要求立刻成立全市青年团组织。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我们坚持各校积极分子组织相互间不发展横的联系的原则，在每一所学校内部，也以分组活动为主。为了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并为解放后建立青年团作准备，我们一方面放手扩大各校积极分子队伍，同时加强了对这些组织的领导，在学习上和工作上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这次大发展，党在重点学校的支部组织加强了，同时还开辟了一批新的中学。到解放前夕，上海学生系统的地下党员大约有2000人，党外积极分子5000人。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同一天，南京11个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6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

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血腥镇压，打死学生2人，伤100余人，造成“四·一惨案”。这次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两面派面目，激起了上海学生的极大愤慨。各校支部立即分头发动群众用召开追悼死难同学大会、举行罢课抗议、募捐慰问受难同学家属等方式，支援南京同学的斗争。上海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恐慌，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头子到各校巡视，恐吓校方和学生，扬言谈判一破裂，就要立即大逮捕，“格杀勿论”。各校的特务也活跃起来，竭力搜集黑名单，对积极分子监视盯梢。种种迹象表明，反动派就要动手了。最后决战即将来临。为了保存力量，坚持到胜利的明天，我们必须改变斗争策略和活动方式。对南京“四·一惨案”事件我们没有组织全市学生的联合罢课和游行示威，并要求各校的支援活动及时结束，以便集中力量去整顿和加强基层群众的战斗组织：

（一）把原来组织在学生会等合法团体中的同学，在自愿的基础上统一编入护校（即纠察）、宣传、救护等大队。每个大队的编制270人，下设中队（90人），分队（30人），小队（10人），以大队或中队作为独立活动单位。队长和副队长用指定和选举两种方式产生。在党内，我们把一校（力量强的）或数校编为一个区大队，准备以后由地区指挥部统一领导。

（二）组织队员学习和接受训练，主要内容有学习党的城市政策、纪律和群众观点教育，以及业务训练等四项。

（三）把护校同开展学校周围地区的工作结合起来，要求各队把每个队员分配到一定的具体工作岗位上去。这项工作由于局势发展比预料的快得多，没有普遍展开。但它使我们的组织工作比过去更加深入细致了。

整编群众战斗组织的工作，是在半公开的状态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对群众是公开的，对敌人是秘密的。在解放军渡江以前，全市组织在战斗队里的学生超过了万人。几个重点学校有组织的学生占全校学生的80%以上，一般学校约占30%。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绝接受和平条件。4月

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大军全面渡江，上海形势顿时大变。上海国民党当局在头几天惊慌失措，乱作一团，顾不上对学生发动进攻。各个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少数属于国民党嫡系的反动校长，有的逃跑了（如暨南大学的李寿镛，大同大学的胡敦复），有的隐藏起来。多数学校当局则不再限制学生的活动，甚至积极参加护校工作。上海党组织估计，上海的解放已指日可待，但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外围之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备敌人垂死挣扎，不要过早暴露力量。我们向各支部提出，号召各校师生员工团结起来，保护学校，照常上课。实际上照常上课这一条已经做不到。许多学校的同学已经自动带上纠察臂章在学校周围布岗，老师们也没有心思教书了。4月27—28日两天，群众中传说解放军已经逼近上海，敌人准备不战而退。同学们情绪更加激动。党内外存在着急躁情绪。有些同志怀疑敌人是否再有力量进行全面镇压。但就在这时，敌人动手了。

4月28日晚上，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出动了万人以上的军警特务，于深夜一时团团包围各个学校，越墙而入，根据他们事前收集的黑名单、照片，挨屋搜查学生宿舍，直到29日上午11时才撤走，这次大搜查，被捕学生350名左右，其中党员约70名。由于我们事先知道了敌人要大逮捕的情报，及时采取了防卫安全措施，一些最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转移，各校支部负责人和大部分群众领袖隐蔽得比较好，都没有被捕，各校党组织和群众战斗组织的指挥系统都没有遭到破坏。

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宣布紧急疏散15个郊区学校的学生，限令两天内离开学校，否则强制执行。这15所学校包括全部国立大学和几所重要的私立大学和中学。它们是学生党组织的主力所在。敌人的这一手使我们的群众工作一度陷入混乱状态。家在市区的同学都回家了，无家可归的外乡同学则在市区流离失所。原来的联络系统完全被打乱，不起作用了。

敌人的血腥统治使我们的群众工作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当时的形势下，党的地下组织系统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

以便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因此，只能继续采取分散的、逐级联系的方法同群众保持联系。同时由于半分开的积极分子组织和群众战斗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状态，这种联系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我们必须在最短时期内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必须想方设法地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一万多同学重新组织成一支随时能出动的战斗队伍。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依靠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党的组织系统，各校支部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努力，全部恢复了同群众的联系。各校支部以积极分子为骨干，重新整理群众队伍，按原来的编制，建立联络网。党员和积极分子分头走访同学，报道解放军胜利进展的消息，说服群众行动起来，为解放上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克服部分同学坐待解放的消极情绪。各支部还以合法的同学关系为掩护，以小队为单位，发动群众讨论上海解放时我们应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并布置具体的准备工作，如制作统一的纠察队臂章、举行小队紧急集中演习、调查预定的看管对象住所周围的情况等。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使党组织能随时指挥战斗，我们改变了每星期接头一次的上下级联系制度，在支部以上的各级组织建立了日夜办公的秘密机关和紧急联络系统，保证党的指示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传达到基层。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在5月初决定建立秘密的市纠察总部（人民保安队）和宣传总部，准备在解放时统一指挥全市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的行动。市以下是各个地区指挥部，确定沪南区、西二区（新成、静安、长宁）和沪北区以学生为主力。上海学生参加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的总数约有15000人。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在解放军解放上海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为解放军做向导，搜索残余敌军，提供敌情线索，协助接管敌伪财产，保护工厂、学校、公司、机关不受破坏，向群众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于恢复上海的社会秩序和人民正常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

十年地下斗争（之一）

· 吴学谦 ·

1939年5月，我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生活的根本转折点。其中上海地下党的十年（1939年到1949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十年，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革命观，我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私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党内关系和同志关系等观点，都是在这十年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在参加党以前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充满着小市民意识（尽管是天真的、纯洁的）的社会青年。读书不用功，生活无目的，胸无大志，得过且过。但这一段时间不长。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社会环境剧变，家庭从小康转向贫困，以至于日常生活来源没有着落。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个人前途渺茫，我越来越不满现状。在左翼书籍的影响下，我迫切要求投奔革命队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黄煜椿首先找到了上海地下党学生工作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经过黄的介绍，我开始接触到革命组织，先是参加学协，后来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初期的上海党组织刚经历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几年的破坏，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派刘晓同志从中央苏区来上海进行整顿、重建和发展上海党组织，当时是一个极好的时机，上海人民抗日意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地卷入了抗日斗争的高潮。

入党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习和坚决执行中央为纠正王明路线而提出的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这个16字方针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据老一辈同志说,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上海地下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大批同志被捕牺牲。例如,每逢革命节日就要自上而下地组织“飞行集会”,依靠少数党员和积极分子,在约定的时间,在南京路等热闹街道上聚集在一起,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随后立即解散。每次这类集会,总要有同志被捕、牺牲。每次准备举行这类集会斗争时,都不研究群众有没有这种自觉的要求,也不讲究斗争策略,不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是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孤立,牺牲越来越大,团结群众的圈子越来越小。少奇同志曾尖锐地指出,这种做法客观上是帮了敌人的忙,敌人可以从每次集会斗争中知道我们的底细,参加斗争的不是我们的党员就是党外积极分子。这种错误的做法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才开始得到纠正。

我在入党学习16字白区工作方针时,只有17岁,既不懂理论,也没有实践经验。对16字白区工作方针这个党内术语,也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很新鲜,但是对这个方针根本不理解。当时同我接上关系的第一个同志(康年,即俞正平),不厌其烦地,尽量通俗地向我讲解。为了防止在家中谈容易被人发觉,因而都是在马路上(上海西南区行人较少的地区),边走边谈,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使我对16字方针有了模糊的、肤浅的印象。尽管如此,我决心按照组织布置的三条去做:

(一)绝不能把参加党的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中的亲人,最要好的同学也不能讲。总之,绝不能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

(二)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上海将长期处在敌人统治下。目前上海租界地区尚未被日本统治,我们可利用当时有利条件来进行某些合法活动,但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形势很快将会变化。要准备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我仍能长期坚持地下斗争。

(三)同家庭和邻居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学校要用功读书,尊敬老师,做个好学生,逐步在同学中开展交朋友的工作。

以上这三点我在日常生活中执行了。通过实践我逐步理解到，革命不总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要埋头苦干，做无名英雄，点滴的工作最终才能汇合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这是我入党以后在实践中上的第一课。从此开始了我的日常革命生涯——交朋友。

我这种对革命工作的理解是逐步深化的。要做到坚韧不拔、耐心地做点滴工作以积蓄革命力量，我开始对这样做很不习惯，觉得无从入手，也看不到成果。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交朋友工作的意义。上了这一课，我的日常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把家庭的日常生活，学校的学生生活都同坚持地下斗争联系起来，觉得这样生活很有意义，精神上很愉快，自己感到我在变化，这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入党以后我能看到党内出版的用蜡纸手抄的秘密油印刊物，同时也更加自觉地阅读马列主义的书刊，我的眼界逐步扩大了，我开始学做团结群众的工作，同他们谈论抗日战争的形势，讨论青年在抗战中应起的作用。我在工作中开始懂得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这样去做，革命力量不就是逐步壮大，越来越强了吗？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做的工作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从此以后，我一直怀着满腔热情去对待工作和学习。家里人也发现我变了。我不再对日常的吃穿用提什么要求，在学校就是找争取团结的对象，一回到家，不是看书，就是有同学（主要是党的关系）来谈话。对工作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不到一年时间，在我的母校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我开始看到了工作成果。成立党支部后，工作也有了新的起点。

支部初成立时，虽然只有三个人（后来发展到五人以上），但同刚入党时个别联系就不一样了。支部联系群众的范围扩大了，活动的方式多样化了，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了。党支部在全校群众中的核心作用日益明显起来。

支部的组织生活是很严格的，但同志间的关系是非常热情的。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间无言不可谈。支部是开展群众工作的核心，同时也是这些刚入党的青年同志的

学校。虽然处在地下，活动受到限制，由于建立了一套合法掩护的办法，我们的支部生活是经常的，内容也是丰富的：

（一）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要求每个支部成员把自己的政治面目掩护好，处理好家庭及其社会关系，个人的合法身份，严格遵守党内联系、接头方法，党内会议的掩护、应付紧急情况的办法等。支部要经常检查执行的情况，改进和弥补工作的漏洞。

（二）经常研究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交流经验。每隔一段时间要做（个人和支部）群众工作的总结。

（三）思想教育工作。完全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联系一个时期的思想，有什么谈什么。如果有什么问题，启发同志自己谈，别的同志从旁帮助分析。当时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与人为善，提高同志们革命自觉性的良好愿望。严格执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这个“三不”我是在解放以后才听说的。以为这个“三不”的目的是鼓励大家敢说心里话，敢说真话。而在反右斗争时“三不”却被公开解释为引蛇出洞，搞“阴谋”。当时上海的学生党组织每次开这类生活会，大多数同志都很活跃，都愿意讲自己的思想，愿意听别的同志对自己提意见。党组织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强调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而不追究责任，也不轻易给以纪律处分。

有了这样的真正同志式的气氛，绝大多数同志都可以做到无事不可告诉组织。因为他们没有恐惧感，他们相信犯了错误不会受惩罚，不会使你过不去，相反地，还可以向组织解释；对组织的批评，一时想不通的，组织也不会苛求，而且会允许让自己再去想想。可以说，上海地下党的学生支部党员，绝大多数是团结的，能够做到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真诚无私的相处。

当时，同志们思想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家庭、处理好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因为在白区环境下，地下党员随时可能因各种原因被捕。这就要求每个同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能够经得起敌人的盘问、拷打，甚至是生死的考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坚持用正面教育的办法；经常教育大家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

律，同时进行共产党员气节教育，帮助同志树立起为革命理想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大无畏精神。如果发现有同志被捕，组织上一方面想办法保护组织不受破坏，另一方面尽量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

另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是，不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这对刚入党不久的年轻学生党员来说，是最容易犯的错误，而其结果，往往使组织受破坏，同志遭逮捕，因此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抓得特紧。以我为例，有一次，我同一位同志约好在某地取“发展新党员报告”（即新党员的入党申请书）。那时刚发生“太平洋事变”，日军侵占了夏威夷，接着侵占了上海的“孤岛”英、法租界，但未接管。我同那位同志约定傍晚某时在法租界小花园碰头，对方没有准时来。秘密工作纪律规定，不按时接上头就不能等，更不能在公共场所递交秘密文件。那次我麻痹大意，多等了大约十分钟才接上头。我的这一行动被法租界的侦探发现了。我当时丝毫没有警惕有人已经注意到我们两人接头的行动，仍然接过了对方带来的两份伪装成邮寄信件的秘密文件。正在交接时，那个侦探就上前拿走打开看了。一面看，一面观察我们的形态和神色（我们当时都是中学生打扮）。我们谎说，这是别的同学托寄的信，我们好奇，想打开看看。侦探翻了一下这两封信，随即把信还给我们说，“这不是信嘛，快走，快走！”我们拿回信后就此脱身。

这是一个由于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而差一点出事的相当典型的例子。

安全回家后，我及时向组织报告了。后来组织分析，这位侦探大概出于爱国心，没有把我们逮捕移交给日本占领者。向组织汇报这事时，我心中很难受，准备接受批评和处分，但组织对我犯的错误不是横加训斥，而是强调要从中吸取教训。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当时怎么也想不到25年以后，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旧事重提，成为怀疑我是“大特务”、“大叛徒”的根据之一，在牢中多次提审，反复调查。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处境不同，从而造成两种

不同的局面。当时上海党组织处于日本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之下，不要说每一个党员，就是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党的领导和下层党员同样没有什么特权。我们要生存下去，唯一的依靠就是内部的团结和群众的掩护。如果党的领导不善于爱护党员的革命积极性，不重视教育青年党员学会做秘密工作和其他革命工作的本领，而是疑神疑鬼、不信任他们，那就只有把自己孤立起来，地下党组织就无容身之地。

另一种处境是：党有了政权，包括有了部分地区的政权（如江西苏区、延安），党的领导和一般党员有差距了，前者有权、有势（枪杆子），对受到怀疑甚至心怀不满的党员就可以搞各种形式的迫害，搞逼供信，轻易把一个共产党员错划成反革命分子。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领导是好的，是认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干部政策的。没有这一条，即使在地下党的条件下，地下党领导人凭他在地下环境仅有的一种特权（党内地位）同样可以使党内生活不正常，使一些党员挨整。

现在，离开地下斗争生活已经40多年了，在地下党时期曾经一起工作过、战斗过的同志相互见面时，都会回忆起40多年前的生活，留恋那个时候难能可贵的内部团结的气氛。

当然，也得承认，40多年的各自经历，解放后多少次运动和斗争使我们每个人都经受了磨炼，我们都不再是当时热情奔放的青年了，而是走过了这样或那样坎坷道路的老人了。

我常常问自己：难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吗？毛主席也多次批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文化大革命”那样规模空前的浩劫，斗争的对象却不是阶级敌人，不是民族敌人，而是自己的同志、战友，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为人民所热爱的大批的老革命、老同志。党内斗争竟然如此复杂，如此残酷，多少同志含冤而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希望从此

不再有运动了，不再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当时也有这个信心。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又使我对这个信念产生疑惑了。至今，对这场风波仍旧不能做出客观的结论。这恐怕要从历史、社会方面找根源。

（1991年9月初稿，1995年5月改定）

十年地下斗争（之二）

· 吴学谦 ·

1944年5月，组织决定我重新回到上海，继续搞地下工作。我听到这个决定后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又将回到敌占区前线进行斗争，接受实践的考验了。我从上海调到淮南根据地将近两年。其中有半年我担任上海和淮南根据地之间的秘密交通，一年多在华中局城工部参加在职干部整风学习。这些都使我学到了许多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历史发展的许多知识，思想上、政治上都有所提高，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可以说，两年来的经历使我变成有些工作能力、能办些事的青年党员了。但这只是一个开头，还要看今后在斗争中的磨炼和考验。这次组织决定我回上海工作，确是回到实践中去提高认识、提高能力的好机会。

在离开根据地前，华中局领导刘晓找我谈话。他说，现在国际形势变化很快，日本投降、上海光复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天快亮了。我们现在就要抓紧准备、迎接解放。目前在根据地学习的一批同志，要陆续派回上海，同时要让原来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同志，抓紧时间分批送华中局党校轮流进行短期培训后再回上海。刘晓说，这次派我回上海学委工作，就是为了加强党的学习工作阵地。上海学委由张本任书记，我任副书记，陈一鸣等原来在学委系统工作的同志，也要回上海工作。

当时我听了要回上海工作的消息，情绪很高，内心很激动。心想回上海后，一定要把两年来在根据地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把上海的工作做得更好。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心，离开上海快两年了，上海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情况变得怎样了？

我们在上海能坚持下去吗？能打开新的局面吗？这些问题想来想去，没有把握，心中无数。

5月份的一天清早，我整理好行李，向同志们告别，心中有些恋恋不舍。又想：这次是回去战斗的，恨不能当天就回到上海，心情又有些急躁起来。组织上从安全考虑，派小叶陪同，作为我的交通，负责把我送到边区出境。由于我在边境地区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交通，多次在边区进进出出，心情并不紧张。早晨出发，走了一天，当晚就到我曾经工作过的月塘集。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过夜。第二天清晨就告别了借宿的农民，打扮成商人的样子，向镇江方向前进。小叶按原路回华中局去了。从月塘集到镇江，要经过两面派政权——瓜州渡口才能到镇江车站。车站上人很挤，后来终于买到了去上海的车票，三个小时左右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要通过党的关系找到一个合法的住处和合法的社会身份。经过多次和当地同志商量，决定在学委系统工作的同志家中找，先是在王光华同志家里住了几个月，后来搬到浦作同志家里住下。浦家上下老小都是党的同情分子，我住在那里，他们把我看做自己人，待我很好。与此同时，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合法的掩护（办益丰米行、办立达图书公司，随后又在暨南大学复学）。

经过一番忙碌后，我可以集中精力开始工作了。当时的上海尽管仍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法西斯已开始走下坡路，但它仍在做垂死挣扎。例如，为了维持对上海的统治，他们搞了一套以华治华的办法。把居民以里弄为单位，组织“自警团”，一有警号全市就实行戒严，路上行人就不能自由行动。日本宪兵队整天在街上巡逻放哨。对学校的学生也管理很严，禁止学生集会游行。日军虽然控制很严，但改变不了它的被动防御局面。当时美国盟军已开始对日本反击，美国掌握了在太平洋的优势。

学委讨论后认为，日本法西斯走下坡路越来越明显，垂死挣扎也不能改变它走向崩溃的下场。我们要肯定这一对我们有利

的形势。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上海仍在它的全面控制下，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抓紧内部的准备，利用一切可行的合法机会通过各种合法的形式尽可能广泛地把群众动员起来，在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为将来的大发展准备条件。1944 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活动，认为利用合法条件，搞一些较大规模的合法的“非政治性”的活动是有可能的。于是我们争取了基督教青年会和社会上层、知名人士的赞助，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义卖助学运动，取得了多年来没有的成功。许多学校的群众热烈支持这项活动。长期沉默不语、死气沉沉的状态改变了。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群众越来越多地参加义卖活动，愿意为清贫学生继续读书，贡献一份力量。

义卖运动的成功使我们对上海的形势变化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工作方针也就明确了。从 1944 年下半年开始，发动全上海各支部讨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当时各个学校的工作，从表面看好像平静无事，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学生卷进到准备日本投降，迎接上海胜利的浪潮中去了。也就是说，学生群众已经开始进行群众的自发隐蔽活动和斗争了。突出的例子就是 1945 年春夏之交，上海全市的助学义卖运动有数万人参加，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各界人士赞助和支持，1945 年 8 月，美国在日本大坂和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苏联军队在东北大规模出兵，日本随即无条件投降。日本占领军缴枪投降，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就开始接管上海。更重要的是上海人民的情绪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是争取抗日胜利，现在是要求实现和平民主。而针对形势的大变化，我们的工作方式方法也必须来一个大转变。

上海地下党在八年抗战中，坚持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工作方式方法上，采取个别、分散联系、勤学勤业交朋友。从 1945 年日本投降，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以后，我们在蒋管区的斗争方针就应当是根据群众的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和平民主运动。有条件的地方，要敢于开展集中（形式）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个放手发动群众，

配合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在日本投降后，成为学委的中心工作。当时中央指出："中国已有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又出现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之间的尖锐斗争。

学谦首长，一路走好！

· 朱晞颜 ·

去年的清明节，我是用泪水度过的。通常清明时节雨纷纷，然而2008年的清明节却是清的、明的、蓝的、净的。兴许是天意，兴许是您愿，您选择了这一天，一个全国人民都在拜祭的日子。您安静而又慈祥地走了，没有遗憾，没有烦恼，更没有牵累。在您弥留之际，锦涛来了，您的老战友泽民来了，许许多多国家领导来了，为您，为一生坦荡、两袖清风的您别离送行来了。学谦首长，一路走好！

4月10日追悼会，当扶灵的车队最后一次走过这熟悉的长安街时，车上的我们啜泣、号啕；情不自已，泪湿满襟，痛不欲生。3月27日，当得知您病危时，我从重庆急匆匆赶回北京，所幸抢救及时，平稳安然。毕玲大姐安慰我返转，并嘱要以工作为重，有情况再行通知。4月2日下午三时，正值我在南山上研讨安监条例，接凡明电告，再次冲向机场，跨进北京医院，在苦苦期盼35个小时后，清明节上午9点38分，您真的走了！首长啊，您慈父般的关爱，师长式的关怀，诤友似的关切，历历在目，难却记念！

1994年第一次随同您和毕大姐去江苏，在专列上，您谈笑风生，讲着上海地下党的故事，革命年代的风险和艰辛，共和国发展与变迁，让同行的作霖、怀山、起顺、庆然、向阳、老周等肃然起敬，无不感慨与自豪。那次，我们都多了个绰号叫“农民”，而且彼此称谓“农民”。当您和大姐得知是因为火车上的饭菜好吃，我们几个小字辈贪多几碗，而得此雅号时，您不禁哈哈大笑，好玩儿似的，一本正经地不断地解释说“农民”是纯朴、可爱、勤劳的象征，

是个好称呼。车轮声、谈笑声交织着荡漾在车厢里。也是在那次，在苏北竹桥镇，原新四军地下党联络站，您与当年的老乡和战友的遗孤一起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小日本的封锁，牺牲的战友，您饱含着泪水，紧握着大家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永远会记住大家的，您还会回来看大家的。在竹桥镇原新四军地下党联络站站牌前，我给您拍下了永远值得纪念的照片，这也是您唯一的一张反映当年做地下交通联络地点的照片。当时我还拍了录像，但没能保管好，受潮了，损坏了。只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现已收编到您的画册里了。当然编辑到您画册里的许许多多照片都是我拍的，比如在泰国的皇宫、21 世纪世界论坛、香港回归岁月、上海湖南路 88 号院、浙江雁荡山、深圳的世界之窗等等，太多太多的回味和记忆，首长您还记得吗？

您抱着亲昵的洋娃娃似的小吟之，今年都要考高中了，还时常会念叨着她的学谦爷爷。我不在北京的时日里，晓镛他们又在国外，我爱人也常常会带着孩子们去万寿路家里陪伴毕大姐，毕竟那里有您的音容笑貌，有您的谆谆教导，那里有我们的记忆，那也是我们的家。噢，还得告诉您一个秘密，您可千万不能生气。起顺、小职和我，每次出访陪您玩桥牌时，我们是作弊的，也就是做了手脚的。我们几个约定，每次晚间打牌时，前一个半小时让您开心，把所有的好的点子牌都做给您，就让您主叫主打，目的是让您舒心畅快，达到休闲怡情；后半小时，我们会使眼色让勤务员去放水，准备让您睡觉，就把坏点子牌发给您，这样您就没再打牌的兴致了。一来达到让您休息的目的，二来我们有时晚间也能有外出的机会或者我们几个自己打双扣玩。记得有几次，您失眠，早早地起床了，我们几个还在打牌，您还误认我们早起等着陪您早上散步呢。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浙江考察，当时，金华到兰溪的路正在修建，路很烂，不好走，省里陪同的领导都劝说改变行程而您却坚持说要去，理由是小朱的故乡，您一定要去看看。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心坎，我永远铭记。类似的关怀关爱的事例还有许多许多。又如中协投资的统战联谊工作，您亲自指点，倾注了心血；

又如对我成长，您慈父般的关爱，师长式的教诲，我都永存记念，一生感恩！和您在一起的日子里，真的很开心，很受益；不但学到了您为人谦逊，勤俭朴素，和蔼可亲的品德，还学到了您一生正气，光明磊落，廉洁处事的作风。

八宝山的灵堂，庄严、肃穆，饱含泪水的我和爱人吟泣着、凝视着您，久久，久久地祈福。学谦首长，一路走好！

后　记

时间过得真快，吴学谦同志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吴学谦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人去神留。吴学谦同志去世后，他的生前战友、同事、身边工作人员、家人与亲朋好友，纷纷发表文章怀念他。现将部分纪念文章选编成集，以表达对吴学谦同志深切的哀思。

经过十个月的努力，《吴学谦纪念文集》终于与大家见面了。在策划、编撰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承蒙各方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钱李仁、朱良、李淑铮、梁畊、蒋忠瑜、黄桂芳、唐龙彬、李道豫、毕玲、孙起顺、曲凡明等同志，还有马飞海、施惠珍、浦作、陈一鸣、吴增亮、龚兆元等上海地下党老同志，给予热情的指导与帮助；还要感谢上海党史研究室的帮助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参与编辑的朱成立及其同事们尽心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由于时间仓促，本文集内容不可能全面概括吴学谦同志一生的业绩，难免挂一漏万；所记载的有些事、人名与地名，因时间过久，亦可能有叙述错误之处，恳请读者谅解。

《吴学谦纪念文集》编辑组

2009年4月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zNTI0OT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352491.zip",
    "filesize": 112459683,
    "md5": "2ace30bbc35e0aac5591cda1ee74144f",
    "header_md5": "754ec1b56b874dbdf0e1cdf7313a1594",
    "sha1": "bd690ff4bf15d9da9150d1de3e15e55182af40cd",
    "sha256": "cbff6861f4f6529cb7912e12167993944976709ef091855ab68b198283da8383",
    "crc32": 4083938544,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125043336,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408,
    "pdg_main_pages_max": 408,
    "total_pages": 438,
    "total_pixels": 178247520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zNTI0OT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352491.zip",
    "filesize": 112582775,
    "md5": "a8a943717b4ed2602a3f2de3b7fee4b7",
    "header_md5": "c7bb97d8f2e151c79620482ee70925bd",
    "sha1": "35d92776c4edc106e42bcd718f54822ce1dfafbe",
    "sha256": "07405d7087144524bc45db6c8c71aace562316a5bda8b6d143b08ebc174a96f3",
    "crc32": 183370681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2503675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408,
    "pdg_main_pages_max": 408,
    "total_pages": 438,
    "total_pixels": 2150755200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